

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张立波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 90 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比较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 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旨在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与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则旨在表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历史哲学, 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理论。比较研究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但究竟如何展开, 则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社会理论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BO- 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9- 0005- 0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提出, 已经有大半个世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关注, 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事情了。在 90 年代中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 还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述, 而只是一般地说: 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①“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②或者说,“形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形态——毛泽东思想”。^③

1998 年, 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主持下, 出版了《中国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该书序言中, 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 并强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

但在公开的阐述中, 最初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强调传统文化重要性的, 而是为了批判 80 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风行一时的“西化”思潮。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要得到发展, 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 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国情与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忽略这个方

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二者的结合既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这种认识无疑值得赞赏。的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法避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

问题在于如何展开这些思考。1998 年, 马克思主义“中源”说随着三种著述^④的出版抛头露面, 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这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都有其“中国学脉渊承”, 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文化基础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恐怕是没有根基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否认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意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 17、18 世纪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也不否认从观念演变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必要性, 但是, 即使中国传统哲学, 尤其是其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 这种相通, 也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阐释的结果, 而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 17 世纪以后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往往被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儒学研究开始“解冻”, 走出

“冷宫”，并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由于东亚经济的崛起，首先在海外展开的“儒家思想和现代化”问题研究，引发了大陆对儒家文化的再评价。1984年孔子诞辰2535年之际，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1989年和1994年孔子诞辰2540年和2545年，都在北京召开了规模宏大的纪念会。1995年12月4—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在京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⑤与会学者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大都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抛弃传统文化，区别在于如何批判地继承。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固然有相异、相反、相斥、相绝之处，但确有许多相似、相同、相容、相接之处，二者并非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与会学者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二者能否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怎样结合，并开始探讨毛泽东对二者的具体结合工作。在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再度强调，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某种“超越性价值”，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⑥

在今天，把儒学看作是僵死的封建余毒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始终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发挥作用。如果承认我们依然是生活在传统之中，也就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依然生活在儒学之中。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复兴”并不是一个由学者推动的纯粹学术的复兴运动，其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假若说在80年代，“儒学复兴”主要是源于东亚现代化模式的启示，那么，进入90年代之后，则主要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重新寻求秩序和整合的需要。在此意义上，儒学在20世纪中国的荣辱兴衰，主要是取决于它和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关系，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人们对这种现实关系的体认。

在90年代系统而明确的阐释中，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传统的文化作基础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中蕴含的唯物

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人们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有密切的关系。^⑦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论题转换为比较研究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继而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诸如：二者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等方面有可能契合之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⑧也有论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范畴，是现代唯物主义，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合理解决当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依然具有某些现代价值，这就使二者在现代实践和现代科学基础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这种注意力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也表现出来。在9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探讨毛泽东是如何对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知行关系、有的放矢、一分为二等概念进行利用和改造，以及如何用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是力图从更高的层次上，更概括的文化视野和氛围，特别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挖掘毛泽东哲学的传统文化根基，把握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例如，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致思趋向上看，直接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从思想风格上看，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从思维方式上看，继承了中国哲学“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从文化心态看，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体主义色彩；从表现形式看，是地道的中国哲学。^⑨另外，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研究也得到深化，论者认为二者堪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也有论者认为，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接近于中国古代的阴阳概念，它既吸收了阴阳范畴的实体含义，又克服了其直观性的缺陷。^⑩

其实，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应当是细致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而是一个复

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都涉及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其中历经了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⑮这既有文本上的变化,也有对理论意义上的某些规定性的侧重和主体选择。因此,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考察其概念、原理等发生的种种变化,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过程。这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在此过程中,比较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概念、思想的变化,以及新增补的词汇和术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生的作用和影响。

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如果承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属于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就具有不同的路径,既有中国文化的“自由主义化”,也有“保守主义化”,当然,更有“马克思主义化”。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当说,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积极意义之一,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80年代以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继续。泛泛而谈,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性质上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形态,它既批判地吸取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成就,又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面对现实生活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⑯

在研究中,尚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既是“中国式”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何以“生成”现代化?如何看待“具体继承”与“抽象继承”?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化”的总体目标系统?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双向反思和互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哲学思想的惟一正道。如果说前马克思的西方哲学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资源,那么,和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则是歧途一条,后马克思的西方哲学更是腐朽没落的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自然要求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1985年,即有学者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尤其是列宁逝世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模式,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之间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应开创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⑰这就要求比较客观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在1982年召开的现代外国哲学第三次全国讨论会上,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西方哲学在理论思维上还有没有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到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终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代性这一非同寻常的观点。“同时代性”观念的提出,意味着摆脱了教条的束缚,克服了简单化、扣帽子的粗暴态度,把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加以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各种哲学流派,面临着共同或相似的问题,虽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答案而互相对立,但同时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着的,决不能把它们截然割裂开来。^⑱1999年,有论者进一步提出,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与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是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道路,可谓殊途同归。^⑲

2001年4月,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改革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第一次突破了二级学科的界限,在全国范围内邀请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共商发展中国哲学事业的大计;第一

次明确地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由此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之间的实质性对话。^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主要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内部需要，是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一条必由之路，是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老一辈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应注意吸取和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就，中青年学者则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在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中生长、发展，都在存在论的根基上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革命；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才能深入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也明确指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不仅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深入理解西方哲学的需要，是中国哲学创新和发展的需要。例如，现象学专家倪梁康先生认为，汉语领域的现象学创新之路就在于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承认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但究竟如何展开比较研究，则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这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为例，加以展开。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关联及相互影响是国内外学术界目前普遍关注的理论议题。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开始有保留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并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思想和方法进一步发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与此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试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提供某种启示。这样，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缓慢地接近和碰撞。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大都既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后现代主义，也不以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从学术的角度、思想的角度出发，谨慎地看待二者

间的关系，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思维。

这一比较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现代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又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现代思想与社会进程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反思。二者都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现代思想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当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和处理现代化和“西化”、全球化和民族性等关系，为寻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切实有力的理论启示。

这一比较研究的理论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物质观、实践观、时空观、历史观、发展观等基本理论观念的认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8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申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则当有助于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视野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此同时，也当有助于客观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以对当下知识和思想语境有比较明晰的把握。

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学者，通常重视二者在思想上的对接。这无疑有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忽视的某些视角、概念和范畴，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可能带来诸多偏颇，特别是可能牵强附会地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视域出发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把马克思的思想无限“超前”，从而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的同时丧失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特质。

在我看来，比较可取的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为指导，分析批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又借助于后现代主义对边缘、裂隙和空白的关注，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曾经被忽视、被误解乃至被遗忘的因素，以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结构。这样，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就是从方法的对接上入

手,相互阐释,相互促动,从而不断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即: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构筑了20世纪中叶以来乃至面向21世纪的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文化的重要主题和最强音,则是面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基本议题和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一方面表现在它对当下知识和思想语境的后现代性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它对这种后现代语境的反思、批评和引导。

在比较研究中,应当全面看待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影响。在苏东剧变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批评,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含糊其辞;苏东剧变后,他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和历史教训时,开始有限制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对我们来说,既不因他们赞同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就简单地引之为同道,也不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评,就武断地斥之为异端。例如,德里达一再强调“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但他首先是解构了马克思,然后再继承和发挥其中的某个片断,这样,他所体认的只是“某一个”马克思,或者说关于马克思的某种记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结构已经不复存在。换言之,德里达所拥抱的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国内外学术界都已意识到,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具体到这种影响的程度、地位和正负效应,目前还缺乏翔实有力的分析,如何在这一方面有所深入,仍然是比较困难的议题。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基础主义、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想脉络。我们必须直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批评,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有其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特别是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质、基础和中心的寻求,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规律的探索,也根本不同于宿命论和机械论,从而对后现代主义在体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做出明确的回

应。

目前的比较研究,或流于表面上的相互印证,或耽于牵强附会的解释,缺乏理论深层的比较分析,缺乏社会历史背景的参照。在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中,应注意文本解读和现实分析相结合,既重视相关文本的解读,又注意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效应,注意探讨问题的具体语境,避免本本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误区,以切实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二者的互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纵深和发展,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上探索一条比较稳妥的思路。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理论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发展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理论随之兴起。相比较而言,80年代关注“文化”,90年代转向“社会”;80年代强调“观念”,90年代关注“路径”。在此过程中,社会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历史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

社会理论研究最初集中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方面。论者强调,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同于社会发展单线论。一般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是马克思运用世界历史的方法,从动态的角度说明社会形态在总体上所呈现的演进趋向;马克思在运用世界历史方法研究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时,并不排斥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性以及跳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原理,决不意味着单线论。但是,仅仅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去解释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实际上仍然是把“跨越”现象看成是偶然的,并未真正理解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的“跨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是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不再是一种偶然的、特殊的现象,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现象了。^⑩

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探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以及“跨越”现象,是为了论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90年代决定世界历史理论

的非单线性, 则是为了论证“中国式”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强调“中国特色”。

由此, 发展哲学或者说发展理论研究得以兴起。直接的现实需要是探索“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论者强调, 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适应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 不可能完全适合当今中国现实的情况, 也不可能回答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逻辑。发展中国家面临自己的特殊矛盾, 在困境中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在此过程中, 应注意从两个不同层面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一是要从理论即发展的本质层次上利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去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二是要从运行机制上去研究社会发展的调节与控制方法等。特别是要思考发展过程中的增长与限制、跳跃与持续、均衡与不均衡、推进与逆转、内生与外源、速度与秩序、效益与代价、遗产与包袱、理性与非理性、功利价值与人文价值等。^④由此, 对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发展的代价、效率与公平、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开始了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 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 诸如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类型、劳动、社会关系、共同体联系和社会联系等,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论者依据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范式, 围绕行动主体及其行动的诸方面, 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 社会演进和社会类型、阶级和社会冲突理论, 权力、国家和官僚制, 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分析等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⑤

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研究是从 80 年代中后期起步的。最初主要探讨社会哲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和方法, 总的说来比较空洞, 很少触及现实的社会问题, 致力于“形而上”的框架建构。1992 年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学术界开始关注发展哲学的理论构架, 关于发展哲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和内容, 开始抓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对国外发展理论有所借鉴, 实证研究较多。90 年代中后期后, 社会

哲学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 包括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 提出了一系列能够较为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观念”。^⑥

关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 把历史唯物主义扩展为社会哲学研究, 其内容包括: 社会起源论、社会实践论、社会系统论、社会价值论、社会交往论、社会认识论等。^⑦但众多学者指出, 社会哲学的兴起, 与市场经济的兴起直接相关。一种比较详细的阐述是这样的: 哲学范围内总体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有两种, 一是历史哲学, 另一是社会哲学。前者是从非现实的历史出发, 经过现实, 又指向了非现实的历史, 后者则是从现实出发, 经过历史, 又回到了现实; 前者将目光主要投注于纯粹的理想态, 因而是富于诗意的, 后者不甚关注纯粹理想态而专注于现实生活, 因而是缺乏诗意或散文式的; 前者是一种指向观念的观念, 后者则是一种指向实践或行动的观念。由于这些根本性的区别, 前者能够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相适应, 后者则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相匹配。正是市场社会中人的能动性、可选择性的增强和社会本身人为性的显著化, 使得社会哲学成为必要的和可能的。社会哲学在中国的兴起过程, 亦可视作市场社会与社会哲学内在关联性的一个最为切近的引证。^⑧

黑格尔之后, 传统经典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在此后, 当然还可以用哲学这个词, 但意义已经和以前不同了。此后, 哲学沿着两条道路发展, 一是“心灵哲学”, 二是“社会哲学”或者“社会理论”。毫无疑问, 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理论”的路径。人们一般把社会发展研究分为社会哲学研究、理论社会学和实证问题研究三个层面。其实, 社会哲学研究和理论社会学很难区分, 相对于既有的作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而言, 社会哲学(理论)属于中层理论, 它在历史哲学和实证研究之间上传下达, 注重对问题的深入研究, 以现实问题为中心, 然后再从问题的研究深入到对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理论特别是社会发展研究中, 比较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人的全面发

展、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问题。应当承认,在这三个方面,西方社会理论都已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值得我们借鉴。因此,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都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之相比较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往往局限于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出片言只语,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而没有追问当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首先提出这些问题。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实质在于,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两次提升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人的生存环境,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诸多学者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涵义、类的全面发展等问题,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提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观关心环境和资源,其实质是注重人的发展,是一种环绕人并为了人而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互动的社会发展模式,追求人的完整性,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论者指出,源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与唯物史观有许多近似、相通、一致的观点和理论立场;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对于从理论上深化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者进而指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于唯物史观现代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直接推动唯物史观价值理论的发展,还可以弥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局限。^①

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使得社会发展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内部。全球化的内容之一,是指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全面形成,是金融资本、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期间既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文化的融合。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如

何看待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有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英、美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一种“陷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变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全球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体制方面的影响?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是晚期资本主义。

在全球化问题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名词术语,诸如:全球伦理,全球观念,全球思维,全球发展,等等。如何解决跨文化问题?如何处理文化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系?如何处理世界劳工问题?经济全球化使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生产之中,加大了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就业压力,从而加剧了各个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由此,传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前途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西方已经产生了种种全球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和这些理论的对话中,发展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全球化理论。

①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24页。

②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19页;第2版,第28页;第3版,第35页。

③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第27页。

④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⑤此次会议的论文收入崔水龙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⑥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述要》,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⑦美籍华人窦宗仪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其专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初版于1977年,中译本于1993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该书“第2版序”中提出,除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在西方哲学系统中没有一个与儒家思想更为一致;而且,二者在辩证唯物主义上的一致远大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致。

⑧参见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⑨参见何显明等《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广

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⑩参见陈剑《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 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1期。

⑪参见李鹏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西文化关系》, 载《哲学动态》2000年第9期。

⑫参见纪光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谈论综述》, 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3期。

⑬参见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年, 第295-300页。

⑭参见《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II页。

⑮参见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载《天津社会科学》, 1999年第6期。

⑯参见张双利等《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改革研讨会综述》, 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9

期。

⑰参见吴兆雪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⑱参见丰子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探求》, 北京出版社, 1999年。

⑲参见瞿铁鹏《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⑳参见孙显蔚《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其主题嬗变》, 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

㉑《关于社会哲学的对话——访〈社会哲学导论〉课题组负责人王锐生》, 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1期。

㉒参见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㉓参见程倩春《唯物史观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 何蔚荣

The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in a Comparative View

Zhang Libo

Abstract: In 1990s, comparison has become a fashion in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Marxist philosophy in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aims at reinforcing her Chinese character, while she in comparison with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hopes to clarify her modern character and universalization, and she in comparison with social theories intends to express that she is not only a historic philosophy but also a really social theory. The importanc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sure beyond doubt, and we must pay much attention to how to carry it out.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social theories; comparative study

冒险的价值

——我读怀特海

韩 震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摘 要] 根据怀特海的观点, 人类文明是最具潜力的创造过程。我们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创造和发展, 变化和创造就是冒险, 因此人生和文明都离不开冒险。要变化, 就必须改变原来熟悉的形式; 要创新, 就须冒险进入无法预见其前景的未知领域。最有成就的人, 也往往是那些最具冒险精神的人, 有发展活力的社会出现在不断冒险改革的地方。

[关键词] 怀特海思想 冒险精神 思想解放 文明发展

[中图分类号] B56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13-04

根据怀特海(A·N·Whitehead, 1861-1974)的观点, 宇宙是无限的、开放的动态生成的过程, 它充满了多样性、创造性和生命力。人类社会更是如此。实质上, 人类文明就是最具潜力的创造过程。

一、人类是否需要冒险精神?

怀特海的回答是肯定的。变化和创造都是冒险, 我们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创造和发展, 因此人生和文明都离不开冒险。

就人类的个体而言, “每一个个体都体现一种生存的探险, 生活的艺术便引导这种探险。”^①每个人都在人生道路中, 有许多自己珍视的冒险经历, 正是这些经历促成并且标志着人们的成长。最有成就的人, 也往往是那些最具冒险精神的人。从整体的人类社会来看, 文明不仅需要多姿多彩的形式, 而且要求这些形式自身应该是不断变化的。要变化, 就必须改变原来熟悉的形式; 要创新, 就须冒险进入无法预见其前景的未知领域。因此, 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中指出: “冒险属于文明的本质”。^②在这里, 怀特海正确地指出了人类文明进化的特点: 没有健康的冒险, 既没有人类的进化, 也没有社会的进步。

活的文明需要学习, 但却不仅仅是学习。没有继承就没有文明, 但只有继承也不可能有文明。人类从森林冒险走入原野, 才有了文明的诞生; 人类

冒险从一个大陆迁移到另一个大陆, 才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以往的成就都是过去人们冒险的结果, 历史往往是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创造的。

没有冒险, 就没有发生状态; 没有发生状态, 也就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也就没有新事物的诞生。冒险的价值就在于引导发生状态, 发生状态的价值就在于开辟未来的可能性, 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在怀特海看来, 历史揭示的进步, “就是把新的模式引进概念经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超越的新视界。”^③有了超越现实的新视界, 我们才能使自己融入变化着的历史创造过程之中。因此, 在生活中, 我们无须也不应该盲目模仿, 而应该勇敢地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不断进入未知的领域。

身体的走动固然重要, 但人类精神上的活动却更重要。其中包括思想上的冒险, 感情上的体验, 审美经验上的多样性感受。正是这些新的尝试、新的感受、新的危险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和创造力。

现在人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 科学技术就是人类精神的冒险。怀特海说: “现代科学使人类有游动的必要。进步的和进步的技术使得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都有到未有航线的海洋去冒险的必要。游动的最大好处就是要遇到危险, 而且要掌握技术, 以避免灾祸……未来的作用

学术研究

就在于有危险，而科学的好处就在于能使未来具有危险。”^④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冒险，因为它力求窥视宇宙的奥秘，改变客观世界的架构。科学还可能制造危险，从而使人不得不面对危险。从文明进步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作用与其说是创造了物质文明，不如说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需要不断面对危险的境地，使我们的精神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与想象力。

教育也要有冒险精神。怀特海认为，“教育是训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成功的教育应该在探究与创造的过程中，让青年体验到冒险与发现的乐趣。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因此，学校，特别是“大学应该成为青年和老年人共同参与的探险活动的家园。”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来说，教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教育，“行动的探险与思想的探险相汇合”，^⑤从而推动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

形而上学是一种精神冒险。但是，怀特海认为，“没有形而上学的预想，就不可能有文明。”^⑥形而上学的理解指导着人们的想象，并且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依据。形而上学是一种精神创新，它的任何一次冒险都使原来的发现成为过去，同时又在召唤下一次冒险。因为随着我们足迹而前进的地平线，使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成为身后的历史。根据怀特海的说法，我们不能因自己的理想而作茧自缚，任何理想都宣称自己是超越时间的，然而它们却在不断流逝，犹如某种闪亮的东西，稍纵即逝。我们必须不断推进自己的理想，理想就是试图创新，而创新就是冒险。从历史的经验看，伟大的创新都始于形而上学的冒险。只要通过精神的历险，我们才能充分发掘我们的想象和直觉，洞察到更有价值的目标和前景。

二、怎样保持冒险精神？

既然冒险精神是维持文明活力的源泉，那么保持冒险精神就成为重要的事情。怎样才能使我们避免故步自封，保持探险的冲动呢？

要保持冒险精神，首先不能被过去的成功所俘虏。换言之，为了继续成功，就不能害怕失败。失败的创新，也比重复好。

在自然界，进化就表现为秩序的断裂与转化。因为“这种转化是一种占优势的主导性的断裂，但这也是激起生命奋发的活泼的新奇性的实现。”生命的进化也是一种冒险，未来总是存在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可能性。但是，生命形式的除旧布新也是激发生命力的力量源泉。“生命的本质体现在现存秩序的失败中。宇宙拒绝完全齐一性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当它这样做时，就走向了新的秩序，因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的基本要求。”^⑦生命的进化是转换新形式的冒险，并且以这种冒险使生命获得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人类社会更加需要变化和创新。任何事情，包括完善的事情，都经受不住单调的重复。重复能够把一切辉煌的东西变成毫无生气的惯例。因循守旧，会消磨制度的功能；屈服于习惯，必定侵蚀人们的自主精神和创造力；强求一致，必然窒息人们的创造力。如果常规惯例占了上风，学术上的正统观点压制了冒险，人们就可能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社会就必然因此而失去活力。“以往的文学在当时就是一种冒险”，^⑧因为这需要突破原有的规范。再美的艺术，如果重复，也不能吸引人们的关注。爱情需要双方注入新的内容，才能保持新鲜活力。甚至道德也要不断有新的探索，否则它就可能沦落为机械、单调的规则。“道德包含在追求理想的目标中”，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新的理想和规范，“呆滞是道德的死敌。”^⑨呆滞了的道德会成为妨碍文明进步，甚至“瓦解文明的力量”；而“一种新的理想出现，随之而兴起了新的社会行为的活力。”^⑩如果没有精神的冒险、思想的探索 and 创新的冲动，文明的生命力就会衰落。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往往是徒有“文明的虚名，却毫无文明的实质。”^⑪没有冒险精神的社会，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虽然有文明的形式，却缺乏文明的灵性。

为了维持文明的活力，我们不能躲进安定的城堡，而应该到处历险。有坚硬外壳的乌龟，失去了进化的动力；在有些地方，狼被消灭了之后，鹿群反而变得病弱起来；构筑了万里长城的中国，还是难以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那号称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却成为溃败的代名词。

希腊民族是被一种追求完善的伟大理想唤醒而前进的。在人类历史中，该文明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艺术形式和思维模式，并且使这些独特性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可是，完善得到了，但获取完善的那种灵感却枯萎了。守成取代了探索，重复取代了创造，一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带头作用。显然，“没有冒险，文明就会全然衰败。”^⑩

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怀特海提到19世纪西欧的处境：平庸的中产阶级情调统治着整个社会，人们“过分地强调了平静生活的价值”，不愿意进行任何必要的社会改革，“又不愿面对新知识所引起的知识革命”。这种情景并不是文明的繁荣，而是文明的窒息。结果却是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平静。在怀特海看来，尽管“不安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与文明不能相容。但整个说来，伟大的世纪都是不安定的世纪。”^⑪问题在于，我们是通过文明的冒险保持文明的活力，还是被无法控制的破坏力量所引导。

其次，要保持冒险精神，就应该容忍并且创造多样性的存在环境。为了发展，我们不能追求单纯和一致。单一不仅是枯燥无味的，而且也必然造成停滞。实际上，人类只能在差异中保持思想的活力。

差异才能引起诧异，诧异可以激发思绪。人类精神上的探险“必须由社会的多样化来提供材料和驱动力”，^⑫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文明发展的障碍，反而是其发展的前提条件。

为了保持多样性，我们甚至容忍不完美。实际上，完善都是相对的。存在着高级完善和低级完善之分，低级的完善对于更高级的完善来说是不够完善的。“对不协和感觉的经验就是进步的基础。自由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产生不协和。完善之外还有完善，一切完善的实现都是有限的，没有那个完善是一切完善的极致。”“因此，不协和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对不完美的优点的一种赞颂。”^⑬正因为不协和、不完善，我们才有改善的欲望；有了改善的欲望，才能激发冒险变革的冲动；有了冒险的冲动，才有发展与进步的可能。

尽管不协和会产生混乱和挫败感，但是“甚至

不协和也比逐渐沦为麻木或顺从（那是麻木的前奏）的感觉好。”^⑭宇宙中之所以存在着不协和，是因为美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种类的完善之间也是不协和的。因此，对完美的追求往往造成不协和，而不协和又可能唤起人们创造的冲动和冒险。

最后，要保持冒险精神，就应该珍视和维护创新的精神冲动。为了保持创新的欲望和冲动，我们必须具备高远的理想。

有了高远的理想，人才能有不断进取的动力。没有理想，人就容易故步自封，缺乏变革的欲望，成为现状的奴隶；没有理想，人也容易为日常琐碎的事情所束缚，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在哲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同样需要远大的目标。立意高远，才可能在理论上有重大的突破。譬如，“遥远的理想是哲学研究的原动力”，没有更加高远的理想，哲学研究就“必定会由于缺乏固有的兴趣而变得毫无生气。”^⑮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敢于突破原来思维框架的束缚，力求反映重大的时代性问题。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冒险精神？

怀特海指出：“有时冒险只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这样它便可以计划它的目标，而且达到它。这种冒险是一种文明类型中的变化的涟漪，依赖它，一种固定的类型时期可保持它的新鲜性。但是，只要有冒险的精力，想象会一跃而起”。^⑯根据怀特海的上述观点，我认为，他对冒险有以下一些理解。

冒险不是莽撞，其基本的感觉既是热情，又是平和。面对真和美，人们既有历险的热情，又有无私无畏的勇气。只有热情，人们往往陷于盲目和恐慌；只有平和，人们往往缺乏创造性活动的动力。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构成文明的冒险。“冒险的统一体却包括爱欲，而爱欲则是追求一切可能性的活的冲动，它要求达到实现那一切的佳境。”“在事物天性的核心，总是存在着青春的梦想和悲剧的收获。宇宙的冒险始于梦想，而终于收获悲剧性的‘美’。这便是热情与平和联合的秘密：痛苦终结于最和谐的时刻。”^⑰根据我的理解，在这里，怀特海是用“悲剧性的美”标示人们有了比较崇高和远大的生活目标以后产生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状态。

有了这种目标,人们就能够产生“一种对生活的价值感”;^⑤有了这种对生活的价值感,人们就不会因琐事和不确定的未来而焦虑。“倘无超验的精神目标,文明化生活或则会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享乐,或则会因循沿袭,逐渐褪去热情。”^①

冒险不是破坏性的,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创造未来,而创造未来是解构与建构的统一。解构现在,是为了建设未来。现代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大学的任务是创造未来”。冒险是因为“未来总是充满了成就与悲剧的每一种可能性。”现代社会需要大学,就在于“它是一个富于冒险的群体,也是一个勤于思辨、发现新观念的群体。”^②这个群体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探索新的技术手段,引导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大学不应仅仅是旧有经验的历史档案馆,而应该是创造未来的试验室。

冒险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基本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创新冲动。行动的创新来源于观念的冒险,观念的冒险实质上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它不断地渴望接受新事物的诞生和成长。习惯的力量往往造就停滞的事实,而冒险的精神冲动才能把僵化的事实转化为历史的戏剧性场景。冒险应该是人类创造未来的建设性的和持续性的冲动和欲望,这种冲动和欲望维持着文明的活力。为了文明,教育家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理

念和教育方法。我们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旧知识的记忆者,而是为了激发青年发现新知识、创造新观念的兴趣与愿望。正如费劳德(Ronald Phipps)先生指出的,“创造性的、综合性的和相关性的学习旨在使知识富有活力,旨在刺激和培养人的好奇心和相关的洞见,以引导人类教育走向怀特海所说的观念历险之道路。”^③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前提。为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让我们传播一种建设性的冒险精神。

①⑤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69、146、141页。

②③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7、149、328、316、327、328、302、309、328、348、114、100页。

③⑦⑩㉒怀特海:《思维方式》,韩东晖、李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2、79、20、151-154页。

④⑬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98-199、199、198页。

⑰怀特海:《自然的观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⑳费劳德:《怀特海过程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王治河、曲跃厚译,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何蔚荣

The Value of Adventures

—My Understanding of Whitehead

Han Zhen

Abstract: According to Whitehead,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creative process with most abundant potentiality. Both individual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 creativity and change, which are essentially adventures. So, adventure is inherent in human life and civilization. Change means altering the previously familiar forms, while innovation means venturing into the unknown field whose future can not be predicated. The most adventurous people tend to achieve much more than others. Where there are constant adventures and innovations, there are vigorous societies.

Key words: Whiteheadian thought; spirit of adventure; emancipation of mind;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来自其特殊性

陈中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认为, 多元民族文化有深厚的客观根基和人文基础; 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不可避免, 但是和而不同。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来自它的特殊性。

[关键词] 民族文化 生命力 民族文化的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17-05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客观趋势, 不管你认为它是一只“聚宝盆”还是一柄“双刃剑”, 它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的。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 文化发展的走向问题, 却可谓众说纷纭。从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出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 世界文化会否走向一体化或仍是保持多元化的格局? 各民族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如何? 这些是当今世界各国有关之士, 以及我国学术、文化界的人士, 必须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一、文化多元性的含义和根基

有人认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 世界文化走向一体化乃不可避免。因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 经济的走向决定着文化的走向。我对这一观点, 不能完全苟同。不过,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必须先对几个概念给以规定。否则, 将会陷入“觚不觚, 觚哉! 觚哉!”的窘境。

首先, 什么是“文化”? 目前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几十个。这里不想对这些定义一一给以辨正, 只想对本文使用的“文化”概念给以如下规定: 一是广义的“文化”, 泛指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相对于世界上的纯粹的自然物、自然现象而说的。二是狭义的“文化”, 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尤其偏重于指精神财富方面的一部分。它常常相对于政治的、经济的等方面而言。本文将根据不同的场合和阐述相关问题的需要, 分别在上述两种含义上, 使用“文

化”这个概念。

其次, 什么是“民族文化”? 对“民族文化”的用法也各种各样。本文根据一般和个别关系的原则, 把“民族文化”规定为一个民族所创造出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同时, 也在相对于民族政治、民族经济的意义上, 使用民族文化这个概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民族文化”本身还有着不同的层次。比如, “中华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它不同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斯拉夫文化”等等。但“中华文化”又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复合体的统一称谓。即它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 同时又包含着满、蒙、藏、维、回等等 56 个民族文化的总称。在这里, “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等也是民族文化; 但它相对于“中华文化”来说, 则是第二个层次的民族文化。有的还有第三个层次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层次性, 是由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造就的。

那么, 文化的多元性是什么? 文化多元性的根基又在哪里?

我们说, 从世界范围来说, 古往今来文化从来是多元的。无论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 都是如此。所谓文化的多元性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文化类型的多样或多元。广义地说, 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各色各样, 多种类型的, 如有房屋建筑、交通工具和交通线路、衣帽鞋袜、农田和粮

食蔬菜、科学、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经济、政治、哲学等等，等等。狭义的文化也有多种类型，如音乐、绘画、舞蹈、电影、电视、诗歌、小说，等等，等等。总之，人们从事的 360 行(及其产品)，行行是文化，只不过类型不同而已。文化多元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文化的地域、民族的多样或多元，如，古代的希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现代的中国文化、西欧文化、斯拉夫文化、拉美文化等，或者还有一种分法为：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这里的重点不在对文化进行分类，而只在说明依据不同的地域、民族、乃至宗教信仰，其文化亦有多种不同的类型。

文化多元的维数，古往今来是有很多变化的。有些类型是古代有的，现代没有了；有的则是古代没有的，现代却有了。这种变化，今后还会继续下去。但类型的多样或多元，乃是从来就有的，至今仍如此，今后也不会变为清一色的单一性。这是由文化多元性的根基所决定的。

文化多元性的深层次根基，在于人类需要的多种多样，实践方式、认识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多种多样。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自由舒展自己的潜能和才华，因而便有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需要。有物质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还有精神性心灵性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层次是越来越高的。不同方面、不同类型的需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衣不可替代食，食不可替代住，住不可替代行；经济不可替代政治，政治不可替代思想，思想不可替代艺术；舞蹈不可替代歌咏，歌咏不可替代绘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文化类型多元性的根基。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存在某一种类型的文化。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同样，多元民族文化也扎根在该民族的生存方式中。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的结晶，是该民族认识世界和创造世界的能力和方式的表征。多元民族文化是人类适应多种生存环境的产物。正像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人类要能够求得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能够适应他的生

存环境。众所周知，人的生存环境，无论就空间来说还是就时间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崇山峻岭的高山高原和广阔无垠的大平原不同，干旱的大陆地区和江、河、湖、海乃至大草原不同；古代、近代、现代自然界被改造的状况，特别是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有很大不同。多元民族文化，首先便是由如此多种多样的生存环境造就的。这一点，在古代的文化里以及在今天那些交通尚不发达，和外界交往较少的那些地区和民族的文化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天世界上的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乃是由古代各民族文化演变衍生而来的。它有现代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同时又总是保留着各自民族的传统或传统的痕迹。但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适应各自的生存环境。如果过分看重这一点，便会变成机械决定论。

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根基，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深埋在各民族的实践方式和认识方式的特点中。每一个民族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认识活动，必须从事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必须进行的两项最基本的活动。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该民族便无法生存下去，便会被淘汰掉。但是，各民族根据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根据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的特点，同时还根据自身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挥程度以及认识手段和实践手段的不同，等等条件，各民族间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是有很不同的。比如，中医和西医，无论在诊断的方式方法方面，还是对病因的分析论理和用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各有各的特点，各自在维护本民族的健康方面发挥着作用。就是说，每一个民族带有自己特点的实践方式和认识方式，造就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民族的实践方式和认识方式以及由其造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否则，它便无法适应自己的环境，更谈不上发展。既然如此，就不可能用一种模式的文化来取代所有民族的文化。

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再一个根基乃在于各个民族的民族情感。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智慧的表现，还是民族情感的表现。在各个民族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处处都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音乐、舞蹈、绘画、诗歌、艺术等方面，表征出的民

族情感尤其突出丰富。民族情感创造出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又起了进一步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从这一点说，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也是不可被取代的。

总之，文化多元性的根基，总的来说在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在于实践方式、认识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等的多样性。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来说，它的根基在于人类生存地域环境的多样性，在于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包括实践方式、认识方式、生活方式等)各自的特殊性，还在于各民族的情感、心理等各自的特殊性。只要这些多样性、特殊性存在，文化的多元性就不会消失。从唯物辩证法的眼光看，这些多元性、特殊性的具体形态以及多样性的具体成分和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地变化。但是，多样性和特殊性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只有单一性没有多样性，只有普遍性没有特殊性的状况，永远不会发生。因而，世界文化走向全球一体化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世界文化仍将保持民族多元的格局。

二、多元民族文化的巨大价值

如果从某个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或自视为优等民族的眼光去看，多元民族文化的格局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认为是有害的，认为它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因而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应大力推动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其实那种文化一体化，实质便是用它那个民族的文化来取代其它所有的民族文化，变多元民族文化的格局为它那个民族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这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文化沙文主义，是不可取的。

如果以人类为本位，从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需要去看，多元民族文化便具有巨大的价值。

首先，它能适应人类面对的多种生存环境。从全世界来说，人类(或者每个个体出生以后)面对的不仅自然环境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社会环境也是多种多样的。条件的好坏优劣，相差很大。人类总体以及每个个体刚来到世间无法对它进行选择。但是，在各民族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使这些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个体和群体，首先能够适应各自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而后才谈得上对这个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进行改造，使其适应自身的需要。如

果没有各地域的民族文化，人们便没有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作为类的这一部分便可能消亡。

其次，多元民族文化使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变化，产生了各种应变能力和抗御能力。人类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有时的变化还非常剧烈。自然界的巨大天灾，社会的急剧震荡、战争、疾病和其它灾难，都会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由于各民族文化是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产物，因而，从类的角度来说，它便具有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使人类能够抗御各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同时，在应付和抗御的活动中，还能更好地挖掘、锻炼和发挥人类各方面的潜能。所有这些，对于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再其次，多元民族文化能使世界永葆活力和生机，永葆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多元民族文化不仅使世界避免成为单一的、阴暗的清一色，维护丰富多彩的状态，而且能使世界充满活力和生机。因为，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宝贵的内涵。正是这种多样性的共存，才使世界的发展充满活力。同时，多元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各种力量的平衡，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也起着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

最后，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说，保存和维护多元民族文化，对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保存和维护民族文化多元的数量和格局，对人类社会的兴旺发达以及对发挥每个人的多种潜能的价值，乃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应该像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平衡那样，来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格局。

三、文化趋同化是民族文化的大敌

和世界上一切矛盾的现象一样，人类的文化，一方面从古以来一直是多元或多样的，而且这种多元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文化多样或多元数量的不断减少，也是自古以来一直出现的现象。特别是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马克思语)

以后,文化的这种多元数量的减少更日益加速。据有关资料的揭示,作为文化的依托和传播工具的语言,古代有几万种,目前只剩下五千来种。据有的语言学家的研究,世界上每年消失的语言达 25 种之多。

文化多元数量的减少(两种含义均如此)有些原因至今还未弄清,如玛雅文化曾经在南美洲那样地辉煌,后来到底如何消失的,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文化的趋同化,使文化多元的数量减少,使一些民族文化消失,乃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偌大的地球变成了“地球村”。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经济的全球化似乎不可避免。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趋同化趋势,将是可想而知的。它将威胁着一些民族文化的生命。

现在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是:文化的趋同化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或者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会不会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体化?

由于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概念讲,经济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所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会不会也一体化?”这个问题本身便存在着逻辑的矛盾。如果从狭义的文化来说,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确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总体上说,归根到底,经济状态决定着文化状态;文化状态对经济的变化发展也有反作用,有制约作用。但是,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人们过去常常把这种关系描述为简单的、直线型的,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经济并不简单地决定文化。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远比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要小得多,要曲折得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也总是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决不会跟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变化。虽然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的内涵不同,但在它们产生的根源上,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不应简单地把文化看成经济的一种派生现象。正因为如此,也就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推出世界文化一体化的不可避免。

所以,对“文化趋同化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问题,不能囫圇地一概而论。就是说,需要分析。其中有些类型和层面,走向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有些类型和层面则是决不可能一体化的。前

者如科学、技术,后者如文学、艺术。也就是说不能笼统地说文化趋同是一历史必然还是并非必然。

对那些并非必然的趋同化现象,人们必须提高警觉,不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所驱动,也不被认识的短视所遮掩。比如,在建筑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引用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各种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和设备乃至先进的建筑思想;但另一方面,在建筑的艺术风格、气派以及民族传统的其它精华方面,也决不可丢掉。否则,便会造成建筑趋同化,在这方面失去丰富多采的局面。所以,我们必须自觉抵制那些并非必然的趋同化的发生,自觉保护各民族文化的特点,自觉维护多元民族文化格局,即保护多元民族文化“态”系统。这对人类的命运来说,将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指出,在保护多元民族文化生态的态度上,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可能表现在:可不可区分和怎样区分文化趋同化的历史必然和非历史必然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张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狭隘民族主义排斥具体分析,以民族的特殊性为借口反对人类文化的共性方面,一味排斥和拒绝汲取其它民族创造的一切先进的东西,认为人类文化的所有趋同化都是非历史必然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不能起到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因为它鱼目混珠,良莠不分,正好是有损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的。所以,它对保护民族文化和发展民族文化,也是非常有害的。

总之,文化趋同化是民族文化的大敌;同样,排斥文化趋同化中带有历史必然性的方面,也是发展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大敌。

四、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它的生命源泉

民族文化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比较而得以成立的。一是和整个人类的文化相比较而说的。文化是属于人类的。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共性。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二是指一民族的文化与它民族的文化相比较而说的。它们的关系是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与个性的关系。从这两方面来看,支撑民族文化存在的是其个性,亦即其特殊性。没有个性、特殊性,就没有民族文化。

首先,民族文化的生命来自其特殊性,即它是

由其特殊性而诞生的。到底如何给“文化”下定义,至今莫衷一是。但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把它概括为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可能万无一失。人类创造财富并不像“上帝创世”那样是一个模式。在广袤的地球上,各个地域的人群为适应自己的特殊环境,通过带有自己特点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创造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尔后逐渐形成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总之,民族文化从它一开始形成,便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亦即个性。

其次,民族文化以其特殊性在和其它民族文化的相互竞争中表现出优势,并得以保存和发展。凡能保存到今天的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有的优点,都有其宝贵的内涵,否则,它早在和其它民族文化的竞争中被淘汰掉了。这特有的优点,便蕴含在它的个性、特殊性之中。这特有的优点,也随着空间的扩大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和发展;但其个性和特殊性则必须保持。否则,它便会被其它民族文化消融掉,同化掉;或者融合成为一种具有新的特点和优势的新的民族文化。

再次,为避免和抵制文化的趋同化现象,必须自觉发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利用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方法来保护民族文化,是再也不可能了。在这种背景下,要保护民族文化,必须自觉地发扬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优势。越是民族特殊的,越是世界的。只有保护好民族特殊的,才能保持住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特色,才能在世界文化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才能得到世界承认。同时,也只有发扬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世界才能丰富多彩。

当然,在保护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时候,必须坚决地反对那种“必须保持原汁原味”的主张。所谓“原汁原味”,那便意味着要那种民族文化原封不动,不允许它发展,这也便意味着不允许别的民族

享受现代文化生活。这是不人道的。

第四,为了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还必须处理好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类文化的共性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始终离不开人类文化的共性。在人类文化的共性中,包含着所有民族文化中最一般、最精华、最先进的方面和成分。离开了人类文化的共性,不及时汲取和借鉴其它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和先进方面,民族文化就不可能发展。不发展就要落后挨打,甚至被淘汰。所以,在这里,必须整合好民族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和人类文化的共性(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坚持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个性的时候,还必须防止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这种整合工作,或者整合得不好,实际上就难以真正保护好民族文化的个性。

当然,民族文化自身也有个变化发展的问题,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我们要保护和发扬先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值得特别研究的是:先进和落后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什么是判断的标准?必须警惕混淆先进和落后的界限,更不能将两者倒置。这里从根本上说是看它对人类长远生存和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是否具有价值。

总而言之,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并不等于世界文化的趋同,更不等于世界文化的一体化。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使世界文化呈现为和而不同的繁荣景象。今天,在发生文化趋同的现象时,必须区分哪些部分和层面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哪些部分和层面是并不具有这种必然性的,而且是万万不可让其趋同的。我们必须深入探究这种区分,自觉促进必然性的实现,坚决反对不具必然性的趋同。我们应该像保护多物种的生态那样,保护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态。这就需要自觉维护和发扬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殊性),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便在其个性。

责任编辑:何蔚荣

文化演进的哲学思考： 具体化、理性化与现实化

陈胜云

(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所讲师、博士, 上海 200233)

[摘要] 文化的演进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对它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从文化经验与人类历史过程的现实关系这个视角对文化的现实演进做一初始分析: 文化经验从神性的压抑走向个体经验的解放——人类具体感觉与激情的真实流露; 文化经验从宗教神学形而上学经由哲学形而上学, 最终走入科学理性; 文化总体不断走入商品世界与市场现实, 这同时也是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过程。

[关键词] 文化演进 具体化 理性化 现实化

[中图分类号] B14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22-06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 本文把论题主要集中于西方文化近代以来的演进过程。文化的演进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规律性, 这是因为文化始终有着对超越现实的渴望; 同时, 文化的演进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所以, 从总体上说, 它是一个从形而上走向现实理性的过程。

一、具体化: 形而上的整体人性到现实人性

从历史看, 文化经验有一个从神性到具体人性的过程, 文化经验不是直截了当地进到具体人性, 而是经由形而上的整体人性才做到这一点的。这个过程无疑地是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联系在一块, 与之相伴随的是商品、市场对以往文化经验的不断冲击。在人类思想解放与商品市场的历史解构作用下, 现代的人们实现了对传统幸福观的突破: 以往人们是在与自己的现实欲望做斗争中欢庆骑士般的胜利, 限制自己感性冲动完全是为了实现某种内在的要求与目的; 而现代人限制这些欲望是因为这些欲求的实现会或者已经在妨碍诸多更长远的连续的外在手段和一系列目的的追求, 比如, 为了做好生意, 在时间与生命力的使用上要节约。

试图把个人自由、极端体验推向生活方式的文

化实践更是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 就具体的文化描述而言, 现代主义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 颠倒传统价值以便讴歌感性冲动而不是理性控制。具体地说, 以往人们总是崇尚整体理性的统一性, 比如齐美尔就崇尚古希腊的文化策略; 但现在不同了, 人们已经放弃传统理性判断或抽象推理, 以放纵自己的感觉与体验。从这也就容易理解大众化的意思了, 因为正是感觉、体验与人们的具体生活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与抽象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这样, 传统理性被取代了, 它被一种强调感觉的狂热的“革命”性所代替: 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童年的幻想与性要求在青春期并以文化史上空前的规模表现出来。从这里可以直接过渡到后现代学者对后现代时期的文化经验的描述: 主体情感消逝了, 这种情感只存在于感情的一刹那的外泄, 主体成了“一种异常猛烈的欣狂之感”。在后现代情景中, “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就个人而言, 主体消失了。”^①

事实真是主体的消失吗? 从文化经验的演进过程看, 我们又该如何在历史的逻辑中来理解这么一种文化现象?

传统文化理解模式常把人性当作统一的整体来把握, 在这种文化视域中,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 人

可以根据统一的理性，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按照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自己明智地在自由理性中塑造自己的人。”^②应该说，这样一种带有传统意味的人性已经在现实中支离破碎了。这一点，就连形而上学大师胡塞尔都不得不承认，在他看来，近代兴起的实证主义已经失去了对理性统一体的信仰；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可靠的方法，一旦找到了这种方法，形而上学就会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

在阿多诺等人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共同创造了一个在社会、思想和行为模式上均无选择余地的单向度社会的同时，我们应该指出，人在传统理性理解模式中被指认的缺失是一种人类无可逃避的社会学的命运：个人的终结，实际所指的是人在一种新出现的后人类框架中的消亡；从福柯系谱学角度看，可以看成是一个人陷身于规戒性技术之中并为其塑造。一句话，社会要进步与发展就得有工业、科层制以及社会控制，但人类不会因此而真实地在地球上消失。

传统文化的现实逻辑是现实生活中的集体生活及其具体的生活经验，从古典的城邦到农村，从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共性到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的共同价值，无不如此。但是商品与市场恰恰打破了所有这些紧密结合的社会群体，并因此使源于群体生活的美学产品和语言创新受到怀疑，最终的结果是统一的人性与整体的理性被撕破了。按杰姆逊的看法，我们所能得到的仅是一些集体经验的幻觉，大众文化给予我们的就是这种幻觉，我们可以在大众文化中得到慰藉，但凭借它，我们决不可能超越当下这种“私人化和心理化的社会”，首先这是由于人们对商品的迷恋并受到大商业意识形态标语的轰炸造成的。^③

现实地讲，我们所处的，不是主体消解的时代，而是一个比以往更讲个性的时代，这体现在许多方面：群体市场走向适应个性化与异质性需求的“微型市场”，这是以先进技术作支撑的，“新技术把产品多样化的成本推向零，并且降低了曾经是至关重要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④媒体从大众化走向大众个性化：“广告的目标对准了越来越小的市场构成部分。日益非群体化的传播媒体无孔不

入地影响视听群。”随之出现的是文化、价值和道德的非群体化：“非群体化的媒体把不同的、通常是相互竞争的信息带进了文化。社会上不仅有更多多样化的工作，而且有更多种类的休闲、艺术风格和政治运动，还会有更多多样化的宗教信仰体系。”^⑤

被其他学者所指认的非人化现象，我们可以从角色与人的断裂关系上去理解：从角色看，组织内部等级制度的形成，工作的专门化，详细明确的分工确实加强了自我分裂的意识。但从个人来说，现在人们选择的范围和种类要比以往宽松得多，你可以有好几份工作，可以去从事多种消费，这说的就是“社会流动性”。在商品与市场主宰的社会里，个人虽然消失在功能性社会结构里，但同时却以自己的多种文化形式表达着自己。“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了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但是，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这种个人情绪在最偏激的时候，只要求一首诗、一出剧或一幅画‘与我有利益’，而不管它是精美佳作或虚浮庸品。不难理解，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⑥也就是说，现实的人一方面承载着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个体创造性能动对抗着文化整体、社会整体。这是文化经验具体化的现实理解，也是适合于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理解。

文化经验的具体性，在广义上，还体现在民族文化经验的具体性上。民族文化经验是与一个民族历史地形成的，与这个民族社群的心理活动、生活习惯、信仰、仪式和态度等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精神体验。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过程，文化全球化丰富了文化民族化，而文化的民族化则深化了文化的全球化。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

化的过程中,“民族经济被迫放弃部分主权,接受以国与国之间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⑦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新的文化传播技术(电信技术、航空和电影等)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有效的文化力量对比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⑧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一定的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性。那种大一统的文化理解模式在现实中确实显得有些惨白。

全球化过程中,文化本土性与民族性是一个现实内容,我们看到,在数字网络化的今天,几乎每一个民族政府和国家都追求某种民族或官方评议的系统化,而且经常努力控制、限制或禁止其他语言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更不用说,本民族对教育系统、新闻电视与广播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控制了。当下,“文化实践被有意识地用来建构国家历史、确立民族认同并灌输民族忠诚思想。”^⑨这已经是全球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现象。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的遭遇会具有不同形态,有同质化,也有竞争,也难免产生混合型文化。这一方面决定于文化交流和互动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取决于不同民族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所体现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这告诉我们,那种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单一文化理想是不现实的,而这正是文化经验具体化的现实体现。

二、理性化: 宗教神学形而上到科学理性

现实文化历史演进另一维度是文化经验从宗教神学形而上经由哲学形而上走入科学理性。当然这不是单维度的线性发展,它既不是向神性的简单回归,也不是抽象整体性的提升,而是一个辩证、复杂的理性化过程。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西方文化的演进与新教运动和启蒙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都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基础与基本价值体系的突破,经历的是宗教神性的消解与近代工具理性观(它正是哲学形而上文化经验的源头)的确立。马克斯·韦伯一生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要说明: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于工具

理性,并伴之以世界的除魅和宗教权力的消蚀过程。^⑩事实上,人类的工具理性行为肯定是与救赎相背离的,而与世俗化相一致:“任何理性的目的行为本身——除了集中于在内心活动的、排除对俗世渴望的灵魂的默想外——以及任何与俗世的不管什么样的利益相结合,都会导致背离救赎”。^⑪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分化中……社会的宗教世界缩小了”。^⑫可是,正当人们为能够从宗教神性超拔出来而庆幸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走入了另一种不幸:虽然启蒙运动使宗教和一切神圣东西开始抖落其神圣外衣,科学与近代工业开始显示其历史的力量;然而启蒙运动及其所带来的工业化过程却产生了新神性——人们把这种神性给予了哲学,人类进入的是哲学文化时代。

哲学文化的一个主导因素就是对传统统一理性的文化追求。按罗蒂的逻辑,启蒙运动的先知们打破了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类进入了后神学文化时代,以往神学的位置由哲学来占据了,因为人们普遍地认为,“与文化其余部分相比,哲学是根基,文化是各种认识主张的集合,而哲学对它们作出判断。哲学是理解认识的基础。”^⑬这里提到的哲学在罗蒂看来是追求大写的真理、大写的理性与大写的善的,阿多诺等人所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正是以这种哲学为理论依托的。这一逻辑对于文化的人性思考有其积极意义,但就其所依托的哲学方法而言,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大众文化批判的内在含义是多层的,但根本的一点是工具手段与目的或价值理性相对: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其他人的作品是把马克思原有的异化、物化理论沿着韦伯的思路扩展并应用于大众文化的作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活动的旧的传统形式被工具性地改组,被按照效果的多种理性模式通过分析拆散和重建。由此,阿多诺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话语中的文化思路,通常将手段本身的组合置于前景,使之与归于其实践的任何特定的目的或价值相对。

阿多诺所处的时代,商品与市场已经开始扫荡他所欲以寄托其希望的艺术余辉。特别是到了后现代所表征的这一历史阶段,我们不得不承认,“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以特殊‘理性’方式组织了空间

和时间知觉的那种统一宇宙论已被粉碎。”^④在这里，有的只是观众和艺术家之间、审美经验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一种距离的消蚀，人们被直接置身于艺术作品之中，人们进入的是一种直接性，实际上失去了对经验的控制——即退回来同艺术进行“对话”的能力。于是，启蒙时代形成的理性宇宙观颠倒了，“时间与空间不再为现代人形成一个可以安然依赖的坐标。”^⑤

这也就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种能够形而上学地提升出来的统一的抽象理性，沿着这一抽象理性我们可以构建一种理性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能像神符一样给人类带来福祉。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取消“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的区分的真实本意。^⑥罗蒂曾指出，现在是打破以特殊“理性”为基础的哲学幻想走向后哲学文化的时候了，在这里我们不要再相信元叙述，不要再相信什么普适性文化模式：“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⑦

在这一逻辑中，我们不会赞同丹尼尔·贝尔对文化宗教的回忆，终究我们不想回到另一种形而上学。我们不需要那种离开现实历史，离开现实物质生产，通向人类彼岸的文化理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现实的文化理想，而这种理想是可以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达到的：在这里，是人与人在现实历史条件下的现实联系，而不是依靠彼岸的神性，作为超越人类的一种超验概念，把人同他身外的某些事物联系起来。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在文化视域中消解我们的价值追求，而是想进一步把我们的价值追求放到现实中来加以讨论，使之现实化。所以我们也不会同意曾被指认为实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极端观点，这种观点意欲将我们变成经验性的存在，或将经验性存在物当作想象其他情景和其他时间阶段的惟一模式，它的目的在于消除人类对价值本身的追求，“它以最传统的形式通过对普遍认识的、非政治活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奉去实践自身的价值。”^⑧

今天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全新的人类文明，这个文明形态是以科学技术，特别是

信息网络技术为依托的。“这一新的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有独特的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方法”。^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我们真实的文化经验。

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言，当下人们所处的现实时空相对于以往的文化框架有了全新的变化：“我们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文化的转变，而变的基础正好可以在建筑空间的转化中看出来……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出现了一种新的‘超空间’，而我们的主体却未能演化出足够的视觉设备以为应变，因为大家的视觉感官习惯始终无法摆脱昔日传统的空间感——始终无法摆脱现代主义高峰期空间感设计的规范。”^⑩这里所言，与齐美尔谈的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矛盾极为相似，我们人类主体再一次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主体无法从自己的创造物中超拔出来。不过，这一次困境与齐美尔所谈及的困境在历史内容方面是不一样的：齐美尔是以传统整体理性为标准来谈这一困境，而我们时代所产生的困境却并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感悟，而是现实的存在，它所指涉的是，信息、网络时代主体的现实不可定位性。这种不可定位性源自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不断改造与创新，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这里所言及的文化困境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就像以往曾经存在过的困境所经历的消解过程一样。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抛弃的是旧日的文化经验框架，而不是文化经验本身。

所以，一种现实的、欲以揭示文化未来的文化思考必然离不开对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具体考察。这是因为文化经验也是一种意识性存在，它必然是现实社会条件的能动反映，离开了现实社会存在，我们将无法现实地分析任何一种现实文化。只有在现实的历史逻辑中，才能客观、辩证地透视人类的现实文化。一句话，在文化思考过程中，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实辩证法，使得对文化经验的判断不再“沦为道德性的评价”。

三、现实化：文化的商品市场化与文化全球化

在文化的哲学思考中，卢卡奇曾误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表现真实的社会关系，例如卡夫卡的作品，而现代主义则不再反映社会关系了，因为现代

主义仅仅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很奇怪的富于魔力的现象。满脑子“否定”，曾坚守着现代主义模式的阿多诺就明确地否定了卢卡奇的说法，他认为，艺术要成为真正的艺术，不管它属于哪种分类，它只有在现实的经验基础上呈现时代危机，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艺术若能一方面吸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业化成果，另一方面又能遵从其自身的经验模式并且同时表现经验的危机，那便成了真正现代的艺术。”^④甚至标新立异也逃脱不了对现实的承认与表现，“真正的现代艺术与其说是不得不设法对付发达的工业社会，还不如说是不得不从标新立异的立场出发承认发达的工业社会。”^⑤甚至自然美也是一种调适状态，它只是人们渴求超越压抑的第二自然即社会的无力回声。

所以，后来丹尼尔·贝尔的说法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据的：现代主义作为对传统的反叛，迟早会被当下社会结构制度化，现代主义的试验形式终究会变成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⑥

那么，到了后现代，情况又如何呢？杰姆逊曾为我们作了很好的描述：在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⑦现实是，无论现代主义还是所谓的后现代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反映、表现着真实的社会关系；本质上，这是文化向商品与市场的现实走入。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现代主义盛行与后现代主流时代还有宗教的存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价值体系随着世俗化的不断解构，使得自我认同感不断发生危机。亨廷顿曾现实地指出，“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⑧正是这个现代化进程使原有的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一定意义上，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源于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它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

的特殊形式的肯定。亨廷顿提醒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宗教，“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⑨它们理所当然地属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所处历史的现实内容。

所以，当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时，他确实说对了一半：“人们企望从文学艺术中寻求刺激和意义，以此顶替宗教的作用。这种努力已使现代主义变成了当今的文化模式。然而现代主义也已衰竭。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以幻觉拓展意识的无穷疆界)仅仅是在对个性的抹杀中努力地分解自我。”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反历史的，因为他想把历史重新宗教化：“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⑩

文化现实性的另一重要体现是文化全球化。当代文化全球化与空前规模的新的全球性基础设施的建立、西方大众文化和商业间交流的兴起、文化产业中的多国公司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跨越国界的通信手段的被开发，国家间、地区间的通信方式增加了，而且传播的成本逐渐下降了，这促进了国际交往的发展，加速了跨国文化交流进程。当下存在的，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交流形式，不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性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看，文化全球化更是一个不断地地理性化、现实化的过程。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曾经专门对此作过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早期以前(1850年以前)，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世界宗教，多文化帝国，它的途径主要是“文化传播与模仿——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形成”，它的动机主要是“对拯救和政治权力的追求”。而现代(约1850—1945年)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欧洲的全球性帝国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跨国的非宗教话语，如西方科学”，其动机主要是“对拯救、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追求”。而到了当代(1945—)，文化全球化的基础则是“大型的、公共的和私有的媒体、旅游、交通和通信公司”产生，

它的主要载体是，“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和话语，全球性专业知识网络”，其主要的动机是“对利润和娱乐的追求”。^④撇开戴维·赫尔德等学者西方中心论的潜意识不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文化全球化从宗教形态经由哲学形而上学到现实的世俗追求——资本利润与人的现实欲望满足，确实是人类现实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

①⑬⑮⑲⑳ 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450、424、232、489页。

②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页。

③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

④⑤⑧ 美] 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三联书店，1996年，第25、81、3页。

⑥⑦⑫⑭⑮⑳㉑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

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6、19、207、134、168、66、75页。

⑧⑨㉒ 英]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58、473、508页。

⑩ 德]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第188页。

⑪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8页。

⑬⑰ 美]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

⑲⑳ 德] 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㉑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讲演》，第160页。

㉒⑳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95、99页。

责任编辑：罗 苹

Reific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Actu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Chen Shengy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s a historical course. We consider if it is a succession of many aspects, if cultural experiences come from inhibition of divinity to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he real outpouring of feelings and enthusiasm, and from religious metaphysics to scientific reasons, and if culture comes continuously into the reality of commodity and markets, developing with cultural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reification; rationalization; actualization

现代新儒家论文化与人的关系

许 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北京 100872)

[摘 要] 现代新儒家对文化与人的基本关系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 着重探讨了文化定义与人的生活, 文化类型与人生态度, 文化价值与人生境界, 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推演、生发、建构起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

[关键词] 现代新儒家 文化 人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9- 0028- 03

文化与人是现代新儒家热烈讨论的两个话题。对前者而言, 因为痛切地感到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危机实质是文化的危机, 故而他们根据传统儒学资源, 系统反思全球背景下的文化现象, 以全面复兴儒学为根本理念, 建构起新儒家的文化哲学; 就后者而言, 他们继承了儒学以人为本的传统, 并结合时代特征和西方理论, 发展出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尽管二者各成一理论体系, 但由于文化与人的关系是如此紧密, 所以使新儒家的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具有极强的沟通性和相关性, 成为它们共同的立论基点。

一、文化定义与人的生活

文化定义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 它不仅决定了哲学体系的建构方向, 而且决定了哲学体系的理论限度。大多数的现代新儒家都对文化作了规定, 虽然界说和表述各有不同, 但论证策略和精神主旨是一致的。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 ^①或“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②徐复观提出“文化是由生活的自觉而来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③钱穆“认为文化只是人生, 只是人类的生活”^④或文化“指的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合全体”。^⑤这些文化定义尽管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用人及人的生活来规定文化。这样就突出和强调了人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 把文化看作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发动、凝结、确

证和实现, 从而深刻揭示了文化与人的内在相关性。

所谓的“人”并非指单个的人, 而是一个类概念, 主要指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对于面对西学挑战, 急于调动、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新儒家来说, 文化主体首先是民族主体, 钱穆明确指出: “文化必有一主体, 此主体即民族。”^⑥文化危机实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 因此必须凸显文化主体的民族性。中国古代就以文化作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 严格夷夏之防。现代新儒家也秉持了这个精神, 虽然由于文化的强势和弱勢的换位造成文化自信的不足, 但他们希望藉着民族文化的重建来延续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人的生活”或“民族生活”是一个富有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 它既包括精神文化, 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梁漱溟析之为“精神生活方面”, “社会生活方面”、“物质生活方面”。^⑦钱穆称之为“精神的”、“集体的”、“物质的”。^⑧但文化之所以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 并使民族自成其为民族的关键在于, 在民族生活中孕育、涵养、生成的民族精神。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在 1958 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 “照我们的意思, 文化是各民族精神生命之表现。”民族精神一方面贯穿、渗透于文化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在塑造、凝聚民族上起着重要的范型和纽结作用。故而现代新儒家从人的生活来规定文

化的逻辑结论最终落实到民族精神上来了。

二、文化类型与人生态度

文化类型是历史形成的各种文化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类型理论试图通过给中外文化“别类定型”，肯定文化的平等性和独立性，挽回民族文化自信，并为中外文化比较和走向融合提供理论准备。其文化类型确立的标准乃是各民族的人生态度，由此对中外文化作出总的评判。

按照徐复观看法，文化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形成人们所共同保持的健全的人生态度”。^⑨梁漱溟在其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以人生态度的不同提出了文化的三路向学说。西方文化是第一种路向，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第二种路向，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第三种路向，人生态度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要求。由于人生态度的殊异，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最为发达，印度文化则发展了宗教，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国文化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比起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要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要好，也甚于反身内求的印度文化，故而是现在最优异的文化。这三种人生态度并非悬隔，而有共生的关系，各为三种文化之基本人生态度。

这种共时性又体现为历时性，即三种人生态度是按照一定的次第在历史进程中得到重现并发展出相应的文化。“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在无生本体，其所用是现象；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其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在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而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⑩这样梁漱溟就从人生态度出发，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建构起文化类型理论，显示了现代新儒家在文化与人的基本关系上另一解释视角。

三、文化价值与人生境界

文化价值是指文化的价值构成，它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在有关文化哲学的论述中，人

生境界成为一个重要的论证环节。如冯友兰说：

“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境界。”^⑪可见，这里的境界是指由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悟解而获得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意义及其由意义构成的世界。冯友兰将客观世界之外的这个意义世界——境界，按照层次的高低划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呈现为由低到高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顺行的，对于所行的事的性质并无清楚的了解，而且他所行的事对于他没有清楚的意义，他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混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为自己的利。虽然动物也为自己利，却是出于本能的冲动，而他自觉他有如此的行为，是出于心灵的计划，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即是为社会谋利益。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功利境界中的人以“占有”为目的，道德境界中的人以“贡献”为目的。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人不但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的一部分，可以“与天地参”。

人生境界的次第既然在于它对于人生的意义大小，那么它也必然反映了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的价值高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是最主要的两种人生境界。与此相对应，现代新儒家区分出“形而上文化”和“形而下文化”。科学被认定为“形而下文化”，在认识大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方法和技术工具改造自然，为人类谋取物质利益，因而是求利的，表现在人对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的物质生活领域。艺术、宗教、哲学和道德等被认为是“形而上文化”，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原则。故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形而上文化”也优于“形而下文化”。方东美指出：“这个自然界是形而下的境界，我们站在形而下的里面，各方面的要求都满足了，……还要提升向

上,向上去发现形而上的世界的秘密。”^①文化价值停留于功利境界的形而下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超越这个文化,达到道德境界的形而上文化。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这种超越后的形而上的文化,尤其是心性之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本原和大道。牟宗三痛感现代人对道德境界的淡漠,导致了形而下文化的独尊,“近人以科学知识为唯一标准,以为最首出,最显明,而德行反成为最辽远,最隐晦,最不显明之事,其实这是支离歧出,逐流而忘本。”^②唐君毅亦批评曰:“顾中国近百年来之人,对于西方文化价值之肯定,实太偏于专从功利点着眼。”^③现代新儒家由人生境界而推导出文化价值,以意义说明价值,认为相对近代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不仅可以救治其重科学轻人文的价值危机、意义危机和道德危机,而且显示了儒家文化价值结构的坚实和优越。

四、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

人类文化自产生以来,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而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人的创造。冯友兰说:“文化是人的文化,是待人而后实有者。宇宙间若没有人,宇宙间即没有文化。”^④徐复观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细致考察了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的关系,第一,是把感观所得的材料,通过心的构造力与判断力,以找出这种材料的条理、意义及其关联;第二,把客观化为主观,又将主观投射、印证到客观上,循环往复,使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人生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扩大,因而能把人与人、人与物作有意义的连接,并向有意义的方向前进。“人类的文化生活,便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人类自然地生命,便是在这样文化生活中而生存发展”。^⑤正因为文化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本能的活动。现代新儒家虽然肯定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但对创造主体的论证却走向了圣贤创造文化的历史观。唐君毅认为:“人类虽然都在文化社会中生活,然大多数的人,常只能享受历史传下来的文化成果,而不能创造文化。”^⑥总之,是那些先知先觉者在创造文化,而广大人民群众则被描述为文化的传播者和寄生者。

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先进,有落后,有发达,有消亡,中国文化曾经兴旺发达了数

千年,成为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在欧风美雨、坚船利炮的震撼中,中国文化落伍了,陷入危机,失去生命力了。唐君毅叹之曰:“花果飘零”,“所谓中国文化已衰微,不足应付时代,是什么一种意义。是否中国文化精神,在现在全不存在了?”^⑦在这样的文化危亡中,现代新儒家勇于担承历史使命,因为“人在有创造文化的精神时,人必须以他的生活之一切实际经验,以他的精力,他的生命,为文化创造而用”,^⑧所以他们以强烈的学术信心和执着精神,成为20世纪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的一群。文化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逃避责任,在危机中总蕴涵着希望,“大时代中的一切灾难,皆所以促成大时代中我们最伟大的创造”。^⑨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在现代新儒家看来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保种救国只能文化自救”。^⑩而文化自救则在于“返本开新”,“从老根上发新芽”,决不能割裂传统的文化脐带。钱穆的说法较有代表性:“在今天纵使我们的生活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但还只能文化自救,不能脱胎换骨的要另来一套新文化。只有我们自己来救我们自己。换言之,即是从各自的旧文化中求再生长。”^⑪

同时,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与人的创造有关。“人的共性与个性,一与多,当然会反映在其所创造的文化上,而成为文化底一与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⑫而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共性与个性,因为它们对文化的发展是极有裨益的。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由不断地接触、吸收,将使某些个性的若干原有部分,发生一种解体现象。“但这种解体,并非个性之消减,而是个性新的凝集。个性之不断上升与凝集,正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⑬中国文化要像过去吸收佛教那样,努力吸收西方文化,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建设和发展更有民族性的中国文化。

由上可见,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的全幅建构立足于对文化与人的基本关系的考察,尽管他们的分析、评判囿于民族本位的局限,带有很大的不足和偏颇,形成了上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干,但他们力图挖掘古代儒学资源,接续传统,调整民族文化的路向,在融合会通中回应西学的挑战,其胸襟是魄大的,其研究是深刻的,其精

韩非思想散论

赖美琴

(惠州学院教授, 广东 惠州 516015)

[摘要] 韩非以成就“霸王之业”作为君主之大利, 这与战国时代社会发展走向统一的趋势相吻合; 韩非思想的核心是“势”; 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要协调发展的问題, 具有进步意义; 韩非主张的极端专制主义以及阴谋权术是其思想糟粕。

[关键词] 利 力 绝对君权 强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 B2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31-05

一、“利”与“力”

韩非认为, 好利恶害是人的自然本性。“好利恶害, 夫人之所有也。”^①“夫安利者就之, 危害者去之, 此人之情也。”^②“人无毛羽, 不衣则不犯(胜)寒。上不属天, 而下不着地, 以肠胃为根本, 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③“故王良爱马, 越王勾践爱人, 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 含人之血, 非骨肉之亲也, 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 则欲人之富贵; 匠人成棺, 则欲人之夭死也。非与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 则舆不售; 人不死, 则棺不卖, 情非憎人也, 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 君不死, 则势不重, 情非憎君也, 利在君之死也。”^④可见, 好利恶害是任何人都有的, 趋利避害乃凡人之情, 无所谓道德好坏。

好利恶害是支配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则。这一法则即使在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连结起来的家庭关系

中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首先是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赤裸裸的性利益关系。“夫妻者, 非有骨肉之恩也, 爱则亲, 不爱则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 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 则身死见疏贱。”^⑤其次是在父母与子女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中, 也是计利而行的。“父母之于子也, 产男则相贺, 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 然男子受贺, 女子杀之者, 虑其后便, 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 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⑥“千金之家, 其子不仁, 人之急利甚也。”^⑦政治关系更是一种利益关系, 集中表现在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虎狼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 君垂爵禄以与臣市。”^⑧因此, 人与人之间完全是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 人总是计利而行的。

韩非关于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论述, 体现了他与《管子》、商鞅及其学派思想的一致性。不同

神是真诚的, 其教训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值得反复探讨、认真汲取的。

①②⑦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第10、7、7页。

③⑨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第623、622、426、317、629、245、304、246、634、634页。

④⑤⑥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

学案》(中), 第562、562-563、569、565-566、146、575、575、576页。

⑩《梁漱溟新儒学论著辑要》,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 第135页。

⑪黄克剑、吴小龙编《冯友兰集》, 群言出版社, 1993年, 第304-305页。

⑫《方东美先生演讲集》,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0年, 第20页。

责任编辑: 罗 苹

的是韩非主张对人的好利、自为的本性采取顺其自然即“贵因”的态度。这是韩非对慎到“因人之情”观点的继承，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观点又有明显的不同。但是，这种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纯粹从人的生理本能，纯粹以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的本质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而且，人也不可能按照自然本性去逐利，它总要受一定社会条件、社会规范的制约。韩非所说的人性好利，说穿了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自私自利本性的反映。

因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好利恶害的，君主无疑也是好利的，君主之利又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的诀窍就在于对各种各样的利进行巧妙的排列组合，从而为君主所调遣使用。那么，君主如何才能调遣“利”、支配“利”，如何才能实现君主之“利”？关键的是要有“力”。“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⑩力量强大，别人就来朝拜你，力量弱小，就只得去朝拜别人。因此圣明的君主致力于力量的强大。“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⑪先王所期求的是利，所需要的是力。

“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⑫君主为何拿出肥沃的田地和高大的宅院，设置爵位和俸禄，目的是要换取民众的拼死效力。就是说，君主有了“力”，才能实现“利”。这个“力”是个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军事、民力等方面。为了增强君主之“力”，韩非提出了富国强兵、重本抑末的政策，并提出了加强君权、限制臣权、抑制豪强、奖励耕战等一系列改革主张。

二、“君利至上”与“绝对专制”

韩非虽然与其他先秦法家一样坚持人性好利论，似乎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推崇个体为本位的个人主义，实际并非如此。在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问题上，他与慎到、《商君书》和《管子》中关于国家之利高于君主之利的观点不同，而主张君利至上。“国者，君之车也”，^⑬这是韩非对君利至上观点最生动最形象的说明。国家是什么呢？国家只不过是君主行载的工具。那么，君主之利是什么呢？韩非认为，“霸王

者，人主之大利也”。^⑭君主之大利集中表现为“霸王之业”，即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推行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如何才能实现人主之大利？那就是要赏罚得当、因能授官。“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⑮很明显，韩非的“赏罚无私”、“任官当能”是非常虚伪的，这种表面公允之“法”只不过是君主控民、控臣，实现君主绝对专制统治之“私”的手段。

而且，韩非深知，没有臣民的效力，仅凭君主个人是不可能建立“霸王之业”的。“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⑯“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⑰韩非特别提到，对六种“耕战有益之民”，君主要很好地以“利”把他们凝聚起来，成为实现君利的工具。这六种有用之民为：“赴险殉诚，死节之民”；“寡闻从令，全法之民”；“力作而食，生利之民”；“嘉厚纯粹，整谷之民”；“重命畏事，尊上之民”；“挫贼遏奸，明上之民”。^⑱对于那些无益于君的“贵重之臣”、“文学之士”，视君命如草芥、不为君卖命的“无用之民”，君主应统统予以罢免、削除、惩处或杀戮。

韩非以成就“霸王之业”作为君主之大利，这与战国时代社会发展走向统一的趋势相吻合，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因为韩非所说的君主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一历史时期的君利与封建国家的利益客观上具有一致性。在战国末期，国家的使命集中表现在要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奴隶主残余势力，结束诸侯割据纷争、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这就使得君主之利与国家之利具有了统一性，君权的追逐与专制主义政治的建立成为相一致的历史归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强调君利至上有其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对慎到等关于君主应为天下而不能私天下思想的倒退。

三、势、法、术与刑、德

韩非认为，申不害只知术而“不擅其法”，^⑲言术而术又未尽。所以，不能协助韩王成就“霸王之业”。事实上，申不害并没有完全离开法来谈术。但与李悝、商鞅等法家相比，确有很大的差距。韩

非还批评商鞅知法而“无术”，变法而法未尽。众所周知，商鞅的法是对李悝《法经》的科学继承和成功实践，商鞅又是战国中期与慎到、申不害互为补充、各领风骚的三大杰出法家，其变法尝试更是彪炳千秋。韩非对商鞅的批评显然不合适。但并不是说商鞅的法尽善尽美。商鞅也并非言法而不知术，只是重法轻术而已。大多认为，商鞅讲法，慎到重势，申不害擅术。从对法、势、术所讲的程度来说，这种观点无可厚非。因为《商君书》、《管子》都重在论法。慎到多论势、法，论“术”的内容微乎其微，甚至未提出“术”的概念。申不害主要讲术，法、势只是兼及。集势、法、术于一身，是韩非的新贡献。从这一层面上说，难怪韩非批评商鞅知法而“无术”，变法而法未尽。批评申不害知术而“不擅其法”，言术而术未尽。同样可以说，慎到之势与韩非之势比较起来，慎到言势亦势未尽。

在韩非的势、法、术思想中，三者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韩非认为，君主的大事，不是法治则是术治。“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④法治以公开为好，术治则不宜表现出来。“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⑤而势位是君主胜众的凭借和爪牙。“势者，胜众之资也。”^⑥“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⑦韩非虽然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反对贵族的法外特权，但他夸大法的地位和作用，否定道德、智慧等非强制手段在治国中的作用，这是非常错误的。特别是韩非把商鞅“以刑去刑”的思想推向了极端，使韩非的所谓“法治”变为了刑治。韩非的“术”讲的是君主驭臣之术，虽然包含有“任能而授官”、“刑名参验”等属于政治艺术、政治方法的积极内容，但主要讲的是以阴谋诡计为主的“术”。韩非所说的“势”也包含有关于国家的合理内容，但主要是指君主权势。他不仅继承了慎到权势至上的思想，而且作了充分的发挥，对“势”的尊崇和膜拜比慎到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韩非关于势、法、术三种思想之中，势处于核心的地位，法和术只不过是实现和维护君主权势的工具。“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⑧而且，韩非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所倡

导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表明，其思想的核心是“势”。虽然学术界对韩非思想的核心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术”（政治术），有的认为是“法”，但从韩非的政治价值目标和政治价值取向来看，无疑应该是“势”。

韩非认为，刑和德是君主治国必须具备的两手。“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⑨在韩非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在治国中没有什么作用，侠义、仁慈有损君主的尊严和威势，是破坏法制的思想行为。“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⑩而且，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上所谓善毕竟是少数，能够自觉地独善其身的人也不能使社会大治。最好的办法是以法的强制力，以利的奖赏力，以刑罚的威慑力，使人不得不服，这样就能实现国家大治。韩非这里所说的“德”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好利论的基础之上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⑪不仅赏罚可用，还要重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⑫刑、德二柄的相互作用，成为韩非势、法、术思想的重要补充。

四、“法先王”与“美当今”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愚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韩非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不同的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⑬“道德”、“智谋”、“气力”分别是上古、中世和当今历史时代所具有的特征。人们争夺生存空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历史和社会政治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⑭这里，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要协调发展的问題，确是非

常了不起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人。韩非认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化也是由物质原因引起的。“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①古今社会人们对财物和官职的态度不同,与人们的道德品质优劣没有关系,而是由财物的多少和权势的大小决定的。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人们道德观念的作用,包含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的科学因子,非常难能可贵。

时代的变化决定政治的变化,复古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政治变革的思想障碍。韩非认为,古今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应不一样。上古时代,人民少禽兽多,生吃瓜蚌等伤害肠胃的东西,有巢氏和燧人氏率领人们在树上筑巢、钻燧取火,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在夏朝还有人这样做,就会受到鲧和禹的讥笑。中古时代,天下发洪水,鲧和禹出来疏通河道,受到了人民的爱戴,让禹统治天下。但是如果在商、周时代还以疏导江河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则会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讥笑。同样,如果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治国方法用于当今,亦一定要遭到“新圣”的讥笑。因此,“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政治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与社会现实相符合的,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③儒家的仁政德治只适用于古代,在当今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只有实行耕战政策、推行法治,才能增强国家实力,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韩非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据,坚决反对“法先王”,主张“美当今”,“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④“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⑤况且,法律也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体现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精神和创新勇气。

五、暴力与强权

世界上任何相互对立的事物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

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⑥在这段话中,韩非显然是把形式逻辑所说的矛盾律与哲学上所说的矛盾概念混为一谈。但韩非的立意是以“矛盾之说”为依据,强调矛盾的对立和排斥,否定矛盾的同一和共存。因此,不能把韩非的矛盾之说归结为形式逻辑的范畴。韩非所说的矛盾,指的是对立双方的区别性、排异性,“不可两立”是其实质和灵魂。

韩非以其矛盾之说为指导,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不可并存的。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法术之学与诸子之学特别是儒、墨之学是不可并存的。“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说不两立而治。”^⑦斥儒学为“邦之蠹”。^⑧乱与治、害与利、私与公是不可并存的。“乱者,治之反也。”“害者,利之反也。”^⑨“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⑩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矛盾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所有臣下都与阳虎一样贪婪,“群臣皆有阳虎之心”,^⑪而且“阳虎贪,知于天下。”^⑫君臣上下之间简直是“一日百战”的关系。但是,韩非是深谙政治术的大思想家,他在肯定政治力量相互对立的双方绝不相容的同时,又提醒君主在策略上要利用好臣下,不能与百姓为仇,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⑬“众人多而圣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今举动而与天下为仇,非全身长生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⑭但是,韩非这些关于矛盾统一性的个别言论,并不能改变其夸大矛盾的斗争性,把矛盾的斗争性扩大化、唯一化的本质。

暴力和镇压是政治斗争的唯一方式。韩非认为,要使政治力量对立的双方达到一致与和谐,从而实现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安定,只有以对抗的斗争形式才能完成,任何宽柔政策、平衡折中的方法都是行不通的。“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毋弛而弓,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其斗□□。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

政，子无适从。”^①只有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使其俯首贴耳、听任摆布；或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将其彻底消灭，才能克服政治力量双方共处所带来的危害。他还以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如何实现君对臣的驯化和制服。“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乌。”

“驯乌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②而对于儒学和诸子百家，统统一概予以消灭，言轨于法，以吏为师，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

以对抗和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唯一方式，对于加速封建社会的统一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诸侯纷争、割据称雄与贵族特权恣意妄为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一个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诸侯来说，假如他敢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革新，坚决大胆地对那些已走向衰败没落或落后弱小的国家发动进攻，就有可能以兼并战争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韩非还以蠹、隙、疾风、大雨的关系作比喻揭示了这一道理。“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③确实，暴力革命、外部冲突和爆发式飞跃对于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还是主要的方式。但是，如果把矛盾的斗争性夸大，以对抗和暴力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唯一方式，就会陷入强权政治，为历史所淘汰。秦汉以后法家为世人所诟病，特别是韩非受到了更多的唾骂，这在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我国在“十年动乱”中所奉行的“斗争哲学”，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韩非思想的刻意利用。

韩非是我国古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政治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深远的历史

影响。即使在已迈入 21 世纪的今天，韩非思想中关于“以法治国”的观点，关于富国强兵、发展经济的观点，关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增长要协调发展的观点，关于立足现实、反对僵化保守、大胆改革的观点，对于我们更好地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以法治国”的思想，关于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当然，对于韩非思想中以法治（实为刑治）代替德治，反对德治的错误，还有韩非所极力主张的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及阴谋权术等思想糟粕，则应该加以彻底的批判。

①①⑥ 《难二》。

② 《奸劫弑臣》。

③④④ 《解老》。

④⑤ 《备内》。

⑥⑭⑮⑯⑰⑱ 《六反》。

⑦④① 《难四》。

⑧⑥ 《难一》。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8 页。

⑩⑫⑬⑭⑮ 《显学》。

⑪ 《外储说左上》。

⑬ 《外储说右下》。

⑰ 《观行》。

⑲⑳ 《定法》。

㉑㉒ 《难三》。

㉔㉕㉖㉗㉘ 《八经》。

㉚ 《人主》。

㉜ 《二柄》。

㉞㉟㊱㊲㊳㊴㊵ 《五蠹》。

㊷ 《心度》。

㊹㊺ 《扬权》。

㊻ 《饰邪》。

㊽ 《外储说右上》。

㊿ 《亡征》。

责任编辑：叶金宝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许雪涛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一般地,“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一是如上所说“我”的,一是在“我”之先的,而后者,是否就是“吾”呢?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关键词]“我” “吾” “我之先”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9-0036-07

对于《齐物论》(以下简称《齐》),本文将“吾”之境作为其主旨,并以解释学的发展为视角,对其提出一点看法,将不考虑其与整个《庄子》的关系,而是当作一篇独立的古代哲学作品。为避免与庄子其人有过多的瓜葛,本文直称《齐》作者,而不称庄子。

一、寻求《齐物论》意义的方法

《齐》是一篇言辞诡异,意味悠长,充满隐喻,并且事实与价值纠缠在一起的作品,面对这样极富想象力与思辨性的文字,人们能理解它并赋予其主旨和基本含义,自然与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有关。解释是理解的再现形式,我们通常所说的解释是指对某文本的解释,然而当狄尔泰提出“客观精神”时,如“在这种客观精神中,过去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断持续的现在”,^①解释或说理解已经被扩大到了生活之流中,而不仅仅是面对某文本。《齐》文就是其作者对他所面对的世界的理解。

文字具有工具性,但又具有自身存在价值,表现在文字本身具有约定俗成的内涵,内涵自然不只一种,所以思想的表达,要尽量选取最切合的词汇。词语的意义与文本主旨的和谐,应该是理想表达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是解释的理想前提。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齐》为我们的解释造成了

两方面麻烦。其一,在历史性上,对《齐》的成文年代及作者问题,冯友兰同任继愈和关锋有过辩解,^②无论《齐》是否出于庄子之手,或是出自他的门人,以及其成书时间在汉初还是战国,距今当有两千年以上。如此跨度,古今语言的差异为我们的理解造成了多方面的不便,如通假,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语法结构的不同,等等。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只能借助训诂学的知识尤其是参考古人所作的注,来进行词义的鉴别。面对许多字的本意和引申意,要取合适的来注解,就要放在上下文的关系当中去看,而文本的主题也往往依靠某些字、词义的鉴别,这种在语言层面的循环被施莱尔马赫的先驱阿斯特所提及,^③并被施莱尔马赫所强化。利科对此也有明确见解,他认为词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只有当其在某种语境中时,才会获得一个实际的意义,在论述隐喻(隐喻在利科那里,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任何一个多义的字词都具有隐喻性)时利科表达了这种意见,^④虽然词已含有词义的效果,但根本上却与语境相关联。

其二,成段成段的隐喻(狭义上)给我们造成的麻烦。这使我们在试图重构一种理解层面时,难免于涉及作者的心理,即如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⑤对

《齐》而言，所指涉的时代背景不多。对于个体体验色彩浓厚的《齐》而言，时代的背景与文本思想之间就少了个体心理与个性气质的必要联结，笼统的猜测价值不大。《齐》言语幽远无际，以自然物象为素材之隐喻充斥其间，对历史名物有所关联的只有“儒墨之是非”、“指、马之喻”、“厉与西施”、“昭文之鼓琴，师旷之枝策，惠子之据梧”、“坚白之味”、“尧、舜”、“丽之姬、毛嫱”、“庄周”，如此而已。这些历史名物只是比喻时的方便，没有这些，也丝毫不会对其主旨有所影响。对于成段的隐喻，我们只有从全篇的意义结构中，寻找它们相连的地方。

我们所用“隐喻”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的，有别于“……好像……”的比喻句式，省去了比喻词，《齐》中表现为直接拿貌似与所提问题不相干的内容来说明。利科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一书中，认为“隐喻”就是一种说明，当将借以说明的东西置于最小范围时，言词便成了隐喻的基础，利科将隐喻由词扩大到句子，我们也可以将“庄周梦蝶”这样的情况，当作由词到句子再到段落的延伸。可以说，《齐》文从字词到段落再到全篇都可视为某种隐喻。

二、《齐物论》的意义结构

我们按顺序来分析一下文本，不像古代注者那样逐字逐句作注解，而是依其大意做一概括，对涉及的关键字、词做较详尽的解释。

1. 《齐》文开篇，^⑥提出南郭子綦“吾丧我”的状态，在颜成子游对“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的疑问中，子綦没有正面作答，而是说出了对“人籁”、“地籁”、“天籁”的理解，“人籁”是比竹，“地籁”是众窍，而“天籁”则是“使其自己也”。但是，究竟万物是咸其自取呢，还是有怒者使然？空有焦灼，仰天而嘘。“吾”的状态也显得颇为神秘。

2. 继而，以悲天悯人之语气，描述了世间人们不论大智、小智皆陷溺于寐觉、交接、动止、性情、事变之种种情状之中之不能自拔的境况。又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到“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部分，对是否存在“真君”提出疑问，似乎在问人世之种种情状的

原因，并与前边“怒者其谁邪”相呼应。然而，是否知道这个原因，与各种现实人生情状之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无益损乎其真”。与这种描述相伴的是“可不哀邪”、“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之价值判断。到这部分最后一句话，“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起到了联络上文之效：凡此种种，都是“我”所表现的，这又是“可悲”、“可哀”的，所以，要“丧我”。

3. 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且无师乎”到“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这七个自然段讨论了“是非”问题，作者用意何在？想说明什么？是非是由“成心”而生，什么是“成心”？郭象解之为“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谓之成心”，成玄英解之为“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王夫之《庄子解》中解之为“成心者，闲闲间间之知所成”，^⑦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解为“成心，言已发动而成为情意之心也，即心已为情所胶着也”，^⑧诸种理解，都不外是面对现实事物的“偏见”之心。海德格尔在讨论理解与解释时，也有“先见”的说法，但海氏之“先见”与“成心”不同，它关系到对“吾”的理解，下文会有说明。

下面由成心过渡到对是非、彼此的讨论，是非、彼此各有所偏，《齐》文作者先是认定了有一无是非的境界，故问“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并提出第一个“莫若以明”。又在“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之后，再次提出“莫若以明”。对“莫若以明”，王夫之解为：明，是成心之明，以明，是以成心明之，意为不要像成心所明的那样。^⑨此解虽与全篇大局一致，但对照后面的“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第三次提出的以明，见下面），王夫之解为“如此乃可谓之以明”（不是成心之明，是真明）。同一个“以明”，王夫子却用在“成心”和“道枢”两重境界上，还要颇费口舌地分辨，倒不如郭象解之“反复相明”来得痛快。楼宇烈在“莫若以明释”的文章里认为是不用知识，否弃文明的意思，与王夫之理解相同，而由

文本中与上文的关系看,“莫若以明”都不能与去除是非、不用成见相矛盾。

可见,作者论是非之目的在“道枢”。联系上文,“是非”之境显然是属于“我”的,而“彼是莫得其偶”的“道枢”,与开篇提出的丧去“我”的“吾”隐然相关。

再往下,话锋一转,作者提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并且“为是不用而寓诸庸”,^⑩

“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由上文之不用是非、抛开成心,转到“无物不可”,面对是非的人,但不用是非。此前读者深感神秘的境界,在此豁然现实了。而所谓“两行”,当是指“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更形象地表达了不用是非、且不必劳神明的状态。之后,通过昭氏鼓琴之喻,以明“成与亏”之不可知,再次提出“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到这部分为止,经过了不用是非的“道枢”,到“道枢”之境的展开:“可乎可”、“然于然”,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或者说,“道枢”之境是直面当下生活时,就已经具备。作者没有说“道枢”就是“吾”,但我们可以看到,二者都是无“我”(用是非、劳神明)的。

4. 从“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到“此之谓葆光”意思是,前面说了这么多,难道不也是有所认定,有所是非吗?可视为对前部分是非之论的反思,王夫之说作者“防人摘己而先自破之”,似乎将作者放在了辩者的位置,不合《齐》文宗旨。冯友兰先生对此有过说明。^⑪我们不妨将之视为《齐》文作者极力想让别人分享他的“吾”而做的进一步解释。前面既说不辨是非,而不辨是非不也是一个是非吗?“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既已万物为一,何必说什么,既然说了,何必再做辩解?接着,经对圣人“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式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论而不辩”,到“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所得出的“天府”、“葆光”之境,应是作者对上文所说的“道枢”——“彼是莫得其偶”的再次理解。

接下,从“有始也者”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从“有无也者”到“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可视为一个隐喻,引申为,下一个不分辨的结论,其实就是分辨,再尝试说明下的结论不是分辨,这又是一个分辨,以至无穷,这可以解释得通。再者从其认识方式上,从“有始也者”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从“有无也者”到“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其实就是一种是非的认识方式,即理性认识的方式。用这种方式不可能避免是非,所以作者又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俄而有无矣”一定不是理性的推理所得,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乃是说虽把握到了无,却仍是我们理性所不能知的。作者前此的种种疑问,都是在以在世、不用是非、直接面对的把握之后,又试图以理性去把握的结果。“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达到此点,就是“道枢”、“天府”、“葆光”。

5. 尧问于舜之喻,尧欲伐宗脍、胥、敖,因此心中不踏实“南面而不释然”,舜说,三人仍生活在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这里的关键词是“德”,郭象解“德”为“无不得”,成玄英以之为“圣德”,在此“德”显然不是儒家所谓的道德仁义之“德”,如联系上文,则“德”乃是以“道枢”为用,即不必“欲”伐,也不必不释然,从“德”观之,万物可自安于是,三子亦然。王夫之解“德为天府”,^⑫应该不错。

6. 啮缺问乎王倪之喻,由三问三不知,再经“正处”、“正味”、“正色”的相对性,引出彼此不相知的论据,可视为对“无辩”的进一步说明,“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此部分提出了“神人”这个具体的隐喻,可看作对“无我”的状态和“天府”的代替词。照冯友兰先生所理解的不可思议,神人可能比任何一个指向现实的概念都更合适。《齐》从否定“我”而暗示“吾”,暗示而不能说出,强而说之,只能用“神人”之类远离经验的概念,它越是远离经验概念,

就越符合那种理想。然而,“神人”是不离经验的,《齐》作者用“神人”这个词,显然是想“对象性地”表达他的经验。

7.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之喻,则可视作从是非问题开始到“葆光”的再现,瞿鹊子所描述的圣人情状,“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是作者反思以前的结论,而长梧子认为瞿鹊子是“太早计”。意思当是指,瞿鹊子的描述是劳神明的结果,也是一是非。而当长梧子指出了“参万岁而成一纯”,并以丽之姬之喻,是说明知的有限性,知的有限性也是劳神明的有限性,包括悦生和恶死、醒与梦同样,“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人们并不知道真假、好坏的确定性,这显然是对是非问题的深化,是“丧我”的又一论据。接着对辩者彼此不能相胜,不能相胜因为彼此不能相知,“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得出“和之以天倪”。“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庄子是“借倪为题也,题者,物初生之题也。”^⑩倪既有“物初生”之义,则“天倪”便有了不加分别的原初状态的意思,我们也看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之“天籁”在这里有了其影子,“使其自己”与作者解“天倪”是“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出现了有效的衔接。以至于“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是以“天倪”、“天籁”为用的解释。长梧子对瞿鹊子苦口婆心,目的就在于此。

8. 罔两问景之喻,罔两质问景之无特操,景说:“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与前之追问真宰相似,都回应了开篇的“怒者其谁邪?”在此,郭象仍以他一贯的“天机自尔”相注,等于是对罔两的回答,而王夫之则从所问本身来回应,“又何拘拘于年义之外立特操与?”已把握住了《齐》不劳神明“吾”的真义。

9. 庄周梦蝶之喻,除最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一句,则是重复了此前“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而“物化”又提醒了什么?郭

象解“物化”为“变化”,“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成玄英也作“变化”解,郭庆藩在《庄子集释》中也未有异议,如此解法,在肯定了经验事物的自然变化之时,让人意犹未尽。王夫之解“物化”为“化之在物者”,并在解说中说“故于篇终申言物化,以见是非之在物者,本无己信之成形。……物化无成之可师,一之于天均,而化声奚有不齐哉?此以夺儒墨之所据,而使荡然于未始有无之至齐者也。”儒墨所据的是“是非”所起之后,而物最初之化是无是非、不相争的,王夫之以化声为例,“是非之所自成,非声之能有之也”,所以在“天均”处,在人面对世界的原初状态中,只是“吾”而没有“我”之分辨。从王夫之的解来看,篇末与篇首的“吾丧我”是相呼应的。^⑪

至此,我们发现,上述9个部分从论证的形式上大致可分为三层,第1部分是总括全文,提出“吾丧我”的主旨。第2到第4部分论证了“丧我”的状态。其重要的论据,就是是非之辩和“劳神明”的知。第5到第9部分通过一些隐喻反复说明“吾”。而在三层之每一层内部,则没有严格的逻辑顺序。

《齐》没有从正面论证“吾”,而是从认识和价值两方面来说明“丧我”的原因。在价值观上否定了“我”,“可悲”、“可哀”、“不知归”等是常用的词,“丧我”在于“我”没有价值。在《齐》中,“我”可训为带有“成心”的知、情、意、行的发动者。

在认识上,出现了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我”不能寻出“真宰”、“真君”、“怒者”,“我”不知谁可以正是非,“我”甚至不知自己是不是在梦中,因此要丧“我”。其二,《齐》已通过“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将所有理性上的疑问彻底消除了,“劳神明为一”,即以理性之致思的一,不如“俄尔有无也”之“俄尔”来的一。理性之致思,仍是用是非,不用理性之致思,就是无“我”,但仍没达成对“吾”本身的说明。

三、解释的指向

在价值和认识上否定了“我”之后,无“我”的外在表现是不用是非、不加分辨的“两行”。那么,为什么要“吾丧我”?作者没有明确提出,这

是属于心理学的问题,如果按照施莱尔马赫对文本语言的重构之外的心理的重构,《齐》显然难以使我们做到,不说作者的生活情景信息不足,就《齐》文本身而言,其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很强的个性,倒是适合每一个人。心理的重构也是狄尔泰面对的难题,^⑧当他以每个人都生活于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为前提,并将语言中介概括为意义以及将整体的诸环节概括为结构的时候,^⑨加之《齐》文本的特殊性,我们得以回避对作者心理的解释,并用如人们通常不自觉使用的,一种从阿斯特、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都强调的语言意义层面的解释的循环。

作者是在极力地想表明“吾”,而所谓“天府”、“葆光”只是两个飘渺幽远的词而已。“吾”,并没有展开。或许可以认为“吾”之境是一种宗教性的体验,或者将之说成是不可思议的“东西”,然而,《齐》中有“是不是”、“然不然”等说法,说明“吾”在现世生活之中。既与现世生活不分离,又“无我”,这如何可能?在狄尔泰视野里,“吾”的本真状态还在暗处,用某种方式进行推测,又会脱离生活,这是诠释学在某一阶段的必然困境。

《齐》文给后人留下诸多解释把柄,一种是为其贴上各种主义的标签,如在天道观上属唯物或是唯心,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直觉主义、不可知论,等等。另一种是不满足于复述古人,在《齐》中发现一系列与现代哲学相关的问题,并对之进行深入讨论,其背后往往带有对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关切。第三种,如郭象和王夫之,在解读《齐》时,直接以“天机自尔”、“唯任其不齐,而听其自己”表明文本的最终归结。前两种解释,都无意指向“吾”,第三种对解读《齐》而不是将其作为阐述自己哲学立场的工具而言,可能更合适一些,所留下的“吾”之境发出者的空间,则需要来填补。

任何解释都不能脱离作为解释者的我(具某种“成心”),对于《齐》而言,因其有一个丧“我”的“吾”,解释者的我就应指向无“我”之地。对“吾”的无“我”的解释,准确地说,是对“吾”做“我”之先的解释。

四、“吾”一“我”之先

指向“吾”的外在形态,并不能构成对“吾”

的有效解释。将其解释为“我之先”,也是无“我”。在解释学的发展上,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过渡,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视角。

狄尔泰之后,海德格尔并没有想使从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中产生的认识论问题完善化,只是要揭示认识活动的本体论条件。《齐》全篇是立足于认识的领域,极力地想暗示出认识之外的“吾”,同是意在言外,《齐》作者是用日常语言构成的隐喻,或构造一些绝对怪异的词如“葆光”之类,并附以形象化的比喻。海氏则通过日常语言有特色的组合,而赋予其新义,并在与常用义的比较中,来达到是什么的说明的效果,如“此在不是一种附加有能够做这事那事的能力的现成东西,此在原是可能之在”、“烦不会是一种特殊的对自己的行为,因为这种自己已经从存在论上用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来标画特征了”等等。海氏在认知之前的本体论领域,同《齐》文作者却除认知之后的“吾”之境是不是相关呢?如果我们承认海氏的本体论有普遍意义,那么,二者会有某种联系。

《齐》文作者一定有一个先入之见,此先入之见当然不是他所谓的“成心”,成心是是非的根源,而这里所说的先见乃是作者之所以作《齐》者,是其面对世界时在生活中已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齐》文作者对“吾”的解释已是先给定了的,一系列说明,都是在瞄准“吾”的眼光的指引下的,而之所以用某种方式说明,也是作者已先行把握的。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先有”、“先见”、“先把握”的意思。^⑩当海德格尔将意义也归属于一种生存论性质的时候,^⑪而不是狄尔泰的客观精神世界的意义(在时空中游离的东西),意义已与“先”不可分了,而我们在“先”之后解释的又是意义(与存在勾连的意义),是我们已经领会了的东西。于是,这里有一个循环,如海氏所问的“如果解释一向就不得不活动在理解了的东西中,并且从理解了的东西那里汲取养料,更甚的是,如果这种设为前提的理解又活动在对世界的普通认识之中,那么解释怎样才能使科学的结果成熟而又免于循环论证呢?”^⑫《齐》无疑也有这种情形,如何正确进入循环是问题的一方面,按海氏的说法,在明确地作为对象的概念出现以前,在“先

有”、“先见”、“先把握”的地方，是无“我”的，即就这种循环本身作为此在本身的生存论上的“先”而言，恰恰是弥补了《齐》没有说并认为不可说的地方。以这种视角看《齐》的“吾”，丝豪不再神秘。

冯友兰所谓的不可思议，不是因为其不可描述，而是不能理性化分析，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将不可思议的“东西”理解为面对世界的“先有”、“先见”、“先把握”，一种原发的、主客未分的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了人的生存原初之境。贴近人的生存状态的说明这条路无疑会利于对生命最深入的挖掘，就这点而言，与我们读了《齐》之后那种对是非、生死、有无的感慨，以及与《齐》文所具有的独特氛围都是相一致的。说明白点，对于《齐》的主旨，任何标签性的解释，都不能有很好的效果，正如我们拿木头解释水果，总不如拿西瓜去解释水果要有效得多。而有其它意图，则另当别论。两种方法，前提不同，功能不同，适合的领域也不同。如果还承认《齐》不属于实证性较强的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话，也可以成为用海德格尔的思想来看待的一个理由，尽管很不严格。的确，语言、某种陈述，常会使我们将之当作一种对象的意义（狄尔泰立场上的），然而，我们一旦领会了生存论上“先”的状态，并以这个视角来观察《齐》，就会发现，正确进入海氏本体意义上的循环，^⑥我们就已贴近了“吾”。

《齐》是一篇陈述，其中出现的三次“尝言之”，很具代表性。以第一次为例，“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作者在说了一通无是非之后，又反思自己的所说是否也是一是非，他为什么要反思呢，既然有了“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又何必再纠缠在语言上呢？如果假定作者一开始就领悟到了无是无非的“神人”之境，他为何还要作这篇大论来陈述呢？以海德格尔的看法，^⑦《齐》文作者的陈述首先是要“展示”，展示他的“吾”之境，“吾”之境不同于一个具体的存在者，如一颗钉子，也不是任何一种现实的情境。照海氏所谓陈述的第二种含义，说出来的东西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性，“就内涵而言总已经变得狭窄了”，那么，在海氏所谓陈述的第

三种含义即“分享”“吾”时，麻烦可知。海氏在解决面对已变得狭窄的东西如何分享陈述者所领悟的存在者时，说“我们必须把这个向着展示出来的东西的存在认作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亦即在展示出来的东西所由而来照面的那个世界中的存在。我们这样从存在论上来领会传达（分享）。”回头看一下海氏正确进入解释循环的方法，这一点理解起来就不难了，“将先有、先见和先把握当作首要的、经常的、最终的任务”，我们在分享“吾”时，也要从存在论上来领会，即从陈述者的陈述所发出的那个层面来领会。于是，从《齐》的“吾”，到作者的陈述，再到我们从存在论上的领会，这一个奇妙的环仍有一个缺口，即我们的领悟与作者的“先”之间有一个历史的跨度，没关系，当我们随着《齐》文本，进入其中的“我”之境，并感受到作者“丧我”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同作者已经站在了同一个意义空间，“吾”已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我们的视域，虽然这个新的视域已然超越了《齐》文作者的“先”以及我们读《齐》之前的“先”，这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

五、小结

《齐》文在表明某种生活样态之时，留下了一个“吾”的空间，即在没有对“吾”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直接表明其外在表现（无“成心”的面对）。本文在用“我之先”来弥补了“吾”之后，“吾”的外在表现同样可以以《存在与时间》来理解，《齐》文所谓“两行”的状态，便类似于在“我之先”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所生发的一霎那，海德格尔用“世内照面”、“当下上手状态”展示了这一幅现象学式的原初境域，^⑧而“我之先”，便是在把握之前我们已有的生存结构，之后的所有的把握，都是从这种背景中汨汨流出，所谓“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一篇《齐物论》就是作者对“吾”的释放。

①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洪汉鼎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②见冯友兰《再论庄子》，《三松堂全集》第1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阿斯特：《诠释学》，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

典文选》，第10页。

④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3-174页。

⑤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56页。

⑥《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下引郭象与成玄英的话，出于此。

⑦⑫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年，第16、24页。

⑧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第42页。

⑨王夫之原话是“浮明而以之，乃自谓以明，愈明而愈隐矣”和“是非无穷，皆自谓以明者所生”。《庄子解》，第16、17页。

⑩庸，《齐物论》的解是“庸，用也”，王夫之主之。许慎解为“从用、从庚”、“庚，更事也”，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8页。有人引申为“平常”，如冯友兰解《中庸》之“庸”为“平常”，见《中国哲学简史》，第151页。本文取“平常之用”义，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就是在平常生活中，不用是非，直接面对的意思。

⑪冯友兰：《贞元六书 新原道》“老庄”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中，他区分了《齐物论》的两层意思，一是针对是非之辩，教人从高处看待事物，而批评了沉溺于是非争端之中的人们（包括名家）。第二层意思是说，万物齐一的“一”，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一旦落入思议和言说，则是与思议者言说者相对的一，而不是“那个”“一”。冯先生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的境界，要去除知才能达到。

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6页。

⑭王夫之在解《齐物论》时，是将文首的“人籁”、“地籁”、“天籁”之喻一以贯之的，几乎每一段的解说

中都含有《齐》文开篇所描述的意象，如声、气、吹、风等。

⑮狄尔泰已抛弃了施莱尔马赫要设身处地体验作者心理的企图，从对他人和自己的不可理解性，过渡到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意义层面，并在意义（黑格尔主义的客观精神的表现）上，来寻求对生命的客观性把握。参见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第46-52页。

⑯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

⑰海德格尔的“先把握”是同“先有”和“先见”相关联的，他认为，所有的解释活动都是向着已理解了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具有整体性，是先有的东西。而揭示这种整体性，要靠一种在揭示以前就有的眼光，在这种眼光的指引下，将要揭示的东西外化为概念。而“先把握”就是在揭示以前，就先有了对用某种概念方式的赞同。参见《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183-184页。

⑱参见《存在与时间》，第185页。

⑲海德格尔：《理解与解释》，见《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122页。狄尔泰自然是没有这种本体论上的循环，狄尔泰的“意义”概念与海德格尔不同，狄尔泰是受黑格尔影响，是一种精神的实在，解释者可以不断地从其中汲取资源。参见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以及利科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中关于诠释学历史的说明。

⑳海氏认为正确进入循环的方法是，一、将先有、先见和先把握当作解释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二、是始终从事情本身出发来整理先有、先见和先把握。见《存在与时间》，第187-188页。

㉑《存在与时间》，第188-196页。

㉒《存在与时间》，其中“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部分有贴近的说明，第83-89页。

责任编辑：罗 苹

坚持“三个代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广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摘要]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纲领。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新的使命而表现出来的先进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关键词] “三个代表” 中华民族 复兴

[中图分类号] D26;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43-0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我们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却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新的国内发展格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愈益激烈，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处境，是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国内，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都出现多样化局面，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三项重大任务：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以及党的三大里程碑式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党创新理论，提出一整套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说。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提出来的。从2000年春天江泽民在广东最初提出，到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展开，到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深刻阐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纲领。

一、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在中国革命史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格局和产业机构、产业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也产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过去把工人阶级界定为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认识，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广大智力工作者同样是劳动者，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

然而，我们的认识，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党从以往的在野的革命党，成为执政的建设的党，从一个传统政党，转变为一个现代政党，从一个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党，转变为代表全国民众的党，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首先，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不再是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阶级，而是致力于经济、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其次，作为执

政党，它要考虑和要代表的，是全国和全民族的利益；第三，中国共产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与时俱进，特别是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问题上，必须正视当代高新科技的发展现状，对高新科技的从业人员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第四，对于不断崛起和发展的民营企业，不能用老的阶级分析模式来套，必须把民营企业的负责人纳入到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力量范围。总之，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某一个或几个阶级、阶层所能承担的，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必须动员全国各族、各阶层的全体人民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代表少数人的政党，党从来都非常慎重地考虑自己的执政之基，考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哪些人的利益。代表全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不意味着党失去了先进性，这恰好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新的使命而表现出来的先进性。“先进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考察党在当代是否具有先进性，要看它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是否维护和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思想、理论从来都是由实践来决定的。今天我们党提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就是因为实践有这个要求了。实践提出的问题，人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根据实践的要求发展原有的理论，开阔原来的思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动员起全国和全民族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性，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在强手如林、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谈何容易。在诸多必要条件中，创新理论是关键的一环。

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民族要走在世界的前列，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个理论思维，不是陈旧的、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论思维，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的理论思维。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党的生命力之所在。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常青树”，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修正、更新自己。我们党要成为一个朝气蓬勃、永葆青春的党，同样需要不断进取，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党探索新的思路，创立新的理论，确立新的观念，制定新的策略，总之一句话，要与时俱进。如果思想僵化，目光短浅，墨守陈规，生搬教条，我们党的生命力就会枯竭，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断送。只有保持思维的高度敏锐性、前瞻性，与时代同步，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才能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保持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且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因而是创造历史的事业。我们投身于这一壮丽的、激动人心的事业，创新就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创新就不能发展，不创新就不能进步，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在各个方面的创新中，理论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理论创新是基本原理、思维方式、思想观念、战略策略的创新，具有指导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意义。理论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勇于解放思想，才能打破桎梏，摆脱羁绊，进入新境界，发现新思路。回顾 2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事业的每一次突飞猛进，都是理论创新、思想解放的结果。当前，我们要在新形势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跨越式发

展,要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进步,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创新是共产党人的永恒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伟大的思想成果,它是科学的理论形态,但它也是实践的产物。用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就会落后于实践,阻碍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它的个别结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来套当下的现实,而是创造性地丰富、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要贯彻“三个代表”,就一定要掌握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确立发展的新思路,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开创开放的新局面,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

当代世界,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以整个国际舞台为背景,离不开周边的环境。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封闭的区域经济已经不再可能。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整体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问题,应该看到世界大势,要把握时代要求。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是,90年代以来世界的急速变化,比如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们似乎有些赶不上趟,显得我们的全球视野还不够开阔。近几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批判清朝统治者的闭关自守,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在辉煌盛世中置全球变局于不顾,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导致一个强大的中国迅速衰败,就是发出一种“盛世危言”,提醒人们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中国面临的世界环境,为适应世界和时代的要求,必须实行新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的改革。应该说,当前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但是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

方面的视野还比较狭隘,而这些方面正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强大的关键所在。在理论方面也是如此,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思想家、理论家、管理大师层出不穷,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优秀的思想理论。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积极吸取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养分一样,我们今天也应该吸取当代社会的各种优秀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养分。最优秀的思想和理论是全世界的优秀思想家和广大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我们不能在思想理论方面自隔绝于世界,置当今世界优秀的思想理论于不顾,付出巨大的代价去从头摸索。在发达国家,生产组织、社会管理、政党建设、治理腐败、生态保护,都有很多很好的科学理论以及具体措施,我们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借鉴、学习。批判性地学习和借鉴国际现代理论,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要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干部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学会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始终走在时代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我们的党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开拓前进。反之,我们无视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就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

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是第一要务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十分曲折、屈辱、痛苦的历程。实现中华民族的惊世崛起和辉煌复兴,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一梦想,只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逐渐开拓了一条现实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民族复兴显露出瑰丽的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0多年时间的艰苦努力,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我们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小康而沾沾自喜,止步不前。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还必须抓紧向“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目标迈进,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发展十分不平衡，虽然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西部地区发展却很艰难和缓慢。即使是东部较发达的地区，发展也有很大的差异，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贫困的人群。加上我国有 12 亿多人口，“家大口阔”，“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嘱。江泽民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一真理，他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除了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之外，还要有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讲共产党的先进性，讲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社会的稳定，这些都要以发展为前提。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强盛，没有全体人民的富裕生活，没有传承文明的基石，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之，没有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要贯彻江泽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指示，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丰富、完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此作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根据我国国情，我国的跨越式发展，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武器，有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国力强盛、人民富裕、社会发达的中华民族，将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执笔人：李明华)

责任编辑：叶金宝

与时俱进：保持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先进性

杨丹娜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 江泽民的“5·31”讲话提出了保持无产阶级执政党先进性的新思想新举措。明确指出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 是“形”与“实”的统一; 要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关键词] “三个代表” 执政党的建设 党的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47-04

今年5月31日,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为主题, 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在保持执政党先进性的问题上首次提出, “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首次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 “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这些新思想新举措, 集中体现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5·31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不仅以非常鲜明的态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的立场。而且, 用较多地篇幅阐述了要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必须创新发展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他说, “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丢掉老祖宗, 是错误的、有害的; 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 以实践来检验一切, 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一崭新的提法表明, 执政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它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而且还表现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 表现在是否有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无产阶级执政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或缺乏对这一理论创新发展的创造力, 都会导致失去它的先进性。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新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坚持, 是对国际共运150多年经验教训的总结, 是对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高度概括, 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 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①它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②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和要求人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时,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他们总是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 并为适应实践的发展, 及时向人们指出在他们已发表的理论中, 有那些观点仍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抑或错误的、或已经过时的, 并要求人们要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这些理论。如在《共产党宣言》

学术研究

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变化,一方面肯定这个纲领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又严肃地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的变化,纲领中有些革命措施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有些思想和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因此,这些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④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再版时,恩格斯在序言中又重引了马克思和他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的有关上述思想的一段话。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进行理论创新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它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150多年,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消灭私有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解放运动的实践进程,在各个不同时期和各个不同的国家,其实际情况都是不同的。这些具体情况的差异促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他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创造了新的理论,写出了新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在各个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指导实践的要求而产生的伟大理论成果。

由上可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动理论发展。正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生命力、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因此,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是国际共运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并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重要经验和决定性因素。

江泽民同志告诫全党,“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并首次提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的要求。他说:“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

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执政党提出的严重挑战和崭新课题。”这“四个一定要看到”所反映的,都是新时期“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并作出新的回答,是开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和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对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

二、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形”与“实”的统一,是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历史过程的统一

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针对如何保持执政党先进性的问题,首次提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强调了执政党的先进性是“形”与“实”的统一,是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过程的统一的新观点。因为通过“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这一事实,既可以检验理论的先进性,也可以检验执政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执政能力。江泽民同志在阐述这一新思想、新概括时,非常娴熟地运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并以新的思想内容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是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⑤它高度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表现为“形”与“实”两个方面和表现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全过程中。

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执政党先进性应体现为“形”与“实”的统一作了新的、科学的阐述。他除了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识别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其先进性的根本问

题。他说,“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客观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各个阶段和每一进程中,都必须实践它的纲领,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否则,就会被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所淘汰,被曾经拥戴它的人民群众所抛弃。这方面我们有苏东悲剧的教训可鉴。鉴于此,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要紧紧抓住这第一要务,“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一思想和论断再现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⑥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论断。它深刻揭示了执政党只有“始终”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形”与“实”的统一,才能保持和体现它执政后的先进性。执政党的先进性应体现为“形”与“实”的统一的新认识表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它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因为它的称谓和宪法的规定,也不是因为它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功勋,而是因为它始终如一地实践它的宗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

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与执政党“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要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它要求我们的改革和基本制度建设既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又要体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并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体系。它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和依法治国制度等。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在“三个代表”统领下,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还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以上制度体系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规律要求,它将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把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际出发,强调了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新的思想观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它深刻揭示了党群关系的本源和物质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最终回归于人民。她一面世: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昭示这一本质和宗旨:“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⑦因此,党群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群众利益基础上的。党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在于它能否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一贯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并在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中体现出

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建议和他们起草的大量文件,都是从根本上反映各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样,为了不损害农民的利益,列宁于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⑧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从执政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面临执政危机的高度来认识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并对党的领导干部敲了警钟。50年代后期,针对革命胜利了,在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了意志衰退,脱离群众,争名夺利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⑨他直截了当地对党的领导干部说,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邓小平同志更是直接地、毫不隐讳地把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与我们党能不能过好权力关,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资格能不能经受新的考验这一重大问题相联系。他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否则,“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⑩

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执政后

5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上述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其易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其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谋私,养成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痛痒,渐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执政党的工作作风一旦脱离群众,重者会直接影响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或者导致重大问题上决策错误,如1957年后至“文革”期间的“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发展造成的重大损失。轻者是正确的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如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问题,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社会风气不良,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更甚者是导致执政党在发展面临生存危机之时,得不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如苏共的倒台就是如此。所有这些错误,无论轻重,真正的、直接的受害者是人民群众。正是在总结这些错误和挫折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提出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按“三个代表”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要求我们的决策,必须考虑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另一方面,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经常反思我们的政策,改革我们的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同时,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任何改革、任何发展政策和措施都是执政为民的手段。发展的手段和方法可以依据形势和任务而变。唯一不变的原则,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执政为民作为它奋斗的最终目的。诚然,这最难做的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因此,按“三个代表”要求,我们不仅要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的重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探讨如何去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如何把它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如何从制度(下转第63页)

关于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若干思考

李秀潭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 北京 100091)

[摘要] 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党代会制度、党委会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目前情况下可考虑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发挥党委会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的重要作用, 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 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

[关键词] “5·31”讲话 政治生活民主化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51-05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代发展潮流, 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思路, 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 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 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 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 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 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 就是政治腐败, 缺乏民主。

例如: 日本自民党, 成立于1955年, 连续执政38年, 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 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 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 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 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

以来, 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 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 要想当总裁, 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 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 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 叫做“一流经济, 二流生活, 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 不仅日本国民厌倦, 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 成立于1885年, 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 前后长达45年时间, 党员3000多万, 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 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 是由于党内专制, 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 达到极点, 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 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 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 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 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 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 倚老卖老, 固步自封, 治党治国不力, 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 有1.5亿住贫

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

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延安整风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了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

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毛泽东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①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

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 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代表的作用。时代发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

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 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 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

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孳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 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

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党的建设的实践看,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哪个地方、部门什么时候党内监督工作抓得比较紧,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个人专断、滥用职权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就比较少,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受到抑制,出了问题一般也能得到及时解决。

对权力如何制约监督?主要方法有:第一是以法治权。用法律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第二是以民制权。比较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是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第三是以权制权,即人们常说的权力制衡。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导致腐败。把权力分散,让权力相互制衡,就可以防止权力被滥用。第四以德治权,即提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权力制约监督方面,人们创造出来的以上种种方法,应看作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本身没有阶级性。对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权力制衡,是防止和遏制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制约制度体系,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效而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活秩序。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96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新时期建设政治文明的战略意义

张江明

(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会长、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贯彻三个文明一起抓, 需要做到人民民主, 民主立国, 依法治国, 制度管国, 以党领国。

[关键词] 江泽民 政治文明 “5·31” 讲话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2) 09-0056-03

我国进入新世纪, 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关键时刻,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是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又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加深了对文明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认识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向来过着三种生活: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三种生活产生了三种文明: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三种文明是互相联系, 互相促进, 互相转化, 缺一不可的。在社会生活中, 政治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基础, 以精神文明为动力, 政治文明属于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 它体现和反映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等。是否重视搞好政治文明, 这不是局部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的战略问题。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复兴, 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复兴, 这是极为重要的。

恩格斯说, 人们在提出辩证法和散文的理论以前, 早已按辩证法办事和写散文。政治文明也是这样, 当它上升和提出理论观点以后, 就大不相同, 便会从自发、零散转变到自觉和系统上来, 进入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总书记总结了历史经验, 吸纳了有关政治文明的科学因素, 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也是文明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 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 把文明建设和文明理论推进到新的高度,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的新发展

邓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提出三个“高度”的观点, 包含有三个文明的内涵, 但还未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 预示着必将出现。邓小平说: “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党的十二大报告, 提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时, 集中一个题目: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认为: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 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 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和法制密切结合。以上所说“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民主”，实质上同政治文明的意思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高度民主和高度法制相结合。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政治文明这个概念包括的目标、根本要求、特点和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理论，从此，我们不仅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还要加上政治文明，即三个文明建设，把政治文明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只有把三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真正达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因此，在实践中，要求做到“三个文明”并驾齐驱，“三个文明”一起抓，充分发挥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作用。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马克思曾经设想写一本关于政治文明的著作，但来不及写成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学，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创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可供借鉴。

马克思最早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准备写一部有关政治文明的书，1844年11月，起草了一个写作计划，名叫《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案》，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权力的分开”和“制衡”、“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政党”、“选举权”，等等。“政治文明”是此书计划草案中提出来的。由于马克思要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作《资本论》和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资本论》三卷本，只写成第1卷并出版，第2、3卷靠恩格斯整理加工，才得以问世，更没有时间去写作政治文明方面的书了。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实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方面的空白，用新观点、新理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新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来说，要从抓两个文明建设，发展为抓三个文明建设，尤其是要重视抓好具有重大战略作用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具有普遍意义和重大作用的。

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方向与道路，必将加快其历史进程，取得丰硕成果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总的指导，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还要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具体目标和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包括有民主文明，法制文明，制度文明，领导文明，即文明的民主，文明的法制，文明的制度，文明的领导。依照总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目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贯彻三个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任务，需要做到：

人民主国。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各个方面都要体现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形式和实践。

民主立国。这是同人民是国家主人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共命运、同呼吸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以人民民主为立国之本，依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民主理论来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依法治国。人民怎样来治理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政府

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民主和法制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法制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法制为保证。坚持以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实行法治,克服人治。为了贯彻依法治国,要进行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把司法机关从属于各级党委,改革为建立垂直系统,直属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充分发挥它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作用,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还要“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各个权力机构之间互相制衡,共同搞好依法治国。

制度管国。邓小平和江泽民很重视制度建设,认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人才辈出,好人掌权,坏人钻不进来;制度不好,可以给坏人乘虚而入,篡夺部分权力,好人受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再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部分权力的教训,建立科学的文明的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制制度、领导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这种制度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因领导人的调动或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而是具有法律的效力和连贯性。只有经过集体讨论和法律程序,才能修改。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制度,践踏制度。要用科学的文明的现代化的制度来保证。

以党领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我们国家中处在执政地位,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这是在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和建设形成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定要围绕和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进行。要使我们的党领导好国家,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政治文明在党的建设中的体现。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全面要求,贯穿在各个方面。首先要从严治好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把关,严格挑选,严格监督,对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养奸,使各级干部认真做到执政为民。

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实现。按照什么领导方式来执政,怎样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直接反映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工作成败。

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对领导方式方法进行改进和创新。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提高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方法进行领导的能力,提高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力,提高实行科学的文明的领导方式和方法的能力,提高抗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形成合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广东学术界探讨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

朝 迅

2002年7月12日,广东学术界部分专家学者就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代表党中央首次正式使用“政治文明”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论述政治文明,新时期建设政治文明的内涵、核心、层次、特点和规律,新时期建设政治文明的重大战略意义,新时期建设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法制文明的辩证关系等,展开了热烈的座谈。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社会学学会和广东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张江明、范英、梁渭雄、李江涛、马中柱、袁惠民、余少波、刘歌德、萧君和、吴灿新、董玉整、萧新生、李振连、陈伟、郑奋明、叶金宝、洗美新、冯达才,《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学术研究》的代表等20多人与会。会议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会长张江明教授主持。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及观点综述如下:

一、与会者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学术界一直锲而不舍地探讨“政治文明”这一全新的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很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加以总结

与会者在学习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中关于“政治文明”的有关论述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先于国内的同行,一直坚持对“政治文明”进行不断探索的历程。梁渭雄教授认为,这种敢为人先、锲而不舍的学术创新精神,有类似如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卓炯教授的真知灼见在上世纪80年代终于被党中央包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之中,而广东部分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政

治文明”的研究成果,也终于被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精神所首肯。这又一次充分地证明:在广东这种较为宽松和谐的环境下,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秉承现代岭南文化务实求新的品性,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事业,广东学术界的理论创新精神是不能小看的。与会的专家学者以事实为例,指出广东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探讨“政治文明”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年之前。这一阶段主要以张江明教授任广东省社科联主席时期的《学术研究》杂志为代表,连续组织和编发了若干篇关于“政治文明”的重点论文。其中第一篇是《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作者萧君和),一是阐明提出“社会政治文明”概念的依据,二是简释“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三是论述“社会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主要关系。作者从马克思于1844年11月首次提出“政治文明”概念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形象地将物质文明看成是一棵树中“强劲的树根”,社会政治文明是它“粗壮的树干和树枝”,精神文明则是“繁荣茂盛、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绿叶”。

在1986年的第5期上,又发表了《政治文明初探》(作者范贤超、周建平),文中界定了“政治文明”的内涵;指出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同步产生的;它同后面二者的发展都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和进步趋势;它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但“国家政治制度”是它的主体,“每个成员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的实现程度”是它的标志;认为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关键”、“物质文明发展的杠杆”、“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

此后,《学术研究》杂志还在1987年第4期上编发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一文(作

者邹永图)。作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包含了“政治文明”的思想,我们应当加以实践和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对其主要的特征与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

同年,由张江明教授撰写的《论政治文明》一文,由《南方日报》编入1987年2月备发的文章,清样已打出,但未能公开发表(后于1994年由作者编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书中)。该文认为:把政治文明独立出来是十分必要的;“改造社会的成果”就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民主、依法治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范英教授在1986年8月提交全国第三次社会主义辩证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简论政治文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中认为:明确“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构成三维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使我们文明建设的战略思想更趋全面和完善,目标更加明确和严峻”;从政治文明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看,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都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深入开展过程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政治改革这一重要手段的协调作用”及其自身的发展所系。

上述主要论文发表后,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或多家报刊反复转登,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第二阶段是1990年之前。这一阶段以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社会学学会和广东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为主,经常召开小型多样的座谈会,继续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关问题。其特点是把“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放进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之中,从精神文明必然触及的外部联系来深入考察政治文明。其代表性的著作是《精神文明学论纲》(范英等著,1990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从1979年国庆节到1990年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兴未艾的重要时期,也是广东在国内率先构思和创立精神文明学的关键时期。《精神文明学论纲》不仅考察了精神文

明的内部结构,同时考察了它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后来还加入了生态文明)的联系与区别。在第九章中,专门探讨了“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指出“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联系纽带;“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确立”;民主政治确保精神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公民意识;政治文明需要切实的政治理论和行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协调的原则、关系等等。

该书出版后,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50多家传媒作了介绍,其中关于政治文明的专章论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可以说,广东在第二阶段深入探讨政治文明时,是借助于广东率先构思和创立精神文明学这一重要学科创新的活动而持续不断地开展的,也由于精神文明学在国内外的逐步传播与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社会效应。

第三阶段是2002年5月之前。以全国和省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推进为背景,以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的创立为初步基础,广东率先成立了以精神文明学命名的广东精神文明学会,她的主要骨干与广东学术界尤其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者、社会学研究者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不断将政治文明看成是必然要研究、要建设的大事,并且自觉地将有关政治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在许多论文与著作之中。广东部分学者集体写作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范英等主编,已出版15部,约700万字)最有代表性。

从著作方面看,为了扩展政治文明的研究与现有理论的运用,该丛书专门出版了国内该领域较早成书的《反腐倡廉与社会发展》的专著(庞跃辉、范英著,1996年8月,广州出版社出版),对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存在的腐败现象的方方面面,均作了理论上的阐释,旨在激起人们对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主要负面问题之一的高度警觉,以及如何解决的若干思路。该书的总论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省市电视台及多家报刊都作了介绍。又如《以德治国纵横谈》(范英、刘小敏、李振连、陈伟等编著,2002年1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突出地阐述了德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等等,显

然是政治文明中依法治国所强调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论文方面看,如在《“五观”俱全与“五观”端正——论中国经济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作者范英、刘小敏、李振连,《现代哲学》,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国经济特区从建立到现在,都是非常重视政治文明建设的,也非常重视它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应关系。特区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为指引,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也用改革开放和‘三敢’精神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因而促进了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系统的建设……这是中国经济特区更上一层楼的重要表现”。此文在厦门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上被列为大会重点介绍的文章,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又如在《论形成和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学》(作者范英,《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一文中,针对使用“制度文明”概念比“政治文明”概念更好的流行观点,作者则认为使用“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比使用‘制度文明’更能区分和突出制度中的政治因素,并使精神文明以政治文明为导向”。此文发表至今,曾被国内诸多报刊反复转引。表面看起来,这是对国内、省内长期讨论两个概念孰重孰轻的一种回应,实际上则是对坚持政治文明理念及其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介本色的再肯定。

二、与会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首次正式使用政治文明概念,阐释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论述政治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在广泛吸纳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探索成果的基础上的一次新概括和新飞跃

(一)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张江明会长认为,我国在进入新世纪,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不仅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更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又一

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把对加深文明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的一个重要发展;3.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马克思曾经设想写一本关于政治文明的著作,但来不及写成的继承和发展;4.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与道路。

萧君和教授认为,从现实层面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反腐保廉的有力保证,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从深层次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和长期发展的重要保证。郑奋明副研究员指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弘扬和发展先进文化,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范英会长认为,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首次正式使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划时代地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始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内涵、层次、特征、规律、地位、作用、方式和实践而展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整体之中。

(二)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吴灿新教授认为,“政治”是一个阶级的历史范畴,它作为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成分和要素,是经济的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以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

张江明会长认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包括有民主文明、法制文明、制度文明、领导文明,即文明的民主、文明的法制、文明的制度、文明的领导。

萧新生教授认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与计划经济下人们所理解的政治文明是不同的:后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它的旗帜,实

际上离开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非政治文明;前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政治文明的否定。只有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治文明,才是真正的政治文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个代表,就是要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这就为开创新时期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三)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范英会长认为,按照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六大方面:一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三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四是不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五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六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六个方面是最根本的,但对其他方面的内容还应深入探讨。

张江明会长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一要做到“人民民主”;二要做到“民主立国”;三要做到“依法治国”;四要做到“制度管国”;五要做到“以党领国”。上述五大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其中,“以党领国”,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富强、民主和文明的关键。

(四)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本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刘歌德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民打江山,人民坐江山,人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因此,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要落实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各级人民代表要做到由人民真正选举;各级政府主要干部要做到由人民真正选举;广大人民要能够真正管干部、民主监督干部;广大人民要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各级政府要真正落实办事民主、公道、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要真正统一起来。

马中柱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它的主体和核心。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有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党的领导能引导、吸引与组织人民参加到政治生活和国家民主生活中来;党的领导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正确方向,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服务。为了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以“三个代表”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根除腐败和不正之风,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党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做政治文明的表率;党要坚持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五)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相关规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董玉整教授认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执政规律、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进步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战略意义并不亚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近20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维模式,现在起码要改为“三个文明一起抓”,这是对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与提升。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中间自有许多新的规律必须进行认真的探讨。余少波教授就此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注意十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性认识。萧新生教授关于新时期政治文明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相关规律,李振连副教授关于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文化的相关规律,萧君和教授关于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与新时期必须补行“文艺复兴”的相关规律,许多与会者提出的关于新时期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相关规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揭示。

陈伟副教授认为,将新时期的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必须关注四个“聚焦点”:一要

深化对执政党“党情”的认识；二要深化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三要深化对现实“民情”的认识；四要深化对当代“世情”的认识。

(六) 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若干条建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国对政治文明的理论研究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许多方面仍然很薄弱，许多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政治文明实践的滞后而难于深入展开。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早于1979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因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要有忧患意识，要有“赶快补课”的实际行动。关于如何“补课”的问题，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建议。与会者认为：

1. 从现在开始，要真正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开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的逐步开展和各项具体实践活动的逐步落实，理论工作者才能有更为丰富的素材来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研究，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认识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自身的规律，以及它与其他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

2. 要真正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既重视政治文明建设现实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又重视政治文明建设中长期的超前性研究；既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微观、中观和宏观及其综合研究，又重视古今中外有关政治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研究；既重视专门队伍的建设，又重视与多学科、多层次以及对于政治文明研究的有识之士建立起研究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3. 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理论研究中，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4. 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中，逐步建立起比较科学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理论体系。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叶金宝

(上接第50页)上去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如何健全监督制度，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和社会民主，使这些重要的思想、要求不至于流于形式。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从理论上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其先进性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无疑将留下重要的一笔。

①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4、264、228、229、264、272、264页。

⑧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2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0、274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 历史回顾与制度转型分析

顾海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研究员,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本文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从无到有, 从不系统、分散的到逐步发展成一个比较完整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创新系统, 分析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推行的一系列的制度演变根源, 由此带来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国家创新系统从整体看仍处于转型过渡期, 其中不仅存在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要解决根本问题就必须突破旧体制的铁框, 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目标, 实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三者的有机结合与互动, 重视建设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关键的三个要素, 从而全面推进中国国家创新系统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国家创新系统 制度 体制 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64-06

对于国家创新系统多种界定是从不同角度体现着创新研究的系统范式的基本思想。从本质上看, 创新体系是由内在于企业、政府和科学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的构成, 在这个系统中, 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另外这个创新系统试图使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同产生最大创新绩效。国家存在与发展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前提, 国家环境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称之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一、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回顾兼制度分析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 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到 20 世纪民国初期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力图科学求国、实业救国, 这一切都缘于比差引力^①索引而导致危机意识和内在追求。1935 年国民党制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1928~1947 年间, 高等学校毕业生不到 18 万人, 1949 年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 5 万, 其中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不超过 500 人, 科研机构 30 多

个, 且集中在地质科学和生物分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业技术落后, 工业产值占 GDP 的 2.6%, 农业仍是落后的传统产业。在工农业、科技教育、国防科研全面落后情况下, 根本谈不上国家创新系统, 同时也表明我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是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 NIS 的历史划分, 可分为行政体制期、转型期和若干阶段。

二、行政体制期(1949—1978 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创新系统建设的第一阶段, 即政府行政主导型创新手段, 是以计划体制为基本制度安排, 相应组织体系, 按照功能和隶属关系严格分工; 创新动机源于政府所认为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防安全需要; 创新决策由各级政府制订; 政府是创新资源投入主体, 资源严格按计划配置; 创新的执行者或组织者进行技术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 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他们所实现的创新成果, 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造成的风险和损失。这种模式的显著优点是国家可以在短时期内有计划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进行大规模的重大技术创新活动, 减少因资源的重复配置而产生的浪费并具备将创新成果迅速地向全社会扩散的条件。

中国在 60、70 年代研制的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成果，就是例证。技术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创新利益与创新执行者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体系特征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

我们从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有关政治、经济纲领中可见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端倪，或者是进行国家技术创新的初步思想。早在建国前的《共同纲领》中就曾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而在 1954 年的宪法明确规定：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以后的宪章进一步写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上述对现代化的强调，表明政府已在考虑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内在步骤和过程设计。

周恩来后来明确表述“四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包含了二层含义：(1) 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源动力；(2) 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是通过实现“四化”目标体现出来的。

对此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萨特米尔(Richard P. Sattmeier)曾作出评论：新中国的科技目标是近百年来现代化问题上努力奋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奋斗过程中，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被当目标看待的，而对这种目标的设计不仅具有经济性同时兼有政治性。萨特米尔曾把此目标分解为三个方面：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改造服务，为文化改造服务。因此可以非常清楚感觉到目标中具有丰富政治内容和思想底蕴。但这三方面的关系及处理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 CNIS 的状态绩效。1949~ 1971 年间中国创新系统的成就与代价同这种综合性的影响密切相关。

中国建国初的 NIS 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是以强大的行政力量来对创新活动进行全面的指令性管理。主要方法有：(1) 政府制定具有权威性的创新任务；(2) 创新活动的展开依靠政府力量强力推动；(3) 创新投入靠政府拨款。这个机制是以《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规划》的产生和实施

为典型代表。其主要是使科学彻底国家化、将科学资源纳入国家发展的目标，这种政府指令性机制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经济发展的特定水平，已有的知识存量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源状况同政府追求目标的显著差异，为政府对创新资源的全面规划提供了现实基础。要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满足整个社会经济的需要，就必须最大效率、最大效益地调配创新资源，即一方面需加强资源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集中资源以解决最关键问题。这种选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中形成战略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策略。比如《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规划》正是在这种原则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即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介绍到我国的科学、国防、生产、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它世界大国。规划提出了 57 项任务、六大类。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推动是通过完成规划中的任务来达成的，这与前苏联的科学计划是不同的。

其次，国家安全对 NIS 具有较大影响，因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国防开支(包括国防 R&D)占 GDP 的比例较高，对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冲击，因此导致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在新中国刚成立之时，本身的政权需要巩固，同时国际环境也需要加强国防建设，当时国际形势是：50 年代的东西方尖锐对峙，前苏联与中国结盟同西方对抗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台湾局势紧张，60 年代的中苏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在这种较为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当时，中国政府必须对科技创新资源起主导作用，通过行政手段集中力量对创新资源进行调配，保证以军事为目的的重大科学及技术计划能顺利进行，如原子弹技术的突破，就是在这种以政府规划为主体的运作机制的成就。对国防目标的高度关注导致提高了重工业的投资分配比例，同时影响了中国技术结构和技术部门的区域分布。

1965 年实施的三线建设，不但规定了当时投资的区域分布(投资集中在西南和西北)、部门分配(机械、钢铁、能源为优先发展部门)，而且对中国以后

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模式以及效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道路,即以自主创新为主。但这种自主创新不是在于国际比较中的领先创新,更多的是在无法获得先进技术和知识支持的封闭型环境中的自主创新。对此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以来的30年中,至少有20年可以由自力更生这一口号相当正确地表达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第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制度上提供了保障。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一般以两个方面为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就能得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和保证。有了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就可以统一协调全社会的科学力量,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自然科学并且实施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即成为政府指令型。这也使得中国在科技基础弱、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仍能取得“计划科学”的成功。

另外,中国科学研究的生产资料远比农业或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化难度要小,因此进入国家整体布局计划的制度性阻力比较小。自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科技工作的计划性事实上已基本展开。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开幕词中就有: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所谓慈善性援助,而是明确成为国家的事务,这实际上表达了科学国家化的基本概念。

从创新动力模式角度看,中国创新系统在这一阶段的动力模式应该是在政府计划政策的技术推动模式。

最后,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降低政府指令性机制的社会成本。

因为意识形态,从广义的制度概念出发,应是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构。5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彻底民主改造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这种思想改造的实质是使个人的

意识形态服从于国家意志。因此无论是迫于政府压力还是政治荣誉者,其改造后的效果多少在形式上是趋于一致的。这就使得政府创新过程中的决策成本以及执行成本都大大降低。李约瑟(Joseph. Needhan)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曾写道:中国的基本传统,也许比欧洲传统更符合科学世界大合作的利益。这种传统,被有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应该理解为一种民族自豪感,是一种自强、自主的精神,是一种希望国家强盛的理念,从大局出发,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意志的认同。所以国家意志的贯彻与知识分子价值观和个人追求之间并不存在严重冲突。这也许就是政府指令性创新机制发挥作用的心理力量。

政府行政指令创新体制下的CNIS,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创新资源,因而是高效率,但效益不一定好。由于靠行政力量推动、组织计划实施创新就会降低创新的社会成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集中人财物进行重复攻关,保证国家目标的实现,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建国初到1977年,中国已建立了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航空工业、石油化工工业、汽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另外从固定资产装备程度的提高看,反映出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和提高,另外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至1978年,正从以第一产业占主导向第二产业占一半的格局发展,以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解释:中国正逐步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向工业化社会迈进,同时也表明中国已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不过中国行政指令型系统在此期间付出的代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此间作为创新主体的政府,用行政集权的手段控制创新问题的选择、创新资源的配置、创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此时CNIS主要特征为:(1)以计划和行政调节为核心的低向结构;(2)封闭结构;(3)强烈的意识形态;(4)科研、生产系统分立。

有了这样一种CNIS,所以创新的重点都随着政府的意志而转移,主要表现在重工业优先,军民分

立、军工优先、重视尖端、轻视现场，大量的人力资源都集中在高精尖项目里，而生产等一线工艺流程即缺乏科技力量的支持，尤其人民迫切需要的广大消费市场的产品创新和改进性创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句话说：在政府忙于实现主要创新目标的同时，广泛多样的社会需求却难以被兼顾，因此，这种排斥市场机制，否定价值规律的创新机制从局部利益来看是高效率的，但从整体来看，是长期违背市场经济的，所以创新机制必将带来创新的无效益价值效果。

其次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技术转移方式或创新转移，形式简单，创新主体少，科研院所完全独立于国企之外，自我封闭性强等，这些不利于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广泛联系。一是技术成果从政府所属的发展密集型 R&D 机构经由政府主管部门或政府所属的推广部门转移到生产-学习系统(企业)；二是经过主管部门审批，采用引进设备或生产线的形式，从国外直接向企业转移技术，在这里需解释是政府主管部门指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下辖的不同的产业与职能部门。这种模式的缺陷是各个主管的沟通需要通过纵向的行政关系来沟通，条块分割，因此就会产生许多弊病，如行政式的技术转移方式难以适应各个企业的经常性的处于变化之中的需求，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在市场机制下的那种快速信息反映和交流。国家的 R&D 与企业的生产实践存在严重脱节，使科技成果难以或不能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不利于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提高。

第三，企业创新缺乏激励机制，创新动力不足。此时期行政体制下的企业之间关系。首先企业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员，缺乏推动技术创新的自主权。在职能方面企业仅在于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企业的情况，提出本企业的要求，而在创新问题的选择，创新资源(如资本、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的需求和分配，直至产品价格的制定、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创新收益分配等全部都由上级行政部门决定。企业既得不到成功创新所带来相应的收益，也不需要承担失败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在此情况下企业又怎会有创新的动力？当然从今天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企业经营者进行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

化，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求效益只求集中力量把“重点工程”高效率地完成的体制下，要求企业符合经济规律的有内在创新动力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形式主要是国有产权。因此国家所属的任何单位都可以无偿使用，这就牵涉到作为知识发明者的个人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作为个人的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益可以被他人无偿占有，那么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必将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的热情将会消失殆尽，也就丧失了以企业及个人的创新激励作用。

第四，中国的 NIS 中的政府强化作用与西方国家的 NIS 中的政府作用不断增强有本质的区别。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 NIS 中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不足，指那些无法由个人或不愿承担的活动，如公共基础实施等基础项目，这在前面第二章和国家创新理论中已有论述。政府采取的是间接干预为主，主要是通过金融、政策的诱导方式，并与市场竞争机制、部分创新资源的个人所有结合在一起，使创新行为具有了相应的自主性。而我国政府在 NIS 中过分强调国家意志与个人创新活动的关联作用，创新行为易受政治干扰。一旦发现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认识偏差就会不同程度地冲击国家创新系统，如“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科技和知识界所发生的悲剧，如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科技知识是否具有阶级性等方面问题。意识形态扩大甚至是畸形的夸张，就会导致往往由政治标准取代技术、学术标准，所以必然导致知识分子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无法得到其应有的主体地位，最终造成国家创新系统主体结构的严重缺损。

三、转型期从 1979 年起，CNIS 发展可以划分为 1979—1992 年(第二阶段)和 1992 年至今(第三阶段)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也常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CNIS 进入了转型期。在这一阶段里 CNIS 是一种复合模式，政府由行政指令型向政府指导型转化并且这种转化是从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为核心线索的。CNIS 伴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运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 1993 年以前并没有明确市场经济

作为转变目标。

例如企业内经费与研究人员投入的变化与科技体制改革目标不尽一致,反映了当时企业创新中的一些问题。在当时放权让利确实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收益,但同时有许多传统经济体制的范畴如以企业数量的扩张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有承包制的短期行为以及外部环境不规范,企业可以通过更为简捷保险的途径实现其收益目标,使得企业的收益动力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创新动力,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国家来推动,而非企业的内在需求。

在第二阶段进行的全面重塑中国创新系统中,其中科技体制改革应视为全面重塑国家创新系统的标志。而在1987、1988年由国家颁布的规定和决定中,突出了二条思路:(1)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各种形式直接介入经济领域,建立和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新型科研生产经营实体。(2)在深化全民所有制科研机构改革的同时,积极支持和促进集体、个体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科技机构的发展。从上述思路,就要有一关于科技系统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的保证并推动落实。

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国家创新系统的变革主要在微观层面上的科技系统内部结构及制度的调整为重点展开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和协调的制度安排不多,这反映了国家科委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共同作为决策主体的制度创新数量很少。

其次,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代替对NIS运行机制的行政手段的努力开始加强,无论是1985年提出科技体制改革措施,还是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事实上都体现了这种努力。

最后,由于实行的是有计划的经济,从其本质上说乃是计划体制,所以这种对国家创新系统的重塑不可能改变这种制度基础,虽然在1988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出现了其它成份所有制的科研机构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兴起,这些更在于它是对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回应,也许包含一些对上述理论的反思,但事实上却是其次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这一阶段确定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如对企业以及包括实行企业制度与产权结构创新改革,实现现代化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创新功能,从政府宏观管理方面,出现了重大科技计划内科技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如国家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加快了高新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实行产业化的步伐,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根本改变,实施了科技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明确了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和方向。

综合以上对中国创新系统转型期的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创新系统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与科技经费投入以及其他创新资源分配因素和政策有关外,最关键的也是最基本的3个要素是:(1)创新的市场激活机制;(2)创新主体协同;(3)创新能力。首先,创新的市场激活机制是一种活化竞争力,虽然在行政指令型时期,创新的机制是以高度集中计划为特征的,集中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和缺陷,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虽然目前新旧体制并存,但将来的创新的调节机制应该以市场为主,换一句话说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进行技术开发,并且使它能够商品化的一个完整过程。其次,创新主体的联系和协同反映创新的势,主要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科研机构之间,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只有不同创新主体的广泛的协同创新,才能克服各部门由于条块分割造成的创新机构设置、创新资源不合理布局和重复低效问题,并使得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运用形成创新的规模优势,具有规模效益,全面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第三,创新能力是创新主体的核心竞争力,反映的正是创新的质。创新能力增强了,创新水平才会提高,科学技术的国际间竞争力才能较大提升。如果把国家创新系统视作一个主体结构,则以上3个要素分别是3个三维坐标轴,其中,创新主体的协同与联系是一种规模为“势”,而创新能力为“质”,“质与势”有机结合通过市场激活机制的

联结，就形成了较强竞争力的国家创新系统。

目前，中国创新系统从整体看，仍处于在转型的过渡期，其中不仅存在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事实上中国科技投入不足，虽然有经济实力相对不足和思想观念尚未转变缘由，从本质上讲，根本因素仍然是体制方面的，因此进一步解决这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将是中国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在以往中国渐进式的转型道路中，一般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转型战略，所采取的措施多因没有触动或较少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者而较易实施，但正因为改革没有真正触动原有利益集团，从而使改革的最终目的不能实现，相反却在实施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阻力，退出成本的代价太大。此时又面临着二难的境地，不退出改革无法深入下去，且由体制带来的惯性会越陷越深，代价也是越来越大，但要解决根本问题，就必须突出旧体制的铁框，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目标，不仅要重塑创新主体，同时也要实现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组合与互动，同时高度重视 CNIS 有关国际竞争力上述三个关键要素是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机遇和挑战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关键。

①马雪娣：《科学技术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对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评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石定寰：《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李正风：《中国创新系统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冯之俊：《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中国科技论坛》1993年第3期。

杨占东：《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三种模式》，《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曾国屏、李正风：《世界各国创新系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黄振荣

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配置的博弈分析

覃 斌 雷富贵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所有权配置的讨论主要从“企业要素特性”这一静态角度展开, 明确了财物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所有权性质。但高新技术企业的的所有权配置更是一个动态的博弈的过程, 财物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行动策略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影响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的所有权配置具有“相机抉择”和“初始状态依存性”的特点。

[关键词] 高新技术企业 博弈模型 所有权配置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70-04

伴随着高新技术热潮的兴起, 以知识、技术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在企业所有权上的要求得到了微观企业制度和宏观政策上越来越多的支持。但在学术界, 主要是围绕企业要素的特性展开静态分析, 其好处在于企业要素特征可以把高新技术企业同其他企业相区别。我们认为, 企业所有权的配置实质是行为过程, 具有动态特征。因此, 本文在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上以博弈经济学为框架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配置的理论综述

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配置指的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状况, 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谁就拥有这个企业。现代企业理论证明, 为了寻求更高的企业效率,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应该尽可能的对称。现代企业的主流理论强调财物资本在企业所有权配置中的主导地位, “资本应该雇佣劳动”。依此理论, 高新技术企业的财物资本所有者(完全)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人力资本所有者处于被雇佣和从动的地位。高新技术企业中, 资本应雇佣劳动的主要支持论据有: (1) 监督成本因素。为了解决偷懒问题和监督的有效性, 必须给予监督者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即企业所有权), 而监督者必须是团队固定要素的投入者。由此, 高新技术企业中的

财物资本应该监督并雇佣人力资本。(2) 贡献测算难易因素。企业的所有权在解决激励问题时是非常重要的, 企业所有权应该与边际贡献最难估计的要素相联系。资本雇佣劳动, 是因为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财物资本的贡献最难准确度量(霍姆斯特姆、泰若勒, 1989)。(3) 资产专用性及交易费用因素。财物资本一旦投入企业, 具有更强的专用性, 因此资本所有者必须掌握着企业所有权, 以保证其价格可以被尽可能准确的反映, 并保护自己不受那些充满着机会主义倾向的易流动的要素所有者(人力资本是其中之一)所转嫁成本的侵害(威廉姆森, 1975, 1980)。(4) 信息不对称及信息显示机制。财物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资本是一种信号机制, 它显示了财物资本的选择和决策更实际、更可信, 因而市场将选择他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即资本雇佣劳动(张维迎, 1994)。

伴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也天然具有分享企业所有权的“权利”。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性, 人力资本更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周其仁认为, 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 来源于含混的资本概念。当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分离后, 人力资本更为“积极”, 市场中的企业就演变为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 企业所有权不应该仅仅属于财物资本。杨瑞龙

和周业安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认为资本可以雇佣劳动,劳动也可以雇佣资本。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团队性和一定的可抵押性,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应该分享企业的所有权。伴随着企业经营中人力资本谈判力量的相对增加,合约不断做边际调整,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由集中对称走向分散对称。方竹兰从人力资本的特征入手认为,由于形式的多样化和证券化趋势,财物资本更易规避风险,而随着分工的细化和专用性的加强,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和承担的风险逐渐增加,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

企业理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略的企业“黑匣子”问题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市场、政府的认识。高新技术企业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企业理论的进展已经证明,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是影响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要素和财物资本要素共同投入组成企业组织,诸多因素使财物资本可以享有企业所有权,同样诸多因素使人力资本也具有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内在属性。随着企业各种要素相对地位的变化,各种要素的所有权要求在具体所有权配置中将会发生变化。但无论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对企业所有权配置的争论和讨论主要从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要素特性”这一角度展开。作为企业的投入要素,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各自作为企业投入要素的某些专有特性而具有了对企业所有权的内在要求。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思路。上述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在企业所有权配置中的要素特性,但这只是讨论企业所有权配置的一个方面,只是明确了谁有何种资格可以享有企业所有权。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权配置是个动态的、博弈的过程,各种要素的产权主体由于合作、利益共享与争夺关系,在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等复杂背景下,静态研究难以实现高效率的企业所有权配置。本文的分析表明,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博弈使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的配置具有“相机抉择”和“初始状态依存性”的特点。

二、企业所有权配置的博弈经济学分析

下文的分析假定:(1)博弈双方是理性的;(2)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双方共享企业所有权将使企业的总收益增加;(3)博弈双方均存在资本的机会成本,并且等值。博弈双方分别为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定义博弈 $G=\{S_1, S_2; u_1, u_2\}$, S_1 、 S_2 分别表示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策略空间, u_1 、 u_2 分别表示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得益, u_1 、 u_2 是博弈方策略的多元函数。其中 $S_1=\{s_{11}, s_{12}\}$, $S_2=\{s_{21}, s_{22}\}$, $s_{11}, s_{21}=\{\text{独占所有权}\}$, $s_{12}, s_{22}=\{\text{不独占所有权}\}$,即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各自的策略空间中可以选择的策略是独占或者不独占企业的所有权。

1. 完全信息下所有权配置的静态博弈分析

首先我们假定:(1)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清楚双方准备共同投入企业的收益情况;(2)双方都清楚在企业收益中不同所有权安排下各自和对方的收益;(3)在决定提出企业所有权要求时,一方不能得到另一方任何决策的任何信息,即双方同时决策如何配置所有权。上述假设的现实基础是,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的可行性得到充分论证,并且经营项目有众多的加入者或潜在加入者(因此任何一方为了不被别人替代,必须一次同时“出招”)。据此,建立模型(1)如下:

		财物资本	
		S_{11}	S_{12}
人力资本	S_{21}	-1, -1	3, 2
	S_{22}	2, 3	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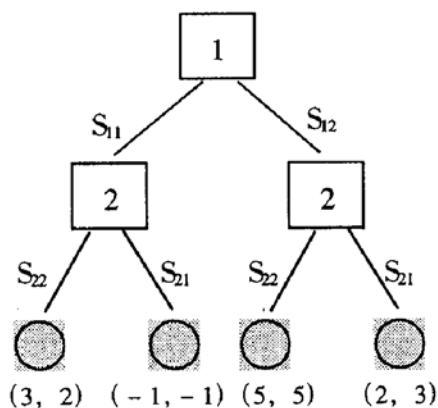
模型(I)

模型的得益矩阵中,每组元素的前后两个数字分别为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所选策略的得益。模型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某个市场合作机会,如果双方都想独占企业所有权,企业将无法合成,二者则均有诸如知识或货币资本贬值等机会成本;如果一方独占,另一方不要求独占,则企业可以合成,独占的一方支付给另一方较少的固定收益(如固定工资或固定资本利息等)外,自己享有较大份额的企业剩余;如果双方均不独占,即和平共享企业所有权,根据现代企业理论,此时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可以带来较大的企业剩余。此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是(5, 5),即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分享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此时不仅企业的效率最高(总产出 $5+5>2+3$),而且二者均得到较大的企业剩余($5>$

3, $5 > 2$)。

2. 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分析

在实践中, 较为现实的情况是, 由于前期的可行性论证和对各种资源组合的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物资本所有者不仅通晓各种可能的企业所有权配置的情况下企业的总收益和各自的收益, 并据此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根据对方的行为相机而动。此时, 上述模型(I)可拓展为模型(II):



模型(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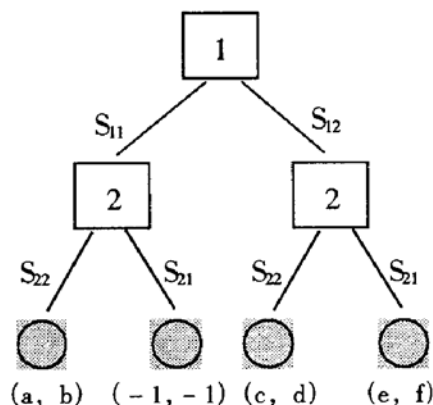
模型假设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物资本所有者不仅明了对方和各自的博弈收益, 而且双方的策略选择有先后顺序, 后行动一方完全清楚前行动方的选择, 并且前行动方也清楚后行动方将会根据己方策略所采取的策略选择。模型中 1、2 分别代表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对称性模型中的博弈顺序可以对调。对此求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得, 1(财物资本)的完整策略是“第一阶段选择‘不独占’”, 2(人力资本)的完整策略是“第二阶段‘不独占’”。此博弈解的现实解释是: 由于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对各种收益和双方策略的确知, 双方在谈判中均倾向于共享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 此时企业的所有权配置是稳定而高效的。虽然二者的谈判可能较模型复杂, 但由于收益和策略的确知使复杂的谈判博弈总可以通过子博弈、等价博弈最终约简为模型(II)。

3. 进一步的推广: 不完全信息的约束

但是更普遍的情形是, 由于市场的不可控制、企业经营的风险和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对各种收益和对方策略难以准确预知。此时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权会如何配置呢?

对模型(II)做改进得模型(III), 其中 $a, b, c,$

$d, e, f > 0$, 且 $c + d > \max\{a + b, e + f\}$ 。对该博弈求解得: (1) 若 $d > f, a > c$, 1 的完整策略是“第一阶段‘独占’”, 2 的完整策略是“第二阶段‘不独占’”。(2) 若 $d > f, a < c$, 1 的完整策略是“第一阶段‘不独占’”, 2 的完整策略是“第二阶段‘不独占’”。(3) 若 $d < f, a > e$, 1 的完整策略是“第一阶段‘独占’”, 2 的完整策略是“第二阶段‘不独占’”。(4) 若 $d < f, a < e$, 1 的完整策略是“第一阶段‘不独占’”, 2 的完整策略是“第二阶段‘不独占’”。



模型(III)

此模型说明, 如果收益不确定, 高新技术企业的的所有权安排将不会是稳定和唯一的, 即企业的所有权配置将出现“相机抉择”的特点。即使共享企业所有权能够使企业产生更大的剩余,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所有权一定由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共享, 因为假如一方独占企业所有权, 并能从较大的企业总剩余中分得更大的收益, 那它将选择“独占”企业所有权。

模型中假设财物资本为首行动方, 其可以根据收益状态选择“独占”或者“不独占”的策略; 人力资本是次级行动方, 其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不独占”(即不得不放弃可能带来更大收益的“独占”)。如果把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的博弈顺序对调, 即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初级行动方, 财物资本所有者随后行动, 则二者的策略选择也将“对调”。这也就是说, 企业所有权的博弈具有“初始状态依存性”。在实践中, 不论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财物资本所有者, 那一方如果首先发现市场机会、拥有更有优势的市场资源或者对市场有更强的能动

性,并能主动安排合作方式,谁就将从博弈中得到更多的收益。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如果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共同投资成立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的总收益和各自的收益是完全明确的,那么无论双方有没有经过谈判过程,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权将由双方共同拥有。对于社会来讲,这是可以实现最大收益的选择,因此政府应该努力加强市场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并鼓励对合作项目做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创造双方充分沟通的条件,保证共享信息的充分流动。

(2)由于不确定性,企业的所有权配置具有“相机抉择”的特点。各产权主体依据各自的信息和收益选择于己有利的策略,由此企业的所有权配置不一定是实现总体收益最大的那种。

(3)由于“相机抉择”的所有权配置,社会资源的利用可能偏离“帕累托最优”,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权存在多种配置,即使共享企业所有权能够带来更高的企业总剩余,企业的所有权也不一定是人力资本和财物资本共同拥有。更糟糕的结果是由于都想“独占”,博弈结果是合作不成,双方均承担了绝对损失。这也说明个人的理性和利益出发的行为往往不符合集体的理性和最大利益,甚至也不能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4)企业所有权如何配置具有“初始状态依存性”,人力资本或财物资本的选择空间、可得到的收益以及合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的初始状态,即依赖于二者的博弈次序。

(5)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人力资本更为重要、更难监督、更具有能动性等企业要素特征,“先入为主”地认为企业的所有权将会被人力资本

全部或者部分拥有是不确切的。我们的分析表明,根据企业的要素特征来分析高新技术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在高新技术企业所有的要素中,即使人力资本更应该拥有企业所有权,但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权也不一定就会配置给人力资本。其根本原因在于各种要素不是孤立的,各自的行动策略将相互影响,仅从某一方的理性出发得出的结论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6)本文中的模型可以解释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权配置行为,但对其他类型企业的所有权配置现象是否具有解释力,则是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这里需强调的是,企业的要素特征不是企业所有权配置的决定因素。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的理论之争揭示了企业各种要素产权主体的所有权要求特性,这对进一步分析企业所有权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财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要求不应该被孤立地过分强调,应该寻求更普遍性的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 张维迎:《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 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 周其仁:《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中华企管网,2002年。
-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 广州市政府:《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规定》(1999年广州市第10号人民政府令)。

责任编辑:郑红军

Game Analysis of the Allocation of High-tech Firms' Ownership

Qin Bin and Lei Fugu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ame economics, we illustrate the problem of the allocation of high-tech firms' ownership. We find that the ownership allocation is dynamic and more like game behavior. The policy adopted by the owner of material capital is interrelated with that of human capital's owner. The game process is specified by momentum in choice and dependence on initial status.

Key Words: high-tech firms; game models; ownership allocation

信号效应、讨价还价模型 与我国劳动力市场

许洁虹

(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0262)

[摘要] 不对称信息的市场理论作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在解释现代市场中的许多现象方面, 有着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本文就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中“信号效应”和“讨价还价”模型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消减不对称信息对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对策。

[关键词] 不对称信息 劳动力市场 信息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2) 09-0074-03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具有关于交易商品的质量和价格的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 竞争性市场的有效运作理论也是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之上, 而现实交易中, 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完备的情形却常见。缺乏完全信息的情况称为不完全信息, 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信息不完全的一种情况, 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本文主要探讨斯彭斯的“信号效应”理论和鲁宾斯坦的“讨价还价”模型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相关问题。

一、“信号效应”与劳动就业市场

1. 斯彭斯的“信号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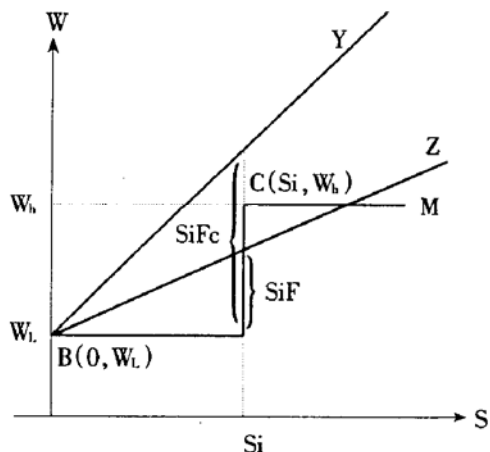
斯彭斯的开创性论文《就业市场信号》(Job Market Signaling, 1973)和《市场信号》(Market Signaling, 1974)一书都分析了劳动就业市场上教育所起的信号作用。假设劳动力市场上有高能力和低能力两种雇员, 高能力的生产率为 A_h , 低能力的生产率为 A_L , 两者占雇员数的比例分别为 b 和 $1-b$ ($0 < b < 1$)。假定线性的生产函数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在均衡的情况下工资取决于(预期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市场信息是对称的, 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是可以观察到的, 则企业可按劳动生产率支付工资,

即 $W_h = A_h$, $W_L = A_L$, 劳动力市场可达成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是做不到的, 如果雇员知道自己的真实能力, 而企业区别不了高、低生产率的雇员, 企业只能支付给雇员平均工资 $W = bA_h + (1-b)A_L$, 高能力的雇员显然不会接受这一工资水平, 最后劳动力市场或许就会萎缩为只有生产率低的雇员按低工资受雇了——类似于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结果。^①

显然高能力的雇员为获得高工资就必须想办法将自己从低能力者中区别开来, 接受教育是可供选择的信号。企业虽然无法直接看出雇员的生产率, 但他们可以看出雇员们的受教育程度。假定每个企业都根据预期的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付工资, 教育不影响生产率, 但不同能力的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斯彭斯——莫里斯条件 Spence-Mirrlees condition), 高能力的雇员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 F 小于低能力雇员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 F_c (即 $F < F_c$); 再假设企业预期达到某种受教育水平 S_i 以上的所有雇员都具有高生产率, 企业付高工资 W_h , 其余的为低生产率, 企业付低工资 W_L 。这种工资假设见图1(W : 工资, S : 受教育水平, Y : 低能力雇员受教育成本线, Z : 高能力雇员受教育成本线, M : 企业按教育

水平付工资线), 考虑这种工资状态, 每个雇员不是选择最低受教育水平 $S=0$, 而获得低工资 $W=W_L$ 的 B 点, 就是选择受高一些的教育水平 $S=S_i$, 而获得高工资 $W=W_h$ 的 C 点, 其他各点都会使教育的成本增加, 而工资却未能提高。可见低能力雇员的教育——工资最优效用选择是 B(0, W_L), 在 C 点对于低能力的雇员来说其为提高教育水平而付出的成本 $SiFc$ 大于增加的工资收益 ($W_h - W_L$), 接受教育是负效用; 而高能力雇员的教育——工资最优效用选择应是 C(S_i, W_h), 其为此付出的教育成本 SiF 小于增加的工资收益 ($W_h - W_L$), 接受教育可提高效用。因此低能力的雇员会选择最低受教育水平, 而高能力的雇员则选择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市场自然实现“分离均衡”, 这里教育水平起着区分雇员类型的信号作用。

图 1



2. “信号效应”与文凭、证书泛滥

斯彭斯的“信号效应”理论揭示, 由于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市场要求一种信号来帮助信息缺乏的一方识别。对于企业来说, 应聘者的受教育水平起着筛选和指示的作用。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向企业提供一种能够证明其有能力的信号, 正是凭着“文凭”这个信号, 企业会按一般水平所做的决策来取舍雇员, 并决定其应得的报酬。特别在雇员的生产率难以计量的那些经济部门, 这种信号的使用更为重要, 工资和受教育程度是在应聘者一开始就业就密切相关的。可见, 人们选择接受教育可能主要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生产技能, 而是为了取得信号将自己从低能力者中区分开来, 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能创造较高的

生产效率, 应拿较高的工资。这种信号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近年来劳动人才市场上文凭、证书泛滥, 甚至假文凭、证书充斥市场的现象。

目前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各种制度、法规还不够完善, 测试人才的能力还没有一套完善科学的人才评价系统, 致使企业甚至应聘者自己不可能全面了解自己, 信息不对称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有时也限于自身的素质, 无法对应聘者作出全面的评价, 只能借助于应聘者提供的材料和文凭、证书等硬性条件来决定取舍, 致使许多人为了找工作或许晋升的需要而选择接受教育, 多一份文凭、多一份证书就多一份筹码、多一份竞争力被社会普遍接受。因而学非所用, 文凭、证书泛滥也就在所难免, 代考现象、假文凭、假职业资格证书也就应运而生。

二、“讨价还价”与我国的劳动合同

1. 鲁宾斯坦的“讨价还价”模型。鲁宾斯坦(A. Rubinstein)早在 1982 年就利用不对称信息理论对劳动管理合同问题做过分析。他建立了两个机构(工会与厂方)进行“讨价还价”的模型分析。假定两个机构为一笔利润 V 的分配问题“讨价还价”, 如果“先走”的机构认为第二步他仍然会“先走”, 他就会这样思考: 如果我的均衡效用是 U_1 , 且如果我在两个阶段都“先走”的话, 我将以我的均衡战略至少得到 U_1 。回到第二阶段开始之前的阶段, 考虑折现的情况下, 我的效用是 δU_1 , 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 对方的最佳选择是 $U_2 = V - \delta U_1$ 。在没有时间延误和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 对第二机构而言同样存在 $U_1 = V - U_2$, 最后的结果是各得 50%, 达到均衡。如果有时间延误的话, “时间”成为传递双方利益的信号, 例如在工会与厂方谈判时, 厂方每天的利润越高, 越容易接受条件。阿德马迪与皮里(A. Admati and M. Perry, 1987)建立了一种具有时间延误的模型, 他们假定双方都有权决定在“出招”之前思考的时间, 假定工会先走, 当然利润多的厂商会因为时间的延迟而损失得更多, 因而会尽量减少时间延误。如果厂方的利润较低, 厂方也会延长时间, 如果这一信号有效, 工会就会相信这是厂方利润较低的信号, 就会首先让步。这种讨价还价的实质是一种消耗战, 双方都等着对方“投降”或

“出局”。

2. “讨价还价”与劳动合同。“讨价还价”模型揭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显然缺乏信息的一方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往往必先让步。目前，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信息不对称使劳动合同管理中信息弱势方受损的现象比比皆是。如试用期陷阱。目前，由于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加，待业大学生开始涌现，不少用人单位利用这种市场信息来骗取廉价的劳动力，提出试用期，试用后才与应聘者签定正式劳动合同，结果是试用期内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试用期一到马上解除劳动合同。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尚未就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受损方往往是缺乏信息的应聘者；又如签订不合理的劳动合同。应聘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往往由于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无法进行“讨价还价”，部分用人单位趁机要求应聘者签定不合理的劳动合同，使求职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比如，加班不给加班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故意拖欠工资及各种保险，随意解除劳动合同，随意扣发工资等等。

三、劳动力市场中如何消减不对称信息的影响

入世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渐趋国际化、市场化、社会化，劳动力需求更加个性化和专业化。劳动力信息市场的规则越来越多，信息量越来越大，参与国际劳动力交易市场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对信息把握程度的层次越来越不平衡。势必会产生更加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的不对称使劳资双方对劳动力信息的了解和分析程度差异，这种差异势必会影响一方甚至双方的利益，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如何消减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

1. 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制度。相对于其他市场来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个新生事物，才刚刚起步，还缺乏一套完整健全的监督体系，有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但现行的法律法规总体上还是能够基本保护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的。只是当事人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掌握相关的信息，而使其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劳动部门应不断完善立法，加

强执法力度，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2. 建立和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劳动力供过于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乃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现状决定了我国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在信息的获得方面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网络和定期的信息发布制度，如定期在相关人才交流网和中介机构发布有关地区各类人才的供求状况及相关的法规制度等信息，让求职者更直接、更方便、更全面地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信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公平劳动合同。

3. 建立人才信息数据库。文凭、证书尽管无法完全反映应聘者的实际能力，但高学历和优秀的学习成绩不仅反映应聘者以较低的受教育机会成本来显示其能力，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反映其潜在的工作能力和驾驶时间的能力。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文凭和证书所传递的是高劳动生产率的信号，但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假文凭、假证书比比皆是。因此，建立完善的人才信息数据库，消减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显迫切。目前为避免假文凭给用人单位带来的困扰，政府已经开始建立应届毕业生数据库，今后应逐步扩展到各种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的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并逐步从地方联网扩展到全国联网。

4. 建立科学的人才测评系统。各级政府应建立人才测评中心和完善人才测评制度。国家和各省、市应建立人才测评中心，组建一支以测评专家为主体的专门化人才测评队伍，专门从事中、高级人才的测评。企业在招聘高级人才时可委托各级人才测评中心测评，在招聘中、低级职员时，应建立一套与企业相配套的人才考评制度和方法，可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注重考查应聘者的综合素质、能力、实际工作经验、职业倾向素质等，具体方法的操作程序、内容、技术、步骤、条件、规则等要规范化、标准化，应克服主观随意性。建立科学的人才测评系统，目的是让应聘者将其真实的能力反映出来，消减由于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新思路

曾芬钰

(厦门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劳动力供给愈来愈大, 但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在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 如何寻找缓解我国城市就业压力的新途径, 便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城市就业 第三产业 社区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77-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失业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有680万人,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500多万人。如果再加上城市国有事业单位、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毕业生以及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失业者, 我国有1900万左右的失业者。值得人们关注的是, 城市失业问题最近出现新动向, 以往被人们称为“铁饭碗”的几个垄断性行业, 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老的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 又出现新的失业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就业形势, 客观上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地开拓新的就业领域。

一、创造城市就业岗位的主渠道——第三产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之前,

即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由于工业规模的急剧扩大, 所需劳动力大量增加, 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机会。而当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后, 社会上大部分人口已经进入城市, 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 这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已不再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 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不仅没有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 反而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很大障碍。

一般地说, 对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工业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但我国非市场化的工业化道路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 工业部门必将较大幅度地裁减冗员。1998年以来, 我国工业已累计减员1840万人。而与之相联系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将成为我国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九五”期间, 我

学术
研究

①王翼龙译, 瑞典皇家科学院: 《具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 《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王翼龙译, 瑞典皇家科学院: 《具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 《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1期。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6年。

张维迎: 《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主编, 卢昌

崇、王询译: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年。

周长才: 《不对称信息理论应用研究评介》, 《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1期。

宋小川: 《入世后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 《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

Michael. Spence, “Market Signal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责任编辑: 黄振荣

国服务业新增就业 2715 万人, 占全国同期新增就业的 85%。“十五”期间, 我国每年需要安置 800 多万人就业, 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可以说: 发展服务业, 对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 加入世贸组织, 将使我国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 这既为加快发展服务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也使服务行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 加快发展服务业, 提高国际竞争力, 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

目前, 我国已进入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 农业就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就业比重过低。这又和我国城市化程度偏低联系在一起。统计分析表明, 服务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性。用 1965 年 101 个国家的数据和 1980 年 123 个国家的数据计算, 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74 和 0.80。我国长期以来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滞后直接联系在一起。20 多年来, 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载体——乡镇企业, 其第三产业比重仅占 17%, 远低于全国 32% 的平均水平。我国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每增加 1 人, 服务业仅增加 0.35 人左右,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转移比例为 $1 \diamond 0.35$ 。如果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比例能够达到 $1 \diamond 1$, 那么 20 年来我国至少应该多增加 6000 万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那样的话, 2000 年的服务就业比重就不应该是目前的 27.5%, 而应该提高到 36%。

与第一、二产业相比, 第三产业具有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合二而一的特点, 不是像第一、二产业那样, 在甲地生产, 到乙地消费。而且, 第三产业要求一定的人口集中度, 即人口必须集中到一定规模, 第三产业才有盈利的可能, 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 也才能有供给。我国农村工业“离土不离乡”的制度性障碍使我国经济增长中潜在的就业空间始终没有释放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模式, 更极大地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建设部所提供的报告, 我国乡镇企业 80% 布局在村落, 12% 布局在集镇, 7% 布局在建制镇, 1% 布局

在县城。这种分散型的布局, 未能有效地促进每个“点”的人口集中, 绝大多数“点”达不到多数第三产业所要求的基本“入门人口”。这样, 在农村难以形成第三产业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情况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就只有挤入第二产业。由此可见,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 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 当其经济发展处于我国这个阶段, 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 $2/3$ 甚至 $3/4$, 而我国目前则刚过 $1/3$ 。由于农村人口对服务业需求低, 大量服务业劳务都采取自助方式, 所以, 虽然在农业以外也存在就业, 却难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十五”期间, 我国服务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首先是市场取向的改革, 将为服务业注入强大动力; 其次是加入世贸组织,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将更加激发服务业的发展活力; 再就是城市化战略的实施, 也将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十五”期间, 服务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将在 4% 以上, 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将由 2000 年的 27.5% 提高到 33%。

二、创造城市就业岗位的新亮点——社区服务业

我国城市就业形势的严峻与尖锐性, 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就业模式转变的滞后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目前我国就业岗位的主要增长点是在第三产业, 那么社区服务业堪称最大的新亮点。我国社区就业市场十分广阔。资料显示, 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的社区服务业可提供 2000 万个就业岗位, 而目前空缺超过 1000 万个。

社区就业是一种相对于政府就业(公务员)和传统单位(城市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另一种就业方式。社区就业的目的是服务于社区, 社区就业的组织是劳动者自发或者自愿组成的。就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 不仅对完善社区功能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推动社区就业、促进再就业工程向社区领域延伸也有重要意义。

与传统的正规就业相比, 社区就业具有其固有的特点:

首先, 表现在社区就业多半带有辅助性质。与目前大中型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就业岗位相比,

社区服务业的不少就业岗位具有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的特点(对城市居民来说,没有社区性服务提供,居民也可以勉强自我服务,虽然会影响生活质量)。社区服务的辅助性,决定了其需求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开发社区就业的难度。

其次,表现在社区就业方式的不稳定性。因为很难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劳动关系,社区就业岗位具有很大的弹性。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社区服务的劳动报酬标准相对较低。目前我国大部分社区服务实体的规模都很小,投资也少,微利运营,客观上需要引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再加上大多数社区服务岗位所要求的技术含量小,需要的劳动力素质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就业劳动力的低成本。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以往那种单纯依靠国有、集体单位等传统正规部门吸纳所有劳动力的就业模式,越来越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客观实际。1996-2000年,我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减少3142万人,下降27.9%;城市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减少1517万人,下降50.3%。同期外资企业等经济单位创造就业岗位近400万人,私营企业创造就业岗位648万人,个体经济创造就业岗位427万人。如何因势利导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将成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就业模式转变的基本方向。

我国的社区就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也是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管统包一切,社区功能几乎完全被就业单位化或企业化所替代,严格意义上的社区就业几乎不存在。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集体企业逐渐剥离其社会职能,机关事业单位和学校后勤保障的社会化

改革加快,社区服务的需求必将会大幅度增加。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使得政府的权力和支配范围不断缩小,市场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加强。“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服务”的框架日趋清晰,这就为社区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服务领域广阔,社区服务内容丰富。为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方面需求,要着力发展物业管理、家庭保洁、医疗保健、体育文娱、设施经营、商品递送、生活护理、维修服务 etc 社会化的便民利民服务业,开发社区治安、环境管理等社会公益性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市场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就必然会分离出相当一部分低素质的劳动者。那么,如何解决这部分低素质劳动者的出路呢?发展社区服务业即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它能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行业。至于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那部分素质更低的劳动者,选择技术、知识要求相对不高的社区服务也许是相对较为合适的行业。

参考文献:

王健君、叶俊东:《不加快城市化速度不行》,《瞭望周刊》2001年第50期。

易查:《膨胀的就业》,《瞭望周刊》2001年第46期。

胡鞍钢、杨韵新:《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

厉以宁、董辅礪、韩志国:《中国经济跨世纪的主题和难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国家计委发展规划司:《为什么“十五”期间必须加快服务业发展》,《经济日报》2002年4月10日。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郑红军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分析

林勤玉

(广东经济管理学院财政金融系讲师, 广东 广州 510262)

[摘要] 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 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不但难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有效的发挥,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分配不公。文章通过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分析, 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思路 and 措施。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税负水平 缺陷 改革思路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80-03

一、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有关观点的评析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正式实施, 始于 1994 年的新税制。在税负问题上, 一种观点认为, 目前的个税税负太轻, 理由是: 我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即个税的宏观结构比率)尽管逐年上升, 从 1994 年的 1.42% 上升到 2001 年的 6.27%, 增幅较快, 但比例仍无足轻重。据世界经合组织的调查表明, 发达国家这一比率一般维持在 40% 左右, 美国、瑞典、丹麦等国家高达 60%, 因此, 大幅度提高这一比重, 在我国仍有很大空间。与此相反的另一观点认为, 目前个人所缴纳税收占个人净收入的比例(即个人税收负担率)太高, 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太重。理由是: 以 2001 年为例, 当年我国经济增长为 7.3%, 财政收入增长率为 22.2%, 而个人所得税的增幅却高达 44%, 税负之重, 略见一斑。

其实, 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并非太轻, 简单地把我国 6% 左右的个税宏观结构比率与发达国家的 60% 相比是片面的, 因为两者的计算口径不一致, 不具可比性。也就是说, 比率偏低并不意味着税负偏轻。我们可通过分析造成比率偏低的原因来说明这一点。

1. 税收征管手段落后, 大量税收流失是导致该比率偏低的一个原因。个人所得税是所有税种中纳税人最多的一个税种, 纳税人越分散, 税源就不易监控, 逃避纳税行为的人就越多, 征税就越困难。

据有关部门分析, 从 1994 年至 2001 年, 8 年间我国应征个人所得税应在 5500 亿元以上, 而实际征收累计仅为 3019.64 亿元, 仅占应征额的 55%, 将近一半的税收被流失。如果仅仅把该征的征上, 那么, 我国个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将大大提高。

2. 我国个人所得税口径窄、范围小是导致该比率偏低的另一原因。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中, 并未包括劳动者为社会保障而交纳的社会保险费。而在西方国家, 劳动者为社会保障而缴纳的一切费用往往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征收, 一并纳入个人所得税范围。美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高达 60%, 其中社会保险税就占了一半。虽然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征收的税费, 在以后一定时期内要逐步返还, 具有有偿性, 但毕竟在劳动者缴纳当时会构成纳税人当前的负担。如果我们在计算口径上也与国外一样实行宽口径, 即把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纳入个人所得税计算范围, 那么, 我国的这一比例也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随着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和社会保险制度的规范, 当年征收的社会保险基金规模将远远大于当年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以广东省为例, 2001 年全省共征收养老、失业保险基金 213.28 亿元, 而当年广东征收的个税不足 100 亿元就是一个证明。

显然, 剔除以上两个影响因素,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已超过 20%。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相当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去年我国人均 GDP 不足 1000 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 25000 美元相比,我国人均 GDP 偏低,这决定了个人收入平均水平也较低。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的指标进行比较,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税负不算轻,是否太重了呢?按理说,个税占税收总额维持在 20% 左右,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适中的。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人却普遍感觉税负太重,减税的呼声很强烈。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个税宏观结构比率不高,而个人税收负担率却偏高?根本原因是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的。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缺陷

去年我国个税收入增幅高达 44%,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这其中相当部分是由于加强税收征管,把以前各年度该征而未征的个人所得税进行补征,这种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情况,并不具有一般性。如果扣除特殊性增长因素,去年我国个税的增幅也不可能有这么高。而税制本身的不合理产生税负的不公平,广大的工薪阶层扛起 70% 的个人所得税才是造成普遍感觉税负重的原因。其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一) 免征额门槛设定太低,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免征额的高低是税制用于调节纳税人税收负担的一种灵活措施,体现了税收制度中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免征额低,税负重。我国目前低至 800 元的免征额是 1994 年新税制实施时设定的,在当时还是适合的。但近 10 年来,从未调整过。而 10 年来,职工收入水平已翻番。现实是,只要收入稍微高于失业救济金几百元,就属于个税征税范围,个人所得税成了普遍征收的税种,这是造成普遍感觉税负重的主要原因。

在税收制度中,个人所得税是具有最强地调节收入分配能力的一个税种,它具有税负难以转嫁、归宿比较清楚的特点,又由于它的累进性,收入越高,缴税应越多。政府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形成的收入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所得税的征收实施再分配,“损有余而奉不足”,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扶持经济弱势群体,实现政府的公平分配的职能。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也大幅

度提高,然而,800 元的免征额却是若干年一贯制,作为一种灵活的调节机制从未启用,使工薪阶层新增加的工资中相当部分又被增加的税款所抵消,从而大大削弱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使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工资、增强消费能力、刺激经济发展的愿望难以实现,紧缩的经济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二) 分类分征的课征模式,使广大中低收入者缴纳所得税的累进性与高收入者的累退性产生强烈的反差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分项定率、分项扣除、分项征收的模式。这使得高收入者由于其收入来源渠道多,可以享受多次费用扣除,并分别适用较低税率,从而少缴税款。对于灰色的、隐性的收入,就更谈不上纳税了。而广大的工薪阶层,由于其收入来源渠道单一,无法享受多次费用扣除,难以适用低税率。出现高收入者并不多纳税,富人自有避税手段。这种课征模式,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无法体现税负公平,反而加剧了不公平的程度。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思路

随着个人所得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其税收负担的轻重,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水平,从微观角度看,是指个人的税收负担率;从宏观角度看,是指个税的宏观结构比率。因此,个税税负的轻重,既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关系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税负太轻,直接影响了政府履行其职能的需要,制约了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调节的力度,使公平分配和量能纳税的税收原则难以体现。税负太重,政府收入未必能增加,而对于纳税人来说可能产生替代效应,即“纳税人用非征税活动来替代征税活动以达到逃避政府税收的行为”,其结果给经济带来紧缩效应,不仅对税源造成破坏,而且政府的税收收入最终反而减少。因此,税收制度,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应体现中性原则。

为了使个人所得税这一“良税”能产生公平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良性作用,鉴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存在的微观负担不合理的现象,改革现行的所得税制度已迫在眉睫。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完善个人所得税的配套措施,消除税制本身存在的不合

理因素,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本身所具有的公平税负的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具体宜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一) 提高免征额,减轻工薪阶层的负担,这是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支持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中部大,两头小”的新的分配格局。为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了实施“扩中、保低、调高”的战略: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保障城乡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免征额过低,真正受伤害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者,与“扩中、保低”的战略相背。对于免征额的设定,既不能采用若干年一贯制,也不能全国一刀切。目前,已有许多城市制定出适用于各自城市的免征额,例如,深圳 1600 元、广州 1260 元、上海 1000 元,这种体现地区差别的免征额的做法,应给予肯定和推广,并纳入税法加以规范化。随时也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而调整。如果考虑收入增长和物价因素,那么,1994 年设定的 800 元免征额在目前至少也要翻一番,更何况各地还存在经济状况的差异。其实,我国已在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了两年晋升一次的正常工资增长机制,对于免征额,各地也完全可以考虑两年调整一次,在工资增长的当月也公布相机调整的免征额,使对免征额建立起灵活的调节机制。目前,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在免征额设定上还难以考虑到每个家庭的差异,但作为过渡性的办法,只考虑收入水平和物价因素来适时调整免征额,在实务上仍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将使税收的公平性、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

(二) 改革现行税制模式,变分类税制为综合税制,这是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调高”战略的配合

现有税制模式的最大弊病在于助长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使收入来源渠道多的高收入者,其个税负担率低于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呈累退态势,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本身所具有的对收入的调节功能无法实现。实行综合税制,能从根本上消

除这种不合理现象。鉴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手段落后、征税效率低下的现状,不宜立即采用综合税制,但作为过渡性办法,可考虑分类与综合税制相结合。即可以在各项收入项目中,对有免征额规定的进行合并,综合征税。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项目,加总后只享受一次费用扣除;对没有免征额规定的收入项目,则按次分类征税。如利息、股息等,按每次取得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按次征税,不享受费用扣除。对某些收入项目的规定,也需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如偶然所得的中奖收入。随着我国福利彩票事业的发展,彩票发行的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中奖面越来越广,“奖金超过 1 万元以上的中奖者须依法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的规定就显得不合理,难以充分体现量能负担和公平税负的原则。

(三) 加快实行个人收入自动申报制度和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是净化税收环境,铲除逃税行为,公平税收负担的制度保证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个人自觉纳税意识相当淡薄。但即使是纳税意识很强的西方国家公民,也并不意味他们都喜欢上税,他们交税虽很不情愿,但他们却毫无怨言,并能自觉地、主动地去履行纳税义务。究其原因,是因为有完善的税收征管制度和严厉的惩罚机制做后盾,使纳税人不敢以身试法。我国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完善税收征管制度,这是全面实行个人收入自动申报的制度保证。我国虽然也提倡个人收入自动申报、自觉纳税,但少交、漏交甚至不交现象却相当普遍,原因在于税务部门无法监控,即使被查出有逃税行为,也因为惩罚力度不够,对违法犯罪行为难以起到惩戒作用,从而使一部分人愿意挺而走险。个人潜意识里的逃税心理和别人逃税的成功又助长了人们的逃税行为,这对于依法纳税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造成税收负担不合理的另一种表现。因此,必须净化税收环境,大力铲除逃税行为。个人收入自动申报,有利于税务部门提高对税源的监控力度。同时必须建立定期抽查机制,保证一定比例的抽查概率,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一旦发现偷漏税行为,立即处以重罚,使逃税者得不偿失,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营造良好的纳(下转第 103 页)

中西方混合经济模式比较研究

崔建华

(武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国家的从单一经济发展到混合经济的不同模式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说明中西方国家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 在起点、路径、特征、绩效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中西方国家走向混合经济在运行机制上是相似的, 中国要大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中西方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推动的。

[关键词] 混合经济 制度变迁 机制转轨

[中图分类号] F0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83-05

当今世界, 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 混合经济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的混合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混合经济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 甚至还存在着根本区别, 但这并不能否认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也有着相同点或相似点。本文主要就中西方国家从单一经济发展到混合经济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 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特性, 以便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的混合经济。

一、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起点比较

中西方国家都是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 但西方发达国家是从单一市场经济走向混合经济, 即从古典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而中国则是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走向混合经济, 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具体地说, 区别表现在:

第一, 在所有制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只存在单一的传统私有制, 企业小而多、以原子式存在, 主要采取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的工厂制度形式, 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于财产所有者。即使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出现了公司制企业形式, 但所有制基础仍是单一的私人所有制。而中国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 排斥和否定多种经济

形式和经营方式, 力求形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单一所有制格局。到 1978 年公有制比重达到 98%, 其中国有经济比重占 55%, 集体所有制比重占 43%, 非公有制经济则不足 2%, 在工业生产领域, 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92.89%, 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7.11%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1994)。

第二, 在分配方式上, 西方发达国家认为, 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 按资分配是唯一的分配形式,^①国家不得干预收入分配过程; 而在中国, 与“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相适应, 实行按劳分配, 不承认劳动以外的其它要素也能获得收入, 否认收入分配的差别, 强调结果上的平等, 实行平均主义分配, 国家是分配的主体。

第三,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 西方国家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自发形成的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变化, 自由地将稀缺资源分配给生产者, 也可以自由地把商品和劳务分配给消费者, 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 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 又是由利润率与市场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而中国则排斥和否定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实行中央高度集中, 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经济运行模式。

学术研究

二、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的具体路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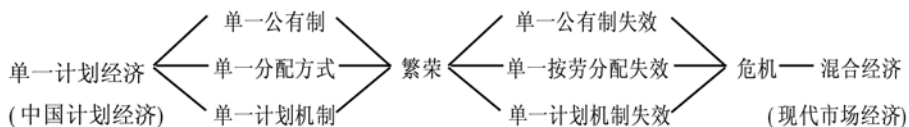
中西方国家发展混合经济目的都是为了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调控机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具体路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具体路径是:



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实行单一的市场经济,在采用单一私有产权和单一的按资分配基础上,运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运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确立政权地位短短的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竞争导致了私人垄断的产生,私人垄断的出现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出现机制失效即市场失效;单一的私有产权的企业结构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追求垄断生产滥用资源以获取垄断利润,其结果必然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即成为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反动,出现单一私有产权失效;单一按资分配,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损害社会整体效率,同时还造成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安全和政局的动荡,出现单一按资分配失效;三位一体的失效,说明古典市场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以沉重打击,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几乎倒退了近半个世纪。为挽救资本主义的命运,三位一体的混合经济,在理论上经过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实行“凯恩斯革命”和实践上的罗斯福“新政”后就应运而生了。从此,西方国家纷纷转向混合经济。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纯粹

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地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萨缪尔森,1991)

中国走向混合经济具体路径是:



由于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资本短缺以及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辉煌成就,建立了我国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经济增长速度名列世界前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一是单一的公有产权的国有企业只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工厂——“单一的巨型的生产企业”(吴敬琏,1992),政企严重不分,政府主要用指令性计划调节企业运行,企业缺乏活力,吃国家的“大锅饭”,效率和效益低下,因而出现了“单一公有制失效”。二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平均主义),不承认其它要素也能获得收入,不承认分配的差别,不能调动劳动者和其它要素提供者的积极性,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盛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因而出现“单一分配方式失效”。三是单一的计划调节,政府对人、财、物、产、供、销都实行干预,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特别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使整个经济都失去了活力,出现“计划失效”。“三位一体的失效”,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提高”。(邓小平,1993)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中国才逐渐走向混合经济。

三、从单一经济走向的混合经济特征比较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混合经济,特指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出现国家垄断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实行的混合经济,特指经过 20 多年市场取向改革,逐渐形成和正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有着各自显著的特征。

(1) 西方发达国家混合经济的显著特征是:

以私有制为基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在绝大部分私人资本企业基础上,西方各国出现了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国有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元所有制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1968 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值的比重,英国为 17%,西德为 22.7%,意大利为 28%,法国为 33%,瑞典 1979 年公共经济在投资总额中占 40%(丁冰,2000)。即使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国有企业仍是一种重要经济成分,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公益企业中还占据明显的支配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企业股份化有了新发展,表现为,一是数量和影响大大增强。在美国,一般大中型企业几乎都是股份公司,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股份制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 1/6,而其净收入的比重却高达 80% 左右,许多小企业也在股份化,特别是很多高科技小企业正是通过股份化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大企业的。二是股票分散化。股票持有者越来越广泛,1982 年美国直接持股人数为 3200 万人,加上间接持股人数达到 1.33 亿人,约占当时美国人的 60%。三是股份职工化。各国大力推行雇员拥有股票制度,如英国,有的企业股票甚至 100% 为本企业职工所购。四是职工参加企业的管理。许多西欧国家已经以立法形式予以规范。(童大林,1988)

上述所有制变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虽没有本质的改变,但在形式上都有了变化:一是在社会所有制形式结构中,已不再是单一的“私人企业制度”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而是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国有制的“国营经济”、“公共企业”以及其它经济性质企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二是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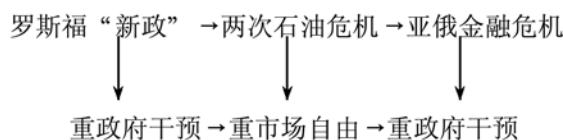
司)的财产所有结构也由单一性“业主持股”向多元化的“业主持股”和其他“个人持股”以及“国家参股(或控股)”相结合的财产所有结构变迁。

(2) 中国现阶段混合经济的显著特征是:

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有经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及其战略性的调整,其绝对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并日趋合理化,相应地非国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国有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56% 下降到 1996 年的 40%。集体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3% 下降到 1996 年 35.2%,而非公有制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则由 1978 年 1% 的幅度上升到 24%,虽然有这种比较剧烈的变化,但到 1996 年,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仍占 76%,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更占绝对优势。公有制主体地位并没有被改变和动摇。(张卓元,1998)同时,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混合所有的企业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中西方走向混合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没有本质区别,基本上是相似的,主要表现在:第一,都是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混合机制调节经济的运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的差异,中西方各国必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模式。如美国是以垄断主导型市场体制运行模式,德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法国是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瑞典是福利型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日本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完善的混合经济运行机制,而中国则对市场机制作用、国家干预作用的力度和范围的把握以及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处理还不到位。无疑,中国必将在博采众长基础上,结合国情,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第二,都根据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对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力度交替循环调整,时而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而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并在动态变化中达到两者的均衡。不同的是西方国家调整经验比较丰富,技艺比较娴熟,如下图所示,(陈东琪,1999)而中国则在调整中显

得经验不足, 技艺正在摸索之中。



20 世纪西方经济发展中“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交替变化。

四、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绩效比较

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后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混合经济后, 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古典市场经济阶段更巨大的成就, 从经济增长来看, 二战后 20 多年,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增长率为 4. 7%, 这 20 多年, 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 超过了过去 200 多年生产的产品总和。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 经合组织各发达国家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 20 世纪 60 年代为 4. 9%, 70 年代为 3. 2%, 80 年代为 2. 6%。(丁冰, 199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 1991 年 3 月以来, 克林顿, 提出“重振美国经济”, 推行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两方面经验, 沿着这条“富有活力和朝气蓬勃”的中间道路, 美国经济持续 109 月出现了“二低一高”的新经济现象。据美国全国企业界经济学家协会提供的材料, 美国 GDP 增长率 1997 年、1998 年分别为 3. 8% 和 3. 9%, 而同期失业率已降到 5% 以下, 通胀率近几年一直保持在 3% 左右, 1997 年为 1. 4%, 1998 年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只有 0. 8%, 为 35 年来的最低点。(丁冰, 2000) 2000 年, 经济增长率高达 5%。

但相比而言, 中国因制度优势和后发性优势发展得更快。中国自市场取向改革以后, 经济充满活力, 发展加速, 从 1978—1998 年 20 年间平均增长速度达 9. 7%, 处于世界前列, 比全世界平均增长率高两倍, 2000 年 GDP 的总量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 人均 GDP 已突破 800 美元, 中国已跻身 GDP 总量第六位的国家, 同时, 社会政治保持基本稳定局面, 人民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长, 由改革开放前的十三位上升到第七位, 国际地位得到举世公认的提升, 出现了“中国奇迹”。改

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在短短几十年中, 中国取得了资本主义上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据美国 1998 年《情报背景材料》分析, 1980—1989 年美国年均增长为 2. 7%, 而中国则为 9. 3%; 1990—1995 年, 美、中两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 8% 和 10. 6%, 另据世界银行统计, 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 1980—1993 年中国为 8. 2%, 美国为 1. 7%。(卫兴华, 1998)

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后并非进入了人间理想的天堂, 相反, 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矛盾重重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

首先,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频繁发生。战后几十年间虽未爆发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大危机, 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却比二战前更加频繁, 美国自二战后到 90 年代已发生了 9 次经济危机, 平均四五年就要爆发一次。其他国家包括曾经出现过“经济奇迹”的西德、日本也无一例外地爆发过经济危机, 特别是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后, 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一蹶不振, 至今也还未复苏过来。

其次,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据统计, 1996 年, 美国 20% 的最富的家庭分享了国家全部收入的 49%, 而在 1990 年这一比例只有 44. 3%, 而 1996 年比 1990 年上升了 4. 7 个百分点; 而另一方面, 20% 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在同期却下降了 1. 8%。从最富、最穷人的情况来看, 目前美国 1% 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比 90% 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还多, 目前美国 60 位最有钱的大富翁的财产总和高达 2650 亿欧元, 比有的低收入国家一年的 GDP 还多。其他一些国家的巨富拥有的财产亦十分可观。如德国 21 位最大富翁财产总和达 940 亿欧元, 日本 14 位最大富翁财产总和达 350 亿欧元, 而与此同时,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却大量存在, 美国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6. 5%, 英国占 15%, 德国占 10%。(丁冰, 2000) 另外, 还有诸如失业、巨额财政赤字、暴力犯罪等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面对此, 竭力粉饰资本主义的萨缪尔森也不得不哀叹: “混合经济仍然远远不能为这些可怕的疾病(经济危机、失业、两极分化)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萨缪尔森, 1991)

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失业等问题,其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其一,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迅速扩大。1978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元和212.9元,到1990年分别扩大到700.1元和885.8元,1997年又分别扩大到3897.4元和5057.6元。再从相对差距看,在1983—1994年间,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系数由29.8%迅速上升到46.7%,而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系数则由44.4%迅速增加到55.9%,到1997年已达到57.2%。目前,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其二,城乡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37:1,到1994年已提升到2.86:1。其三,高收入阶层凸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我国年收入在100万以上已有100万户,最高3%收入组同最低10%收入组的比率从1988年的7.69%上升到1995年的11.82%。

五、简要的结论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中西方国家通过制度变迁与机制转轨走向混合经济,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有的、一般的规律或客观发展趋势,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调整,归根到底,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2. 中西方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起点、路径、特征、绩效都有很大差异,但根本区别在于,不同制度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实行混合经济的性质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锁定”在资本主义宪政秩序前提下,因而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混合经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锁定”在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前提下,必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条件的混合经济。同时,不同制度内部结构在保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始终处在动态调节过程中。

3. 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本质区别,基本上是相似的(都有自己鲜明的特

色),并且都要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因此,中国要努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混合运行机制的经验,以发挥后发性优势,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 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都存在许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其出路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因而其出路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①这里讲的按资分配是唯一的分配形式的含义,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只存在物资资本所有者参与利润的分配,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参与利润的分配,他们获取的工资不是分配,仅仅是劳动消耗的补偿,分配应是对新创造的价值进行的分配。

参考文献: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趋势和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

吴敬琏:《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丁冰:《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童大林:《当代资本主义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

张卓元等:《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常修泽、高明华:《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推进程度与发展思路》,《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

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丁冰:《战后科技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卫兴华:《改革20年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评析》,《学术月刊》199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

辛亥革命与清末 “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

郭世佑

(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授,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怎样看待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价值与作用, 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 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 也许是必要的。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清末“新政” 内在联系 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88-04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 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 影响及于后世, 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 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 聚讼纷纭。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 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 对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劳绩多给一点理解与敬重, 也许是必要的。

一

曾几何时, 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 我国史学界大都重视破坏而鄙弃建设, 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 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著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 鲜有提及, 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或戊戌通缉要犯兼时政批评家梁启超的思路, 斥责“新政”为“假维新”, “伪变法”, 充其量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 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这个“反动”的“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近十余年来, 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 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顺利铺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 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著不断涌现, 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渐

次浮出水面。可以说, 近十余年来, 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 在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过, 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 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名义, 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 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 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 此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已出台, 至今余音未绝。有关论点或从境外引入,^①或与境外的类似声音相呼应, 其中固然不乏“与国际接轨”的架势, 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有关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如何直接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或提炼的价值理念来阐释或衡量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而不使人产生隔靴搔痒之感, 外来的或基于本土的理论模式在千人千面的历史现象面前是否具有万能的功效, 这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本文姑置不论。就我国的有关学术状况而言, 由否定晚清“新政”、讴歌革命而转为讴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学术现象与其说同自然而然的互补性学术反弹或纠偏有关, 还不如说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误区有关。无论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讴歌革命的话语系统, 还是近年彻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恋“新政”的见解, 尽管彼此的结论显得南辕北辙,

但无论在话语环境之于史学主体的制约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话语环境上,有关是非判断都过多地受现实生活与社会主流中的价值体系的制约与影响。现实生活中崇尚革命,鄙弃改革,史学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去一味地讴歌甚至神话革命而鄙弃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差异,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对平静的学术心境与学术中立态度,过于趋时;在思维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于两分法的简单化思维定势,用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过多地纠缠于是非定性与价值评判,站在要么彻底肯定、要么彻底否定的两极互换角色,却忽视了社会内部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有关历史结论就真像翻烧饼一样,此也是一是非,彼也是一是非,史学主体的主观色彩太浓。

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的确还超过了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已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正是通过“新政”,从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落户;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已开始成形。除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相继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就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②其价值与影响也不因清朝的覆灭而消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被迫将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启超于1901年所设计的预备立宪方案捡起来,逐渐予以尝试。

不过,“新政”毕竟是在统治者于19世纪接连

耽搁几次改革机遇之后开始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百孔千疮。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统治者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时来临的,并非孙中山等职业革命家一厢情愿的结果,不是人为地造势而成。

首先,清政府长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生凋敝与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一笔笔巨额赔款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不尽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民心的涣散与社会的分化。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变本加厉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政治威慑力与治理能力逐代递减,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为挽救统治而启动的,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之于改革者的政治权威、魄力与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后也罢,载沣也罢,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成果,冷静地处理某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维持残局,却还是未知数。以新军为例,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中下级军官中还不乏留学归来者,军中还有同盟会中人乔装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

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爱新觉罗皇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立宪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就成问题。诚如一向不赞成暴力反清的梁启超所说:“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③严复有一段评论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谁能说这些建议是错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先生都不知道,他们恰好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或拿一块马钱子碱当补药给婴儿吮吸。”^④

再次,古往今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难度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应的眼界与胸怀,也要具备沉着果敢的魄力与驾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也许还勉强可以苦撑,但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遭。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来临了。

二

历史本身既充满矛盾,也不无因果联系,最典型的莫过于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充满矛盾的一面不难引起高度关注,却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联系的一面。

不管黑格尔对理性的自我发展之于历史过程的作用以及历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夸张和绝对化,他把历史看作一种必然性的逻辑过程的见解却不无可取之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

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⑤

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

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的步伐,统治者已经明白,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将自身的统治秩序维持下去,使“内乱可弭”;

第二,统治者的预备立宪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国理念的革命者抓紧革命反清的准备,后者试图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爱新觉罗家族成为宪法所规定的“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

第三,“新政”期间,新军的编练与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兴起,为革命阵营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

第五,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民权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六,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与晚清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一脉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财,革命者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去占有革命对象的财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国库空虚,在经济上留下一个烂摊子,这既有利于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不利于革命者自身的政权建设。另外,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也与清末中央权力式微与地方督抚专权的趋势有关,任何一场革命对原有社会格局的破坏都是有限度的,都或迟或早地回到建设的

话题中，破坏只是暂时性的“变态”过程，建设才是常态。况且，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任何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⑥

可以说，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场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与革命者之间固然势同水火，谁都希望吃掉对方。但“新政”与反清革命运动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新政”，都不可能凭空发生。既然二者都已发生在同一时空，势必互相影响，互相对立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过程。假如没有反清革命运动发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们所研究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新政”，反之亦然。对于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场景，后世研究者设想起来不难，但分析和评判起来就需要在必要性与可行性上严格把关。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来，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指责革命者添乱，不仅无法保证由清朝统治者自编自演的预备立宪之结局能令你满意，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较之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既否定“新政”的历史地位又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之论，可谓异曲同工。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⑦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辛亥革命作为“新政”的替代物，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谱写出了中国民权建设的第一章，许多论著已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笔者只想补充的是，尽管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还容易引起纷争，民国的建设也的确难以令人满意，但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将“三纲”之首弃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况空

前，“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⑧在国内是如此，在海外华人中也大致如此。蒋梦麟在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唐人街的变化情况时，就深有感慨地说：“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⑨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对孙中山不无成见的张謇饱含深情的感叹：“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⑩反对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启超也在事后以学者的识力，多次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专题另述。如今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倘若后世研究者连张謇、梁启超的思想境界都难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应革命文学家郁达夫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说过的一句话：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浓厚的民族。尽管孙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完人，在他身上同样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话，也不必掩饰，但称他为近代伟人，当不为过。辛亥革命的发生毕竟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将不会因为后世研究者的学术偏见而消失。

① 详见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2000年，第1-29页。

② 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③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页三一。

④ 澳]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马忠文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北京 100720)

[摘 要]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黄遵宪 张荫桓 戊戌维新 晚清政局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9- 0092- 06

有关黄遵宪与张荫桓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系统而专门的研究仍较缺乏。^①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和新材料的披露, 全面探讨这两位粤籍人士的政治交谊, 对于推进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

张荫桓(1837—1900年) 字皓峦, 号樵野, 广东南海人, 捐班出身。同治初年入山东巡抚阎敬铭和丁宝桢幕, 开始投身于洋务活动。光绪十年(1884年) 曾一度入总署供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 授命为出使美国、葡萄牙、秘鲁三国公使。光绪十六年(1890年) 任满归国后以太仆寺卿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数年间迁至户部左侍郎。甲午战争后, 张氏积极结援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 日益受到光绪帝赏识, 逐渐成为影响政局之“幕后大人物”。^②黄遵宪与张荫桓为粤籍同乡, 均持节出洋。他们谙熟西学, 志同道合, 在戊戌维新中积极倡导变法, 与晚清政局变迁颇有关系。许多迹象表明, 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帝推荐《日本国志》, 密荐黄遵宪, 为其在朝中最大的支持者。

—

黄遵宪与张荫桓订交似在光绪二年(1876年) ,

循书信集》上册, 知识出版社, 1986年, 第78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55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603页。

⑦ 孙中山: 《建国方略》,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

其时张为署登莱青道, 受丁宝桢委派在烟台参与筹划海防事宜, 黄氏则侍父客居烟台。由于中英马嘉理案的谈判在烟台结束不久, 世论于外交时局颇为关注。黄遵宪即在此时“识闽县龚霭人易图、南海张樵野荫桓两观察, 与樵野抵掌论当世之务”, ^③

《人境庐诗草》收有数首当时黄与龚、张的唱和之作, 颇见他们立志经世的理念。数月后黄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 不久随何如璋出使日本, 从而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光绪八年(1882年) 春, 黄以驻日本参赞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张荫桓则于光绪七年(1881年) 由山东调安徽宁池太广道, 后署理安徽按察使, 因李鸿章、阎敬铭等人举荐, 光绪十年(1884年) 夏入京预备召见。不久, 被赏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大臣上学习行走。光绪十三年(1887年) 张荫桓赴美, 临行前专门派人“檄召”刚从美国卸任归国的黄遵宪至广州, 邀他继续担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黄以“限禁华工之例祸端未已, 虑不胜任, 力辞”。^④三年后张氏自海外归, 再次入值总理衙门, 此时, 黄遵宪却又随薛福成出使英伦。次年(1891年) , 清廷在新加坡(当时称新嘉坡) 设总领事, 总署选调黄氏充任。纵观张、黄订交十多年,

版社, 1956年, 第208页。

⑧ 黄炎培: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 中华书局, 1961年, 第68页。

⑨ 蒋梦麟: 《西潮》第10章, 《美国华埠》。

⑩ 《张季子九录·文录》。

责任编辑: 郭秀文

晤面机会并不多，彼此却钦服甚深。黄氏在新加坡所作《岁暮怀人诗》中有一首怀念张氏的诗云：

“释之廷尉由参乘，博望封侯自使槎。官职诗名看双好，纷纷冠盖逊清华。”^⑤诗中对出身寒微却才华横溢、位列廷臣的张荫桓极表赞誉。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是年底清廷派张荫桓、邵友濂以全权大臣赴日谈判，抵达上海后，张氏特召刚从新加坡解任回国、深悉日本国情的黄遵宪咨询对策。对此，黄氏后来有诗云：“公复探虎穴，经驱车前驺。丝辔黯无华，云旌惨垂旒。谓我识途马，召我来咨諏。檄我千里船，揖我百尺楼。”^⑥当时情景可见一斑。其后张氏在广岛被日方蛮横拒绝，清廷复命大学士李鸿章使日议和。李临行前托滞留沪上的张荫桓荐举“熟悉公法条约而有智略文笔”者，张氏复力举黄遵宪。^⑦后虽未成行，却见张氏对黄之推崇与器重。

二

《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变法呼声日益高涨。黄遵宪归国后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托主持江宁洋务局，办理江南五省历年累积教案。在日渐兴起的维新运动中，黄遵宪与张荫桓都表现极为活跃。是年(1895年)底，文廷式、陈炽等人在北京创设强学会，张荫桓即列赞助者之中；^⑧黄遵宪则列名参加了稍后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并结识了康有为，这反映出他们政治理念的一致。不久因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上海之会亦无形解散，黄氏乃以上海强学会余银1200两，并自捐1000两为经费，联络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潇等人，创办了著名的《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初一发行。这份以宣传西学和倡导变法为宗旨的新式报纸成为维新力量重要的舆论阵地。黄、梁等人通过在总署任章京的张元济将《时务报》赠送给包括张荫桓在内的朝中官员。^⑨

是年，黄遵宪受回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委派，与日本领事珍田舍己会议苏州开埠之事。黄遵宪以为苏州非江海口岸可比，力持自营市政，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尤不让步，“珍田氏竟莫能难”。^⑩时论谓“苏界以黄公度所议为最善”，不料，“日本以限制过严，全然翻异”，^⑪致使所议废弃。九月，黄遵宪奉旨入觐。此次入朝得到张荫桓全力相助，从稍

后派黄出使及遭拒事件中颇能见其原委。

十月十九日(11月23日)廷旨令黄遵宪以道员加卿衔授出使德国大臣，同时放罗丰禄为出使英国大臣。然而，德方竟然表示拒绝。有关此次变故的内幕与原因，说法不一。^⑫一般认为，本来总署与枢府拟定黄遵宪出使英国，后因总税务司赫德从中作梗，总署“辄恐英人之不悻，于是奉派使德”，而“德人亦误传英人不愿接而拒之”。^⑬据翁同龢日记称，十月十八日(11月22日)到总署交涉事件的英使臣谈到黄时，“说黄遵宪在新嘉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嘉坡总督署”。^⑭英使所云当闻自于赫德，此即当轴者决定改派黄遵宪使德的潜因。不过，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事件发生时，汪大燮正在张荫桓家充西席，他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7日)致汪康年的私函中，透露了一些局外人无法知道的内幕。不仅缕述了德国拒黄的详尽缘委，并述及张荫桓从中挽救之情形。该函云：

公度星使事，近日已转机，特将各情详下：前月十四、五间黄、罗、伍有召见之信，某使馆筵宴，座有罗，德使海静亦在座。客询使事，罗云黄英、伍美、我则德也。十八(日)英使臣以他事诣译署言及黄，合肥遽生疑，以为不愿黄往，传于枢臣。次日将揭晓，枢臣以合肥之疑词对，仓卒间黄、罗易位。海静初闻罗言已电其国，至是其政府诘之，海疑简使译署与英商而不与德商也，遽以闻英不接黄故易对。德廷遂怫然电海致词译署，海遽咨译有不接待之语，李意沮。张行文英使臣，诘其有无此意，咨复明晰，有“当日晤会贵大臣并未告以黄将使英，本大臣亦绝无不愿待”之语。越日执此诘海，海赅于引咎执前言。两政府惧张，电许使婉商。许未复，张欲复电许，嘱亲诣德邸，意谓可即得复，无烦续电。嗣许复电，言德将询英。续又电言决意不接待。事几已矣，合肥电许使，有德廷既不接黄，未使因此失欢，但亦遽行改派，请许卸俄事(并未奏明——原注)，驻德半年，再

行请派云云。及冬月廿二海复诣译署，言愿接待，自辞前探不实之咎，始有转机。其实当初海意以误闻罗言，亦自知过，特一时无从转脸，开路使行，事实非难，而诸君皇皇几失国体。所争之事，乃新嘉坡之案，赫德微讼之而罗实构之，乘机作乱，窃英任不[而]去。阴邪巧佞，倘得位乘时，殆不可问。而公老公事之老到，亦一时无两，倘非如此结实则败矣。可佩可佩。然遭此萋菲，去亦无味，谅必自辞，既全国体，当自占地步。^⑮

函中“罗”为罗丰禄，“伍”指伍廷芳，“合肥”指李鸿章，“张”指张荫桓，“许”指许景澄（时为驻俄公使），“海”指海静（也做海靖，时为德国驻华公使）。“两政府”似指军机大臣翁同龢与钱应溥。从这份局内人披露的情况看，调换使臣和德国拒黄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关键是函中所谈“合肥遽生疑，以为（英）不愿黄往，传与枢臣”之细节值得玩味。其实，所谓黄遵宪扣商人款欲归己之说纯属谣传，黄甚至为此事专门致函新加坡总督澄清事实。^⑯似乎还没有确凿材料说明英国会因此事而反对黄遵宪赴任，问题的症结在于清廷高层的决策方面。李鸿章当时以此事为词，以为英不愿黄往恐怕只是一个借口。这与甲午战后李鸿章、张荫桓关系的日益恶化以及他们在总理衙门明争暗斗的背景有关。^⑰以当时英、德两国与中国的关系而言，英国所处地位相对重要一些，由亲张的黄遵宪出任驻英公使自然为李所不愿，这是李鸿章借故阻黄的真实原因。^⑱作为李的亲信，罗丰禄从中煽惑也不难理解。翁同龢等枢臣因受李的影响，决定将罗、黄易位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英使正因西江开埠事对清廷百般要挟，翁氏等怕派使之事为其再添口实，从权计议亦有其道理所在，但此举自然为张荫桓所不满，“两政府惧张”原因即在此。当然，李鸿章、翁同龢等人并未想到会发生德国拒黄的事情。后来李也曾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与英方交涉，“为黄辩诬”，^⑲也只是事后做点表面文章而已。数月后，张荫桓充贺使赴英期间，一直与罗保持着相当距离，也颇能说明问题。^⑳总之，黄遵宪出使被拒之详因似

不能离开总理衙门中张、李争权的背景去探讨。由于德国方面毫不让步，总署只得暂派许景澄驻德，黄遵宪则被迫株守京城，等待新的任命。

是年十二月初十日（1897年1月12日），汪大燮又有一函致康年，该函云：

公度事竟如此，可叹可叹！其实上意甚为眷笃，南海每入觐，必问其人，其余未必尽无，惟肯说好话者，亦只有南海，是以更调他国之说，决乎不行。上谓南海，言当放以道缺，然非枢廷着力，未必任以繁剧，则公度亦将翩然而去耳，甚为国家惜之。^㉑

函中“南海”即张荫桓，此函透露出张氏在与皇帝独对时力荐黄遵宪的情况。这再次显示了张对黄的深切关注，对于我们了解戊戌维新中光绪帝、张荫桓、黄遵宪之间的关系尤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至戊戌年间，虽然黄遵宪以其出众的才干和见识曾得到过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器重（如甲午年从新加坡奉调回国即出于张之洞的奏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与李、张之间从未建立起真正的信任，更谈不上私谊了。正因为黄遵宪在官场中以身任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为奥援，其仕途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与派系之争的干扰。

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四为张荫桓生日，黄遵宪作《樵丈尚书六十有一赋诗敬祝》，诗云：“入丁出丙寿星祥，四国传夸天上张。冠冕南州想风度，枢机北斗在文昌。金城引马迎朝爽，银汉归槎照夜光。挥麈雄谭磨剑气，独因忧国鬓苍苍。”^⑳三月，张荫桓奉命赴英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活动。临行前黄遵宪又赋诗《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回顾了两人20多年来的交往，诗中表达了对张荫桓的钦佩与感激之情，^㉑可视为黄、张关系的真实写照。

次年五月，在京闲居九个月之后的黄遵宪终被授以湖南长宝盐法道。此次放缺与军机大臣翁同龢努力有关。翁氏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日）记：“黄公度（遵宪）来，以所撰《日本国志》见赠。”^㉒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1897年6月29日）记：“黄公度遵宪，新授湖南盐道，来长

谈，重在延德人、练德法。”^⑧同年六月十五日(7月14日)又记：“晚黄公度来辞行，明日起身矣，长谈：第一事，开学堂；二事缓海军，急陆军，十五万人已足；三事海军用守不用战。合船无用，即哩亦无用。三大可虑：一教案，一流寇，一欧洲战事，有一于此，中国必有瓜分之势。”^⑨从这些记载看，翁对黄的才具和见识也是较为欣赏的。他对黄遵宪遭德方拒绝一事也曾设法补救。不过，翁对黄的赏识很难说与张荫桓毫无关系。甲午至戊戌间翁、张二人关系密切，翁“倚之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⑩张被称为“甲午至戊戌间幕后大人物”，即与受到翁的信任有直接关系。光绪帝既已对黄遵宪深简在心，翁氏位居枢垣，从张之议一力保举亦在情理之中。

黄遵宪抵达湖南后，巡抚陈宝箴“赞变法，公度乃以其平日之学发纾之”，“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⑪开时务学堂，特聘梁启超为总教习，设立保卫局等新政措施均有黄氏的参与，在陈、黄、梁、谭(嗣同)等人的倡导和主持下，湖南成为当时最有生气的省份。是年底，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主题的变法图强运动在北京迅速兴起，与湖南新政成相辅之势。黄遵宪与张荫桓的政治合作关系也进入了最重要的时期。

戊戌年春张荫桓的政治境遇十分特殊。据《渝折汇存》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⑫从是年正月至五月间光绪帝先后13次单独召见张氏，每次问答逾时。时人以为张“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⑬张氏“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成为“启诱圣聪”^⑭倾向变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他不仅通过“密进康(有为)所著书”^⑮推动了康氏的进用，而且再次向光绪帝举荐了黄遵宪。《日本国志》之进呈即源于张氏之介绍。

《日本国志》是详细介绍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著作，其中深含着黄遵宪想通过叙述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来启发国人的思想动机。该书正式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5年)秋冬之际，在士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梁启超为之作后序，谓读《日本国志》乃“知日本之所以强”，并由以“知中国所以弱”，视之为开民智、促变法的

理论篇章。该书在戊戌年就有三个版次的刻本，可见影响之大。张荫桓将这样一部变法著作介绍给光绪皇帝，其用意不言而喻。^⑯据翁同龢日记戊戌年正月二十二日(2月12日)记：“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并论外人入觐，将以舆马入禁门，上意谓可曲从，臣谓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次日又记：“是日以《日本国志》两部进呈。”^⑰深居禁城的皇帝为何突然宣取《日本国志》呢？从翁受申斥的情况看，似非枢臣介绍。从皇帝获取信息的途径去考察，这当于张荫桓前一日独对时奏言有关。正月二十一日(2月11日)张氏日记云：“蒙召对，问德亲王来华事，跪对两刻余。”^⑱隔日皇帝向翁表示拟允“外人人觐以舆马入禁门”即出自张氏这一天的建议。《日本国志》也应是这天由张荫桓推荐给光绪帝的，联系张、黄长期以来的政治交谊，这种解释似无疑义。

“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三天，内阁学士徐致靖上疏公开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和黄遵宪五人。徐氏在折中称黄“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并称“(黄)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易効，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⑲这番荐语并非溢美之词，是对黄氏才识的中肯评价。据考，徐氏此折系由康有为、梁启超密谋草拟的。张荫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参与者之一，^⑳该折也反映了张积极援引黄氏的个人倾向。

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出使日本。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李岳瑞回忆：“戊戌夏，联日议起，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故事，实缺道员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补，黄时官长宝道，独以三品卿用，盖重其事也。”^㉑光绪帝还连下三道诏令，称“无论行抵何处，著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携程迅速来京”，^㉒可见急于起用黄的迫切心情。据说皇帝的初衷是让黄以出使日本以提高其资格，同时在外交上发挥积极的联络作用，待时机成熟，即调之返京，“俾得总领中枢，实行新政”。^㉓当时京中已有黄将“入枢”的传闻。^㉔光绪帝对黄遵宪日渐加深的倚信，与张荫桓长期以

来的大力推举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以往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中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已是很熟悉了。黄遵宪自长沙抵沪后,因病滞留上海,未能如期北上。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政变事发,康、梁出逃,张荫桓、徐致靖及军机四卿等被捕入狱。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张荫桓则因英、日两国公使的营救,暂时保全性命,被革职发配新疆。留居上海的黄遵宪也受到了监视。八月二十一日(10月6日)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与张荫桓结为师生”,且与康、梁“密电往来,暗通消息,结党最深,若令其逍遥法外,难免不勾结外人,隐生祸变。”^⑩同样,由于英、日两国干预,清廷只将黄遵宪革职,未有深究。八月二十九日(10月14日)黄遵宪搭海轮返籍,此刻的张荫桓亦正在西行途中。黄为政变作《感事》诗云:“父子相从泣狱扉,老翁七十荷征衣。一家草索看生簿,三寸铜棺待死归。凿空虚槎疑汉使,涉江奇服怨湘妃。可怜时俊才无几,爪蔓抄来摘更稀。”^⑪此诗表达了黄氏对受到排挤和迫害的新党人物的同情,其中“凿空”一句即指张荫桓而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1900年7月31日)张氏在新疆戍所被杀,时年64岁。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也在抑郁中病逝家中,享年58岁。张荫桓在新疆期间,二人是否有过音讯往来,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不过,他们在政坛密切合作的时代则永远结束了。

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粤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不论支持变法的还是反对变法的)在戊戌维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⑫在当时的粤籍维新人士中,核心人物似为在朝中地位最高的张荫桓,而非康有为。从康有为、黄遵宪与张的关系中都能看出这一点。

①以往论著中对黄遵宪、张荫桓关系的记述比较零碎分散,可参见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见钱仲联笺注《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见《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等等。

②黄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第464页。

③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第1180页。

④黄遵宪:《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参预前筹”自注,《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738页。

⑤⑥⑦《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547、739、787页。

⑧参见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5页和第451页所载李、张二人的往来函电。

⑨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

⑩张元济:《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三日,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修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1页。

⑪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17页。

⑫总署章京顾肇新致命钟颖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转引自《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17页。

⑬参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19-1222页)及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4章第6节。

⑭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转引自《入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21页。

⑮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953页。

⑯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七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2-753页。

⑰参见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4章第6节。

⑱关于甲午至戊戌间李鸿章与张荫桓在外交上的分歧,笔者将有专文讨论。

⑲罗丰禄被任命为新任驻英公使后,在奏请出洋的19名随员名单中,包括了翁同龢的曾侄孙翁之缙。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翁同龢得知此事后,颇感意外,既斥之缙,令“递呈辞出洋差”;又责罗“何以不令其家长知也”。后来翁才知此事“傅相与闻之”。(参见《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2952-2956页)李鸿章在翁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罗奏请翁之缙为随员,不免将翁推到了“以私干人”的境地,或许这并非出于李之本意,但将其视为因得翁支持而达到以罗代黄目的的一种答谢,似也不出情理之外。

⑳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0页。

㉑张荫桓此次访英的接待工作基本上由赫德在伦敦的助手金登干负责。

㉒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七十八),《汪康年师友书

札》(一),第755页。

②此诗为黄遵宪集外佚诗,原件现存广州博物馆。转引自左鹏军:《黄遵宪诗文考述三题》一文(见《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打印本,北京,2001年8月)。

③参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733-747页。

④《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947页。

⑤⑥⑦《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11、3015、3093页。

⑧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第21页。

⑨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2页。

⑩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社,1999年。该书原稿现藏广东学者王贵忱先生处。

⑪王照:《小航文存》卷1(收入民国二十年刻《水东集初稿》),第10页。

⑫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331页。

⑬龙顾山人(郭则沅)纂《十朝诗乘》,卞孝萱、姚松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1页。关于张荫桓与康有为在戊戌年的政治关系,可参阅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86页)。

⑭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本国志》书稿在广州富文斋付刻,但此年并没有刻成出版。1894年初,黄遵宪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又将书稿邮寄至巴黎,请薛福成作序,到1895年秋冬之际,《日本国志》方正式刊行,卷首刊有李鸿章的《稟批》及张之洞《咨文》。大约在1897年春夏

之间,黄遵宪对原稿进行了修订,“改刻本改动较大者有十几处,增补了数千字,较重要的是增入了日本明治维新大久保利通的明治元年奏。此疏实为日本维新后建立宪政、开国会的舆论先导。”(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167页)这次修订版的另一特点是加上了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为之写的《后序》,同时抽去了卷首李鸿章《稟批》、张之洞《咨文》。此次印七百余部,其中五百部交由《时务报》馆代售。笔者推断,此次呈送皇帝的可能是有梁启超《后序》的新版本。

⑮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23页。

⑯徐致靖:《保存人材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336页。

⑰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考析——兼论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⑱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3页。

⑲黄遵宪:《己亥杂诗》“三诏严催倍道驰”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840页。

⑳正先:《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转引自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419页。

㉑八月初三日张之洞《致京钱念劬》函云:“闻黄有留京入枢译之说,故托病辞……”(《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614页)。

㉒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72-473页。

㉓参见李吉奎:《粤籍人士与戊戌维新运动》,《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责任编辑:郭秀文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uang Zunxian and Zhang Yinhuan

Ma Zhongwen

Abstract: The fact that Huang Zunxian and Zhang Yinhuan were closely connected in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Both were sent as diplomatic envoys to other countries, were familiar with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were active advocators for political reforms. Zhang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1898's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the Qing Empire by recommending Huang Zunxian and *The History of Japan* to Emperor Guangxu.

Key Word: Huang Zunxian; Zhang Yinhuan; the 1898's Reform Movemen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抗战时期的文化论战^{*}

赵立彬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继 1934、1935 年文化论战后的抗战时期的文化论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思想界的一些特征, 对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 文化论战 中西文化 陈序经 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098-06

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多次文化论战中, 较为引人注目的是 1934 年广州的文化论战和 1935 年全国性的文化论战, 对于这两次论战均已有关研究成果发表。而作为这两次论战的继续, 在抗日战争时期, 在大后方还发生过一次重要的文化论战, 但这次论战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迄今尚无专文评述。本文即对此问题爬梳有关史料, 钩沉史实, 以期全面反映这一史事, 为客观评价当时一些代表人物的文化观提供有益的视角。

一

由胡适和陈序经等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提出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主张, 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思潮, 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作为其基础的。在政治环境方面, 从 1928 年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中国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内战和抗日活动都是局部的, 现代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因而提供了一个探索和讨论文化问题的社会环境。在思想环境方面, 五四以来, 西学作为“新学”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知识界的崇洋心理成为基本的社会心理,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 易于与激进主义相结合, 导向极端的激进主张。这一时期, 国民党强化思想文化统制, 开展“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 控制舆论和出版, 打击异见分子, 出现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发展的反动; 复古和守旧的思想则利用政治上的有利时机重新抬头, 与国民党控制意识形态的“党化”要求暗相吻合, 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

代初社会上复古思潮的泛滥, “读经”、“祀孔”等活动盛行。这些现象, 引起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而 20 世纪 20 年代后东方文化思潮的勃兴, 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新景观, 已居于主流思想地位的西化思想预感到正在上升的东方文化主义的潜在威胁, 不得不起而倡导“全盘西化”。^①因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 全盘西化的思潮逐渐发展, 并经历了两次文化论战。特别是 1935 年全国性的文化论战, 由于胡适的明确表态并参与争论, 使得全盘西化论所受的关注骤然提升, “对于全盘西化论壮了不少声势”。^②这场论战, 标志着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达到鼎盛阶段, 在当时的思想界已不容忽视。

全面抗战的爆发, 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势发生了巨变, 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 全盘西化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与 30 年代前期迥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时期, 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有的知识分子毅然走出书斋, 投身于抗战的实际工作; 大部分人则跟随学校的内迁, 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西南大后方。一时间, 西南各城市名流云集, 大学重建, 内迁和新办的报刊层出不穷, 文化气氛骤重。桂林、重庆、昆明逐渐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抗战的发生, 对思想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战争完全依据实力的原则, 故弄玄虚的夸夸其谈, 无从对战争产生实际的利益。在局部战争时期, 强调精神方面的因素, 以鼓舞人心、激励民气, 尚有可为; 而进入全面抗

战后，一切为了战争、战役、战斗的胜利，一切为了组织和动员具体的人力、物力来与敌国相拼搏。这就使得思想界必须更加贴近现实，将思想主张与实践的检验联系起来。这一形势为西化主张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条件，蒋廷黻在1938年夏天成稿的《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担任过驻苏大使的蒋氏所考虑的，要比一般的学者更为具体和实际。因此，蒋廷黻从以史鉴今的角度出发，希望“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③而这一教训就是蒋氏孜孜以求的“近代化”。

但在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文化论战，虽有特定的针对性，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全盘西化论影响虽然有所扩大，却仍不足以改变思想界的面貌；各方面对全盘西化思想的批判，也多停留在思想的表层，并没有深入下去。换言之，到抗战时期，选择西化、全盘西化、文化折衷等等观点在整个文化氛围中的格局基本未变。而且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与政党的意识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国共两党都从政治的角度来夺取思想文化阵地，全盘西化论可以伸张的余地更为有限。

由于上述原因，全盘西化思潮到抗战时期，已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式微的局面。在思想界，陈序经则主要从两个方面坚持全盘西化论，一是继续选择对象展开论战，试图从论战中扩大影响；二是对全盘西化论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以期从理论基础方面挽回颓势。

二

“七七”事变发生时，陈序经正在广东，因战事的扩大，不能再回天津南开大学，遂随校内迁，直至云南，先后在蒙自和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在抗战的形势下，陈序经坚持认为，全盘西化是抗战建国的唯一出路，“不但在理论上我们觉得全盘西化的必要，就是在事实上，我们也是朝着这条路走。”^④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为全盘西化论张目，陈序经选择了当时在思想界和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三位哲学家——张申府、冯友兰、贺麟来展开文化论战。

张申府，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

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后以介绍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哲学思想而知名，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任教，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而被捕，被清华大学解聘。抗战开始后，他积极参加救亡和民主活动，曾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申府服膺于罗素的“逻辑解析”的方法，同时又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问题，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兴趣，并参与发表意见。1935年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时，张申府表示了赞同的意见。^⑤数年之后，他对于这篇宣言仍然给予肯定，认为“前几年一度提倡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在大体上，在本意上，本是对的。当时反对或嘲笑之的不免是由于不了解，由于感情用事，而未免就事论事。”^⑥1938年，张申府出版了《文化·教育·哲学》一书，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批评。其批评所使用的主要观念是“分”的观念。张申府指出全盘西化论者不加分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笼统的整体是不正确的，他说：“（全盘西化论者）根本没有了解西洋文化，根本没有了解西洋文化一个核心的科学。科学的出发点是分。因此所注重的是数量，是分析，是分别，是分寸。为什么对于文化，要囫圇待遇？”^⑦

张申府认为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能“分”出“最好的东西”来，根据新陈代谢的作用，化合出一个更新的东西。他提出建立一种文化的三个原则：

“第一，文化是不可以速成的，文化的收效必须见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可以说就是要革风易俗。……

第二，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在文化建立上所谓端其趋向也就是要有一种哲学。……

第三，无论如何，文化是比较上层的东西，至少，文化与社会也是互相影响的。因此，要建立一种文化，不可不同时建立一种与之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会妨碍新的文化的发展的。”^⑧

张申府对全盘西化论的分析方法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陈序经与之在文化观上的不同，正是出于

分析方法的“分”与“合”的分野。张申府以“分”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陈序经则重视“合”。陈序经反驳张申府：

“我们承认科学的出发点是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科学的实体也是合，分是为着我们的研究的便利起见，合是科学的基本原理。”^⑨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论，就是从“合”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与文化的各种现象。这种“合”的具体意义，实际上就是文化现象间的连带关系。因此，中国文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方面，就会在各方面都受到波动。何况在事实上，即使从“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今日的文化，无论哪一方面，没有不受西洋的影响的。”^⑩

对于张氏提出的要把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好的方面“分”出来，化合成一种新的文化，陈序经指出，这种方法在实际中无从操作。一方面，所谓“西洋的最好的东西”无从选择起，因为“选择西洋的最好的东西，既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而主张全盘西化，主张文化的各方面都可以全盘接纳，才更能体现出文化是一个化合物的观念。另一方面，陈序经仍然不承认“中国文化的优点”，坚持认为“把中西文化比较起来，我们的文化相形见绌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张申府先生除了空空洞洞的说了取长舍短之外，并没有具体的指出中国文化在哪一方面或几方面是我们的特别优点，是值得我们去保存的。”而要建立中国新的文化，就不得不改变中国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所谓集体的就是全盘的，全盘的去改变比较下层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则所谓比较上层的文化也不能不随之而改变。这种全盘的改变岂不就变为全盘的西化？”^⑪

冯友兰，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当时第一部中国哲学的通史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日战争前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与陈序经可算同事。对于中西文化问题，冯友兰不认为它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近代化。”^⑫冯友兰对于本位文化

和全盘西化都有所批评，在《别共殊》一文中，阐释了他的文化的共殊的观点。冯氏指出，文化可以分为共同与特殊两个方面。所谓共同的文化是人类共需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所谓特殊的文化是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特殊的文化不可改变，所以在以西方文化为特殊文化时，各种文化主张就遇到问题。“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部分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论者。无论其主张如何，但如其所谓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其主张俱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因此，冯友兰主张对于中西文化，要在五光十色的各种性质中，看到“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的，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的”，对于西方文化，“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对于中国文化，“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⑬

在道德观上，冯氏又采“中体西用”的立场。他认为“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需添加者是西洋的智识、技术、工业。”^⑭与他的共需文化和特殊文化的观念相对应，冯友兰将道德也区分为基本道德和非基本道德。他指出：“我所谓基本道德者，是任何种类底社会所都必需有底道德，例如仁、义、智、信等，这是不变底。至于只为某一种类的社会所需有底道德，则不是基本道德，是可变底。”^⑮

冯友兰主张用“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取代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西洋文化”的概念，具体地说，就是要“工业化”，他的《新事论》“明明大书特书地提出‘工业化’的具体办法”。^⑯

陈序经从文化整体论来反驳冯友兰的观点。陈序经指出：从共需的文化方面来看，冯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从特殊的文化方面来看，冯又是主张部分西化或中国本位的。然而，陈序经指出，“所谓共需的文化与特殊的文化是有了密切的关系而不易分开的”，冯氏的主张因此而充满了矛盾，观点之间不能相互支持；或者其“所谓共殊的区别只是一种空谈，只是一种名词上区别而已”。^⑰

对于道德问题，陈序经指责冯友兰的“中体西用”是又一个矛盾。道德与智识、技术、工业是有

密切的关系的,“采纳了西化的智识、技术、工业,则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不得不采纳了西洋的道德;反过来说,中国今日对于西洋的智识、技术、工业所以不能够全盘采纳、彻底讲求,也是由于固有的道德作祟。”^⑩

对于冯友兰用“近代化”、“工业化”来代替“西化”,陈序经指出,“我们所谓西洋化当然是近代或现代的西洋化,稍有头脑的人绝不会误会我们所说的西化主要的是指古代的西洋文化或中世纪的西洋文化。”而以近代化或现代化去代替西洋文化,“则这个名词不只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有了野蛮化或原始化的语病。”^⑪冯氏的“工业化”概念本身,也有不确定之处,工业化只是西化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只要工业化,而还要西化的工业化,不只要西化的工业化,而还要西化的其他方面,不只要西化的其他方面,而还要全盘西化。”^⑫

贺麟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后也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从“体”与“用”的角度来估量中西文化,来评判中西文化观上的复古、本位与全盘西化。贺麟认为,“由批评文化所提出的几种较流行的口号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等,似乎多基于以实用为目的的武断,而缺乏逻辑批判的工夫,所以我希望对于文化的体与用加以批评的研讨,或许可以指出批评文化的新方向,引起对付西洋文化的新态度。”^⑬因而,在《今日评论》上他发表了《文化的体与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贺麟提出了对于西洋文化的态度的三个指针:

“第一,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须见其集大成之处。

“第二,根据文化上体用合一的原则,便颇见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之不可通。

“第三,提倡精神(聚众理而应万事的自主的心)为文化之体的原则,我愿意提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说法。”^⑭

贺麟反对中体西用,但与全盘西化也保持较远的距离。他强调,“我所谓治西学须见其体用之全,须得其整套,但这并不是主张全盘西化。”其理由有三:其一,贺麟的主张着重于“深刻彻底理解该一部门学术文化”,这乃是基于对西洋文化的透彻把握和民族精神之创造发扬,自觉的吸收、采纳、融化、批评、创造,“这样既算不得西化,更不能说是全盘西化。”其二,数量上的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想把西洋文化中一切的一切全盘都移植到中国来,要想将中国文化一切的一切都加以西洋化,事实上也不可能,恐怕也不必需。”其三,全盘西化会丧失民族精神。“假如全盘西化后,中国民族失掉其民族精神,文化上中国沦为异族文化之奴隶,这当非提倡全盘西化者之本意。”因此,贺麟主张“化西”,“即是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⑮

贺麟的主张,是“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其文化理路“可以用他所谓的相对的体用观作一种虽然有欠准确却还不失真趣的简括,即:以‘化西’为体,以‘西化’为用。”^⑯既然如此,应将西洋文化视为“化”的对象,“不要视之为外来干涉的异族的文化,而须视之为发挥自己的精神,扩充自己的理性的材料。”^⑰

从全盘西化的立场出发,陈序经对贺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不但“是一位认识西洋文化较为深刻的人,而且因为他这种理论,是十余年来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的一种基本的理论”。^⑱但对贺麟疏远全盘西化论,陈序经表示不满。陈序经指出,全盘西化论者并非如贺麟所批评的那样,主张被动的西化,奴隶式模仿。陈指出:

“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并不主张被动的西化,奴隶式模仿,而是主张自觉的吸收,采用,融化,批评,与创造的精神。西洋文化本身之所以能有剧烈的进步,也就是有了这些精神,中国文化本身之所以落后,就是缺乏了这些精神。其实主张这些精神的人,已是有了西化的精神。”^⑲

因为贺麟主张中国一切学术文化工作,都应该科学化。而全盘科学化不得谓为全盘西化。因为科学是人类的公产,而且科学仅是西洋文化的一部

分。陈序经反驳道：

第一，“我们承认科学乃人类的公产，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近代的科学是西洋的特产，所以科学化不能不谓为西化。”

第二，正是因为科学只是西洋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的各方面是密切联系的，根据贺麟的所谓“西洋体用之全”，那么中国的西化，就不只是要西洋的科学之全，而且要西洋的哲学、神学之全了。“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要西化，这岂不是全盘西化吗？”^④

陈序经给贺麟的中西文化观所下的结论是：

“总而言之，若照贺麟先生的前提来看，他是偏于全盘西化的主张的，可是他的结论，却是中西合璧的办法。结论与前提相背而趋，就是一种矛盾。”^⑤

三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这一场文化论战与前次的论战有很大不同。1934年的文化论战，虽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但仍在南方文化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此后思想界争论的一些特征；1935年的文化论战，对全国思想界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是继五四运动以来思想文化界关于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论战，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抗战时期的这一场文化论战，所面临的局势则迥然不同，它对于整个思想界的影响十分有限，其意义更多地指向全盘西化思潮本身。

抗战时期的论战，可以说是1935年文化论战的余声。但在抗战时期，后方文化界的主要任务，

“是要用文化运动，促进全国大众有意识有计划有把握地来进行抗战，来支持抗战，使它能坚实与持久。”^⑥理论层次上的文化论战，毕竟离抗战的现实主题稍远。在这种形势下，中西文化的问题自然难以形成全国性的规模。全盘西化派的力量此时也受到严重影响。胡适赴美出任大使；曾给予过陈序经极大鼓励的好友、原岭南大学的同事卢观伟在抗战后便离开岭南大学，在香港讲学；^⑦陈受颐抗战时期一直在美国任教；^⑧曾积极响应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岭南大学的学生，如吕学海仍跟随陈序经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担任行政、研究工作，其余各人也各奔前程，从吕学海发表在《今日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来

看，他的某些观点还存有在岭南大学求学时的影响，^⑨但在大学任教毕竟与办学生刊物不同，因而也不可能有十足的兴趣来参与全盘西化的呼喊。从总的趋向来看，全盘西化思潮此时已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式微的态势。

时势的局促和陈序经坚持全盘西化论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导致这场文化论战在整体水平上没有太大的进展。在抗战时期，学术界对于全盘西化的看法基本上延续了30年代初的观点，思想水平也与30年代前期相差无几，选择西化、全盘西化、文化折衷等等观点在整个文化氛围中的格局基本未变。换言之，张、冯、贺三氏对全盘西化的态度并不具备特别的意义。陈序经与之展开论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借靶立论”的意味。由于“借靶立论”的需要，陈序经对论战对方的论点，不免采取有意误读的办法，以利于己方的批驳。如冯友兰本意是“中国人特别崇尚道德”，意即“崇尚道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而陈序经则曲解成冯友兰主张保存固有道德。冯友兰本意是“在基本道德一面，是无所谓近代化或不现代化的”，而忠孝不是基本道德，是可变的。陈序经则把冯氏的两段话强拉到一起，指责冯氏主张道德是不变的，“基本”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词。^⑩陈序经指责对方最多的就是“自相矛盾”，而这些矛盾并非都实际存在。在这种状态下，陈序经很难在论战中提出新的见解，相互辩驳的思想水平没有超过1934年和1935年的文化论战，反响十分有限。

但陈序经选择张申府、冯友兰、贺麟三位哲学家展开论辩，并十分用心地对三位学者的观念加以批驳，并非完全无的放矢。通过论战，陈序经一方面重申了全盘西化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文化整体论、文化现象间的连带关系，使得全盘西化论的基本主张得到更为明确的阐释；另一方面，通过文化论战，也试图保持并进一步扩大全盘西化论的思想影响。这是陈序经坚持自己独立的文化观的一种努力。结合陈序经此时正在西南联大开设“文化学”课程和后来撰写文化学方面的系列巨著的情况，对陈氏主动挑起文化论战的良苦用心，就不难理解了。

全盘西化思潮的提出，离不开当时具体的文化

和社会背景。它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复古守旧思想和国民党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这一环境在抗战时期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甚至由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强化而更为突出。因此陈序经在抗战时期的艰难条件下坚持自己独立的文化观,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全盘西化思潮毕竟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一种过于偏颇的选择,在实践中无法进行,这既是陈序经个人的局限,也是时代潮流的必然。

* 本课题研究得到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桐山研究基金资助。

①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②陈序经:《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国闻周报》第13卷第3期。

③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3页。

④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序经:《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今日评论》第5卷第3期,1941年1月26日。

⑤张曾说过:“《宣言》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其中大部分的意见,即是本人自己愿意说的话。”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龙文书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附录,第30页。

⑥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重庆),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20日。

⑦⑧张申府:《文化·教育·哲学》,(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8月,第17-18、8-9页。

⑫马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59页。

⑬⑭马友兰:《新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5-16、228页。

⑮⑯马友兰:《答陈序经先生》,《今日评论》第5卷第6期,1941年2月。

⑰陈序经:《东西文化观(手稿)》,载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贺麟:《文化的体与用》,见《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第258、267-271、269、271-272页。

㉔黄克剑:《在“化西”祈向下贞认“西化”》,台北,《中国文化月刊》第131期,1990年9月。

㉕辛木:《论抗战期中文化运动》,生活书店,出版时间不详,约为抗战前期,第39页。

㉖《关恩佐卢观伟老同学不幸先后捐馆》,《岭南大学校报》第84期,1948年10月20日。

㉗《同学陈受颐博士由美休假回国访探》,《岭南大学校报》第75期,1948年3月30日。

㉘在《论促进地方自治应自城市始》一文中,吕学海仍然坚持城市在文化上的领导作用,这与岭南大学时期陈序经的观点一脉相承。文载《今日评论》第1卷第22期,1939年5月。关于吕的行踪参阅该刊之“本期撰者”介绍。

㉙马友兰:《答陈序经先生》,《今日评论》第5卷第6期,1941年2月。陈序经:《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今日评论》第5卷第3期,1941年1月26日。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上接第82页)税环境和社会氛围。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从总体上看,宏观结构水平是合适的,但具体到微观主体,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则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顺应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税制中不合理的方面,对于强化政府的公平分配职能,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经济保持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

道德氛围。

参考文献:

洪银兴:《现代财政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许善达:《中国税收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胡杰:《浅析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治理》,《经济师》2001年第10期。

《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1年。

责任编辑:郑红军

An Analysis on Tax Incidence Level of China's Individual Income Tax

Lin Qin-yu

Abstract: Due to the existing defect of the tax system design in China, the basic functions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can hardly be brought into practice during the chang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n the contrary, to some exten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s becoming unfairer.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thinking and measures of further reform and improvement by analysing the defect of China's individual income tax system.

Key words: personal income tax; tax level; defect; ideas of reform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杨 权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关键词] 《白虎通义》 章句 汉代

[中图分类号] K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104-07

现存的东汉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 是东汉白虎观会议的产物。

白虎观会议曾开过两次。一次是在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东观汉记·明帝纪》、《后汉书》的《章帝传》与《樊榘传》都提到这次会议, 但此次会议并未留下可供后世为议的文件。另一次是在建初四年(公元79年), 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由班固“撰集”的《白虎通义》(又叫《白虎通》), 它是当时统治者想“统一经义”的产物。

最近张荣明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中提出, 《白虎通义》的“本相”是汉代的“皇家章句”。^①这种说法虽令人耳目一新, 却未必正确。兹直陈管见, 请教于张先生。

要分析《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得先从汉代注书的著述形式谈起。

两汉的注家之书, 见诸传本及记载者名目繁多, 而若从著述形式上归纳, 依笔者的看法, 则不外传、说、记、注、故、例、章句七体。^②

经学中的传, 是指先贤的释经之作, 它是“记事立论及解经”^③的。顾颉刚先生在《汉代学术史略》一书中说:

(古代) 还有一种六寸的木版, 备随时的写记, 正像我们的笔记簿, 称之为“簿”, 亦名为“专”, 用假借字写来

就成为“传”。它不像经的严整, 所以后人就用来做经的补助读本或参考材料。^④

东汉的鲁丕说: “传者, 传经师之言, 非从己出, 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 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 ^⑤说明传具有权威性与传承性的特征。西汉人把先秦诸子也看作“传”, 例如在盐铁会议上“文学”们征引《老子》, 说“传曰”, 这是因为在武昭宣元时期, 诸子都被视为五经的辅翼。《孝经》虽名“经”, 但汉时人在征引它时也把它称为传, 原因是它不在六艺。虽然战国晚期某些学派的著作中(例如《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已有经与传的区别, 但传主要是指儒家五经的解释性或辅助性著作。《礼》有《丧服》、《周官》等传, 《诗》有《毛诗传》、《韩诗内传》、《韩诗外传》, 《易》有《彖》、《象》等十篇大传。

由于古代书写条件所限, 传被记录于简策时往往只留下了精义。儒林后学若对经传做进一步的发挥, 便产生“说”。说是时代较晚的经师对经或传所做的解释。严格而言, 传与说在体例上并无本质不同, 它们被区别开来, 只不过是因来自先贤, 而说出于后学而已。西汉哀帝时刘歆等的《移让太常博士书》, ^⑥对说与传给出了很明确的时间概念——“口说”乃“末师”之作, 而“传记”则出

自“往古”。见诸著录的说,基本上都产生在西汉中期以后。除了出处不一样外,传与说还有以下一些区别:一、传是文字记录(所谓“传记”),说原是在师生之间口耳相传的(所谓“口说”);当然,出于文化传承的需要,后来说也形成了文字。二、因出处不同,传比说更具权威性;换言之,传是对经的权威性解释,而说是对传的补充性阐述。三、传的解释对象是经;说的解释对象可以是经,也可以是传。^⑦

经、传、说之间的关系,可以《汉书·五行志》所载《尚书·洪范》的《传》与《说》为例:

经曰:木曰曲直。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本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改,及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

记本来的意思是“史记”,即“史官所记”,它原是先秦的一种史学著述形式。在战国秦汉的典籍中,可以看到一些史记之名,如《古记》、《燕记》、《秦记》等。因为古代经典多与历史有关,所以一些记事色彩较浓的说经之书便被称为记。

《礼》是记录已形成通例的祭祀仪式或程序的,所以战国秦汉学者释《礼》之书被通称为《礼记》;礼、乐密切相关,因而又产生《乐记》。

《尚书》、《春秋》两经都有史的性质,所以战国秦汉学者解释这两种经及传的书也被称为记,例如解释《洪范五行传》有《五行传记》,解释《春秋公羊传》有《公羊颜氏记》,等等。《论语》是孔子本人的言论记录,在汉代也被视为记。传和说的作用是传述或解说经义,记的作用是补充经传所不备的事件或言论。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辗转相授谓之说。”^⑧此说恐不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雅好斯文的河间献王收集的古籍“皆

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传与记被并列在一起,这说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著述形式。

注也称“笺”或“笺注”,它也是解释性的文字。虽然从广义上来说传与注都是解释性的文字,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注并不面面俱到地泛讲典籍的意义,而只是对典籍中的疑难进行解释。注的本义是灌注、流入,贾公彦说:“注者,注义于经下。”见于著录的汉代注笺类著作有张楷的《古文尚书注》,郑玄的《易注》、《周官注》、《毛诗笺》等等。

故又叫“诂”,也作“训故”、“训诂”,它是指对古籍的字义或词义进行解释。《说文解字》释“诂”为“训故言也”,意思是用当代的字词来解释古代的字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记载的《尚书》、《大夏侯解故》、《小夏侯解故》、《诗》《齐后氏故》、《鲁故》、《韩故》、《齐孙氏故》,还有贾谊的《春秋左氏传训诂》等,都是以解释字词意义为主的作品。

条例又叫“列”、“例”、“义例”,这是一种以条列的形式归纳经传要旨的注书。条例被认为始自春秋公羊学的大师胡毋生,因为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有“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之语。不过在早期公羊家的著作里,却未见有条例的名称。两汉明确以条例为名的注家,都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且都集中在春秋学,到魏晋时才扩展到易学。近代今文经学家刘师培曾对他的学生蒙文通说:“《诗》、《书》两经,只有家法,没有条例;《易》、《春秋》两经,又有家法,又有条例。”^⑨是中的之语。《三国志·蜀志·尹默传》说,刘歆本人撰有条例作品。《后汉书·郑兴传》则记载,郑兴在新莽时因传习《左氏春秋》而受到赏识,故刘歆“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郑兴的儿子郑众“从父受《左氏春秋》”,也撰有《春秋记难条例》。^⑩《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贾逵所撰的《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⑪《后汉书·贾逵传》说他的父亲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见诸记载的汉代条例著述还有颖容的《春秋左氏释例》和荀爽的《春秋条例》。^⑫

在上述六体之外的一体便是章句。何谓章句?章

句是流行于两汉以后(包括两汉)的一种注书形式,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分章析句解释古代典籍的意义。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称篇。”可是古籍在形式上篇下多不分章,文中也无标点。读者要理解典籍的意义,需先分篇为章,再析章为句。这就是《后汉书·桓谭传》李贤注所说的“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张荣明先生把“离章辨句”理解为“从文本外部引文作解”,^④这是望文生义。“离”在此处的意思是“分开”,而不是“脱离”。分章析句的工作完成后,要进行的第二步工作便是按顺序一章一句地串讲古籍。章句解释的对象主要是经,但也包括传、说和在当时尚未被认为是经的重要古代典籍。现存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为我们留下了汉代章句的形貌。该书每章的开头,都有一篇小序,说明作者、写作背景和命意,紧接着便对每个句子进行细致的疏解。例如《渔父章句第七》(大字是正文,小字是王逸的章句):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异。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游于江潭,戏水侧也。行吟泽畔,履荆棘也。颜色憔悴、杆(注此字应为“木”旁一个“皮”)黧(注此字中间的“系”应为“黑”),黑也。形容枯槁。羸瘦瘠也。渔父见而问之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闾大夫与?谓其故官。《史记》作欤。何故至于斯?”曷为遭此患也。《史记》云:“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醉惑财贿也。一云:巧佞曲也。我独醒,廉自守也。是以见放。”弃草野也。一本此句末犹“尔”字。(下略)

第二,紧附所阐释的对象,不单行。《十三经注疏》整理工作委员会在横排标点本的《十三经注疏》的《整理说明》中说:“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宋以后,始有合刻本。”^⑤不知何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以《左传》附经始于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

《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断定传与说原来不附经也许是事实,但若说注、疏在南宋以前不附经却未必正确。三国时魏少帝问臣下:“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足证在汉代郑注是附经而行的。从广义上说章句也是注(《十三经注疏》便径把《孟子章句》称为“注”),它的体裁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单行的。有人认为在郑玄发明笺注体之前,不仅传、说、记单行,“即使是章句之作,也是单行”,^⑥事实正好相反。这一点可从现存的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得到证明。清儒焦循说:“赵氏子《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章有其旨,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旨’也。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⑦意思很明确:《孟子章句》并不是单行的。请看《梁惠王章句上》开头的一段(大字是正文,小字是赵岐的章句):

孟子见梁惠王。孟子适梁,魏惠王礼请孟子见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曰,辞也。叟长老之称,犹父也。孟子去齐,老而之魏,王尊礼之曰:“父不远千里之路而来,此亦将有以为寡人兴利除害者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义之道,故曰:王何以利为名乎?亦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名。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因为王陈之。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征,取也。从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争,各欲利其身,必至于篡弑,则国危矣。《论语》曰:“故于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为名也。又言交为俱也。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万乘,兵车。万乘,谓天子也。千乘,诸侯也,夷升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万乘者也。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百乘之车,谓大国之卿,食采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若齐崔卫宁晋六卿等,是以其终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

乘，当言国而言家者。诸侯以国为家，亦以避万乘称。故称家，君臣上下之辞。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禄。君食万钟，臣食千钟亦多。故不为不多矣。苟为后利而先利，不夺不餍，苟，诚也。诚令大臣皆后仁义而先自利，则不篡夺君位不足自餍饱其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者，亲亲；义者，尊尊。人无行仁而遗弃其亲也。无行义而忽后其君长。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复申此者，重叹其祸也。

章句有时会与传混淆。张荣明先生认为：

“‘章句’就是义理体系和解释体系，是经义的现代化阐述，……‘易传’本来是战国时人解释《易经》的，但对汉朝人来说算不得章句；‘三传’是战国时期解释《春秋》的，对汉朝人来说也算不得章句。”^①这等于说《易传》和《春秋》三传是战国时代的“章句”。这种说法混淆了章句与传在注经形式上的区别，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章句更多地被当成“说”。王铁先生在《汉代学术史》中认为：“章句相当于说”，“说与章句两名可以互称”；^②而可支持作者观点的材料只有一条，那就是《汉书·儒林传》中所说的：丁将军（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义）而已，今《小章句》是也”。^③其实史籍这么讲，比较容易理解：丁宽是景帝时人，那时虽已有章句之体，却未有章句之称（章句之学兴起是差不多一百年以后的事情），故章句作品以“说”冠之是可以理解的。王铁先生还认为“西汉多称说，而东汉多称章句”，这也值得商榷。在《汉书·艺文志》里，章句与说是并列著录在一起的，以“章句”冠名的书有《易施氏章句》、《易孟氏章句》，《易梁丘氏章句》、《尚书欧阳章句》、《尚书大夏侯章句》、《尚书小夏侯章句》、《春秋公羊章句》、《春秋谷梁章句》等等，以“说”冠名的书有《诗鲁说》、《诗韩说》、《礼中庸说》、《论语齐说》、《论语鲁夏侯说》、《论语燕传说》、《孝经长孙氏说》等等。而在《汉书》的列传中，章句与说是被区分得很清楚的。例如《儒林传》载：“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

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东汉也是如此，例如《卢植传》载：“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作《尚书章句》。”《桓郁传》载：“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

与“章句相当于说”迥异其趣的是“章句即训诂说”。《辞源》把“章句”释为“分析古书的章节句读”，而把“章句学”释为“训诂之学”，^④俱欠妥当。“分析句读”只是章句的初步工作，它更主要的工作是释义。训诂的注释对象是字和词，章句的注释对象却是句与章。不否认章句之作在“离章辨句”时会对某些字词作训诂，但训诂不是章句的重点。《汉书·儒林传》说，丁宽的《易小章句》在训故方面只是“举大谊（一作‘义’）而已”；而从夏侯建“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⑤的做法来看，章句是把解释经义放在主要地位的。《汉书·艺文志》把不少称“故”、“解故”、“故训”的书与称“章句”的书著录在一起，说明章句与训诂是不同形式的著述。较诸《辞源》，《辞海》说章句是“汉代注家以分章析句来解说古书意义的一种著作体”，^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说章句“是对古书文意分章析句地加以解释”，^⑦要准确得多。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对章句的特点大体上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以此来衡量《白虎通义》，不难发现张荣明先生的《白虎通义》是“章句”说不成立。

首先，《白虎通义》在形式上与章句并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白虎通会议的召开虽然肇因于“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⑧但现存的《白虎通义》根本不涉及对五经章句文字的减省问题，其著述形式与章句也完全不一样——尽管在内容上它可能引用了多家的章句文字。如前文所述，章句必须在形式上依附于它所阐释的对象（经、传或说），并逐章逐句地解释原文。而《白虎通义》讨论问题不是这样展开的。它没有明确的阐释对象，也不依附于任何一种古籍，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离开经典，径自阐说的。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与章句正好相反。

张荣明先生说：“皇家章句与各家经师的章句在体例上有相似性，即都先设问，然后做出解答；也有不同处，各家章句是围绕着经团团转，皇家章句则不然。”^⑥此语的后半句说对了，前半句却说错了。说章句文字一定是问答式的，无法从文献中获得证明。从收入《十三经注疏》的赵岐撰《孟子章句》看不出章句是问答式的，从现存的王逸撰《楚辞章句》也无法证明章句是问答式的；即使有些章句在解释经传意义时可能采取了问答的形式，但在逻辑上问答式也绝不会是章句的通例。

其次，经学章句有派别门户之分，彼此泾渭分明。各家经师绝不会随意立说而违背师法、家法，纵然发挥也有限度，一旦混淆师法、家法，便要遭到各方面的批评指责。而《白虎通义》虽然是今文春秋公羊家在领衔主唱，但它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不管师法、家法，不介意今文、古文，甚至不区分经学、纬学的（所以至今人们还在争论白虎通会议究竟是有益于今文经学还是有益于古文经学，是正统经学占上风还是谶纬占上风）；它不主一家，不执一说，不以特定的教条为前提，对诸家学说一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之，从各种经、传、记、说、注、故、章句甚至纬书中为自己的理论找注脚。若遇到歧说，便由皇帝按自己的口味“择善而同”；如果乏“善”可“择”，则径作阐说。试看该书卷九《姓名》篇：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曰：“天生蒸民。”《尚书》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故姓有百也。

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别诸侯之后，为兴灭国、继绝世也。王者之子称王子，王者之孙称王孙，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故《春秋》

有王子瑕，《论语》有王孙贾，又有卫公子荆、公孙朝，鲁有仲孙、叔孙、季孙，楚有昭、屈、景，齐有高、国、崔，以知其为子孙也。王者之后亦称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孙，亦称王孙也。《刑德放》曰：“尧知命，表稷、契，赐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远刑。”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蕙苴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

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时，物有其变；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与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礼服传》曰：“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于祖庙。”（后略）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礼·冠经》曰：“宾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后略）

文中的《诗》、《尚书》、《春秋》、《礼》是经，《论语》是记（后代才升格为经），《礼服传》是传，《刑德放》是纬书。“有姓者何”和“有氏者何”后面的文字，是作者找不到理论依据时所做的独立阐说。

第三，张荣明先生认为章句“着重义理的阐发”，这其实是误解。正是这一误解，导致了他对《白虎通义》的著述形式做了错误判断。其实，在汉代，章句恰恰是由于不重义理的阐发而遭到时人的诟病的。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在汉代是两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学术。章句是解释古籍的，当然不能不讲义理。汉代文献评述说：“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⑦“世俗学问者……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一》评价说：“《孟子》词旨显明，（《孟子章句》）惟阐其义理而止。”都说明章句离不开义理。另一方面，义理学者要讲求古籍的“微言大义”，章句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但是章句必须拘泥于原文，要一章一句地解释古籍，这种体例上的局限，决定了它难以充分容纳作者的创

见，而不能自由地阐发义理。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98年)徐防上疏说：

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凿……^①

这段话在批评博士弟子们治学浮躁的同时，也显示出说在阐发义理的空间和自由度方面比章句要大得多。徐干在《中论·治学》中则指出章句之学的弊端：“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这种轻宏观重微观、见树不见林的做法，必然会影响到义理的阐发。因此章句之学从一开始，便与义理之学有冲突，这种冲突在两汉经学史上经久不息，十分引人瞩目。时人不是说章句“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③便是攻击“章句小儒，破碎大道”、^④“章句之徒，破坏大体”。^⑤

作为“国宪”或“礼典”的《白虎通义》，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离开具体的经典洋洋洒洒地述说道理规范的做法，所体现的不是章句之学，而恰是与章句之学对立的义理之学！大概张荣明先生也意识到《白虎通义》的确有许多与章句不同的特征，所以在“章句”的前头冠上了“皇家”二字来自圆其说。但一顶帽子，又如何改变得了一部书的形式属性！《白虎通义》不但不属于章句，而且还是章句的克星——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汉代章句之学的衰落。试想，皇帝想解决经义的分歧问题，固然不得不请经师来帮忙；但“共正经义”的目的达到后，经师章句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呢？所以，白虎通会议实际上是章句之学与训诂之学替兴的转折点。从汉章帝开始，马融、班固、许慎、郑玄等一批古文经学家走红，都和训诂之学的走强有关。

①③⑦②⑤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286、236、236、287页。

②马宗霍先生说，两汉注家之书“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中国经学史》，商

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此说似不全面。

③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④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52页。

⑤《后汉书·鲁荣传附鲁丕传》。

⑥《汉书·楚元王传》。

⑦王铁认为传是释经的，而说是释传的（《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63页），这是误解。《易说》、《孝经翼氏说》所说的对象是经，而《三传异同说》所说的对象便是传。

⑧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67页。

⑨《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9月，第42页。

⑩《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郑众《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当是同书异名。

⑪所谓“朱墨列”，是用黑笔抄写经文，用红笔抄写传文。《晋书·儒林传》：“刘兆……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

⑫顺便一提，东汉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条例类著作，而以魏晋时期杜预的《春秋释例》最为著名。杜预之后，关于《春秋》的条例越来越多。朱彝尊《经义考》说：“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颖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灵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滉、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嗣、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增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澄也；曰凡例，李建、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文中所举的，已使读者眼花缭乱。而下文还有“明例”、“新例”、“门例”、“地例”、“会例”、“断例”、“异同例”、“显微例”、“类例”、“序例”、“括例”、“例苑”、“例论”、“例宗”、“例义”等名目，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完全可以认为，在杜预以后，《春秋》学形成了一种义例之学。

⑬《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整理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⑭王葆玟：《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70页。

⑮《孟子正义》卷一。

⑯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64页。

⑰作者还举出了另一条出处相同的材料：“（张）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但这条材料并不能支持他的观点，因为“守”的意思不过是在师法上

遵从成说，而不是说章句等于说。

④⑩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1版。

④⑪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④⑫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

④⑬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④⑭ 《后汉书·章帝纪》。

④⑮ 《论衡·谢短篇》。

④⑰ 《论衡·程材篇》。

④⑱ 《后汉书·徐防传》。

④⑲ 《汉书·刘歆传》。

④⑳ 《汉书·艺文志》。

④㉑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④㉒ 《后汉书·杨终传》。

责任编辑：郭秀文

Is *Baihu Tongyi* A *Zhangju*, an Explained Text Organized on Paragraphs and Sentences?

Yang Quan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Zhangju* with other types of ancient texts such as *zhuang*, *shuo*, *ji*, *jianzhu*, *xungu*, and *tiaoli*, and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two characteristics in *Zhangju*: firstly, it explains ancient classics chapter by chapter, paragraph by paragraph, and sentence by sentence; secondly, it is closely attached to what it explains and is never found as an independent form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argued that the proposition that *Baihu Tongyi* is "a Royal *Zhangju* of the Han Dynasty" is not convincing. Not only the format of *Baihu Tongyi*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Zhangju*, but its ideology and methodology expressed in its elucidation of the classics are also dissimilar to those *Zhangjus* made by the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 *Baihu Tongyi* is not a *Zhangju* but an argumentation in essence.

Key words: *Baihu Tongyi*; *Zhangju*; Han Dynasty

明人史论专书叙录

廉 敏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5)

[摘 要] 明代学人的历史评论是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史论的具体情况, 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本文搜求到十几种比较重要的明人所著历史评论专书, 仿照前人叙录的形式, 对这些史书的作者、版本、内容、收藏等基本情况作了介绍, 并对这些史论专书的史学价值略加说明。

[关键词] 明代 史学 历史评论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111-06

一、引 子

明代学人的历史评论是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①一书及葛兆光的《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②一文已有所说明。关于明代历史评论专书的具体情况及其得失, 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为了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一步, 本文对明代史论专书作了粗略的搜求工作。今略仿前人叙录之例, 对若干史论专书作一简要介绍。挂一漏万, 在所难免, 祈读者予以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 在搜求的过程中, 也曾涉略了一些虽非史论专书但史论很丰富的史著, 如胡粹中的《元史续编》、陈建的《皇明通纪》、俞思学的《史概》、张壘的《廿一史拾余》、晏璧的《史钺》等等, 也都有丰富的历史思想, 值得披览和研究。因体例与篇幅所限, 这里暂不讨论。

二、叙 录

《宋史论》 作者刘定之, 字主静, 号呆斋、保斋, 谥号文安, 永新人(今江西永新县)。举正统元年(1436年)会试第一。《明史》有传。

此书是一部评论宋代皇帝政事的史著, 所论起宋兴至于宋亡, 包括北宋、南宋各代皇帝。书无序与目。正文共三卷。卷一为大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 卷二为神宗、哲宗、徽宗、钦宗; 卷三为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朱熹、理宗、度宗、帝显(恭帝)、宋亡。

《宋史论》有三个特点: 第一, 评论的问题集中为某某皇帝的几件主要的事件, 其它则一概不涉略, 重点突出, 有利于客观评价宋朝历代皇帝。第二, 见解上较能尊重客观事实, 显示出思想进步的一面。第三, 思路开阔, 分析深入, 有一定的理论认识。作者既善于使用历史事实之间联系与比较的方法评论宋代帝王事迹, 显示出历史视野的开阔, 又善于联系其他史家的观点来认识宋代诸帝事, 显示出理论认识上的宽度。总的看来, 《宋史论》是一部见解客观深刻、视野宽阔、议论集中的宋代史事专论。

此书收于《刘文安公全集》, 为北京大学馆藏乾隆癸未年(1763年)崇恩阁重镌版。

《新旧唐书杂论》 作者李东阳, 字宾之, 茶陵(今湖南茶陵县)人。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明史》有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李东阳曾著《东祀录》, 其中即包括此编。

此书就《唐史》所载事迹来辨析是非。评论之例为: 每论顶头首列名目, 次列降一字进行讨论。讨论起于所论之事, 然后指明发论之由, 最后阐明作者本人的意见, 条理清楚, 一气呵成。

所论之事共29条。根据书中内容, 其评论之事包括: 唐高祖放任太宗谋杀兄弟, 徐世勣舍父事唐, 唐太宗不愿试探佞臣, 唐代的赏罚法度, 傅奕对佛事的阻止, 批评对那些有功勋而贪污的官吏(如侯君集)的宽容, 对贾充谥号的讨论, 立晋王

治还是立吴王恪，武氏之祸古所未有，小人不可与共事，教育太子，抨击褚遂良、狄仁杰、姚崇、宋璟有宰相之体而无宰相之道，哀叹小人损伤君子，张九龄推荐牛仙客，败坏唐朝的三种人（女后、奸臣与宦官），李泌权术高明，肃宗治逆党不力，进君子退小人，君臣猜疑，人君于理乱之机不可不慎，慎用迂腐之人，德宗任用奸臣卢杞，对违令者是杀还是赦，段秀实的死因，德宗命白起官是愚昧之举等。

对于李东阳的观点，四库馆臣基本上肯定，认为其大体上平允。同时指出，其中有出于私心而加以隐晦的地方：“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所论太宗明皇之事为多，持论亦皆平允。然东阳依违避祸，固位取容，其论宋璟不与反正之功，无害宰相之体，实阴以自解；其论狄仁杰、褚遂良优劣，谓二人易地，仁杰必能强谏于武后初立之时，遂良必不能成功于武后既篡之后；及论德宗猜忌，元载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间，亦隐。然自以调停为功，其驳胡寅论高力士一条，及论姚崇任谄用诈一条，亦欲以持论之正，自盖其所为也。”以今天的认识来看，李东阳在《新旧唐书杂论》中的观点虽不庸俗迂腐，却也不见得允正高明。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借月山房彙钞》所收嘉庆戊辰年（1808年）张海鹏校本。

《学史》作者邵宝，字国贤，谥号文庄，无锡（今江苏无锡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此书共13卷。每卷以十二天干命名，寅为首卷，末为闰卷，每卷或二十九章或三十章，代表月份及每月的天数。这里根据的是程子“日格一物”之义，所以此书又称《日格子》。

这部书是对各史书所记某段历史的评析与阐发。讨论上起《左传》下至《元史》，不拘时间顺序，似是作者平日所作的读书笔记。其例每章顶头举所学之史，并于文尾用小字注明出处，然后降一格以“日格子曰”领起作者的讨论。《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分条论列，词简意赅，笔力颇为遒健”。

书中讨论的史事大都围绕国政、礼制、为人等重要内容进行，从中可见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至于书中的思想观点，四库馆臣认为考证不足，但观点基本上平正。《提要》称“其间如记《后汉书》谯玄用弟服去官，戴封用伯父丧去官事，以为避世与人，不知后汉人情淳朴，其以期功丧解官持丧者，见于史册，不一而足，盖风俗使然，宝疑为托故而逃，未免失之不考。又论荀彧以为志似管促，心似召忽、杨雄之比，其评涉亦为过当。然宝平生湛深经术，持论平正，究非胡寅之刻深、尹起莘之肤浅者可相似，固不失为儒者之言也。”四库馆臣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肯定《学史》，反映出《学史》尊重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

所见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所收据嘉靖甲辰年（1544年）容春精舍本影印本。

《两汉解疑》作者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举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明史》有传。

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自汉高祖至皇太后王氏，下卷自卓茂认马至臧洪。

其书论史的体例为，降二字首列所论之人或事，次列降一字举所疑之处，再列顶头以“解曰”的形式引出作者的意见和观点。该书各篇篇幅短小精悍，一般在二三百字左右，所论大多数是汉代一些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如汉高祖、廐养卒归赵武臣、韩生、纪信、酈食其、叔孙通、陈平、太皇太后王氏等。

《两汉解疑》中所持观点能就不易想见处发论，至今仍能给我们不少启发。如抨击《史记》中所记“蛇死姬哭”实际上是一种愚民行为，“非事术也，聊借之以愚民耳”，“如必取验于后，是痴人说梦也”。如人们多叹惜韩生有才略反被当权者杀害，而唐氏则认为韩生“欲图一己之功名，不顾天下之利害”，像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杀掉，等等。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借月山房彙钞》所收嘉庆十三年（1808年）张海鹏校本。

《两晋解疑》作者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体例如同《两汉解疑》。共十七题。所论有：羊祜劝伐吴、杜预、刘渊、王恺、石崇、贾充、刘毅、韦忠索靖、陆机陆云、晋惠帝、荀晞、王衍、卫玠、祖逖刘琨、王导、庾亮、殷浩、桓温。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借月山房彙钞》所收嘉庆十三年(1808年)张海鹏校本。

《王弼州文部读史论辨》 作者王世贞,字元美,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苏州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明史》有传。

这是一部以评论史事与历史人物为主,兼及评论史书与诸子的著作,共一卷。包括读(史)二十五首、史论二十首、论四首及(史)辨五首。“读”部主要是读历代正史的内容,如《读秦本纪》、《读魏志》、《读五代史》、《读元史》等,也包括读诸子如荀子、杨子、管子、家语等书中有关历史的论述。“史论”部主要评论历史人物,如评太公、季札、蔺相如、魏公子无忌、高帝、周亚夫、关羽、魏相、陶侃、苻坚、李纲、文天祥、武曌等。“论”部专评《春秋》。“辨”部其实也是历史评论,如萧何诸葛亮优劣辨、閼天不略纣辨、成王赐伯禽天子礼乐辨、淮阴侯不友辨。

书中论辨的观点是有见识的。如评论秦始皇时既批判他的暴政又肯定其法度的历史意义;评论曹操时也不完全否定;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世贞亦表现出难得的气量:“余尝怪晋世匈奴鲜卑羯氏羌以至索头之虏,更迭而入为主,其割中国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袭年号,变夷礼,多足称者,盖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等等。

此本为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吴兴周邦明刻本,版本年代不详。

《读史漫录》 作者于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今山东平阴县)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

此书就明代以前的历史选择其中若干事件进行考析与评论,是一部史论性著作。全书共十四卷。上始自宓戏,下至辽金元,按时代顺序考论诸事。考论之例为,大约一事一论,先举史籍所记,然后亦考亦析,评论遂出。

所议论之事大皆史书所记的重要问题,如三皇五帝的起源、古帝王的称号、禅让制等。而其所持论点大率能发人所未发,与一般看法不同,也有一定的反叛味道,颇能给人启发。如认为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二地相去三四千里,

“不应悬远如是”。再如否定三皇五帝之事,认为“世之传古帝王者,类多诡异不经,想皆春秋战国时好事者所为,其谬不可尽辨”。认为帝王之间的传位之事古今貌同实异,“尧舜之禅代非后之禅代也,事不同也。汤武之放伐非后之放伐也,势不同也”。这些看法持之有据,能于史书所记似是而非之处加以鉴别,对于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观点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不同于探玄钩几的考证,而是对历史的是非认识。文前附唐叶向高所撰的《题辞》中评论该书“其论世超其持衡,审殚元会之变,综得失之林,别善败如列眉,烛忠佞如观火。至于军国机宜,华夷阨塞,莫不备举,盖经世之书而非佔毕之业已”。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善本,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闽建书林刻本。

《明事断略》 无名氏作。凡一卷。论自洪武至嘉靖间事。

其例首列事目,一事一议。所举事目如洪武起兵、平定东南、集师滁和、定鼎金陵、宋事始末、洪武平汉、洪武平吴、洪武平闽、平方国珍、平定两广、北定中原、故元遗兵、洪武平滇、封赏功臣、褒显忠烈、正位分藩、封国燕京、靖难师起、转战山东、再出河北、长驱金陵、入正大统、燕王起兵、壬午殉难、三征、开设贵州、开设交趾、平山东盗、河漕转运、治水江南、太子监国、征汉庶人、麓川之役、王振用事、土木之变、南内复辟、石亨之变、诛曹吉祥、平藤峡寇、汪直、平固原寇、剿清平苗、再平江西、平郴桂寇、讨宁庶人、江彬之变、诛灭岑猛、庚戌之变、更定祀典、沿海倭乱、议复河套、俺答封贡、世宗崇道教、严嵩专权、再定大同、勘定安南、平湖贵苗、追戮仇鸾。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借月山房彙钞》所收嘉庆十二年(1807年)张海鹏校刻本。

《读史商语》 作者王志坚,字弱生,又字淑士、闻修,号珠坞山农,昆山(今江苏昆山)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明史》有传。

全书共四卷。书前有万历己未(1619年)孟夏同郡人娄坚所作序、戊午(1618年)仲春三月王志坚自叙。根据作者的自叙,该书的撰写意旨,是为

了矫正宋人论史迂腐不合情理及李贽论史的偏颇之处，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见解，并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商语云者，与同志如诸君子者共商之也。古之好持论者，莫如宋人。皆迂刻不情，或耻以立教而不顾时世之所宜。近世有李卓吾者，好耻前人成案而翻之，一洗头巾蒙气，而偏驳之处，亦复不少。余是编颇鉴之。”

全书自秦汉起，下迄五代。综合了历代正史及《资治通鉴》的观点。正文一事一段，“自单词复句多至二三百言”，议论简洁扼要。所论之事不拘一格，观点比较客观。

北京大学馆藏《续修四库全书》收，为据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刻本的影印本。

《史疑》 作者张应泰，字东山，泾川（今安徽泾县）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万历前后。

《史疑》论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上起秦朝，下至宋，各代只取两三题而已。名曰“疑”，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评论。

书凡一卷，共34篇。所论的标题有：秦论、陈曲逆、霍博陆、赵克国、匡衡、高光论、侯霸、霍去病杀射李敢、魏相、汉儒论、孔奋、东海王疆、关壮缪、王导、山涛内宁必有外忧、历代论、张宾王猛范长生、陆机陆云、谢文清、陶文亮、崔浩、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褚渊、牛棣说、张彪黄苍、王僧辨、六朝论、猫鬼、唐太宗习射、唐太宗诛李君羨、徐世勣、朱全昱、裴延龄、五代论。

书中标目涉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有些是其它史论很少论及的。如王导、陶元亮、崔浩等。还涉及一些政治制度，如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另外，该书还讨论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秦论、历代论、六朝论、五代论、汉儒论等。

该书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没有脱离儒家的思想范畴，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当时天下趋利等社会风气的不满、悲叹与担忧。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道光十二年（1832年）赵仁基序本、古墨斋藏版《泾川丛书》所收嘉庆四年（1799年）赵绍祖后记本。

《续史疑》 作者张一卿，字次公，泾川

（今安徽泾县）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万历后。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三十三题。上卷标目有：稽疑、阙疑、代国或书国或书人或书爵辨（凡二则）、弑逆辨（凡三则）、晋献公杀桓庄之族、吴伐越秦伐燕、张华、甘卓、谢朓许善心、岐灵岳、沈庆之、孔熙先（附文帝）、卞壶（附江敦、谢澹）痴姨，共十五题十八则。下卷标目有：志疑、梁武帝不知学佛、何敬容、朱异廐杞、梁孝元焚书、七德舞、张公艺百忍、伴食宰相、何妥万宝常、牛僧儒李德裕、程异郑繁、史宏肇杨邠王章、冯道、桑维翰、王进、皇甫镇、敬翔皇甫遇、澶涿靖康、蒋之奇欧阳修、程伯淳、元年正月朔日食（熙宁）、复燕云、杨三变立太学生三舍法、叩马书生、陈公辅、弘德远史浩、金元兴灭、五星聚轸（淳熙十三年）、余汝尚许衡、洪福、赐处士赠谥、分人为十等、宋末三僧。

从标题上看，该书不仅是《史疑》的续作，也是对《史疑》的补作。《续史疑》补充了对元明时期历史的评论，即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朝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续史疑》是对《史疑》的续写。但除此之外，《续史疑》在史书书法、史事上针对《史疑》作了很多补充，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集中表现在，《续史疑》的作者对史书书法的关注与研究。虽然作者对客观历史也有自己的观点，并且《续史疑》也确实是对历史的评论之作，但作者运用的角度显然有所不同。作者还认为史书的记载于史实本身会有出入之处，读史的人不能不察，即对史书要采取怀疑的态度。书中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论也往往有新颖的地方。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古墨斋藏版《泾川丛书》所收嘉庆五年（1800年）赵绍祖后记本。

《历代史论》 作者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今江苏苏州市）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明史》有传。

书共12卷，503题。其中，自周至元代的史论由张溥本人所作，包括周二题、秦二题、汉五十七题、晋四十四题、六朝四十八题、隋十六题、唐七十题、宋一百零九题、元二十七题。后续谷应泰所作《明史论》四卷七十五题，高士奇所作《左传史

论》二卷五十三题。

论题起自周代三家分晋，其后有秦并六国、豪桀之秦、高帝灭楚、匈奴和亲、汉通西南夷、武帝惑神怪、光武中兴、黄巾之乱等等。可以看出，书中所评论的题目都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有些还是今天研究历史也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反映了作者对历史敏锐的洞察力。

从历史观点来看，张溥也是非常具有见识的。他的分析往往抛开了历史上的一些表面现象，更接近历史的根本。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张溥在进行历史评论的时候，还善于结合史学批评来进一步认识。在《历代史论》中包含着对《春秋》、《资治通鉴》等史书的史学批评，这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

清人孙琮曾著《详注历代史论》。此书在1925年4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光绪八年（1882年）西江晔氏校刊本。

《三峰史论》 作者万应隆，字道吉，泾县（今安徽泾县）人。崇祯举人，入清不仕。有《三峰文集》。

作者从秦汉至宋的历史中选取了几个人物与事件加以评论。书凡一卷，共十四篇。标题有：鲁仲连、田横、霍光、桓谭、郅恽、鲁肃、徐庶、荀彧、赵云、霍去病、陆逊、刘晔、季汉二篇、汉系人心之久、李胜、曹髦、苏洵、司马光。

大致看来，此书的思想内容有两个特点：一是所选择的人物或事件主要围绕儒家伦理道德进行评论。如《鲁仲连》篇称赞鲁仲连以死拒秦的凛然品格，“其不肯帝秦至欲蹈海死之，则凛凛纲常孤竹二墨之伯仲也。”《田横》篇称赞田横及其门客以死成就了功业，“善乎巡之言曰：‘身死节完之日即功成业立之秋也。’”二是作者在评论时运用了心性理论。如赞扬身死功成的思想时，解释为“人之有心，此物之性，天之命也。得其心斯所以尽人物之性，立天地之命，根本之所系也。”评价司马光时，认为他行为端正但识见不高，而且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自身内在条件不足：“士有行谊端慤而识鉴未能充义之尽者，此质厚而气示甚清。有宋君子司马君实是也。”援引心性理论来解释历史，是

儒家思想在明代的发展，它说明了历史理论的发展。

有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古墨斋藏版《泾川丛书》所收嘉庆五年（1800年）赵绍祖后记本。

《史记论略》 作者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谥号忠节，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明史》有传。

《史记论略》是对《史记》一书书法与意旨及所记历史进行讨论的评论性著作。书凡一卷，共62题111则。目录与标题基本上依循《史记》。

《史记论略》评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对史实的考论，如论尧舜禹汤非谥、非名、非号，“尧舜禹汤皆号也，生为号死为谥。”（《五帝本纪》）论微子离开商朝时，所参与评论的太师、少师的名字，分别为疵、疆，而不是比干。（《殷本纪》）等等。有很多内容不是考证史实，而是对《史记》的批评。如既有对《史记》所据材料的不同意见，也有对太史公著作意旨的揭示，还有对不同史著的比较，等等。

无论是考证还是史评，作者著《史记论略》主要还是为了对历史的人物与事件进行评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因此，除了上述两部分曲尽评论之意外，作者还对历史进行了大量评论。如评论秦法的严酷、叹惜丞相具有贤德却不能早决去取、揭示以弱敌强、骄者败之的道理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评论《史记》时有明显的借鉴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一些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总结。如批评司马贞不能充分认识司马光的论赞、对人们所普遍反对的三纪表明肯定的态度、反对时人对金石古文上所记怪异之事的热衷、再论分封制等。

此书收在《黄陶庵集》中。《黄陶庵集》又名《黄忠节公陶庵集》，共22卷，光绪己卯（1879年）重刊，上海时中书局印行，嘉定教育会藏版。

《史记论略》为此书的第七卷。北京师范大学馆藏。

三、赘语

上面说到的这些史论专书，仅是明代史论专书中的一部分。限于条件，有一些史书无法备览。很多史书只有书目保留了下来，另外还有大量的史论专书已经湮灭无存，只能从明清学人的文章中偶尔

可知当时的规模。从这些尚可睹见的若干史论专书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明代学人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前人。春秋战国时期,史家主要通过对史事记述中的微言大义或某某曰等形式,来表达对历史的理解与评价。汉代史学在记述之外,出现了若干专门评论历史的文章,如《过秦论》等。较早的历史评论专书出现在唐朝,如《唐鉴》。^①宋代对历史进行评论的专书开始多起来,但在数量和内容上无法与明代相比。^②就主体而言,明代史论专书的作者身份复杂。上至宗室如明宁王朱权,下至山野隐士如黄淳耀,其间有宰臣如李东阳、史臣如于慎行、文学名家王世贞、“反叛”名儒李贽、地方官员王志坚等。就对象而言,明代学人不仅评论汉或唐或宋或元或明等某朝的历史,而且不少史论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明朝当时人事,笔锋贯通古今;或关注维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或注重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或旁探风俗制度。就方法而言,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注重考据,有的善于比较,展示出不拘一格的活跃的理论思维。它表明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历史理论曾有一段颇具特色的发展时期。明代史学领域的论史风气,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史论取得的成就如《宋论》、《读通鉴论》、《国朝史论萃编》等,与明代对史论的认识和积累不无关系。

第二,明代史论还反映了明代社会以及明代思想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与问题,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明代历史有重要的意义。举其突出者如:明

朝建立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借鉴,尤其是宋代的兴亡更令明朝君臣深以为警。明代学人关于宋史的评论,如刘定之所著的《宋史论》,就是当时这种政治潮流的反映。再如《史疑》一书,分析了明代尤其是万历年间的矿使税监的搜刮、党阉之祸、吏政腐败等社会问题,并对社会上趋利的世风产生了怀疑,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面对社会发生的变化而产生的种种忧虑心理。为了约束思想,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明代统治者还编纂和颁行了一系列劝惩史书,来规范宗室、后妃、功臣等人的行为。这些史书把历史的相关人物按善恶等不同品行分类,让不同身份的统治者来学习。这种把人物按品行分类的史书在明代也出现了不少,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史论。在明代,社会上出现了动乱、饥谨、社会风俗变迁等,给人们造成了担忧、疑虑或赞颂等诸多心情,在明人对历史的评论中尤其是当朝史的评论中,也表现得真实真切。李贽评价历史的标准的转变正是这样的反映。总之,明代史论的繁盛与明代的社会状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对我们了解明代的思想以及明代社会的变动,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料。

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271页。

②《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32页。

③参考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6月,第102页。

④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272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海不扬波迎粤商

——评介《明清广东商人》

刘正刚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9-0117-02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特殊政策, 率先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地之一, 以致有“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新民谚的形成。广东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广东商人功不可没。广东商人驰骋于国内外市场是有历史渊源的。最近, 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黄启臣教授、庞新平博士的《明清广东商人》一书就是对粤商“久经商场”的注解。

唐宋以前, 广东一直被中原人士视为南蛮烟瘴之地。宋代以来, 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 广东社会有了较大发展。明清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是后来居上, 赶上和超过了内地的水平。与此应运而生的广东商人群体也空前活跃, 成为名声显赫的商人集团——广东商帮。该书正是集中阐述明清广东商人的类型及其经营方式、地缘和社会构成、会馆公所、著名商人家族、海外移民、资本流向和历史作用等内容。纵览全书内容, 下述几个学术观点是比较新颖的。

一、广东商人利用明清政府对广东地区实行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 大作国内外生意。该书在分析明清广东商人驰骋海内外(特别海外)贸易原因时, 特别详细地阐释了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对外开放贸易特殊政策的重要作用。指出: 明清时期, 就全国范围而言, 朝廷曾反复实行海禁政策, 严禁濒海商民出海贸易。但是, 至嘉靖元年明廷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 独准广东省市舶司对外贸易; 万历年间又由广东三十六行出面代替市舶司具体主持对外贸易; 隆庆初年部分开放海禁后, “广州几垄断南海的航线, 西洋舶常泊广州”。(《海录》卷上)清初

一度下达禁海、迁海令, 沿海地区一度成为“无人区”。这期间广东要求展界的呼声最高, 朝廷顺应民心, 于康熙八年在广东开始实施展界, 使广东对外贸易通市如故。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宣布取消海禁, 开海贸易, 并于次年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由于发生“洪任辉(James Flint)事件”, 清廷宣布撤销闽、浙、江三海关, 规定“夷舶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东华续录》)从此之后, 广东成为全国唯一合法开放对外贸易的省份, 于是广东商人“东起潮州, 西尽廉(州), 南尽琼崖(海南岛), 凡分三路”, (《粤海关志》卷5)纷纷争相出海贸易, 计“每年出海船只所用舵工、水手、商伙等, 为数甚多, ……约计数十万人”。(《史料旬刊》)可见, 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 使广东商人获得得天独厚的机遇, 从而获得蓬勃发展。该书对广东商人崛起和发展的分析, 是中肯的, 符合历史事实。

二、广东商人积累的商人资本部分流向产业, 推动了广东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该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 指出: 明清特别是明中叶以降, “广东商人的商业资本, 已经有一部分从流通领域投入手工业生产领域, 而成为产业资本, ……出现不少商人投资经营手工业生产现象”。(第379页)商业资本流向产业, 大大推动了广东近代工商业生产的发展, 诸如冶铁业、铸铁业、纺织业、制糖业、采矿业、造船业和制盐业等。以丝纺织业为例, 南海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 于咸丰元年到越南经商致富后, 动用资金白银7000多两于同治十

三年在家乡创设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这是广东华侨商人投资兴办的广东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又如一些商人将商业资本投资于近代交通运输业,如台山商人陈宜禧投资兴建新宁铁路,梅县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兴建潮汕铁路。这些史实说明,作为资本独立形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已属于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到独立产业资本的阶段,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的范畴。虽然这在明清中国社会经济中仅属于星星之火,但它却代表着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方向。

三、广东十三行商人对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作者在论证广东商人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始终将眼光关注于粤商的外向型发展。关于十三行商人的历史作用,以往研究者多将其列为明清朝廷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内容加以否定。该书排除众议,大胆求证,充分肯定广东十三行行商人的积极作用。作者将广东十三行行商分类列入历史悠久的牙商加以阐述,运用大量史实论证明清两代均存在“十三家商号垄断着”广东对外贸易,这是当时朝廷对广东实行对外开放贸易特殊政策的产物。广东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其经营方式是以外贸批发商的身份,成为国内长途贩运商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居间者,在商品所有权转换的过程中起代理商的作用”。(第51页)十三行还为明清政府办理与商业相关的其他事务。“广东十三行行商不仅垄断了中外贸易,而且连中外交涉事宜,也由其居间办理,成为外商与清朝官府联系的媒介,实际上具有经营国内外贸易和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第61页)所以外国商人“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选择(或重新安排)他们的保商,保商必是十三行中的一家”。(第52页)可见,广东十三行行商在16至19世纪在广东对外贸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对外贸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其他商人无法代替的,其促进广东外贸发展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四、广东商人的海外移民,推动了外国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分布在世界各个国家3000多万华侨华人中,广东籍侨胞有2000多万人,占70%以上。(《羊城晚报》2002年2月23日)溯源这2000多万粤籍华侨华人,其祖宗为明清出海经商而移居

外国者不乏其人。该书指出:自永乐三年南海商人梁道明等出海瓜哇贸易而移民定居始,至正統年間广东商人到瓜哇定居已有“约千余家”。(第339页)到了清光緒二年移居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侨华人达4万人,几乎全是广东人。光緒十年移居暹罗的华侨华人达到150万人,(第341页)其中大部分是广东潮州人。(第430页)这些移居海外的广东人,有不少人在当地经商发财,成为当地的百万富翁。广东商人移居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运用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共同开发和发展各国的社会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465页)

仅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作者已将明清广东商人置于全国和全世界的大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是独具慧眼、非常必要的。15、16世纪以降,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特别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瓦斯哥·达·伽马打通东西方航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航海活动开始超越各个国家内海和沿海的局限,成为飞跃全球大陆的远航。该书正是阐述广东商人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舞台中的出色表演,从而凸现了广东商人对世界海洋经济史和海洋文化史的贡献。尤为重要的是,明清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还把广东与国内外市场联为一体,进一步加速了广东近代化的进程,而广东商人在内地的活动,其实也逐渐将近代化的风气传播于祖国内地。该书不仅内容丰富和观点新颖,而且资料也丰富翔实。据统计,全书参阅古今中外重要书籍180多种,引用资料达930条之多。所引用的资料包括正史、政书、实录、会要、会典、方志、档案、碑刻、笔记、近人著述等。如此广征博引,使全书的论述具有扎实坚固的基础,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金无足赤。该书也有不足之处。诸如第五章著名商人家族只阐述了广州商人,缺乏潮州、客家著名商人家族。外文资料的占有较为薄弱。其实,明清广东外贸十分活跃,外文档案资料也是相当丰富的。希望该书再版时能补充更多的外文资料。但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目前研究明清广东商人的第一本较系统、有份量的学术专著。

责任编辑:郭秀文

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实践

徐真华¹ 王淑艳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 广东 广州 510421)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

[摘要] 20世纪20年代, 超现实主义运动引发了法兰西文坛的诗学革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被逻辑和理性统治了几千年的语言及人类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主张到逻辑和理性划定的思想范围之外寻找诗歌创作的新空间, 于是, 自动写作和梦境叙述应运而生。诗人们乞求于潜意识, 诉诸于未经推考的即时言语, 对梦境反映的自然意象与真实自我推崇备至, 这一切构成了超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方法的基础。

[关键词] 超现实主义 诗歌 自动写作 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119-05

在两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中, 安德烈·布勒东不仅宣扬了他的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和世界命运的革命事业, 还阐发了诗歌创作的新原则, 即通过对诗歌艺术及其创作实践重新定义, 寻求新的创作方法。安德烈·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 尤其是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和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提出要把被理性主义和逻辑学压抑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直觉、梦境和幻象放在首要位置, 目的是运用“自动写作法”使“精神活动的产物”获得无条件解放。(布勒东语)通过探索隐藏在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处的未知面来了解真实的、完整的人。为此, 超现实主义大师们醉心于梦境, 听任于想象, 求助于幻觉与潜意识, 以便进入到另外一种空间和崭新的境域, 在那里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在1930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中, 安德烈·布勒东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过程进行了明确的描述: “这些精神活动的产物不受逻辑的摆布, 不受清醒意识的控制, 不受理智的支配, 自动写作和梦境叙述就是对精神活动的摹写, 它们既具有提供大量评价元素的独特优势, 因为, 在艺术领域, 批评界尤其显得惊慌失措, 同时又能够对抒情诗的价值重新全盘估量, 还可以推荐一把能一次次开启人类隐秘心底的万能钥匙, 鼓励他勇往直

前, 在黑暗中叩开那关闭着‘彼世’、现实、理性、天才和爱情的大门”。尽管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革命运动未能达到改变人类和世界命运的目标, 但是作为一个文学运动, 还是成功地实现了建立新的诗歌世界的理想, 尽管后者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我的妻子》法语原名为“自由联合”, 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布勒东用自由联合的词语歌颂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一个形象具体而肉感的女人, 一个让男人终身难忘的女人。

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有炭火般的头发
有热得闪光的思想
有漏沙计一样的身条
我的妻子有叼在虎口中的水獭般的身条
我的妻子有徽章和一束小星般的嘴
有洁白大地上小白鼠般的牙齿
讲着琥珀和揩拭过的玻璃般的语言
我的妻子讲着餐刀上的圣餐饼般的语言
有着睁眼和闭眼的布娃娃的语言
有难以置信的石头般的语言
我的妻子有儿童习字时所画的杠杠般的睫毛
有燕窝边缘一样的眉毛
我的妻子有暖房顶上石板一样的额角

玻璃上的水汽般的太阳穴
 我的妻子有香槟酒一样
 镜子下海豚头的水龙头一样的肩膀
 我的妻子有火柴般的手腕

我的妻子有垂直逃跑的鸟的脊背
 光亮的脊背
 琼石和湿粉笔样的脖颈
 和人们喝一口酒杯里液面就下降一点似的脖颈
 我的妻子有小舟般的腰枝
 有着光洁和尖羽般的腰枝
 白孔雀羽枝般
 微微晃动的腰枝

我的妻子有泪水盈盈的眼睛
 有染色甲冑和磁针般的眼睛
 我的妻子有沼泽般的眼睛
 我的妻子有着狱中解渴的水汪汪的眼睛
 我的妻子有着总是处在斧头下木头般的眼睛
 有着水一般、天一般、地一般的眼睛

(《我的妻子》*L' Union libre*, 巴黎, 加利玛出版社, 1931 年, 译诗见《世界诗库》第 3 卷, 第 514- 515 页, 花城出版社, 1994 年。)

作为极端的象征派诗人, 布勒东主张意象的大量使用和堆积, 认为诗歌的意象越是使互不相干的事物产生关联, 便越有诗意。“我的妻子”的不可解释的意象便跳跃般地涌入读者的脑际: 头发→炭火; 思想→热光; 身材→漏沙计、虎口中的水獭; 牙齿→星星、小白鼠; 语言→琥珀、布娃娃、石头; 睫毛→幼儿的涂鸦; 眉毛→燕窝; 额角→石板; 太阳穴→水汽; 肩膀→香槟、海豚头; 手腕→火柴……显然, 诗人的想象并非来自于事物本身的合理联系。诗人在背叛了抽象的逻辑规律后, 打破了习惯的语言思维方式, 让无法关联之物自由碰撞, 将肉体与精神、真实与想象糅合在一起, 用一种不规则的、非理性的、非逻辑的文字组合去反映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

路易·阿拉贡(1897—1982年)是超现实主义

文艺运动的另一主将, 从事创作 60 余载, 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著作。他一生变换过多种角色, 他同时是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和记者。阿拉贡年轻时在巴黎上中学, 成绩优异, 尔后学了 5 年医学,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学业被迫中断。1917 年, 与安德烈·布勒东的相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两人对战争的野蛮极厌恶, 因此, 战争过后他们都采取了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态度, 对阿波利奈尔的“新思想”和“立体派文学”推崇备至, 这为他后来与苏波(Supault)一起创办《文学》杂志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 阿拉贡将兴趣转向了文学活动。他在 20 年代发表的早期作品:《欢乐之火》(*Feu de joie*, 1920)和《永动集》(*Le mouvement perpétuel*, 又译《永恒的运动》, 1925 年)兼有超现实主义及其前身达达主义的诗歌特点。他在超现实主义阶段创作的诗歌显露出卓越的语言天赋, 这在向阿波利奈尔表达敬意的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果实味道像沙
 小鸟没有名字
 马儿画得像旗
 爱情朴实牢固

只服从这多变的思想
 唯一的规则, 这思想
 在可恨的时间之眼中
 喝着加农炮晶亮的香槟

为这盗密的好汉
 唱它两句颂词
 四周响起抒情的回声

在这遗憾之极的墓地
 我悲惨的俄耳甫斯阿波利奈尔
 躺在一个庸俗的石棺里

(《永动集》*Le Mouvement perpétuel*, 巴黎, 加利玛出版社, 1920- 1924 年, 胡小跃译。)

自动写作法不纯粹是无意识词句的混乱组合, 用不依常规的语言游戏去追求诗歌的幽默意趣。通过潜意识的感悟表达, 诗人对阿波利奈尔的敬意, 思想的强大与生命的脆弱, 爱情的甜蜜与时限的无

情,随着意象的任意组合自动地流露,语意凌乱,而又有可靠的思绪轨迹。

20世纪30年代,阿拉贡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倾注了满腔热情。在抵抗运动时期,他在知识分子中组织秘密斗争,反抗法西斯的统治,并负责与北方区的联络工作。这一时期,面对纳粹的占领和法西斯的野蛮行径,他发表了不少鼓舞人民斗志的诗歌(大多是秘密出版),激发了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歌颂了人类的尊严,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反响。政治和社会的巨变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对妻子艾尔莎的爱和对祖国法兰西的爱,成了他创作的主题,他笔下的抒情韵律秉承了19世纪传统诗学的丰富遗产。这一切为他赢得了民族诗人的桂冠。我们在此仅列举当时畅销的几本:《断肠集》(*Le Crève-cœur*, 1941),《赞艾尔莎》(*Cantique à Elsa*, 1941),《艾尔莎的眼睛》(*Les yeux d' Elsa*, 1942),《布列塔尼大森林》(*Brocéliande*, 1942),《蜡像馆》(*Le Musée Grévin*, 又译《格雷文博物馆》, 1943年),《向您致敬,我的法兰西》(*J'ètesalue, ma France*, 1944),《法兰西晨号》(*La Diane française*, 1945)。

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在5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变故,那些反映抵抗运动的作品遭到抨击,他的某些诗作未被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读者理解,他倡导的著名理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受到质疑,这一切使他痛苦万分。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两部重要的作品,第一部是发表于1956年的《未完成的小说》(*Le Roman inachevé*),这部诗集“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又昭示了日后创作计划中的全部主题”。^①第二部是1958年发表的《受难周》(*La Semaine sainte*),该作品“围绕发生于1815年的一场民族危机,对历史事实的复杂多变进行了反思”。阿拉贡从此宣告自己向“无边的”现实主义靠拢;并要以为想象为中心的“实验的现实主义”谋得“一席之地”。^②

阿拉贡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回顾了他昔日的岁月。当他回首往事,重新审视他本人40年前的反抗者形象时,他感到痛楚撕裂心肺,一想到自己的天真幼稚和所犯的错误,他不禁痛苦万分。

……

在新桥上我见到了
远处的另一个我,蒙面的我
在那个暗淡的日子
他低声称我为同志

在新桥上我见到了
我无知而轻信的替身
我久久地沉浸在
自己后退的影中

在新桥上我见到了
我坐在破烂的石头上
见到了我的梦,我的光芒
听到了我轻轻吟唱的歌

盲目而盲目地见到
哦,我不知所措的过去
抬起你寡妇般的眼光
好好看一看新桥

(《未完成的小说》*Le Roman inachevé*, 巴黎,加利玛出版社, 1956年,胡小跃译。)

阿拉贡曾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中最好斗的,最富有挑战性的,最爱恶作剧的,最爱挑衅的”。^③20世纪30年代后,阿拉贡脱离了超现实主义,诗风亦为之改变。晚年的阿拉贡常常反思自己的人生岁月,理想的幻灭,革命的困惑,生命之旅的坎坷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一种痛苦、歉疚、遗憾、惆怅的感情油然而生。

因创作年代不同,阿拉贡作品的艺术风格前后明显不一致:“好像我一直都是为了推翻我以前创作的东西才进行写作似的。以至于人们只有不断地在我的作品当中找到我是自己的反证时,我那当作家的历史才能被理解”。^④但是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却隐含着内在的逻辑,如同拉维(S. Ravis)评价雨果时所说的那样:“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异乎寻常地秉承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我”。顺着拉维的思路,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依照我们对阿拉贡的创作实践的再分析,我们认为他的作品当中还渗透着迪卡斯(Ducasse)式的“方法的变化”。^⑤

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是保尔

·艾吕雅。他从事文艺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超现实主义。

保尔·艾吕雅(本名欧仁·爱弥尔·保尔·格兰代尔, *Eugène Emile Paul Grindel*) 1895年12月14日在圣-德尼出生,是独子,父亲是会计,母亲是裁缝。他在郊区长大,不太富裕,但是倚仗会理财的父亲,他依然能够先在圣-德尼,然后在奥勒奈-苏-布瓦,最后又在巴黎上学。1912年夏季,由于突然患上咯血的毛病,他不得不中断初中最后一年学业前去瑞士,在达沃思的结核病疗养院疗养数月。在那里,他认识了也在那里休养的俄罗斯女大学生嘉拉(*Gala*),此人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并且成为他诗歌作品中第一个耀眼的形象。在他的孩提时代,郊区百姓住的街区在他脑海里留下忧伤的印记:随处可见的灰色的房屋,工厂里冒着黑烟的烟囱以及成群结队的工人。1914年12月,艾吕雅应召入伍,在部队里担任护士,然后自愿上了前线。这使他有机会每天看到战壕里士兵们遭受的痛苦和所处的悲惨境地,能够发现战争中互相残杀的荒谬本性。

疾病、爱情和战争是诗人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三大人生体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掩饰他那对现有秩序和传统习惯的反抗精神。战后不久,他与让·波朗、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邦雅曼·佩雷(*Benjamin Péret*)和德国画家马克斯·埃内斯特(*Max Ernst*)建立了联系,这些人都是巴黎地区文艺先锋派的成员。保尔·艾吕雅与他们一起发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并成为一名最积极的干将。在这一阶段,他对诗歌语言进行大胆创新,他的诗充盈着鲜明的个人特色,成为诗界的新声。他写的抒情诗在表达上不仅借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技巧,而且还“从中掌握了词汇技巧,后来还通过对潜意识诗歌创作或谚语和常用俗语的语义研究扩大了其使用范围”。^⑥《为了不死而死》(*Mourir de ne pas mourir*, 又译《死于不死》, 1924)、《痛苦的首都》(*Capitale de la douleur*, 1926)、《爱情与诗歌》(*L'Amour, la poésie*, 1929)、《直接的生活》(*La Vie immédiate*, 1932)、《公众的玫瑰》(*La Rose publique*, 1934), 这些作品显示了语言的神奇力量与超现实主义运动强调的内心冲动的完美结合。诗人与梦境、黑夜以及潜意识的力量融为一体,通过亲历的爱情

生活,“用最纯真、最审慎的声音歌颂了人类与现时生活所保持的基本关系”。^⑦

1929年与嘉拉分手的艾吕雅在《超现实主义革命》(*Révolution surréaliste*)杂志的第12期写到:“我曾长时间地相信我是以牺牲自由的痛苦代价来换取爱情的,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所爱的女人不再担心了,也不再嫉妒了,她让我自由了,而且我有勇气成为自由之身”。假如用一个词来归纳艾吕雅诗歌创作的主题,那么非“爱”莫属。在诗人的眼里,爱是至高无上的品质,爱排遣了寂寞,驱除了孤独,滋润了生活,哺育了生命,战胜了虚无,奉献了幸福。

艾吕雅用简明具体的语言来歌颂爱情和自由,对他而言,诗歌不是对个人经验的变形,而是要在自然的景象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中老实地将其描绘。诗人喜欢说的一句话便是:“我们只需要较少的词汇就可表达主旨,可是我们却需要所有的词语把它表达得真实”。

除了超现实主义,艾吕雅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与明确表态拒绝任何意识形态制约的安德烈·布勒东不同,他与路易·阿拉贡一起,通过参加法国共产党回答了文学介入政治活动的问题。那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常有他的身影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大会,在反对法西斯战争威胁的斗争中,在知识分子警醒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保尔·艾吕雅坚持不懈地思考着如何在斗争中发挥语言的力量,他似乎重新发现了口语体诗歌的呐喊特点,发现了它的自然表现力和简洁明快的节奏。他将想象的奥秘和朴实无华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诗句变成了极富鼓动性的战斗口号。下面这首收在《诗歌和真理》(*Poésie et vérité*, 1942年)中的著名诗篇《自由》(*Liberté*)便是一例:

.....

在我家门的踏板上
在熟悉亲昵的物件上
在受祝福的火之波浪上
我写着你的名字

在一切和谐相配的肉体上

在我朋友们的额上
在互相伸出的每只手上
我写着你的名字

在透入惊奇的玻璃窗上
在聚精会神的嘴唇上
超出一片寂静之上
我写着你的名字

.....

凭着一个词儿的力量
我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我生到世上来就为了认识你
为了呼唤你的名字

自由。

(《诗歌和真理》(Poésie et vérité, 巴黎, 加利玛出版社, 1942年, 译诗见《世界诗库》第3卷, 第506页, 花城出版社, 1994年。)

这首85行的长诗是一份传单, 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抵抗战士中广为传诵。热爱自由的法兰西人民不仅把它刻在自己的记忆中, 更把它刻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 刻在通向死亡的监狱和刑场上。

艾吕雅的诗大都写得浅显易懂, 且朗朗上口。他笔下的意象也大都如这首诗所罗列的那样是生活中常见的十分具体的事物, 如家门口的踏板、朋友的额、朋友的手、朋友的唇等等。诗人似乎无暇选择, 在伸手可及的任何物体上, 急切地写下这力透千钧, 让人崇敬, 让人肃穆, 让人颤抖, 让人激奋的“自由”两字。

法国解放后, 保尔·艾吕雅继续跻身于法国杰出诗人的行列并表现出旺盛的创作力: 《什么全能说》(Pouvoir tout dire, 又译《一切都可以说》,

1951), 《凤凰集》(le Phénix, 1951), 《旧诗新选集》(Première Anthologie vivante de la poésie du passé, 1951), 《艺术评论文选》(Anthologie des écrits sur l'art, 1952), 《没有间断的诗》(Poésie ininterrompue, 1953)。他的后期作品反映出来的现代性中还能寻觅到法国长期以来的诗歌传统的影子, 透过他那醇厚的诗歌语言, 我们读到了诗人对传统诗学的扬弃和创新。

布勒东的创作特点是永远捍卫和阐释超现实主义; 20世纪最富有革新精神和最具有颠覆性的思想运动的社会准则, 而且他那不同寻常的文学生涯孕育了先锋派文学运动的众多思潮。与他相反, 阿拉贡和艾吕雅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所表达的是“一种双重的愿望”: 首先在青年时代积极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 然后是投身具体的政治活动。在他们看来, 介入政治是为人类崇高事业而实实在在进行斗争的必要条件。如果回顾一下超现实主义运动走过的道路, 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运动蕴含着矛盾与聚合的多样性的发展特点,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和现代主义,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能够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之中共存, 尽管这种共存现象并不稳定, 但毕竟富有成果。

①RAVIS(S.), *Aragon dans Manuel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Paris, Ed. Sociales, 1982, tome VI, p. 388.

②③ibid. pp. 388-389, P. 390.

③《法国文学》下卷, 拉鲁斯出版社, 第303页。

④Cité par RAVIS(S.), p. 390.

⑥LAGARDE(A.) et MICHARD(L.), *Les Grands Auteur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Paris, Bordas, 1973, p. 351.

⑦BRUNEL(P.), BELLANGER(Y.), COUTY(D.), SELLIER(PH.), TRUFFET(M.):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is, Bordas, 1973, tome II, p. 618.

责任编辑: 陶原珂

The Creation of Surrealist Poets Xu Zhenhua and Wang Shuyan Xu Zhenhua and Wang Shuyan

Abstract: In 1920s, surrealist movement brought the poetic revolution in the French literary circles. Surrealist artists raised strong doubts about language and human thinking mode, which had been dominated by logic and rationali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maintained that new space for the creation of poetry should be sought beyond the domain demarcated by logic and rationality. As a result, automatic writing and dreamland narration came into being. Poets relied heavily upon subconsciousness, resorted to immediate language unanalyzed, held in high esteem the real self of the natural imagery reflected in dreams, all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the new methods of creating surrealist poems.

Key words: surrealism; automatic creation; subconsciousness

上博楚简《诗论》 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黄 鸣

(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关键词] 上博楚简 《诗论》 《诗序》 文学教化说 大小雅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124-06

2001年11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由马承源先生主编的这套上博楚简逐次出版, 是中国学术研究上的一件大事。迄今为止, 对这批楚简, 学者们关注的目光多集中在哲学、经学、思想史、文字释读等方面, 还没有人就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阐发。而首辑整理出版的材料包括据认为是孔子所作的《诗论》, 这正是罕见的先秦时代儒家文学思想的原本。探讨它的意义, 对于研究儒家文学思想从春秋时代的初步成型到两汉时的经学化中间所经历的过渡阶段的面貌,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所采用的释文, 依据李学勤先生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①部分字句, 据台湾大学周凤五先生的《〈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②的说法加以改订。竹简的编连与分章, 皆从李文。

一、《诗论》的文学思想分析

在《诗论》对《诗经》的评价中, 蕴含着极为宝贵的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试述如下。

1. 《诗》的体式

(1) 风雅颂的划分

在诗的体式上, 《诗论》最重要的贡献是明确了“风”、“雅”、“颂”三体的划分。这种划

分, 亦见于《荀子》与《礼记·乐记》中:

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 取是以节之也; 《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 取是而文之也; 《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 取是而光之也; 《颂》之所以为至者, 取是而通之也。

——《荀子·儒效》

宽而静, 柔而正直者宜歌《颂》; 广大而静, 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 正直而静, 廉而谦者宜歌《风》。

——《礼记·乐记》

荀子的生卒年, 约在公元前313至238年之间。《礼记·乐记》为孔子门徒七十子后人所作, 多为先秦礼家旧籍, 则此二条资料恰好与《诗论》大致同时或稍后, 在风雅颂三体的划分上, 可以互证。^③

《诗论》中提及风雅颂之划分的内容为第十章:

[孔子]曰: 诗其犹旁(李作“平”)门与? 残(李作“戈”)民而怨(李作“裕”)之, 其用心也将何如? 曰: 《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 上下之不和者, 其用心也将何如?

……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

这里已经有了“邦风”与“颂”的区别,句中缺失之处据句意补出应为“雅”字。

进而在《诗论》第八章中又出现了“颂”、“大夏”(大雅)、“邦风”等名词,而依句意可补充之处应为“小夏”(小雅),这就非但有风雅颂的区别,并且大小雅的划分也已经存在:

颂,旁(李作“平”)德也,多言後,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寻(李作“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小矣!

《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

迄今为止,这是关于“风”、“雅”、“颂”的名称与定义的出土材料与文献记载最为吻合的一个例子。

(2) “重而皆贤于其初者”的结构理论

在诗的结构上,《诗论》提出了“重而皆贤于其初者”的理论。它指的是诗的章节重章复沓而在意思上逐层推进,后一章比前一章的意义与情感有所深化的特点。比如《关雎》,先由关雎起兴,喻君子思慕淑女,二、四、五章皆重章复沓。诗意则由一章的“好逑”到二章的“寤寐求之”,再到三章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寝食不安的状态,四章五章则进到“琴瑟友之”与“钟鼓乐之”——即将这种爱意收敛到“礼”的约束之下了。而在诗人看来,诗中所表现的感情也就从起初的迷乱状态被规范到了以礼自束的平静雍和的精神状态与伦理氛围。这种意义和情感上的层进就是“贤于其初者”。所以,《诗论》第一章在提出这个理论时说: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重(李作“童”)^④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可得,不求(李作“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鹊巢》出

以百两,不亦有偕(李作“离”)乎?《甘棠》……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偕(李作“离”)者……[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这也就是用对《诗经》中具体作品的分析来说明“重而皆贤于其初者”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诗论》中所提及的这些诗篇的内容,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并不一定具有“皆贤于其初者”的特点,倒是互相补足语意的情况较多。这种矛盾应该如何看待?首先,这个理论的提出,也许与孔子想将《诗》纳入教化系统的努力有关:诗意上的层进性正指导着修养上的层进性,即上文所说的“《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诗论》的行文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另一方面,诗歌内容上没有层进性并不意味着诗歌情感上没有层进性。一首诗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从起初刚接触到诗行到顺势而下含咏咀嚼之后,它带给读者的喜怒哀乐、悲悯愉悦的情感深度肯定是有所增益的,所以上面引文中关于《绿衣》与《燕燕》的评价主要是从情感角度着眼,使用的是“思”、“情”、“忧”、“独”这样的词语,就表明了《诗论》作者对这方面情感因素的注意。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论及《诗经》句式特点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但他只是就《诗经》的四言句式作了论述,直至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才初步提到了这一特点:“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复嗟叹咏歌之趣者居多。”这里也只是提出了重章复沓的特点,对于“皆贤于其初者”的理论没有阐发。直到现代,更为精密的关于诗的结构“重章互足”说才由钱钟书先生和黄焯先生完成。^⑤《诗论》在关于诗的体式结构特点上的敏锐论断,是足以光耀千古的。

2. 《诗》的思想

(1) “诗无隐志”说

《诗论》中关于诗的特点的论述,最引人注目

的是“诗无隐志”说: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此说即先秦“诗言志”说的另一种表述,意思是:人心中的真实情感表现于诗中,无法隐藏避匿。“诗言志”说最早出自《尚书·尧典》,经过春秋时列国诸侯卿大夫交往酬酢“赋诗言志”的政治活动的强化,这种观念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吸收,并将之作为“诗教”理论的基础,与“乐教”、“礼教”相辅而行,如《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下句之“乐无隐情”,讲乐与情的关系,先秦儒家经典亦有说明。《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诗论》第五章就说:“《鹿鸣》以乐始(李作“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这就是强调“乐教”的作用。

而“文无隐意”,是《诗论》提出的新的命题。孔子言“文”,多从形式与品德方面着眼。品德如《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涉及到文体或文学的只有《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及《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文无隐意”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文”的性质的最早说明,它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属于同一组范畴,表达方式也相同,且“志、情、意”三者意义也相关;因此,有理由认为,《诗论》的作者将诗、乐、文三者并提,表明了当时儒家文学思想已经存在将诗乐文相互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其中透露的“文”从伦理领域进入文学领域的消息,证明了《诗论》时代“文”的独立性增强的趋势,而三者的并论,也暗示出当时已经有了诗与文不尽相同的文学思想。

(2) 诗与礼

《诗论》的作者非常强调诗的礼制教育作用,如上引《诗论》中关于《关雎》的一段话,就非常重视将人的情感特别是男女燕好之情“反内于

礼”,即纳入“礼”的规范之中。此外,《诗论》中所提及的还有宾赠之礼,如:

[吾以]□□[得]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干(李作“觔”)也。吾以《袞杜》得爵服……如此可,斯爵之矣。俚(李作“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

爵服是饮酒之礼,币帛是挚见之礼,《仪礼》中的“士相见礼”与“燕礼”说得很清楚。它们都是先秦时期规范贵族人际关系的基本礼制。《诗论》论诗,从合乎礼制等方面生发,体现了它注重以社会政治伦理等外在范畴来分析文学作品的特点,贯穿其中的是极为强烈的实用工具理性,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对接受者进行教化,这点是与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一致的。

不仅如此,《诗论》中还有从反面说合乎礼制之不易的:

《青蝇》知患而不知人。《涉溱》其绝肆而士;角艳妇。《河水》知……贵也。

《将大车》之器也,则以为不可如何也。

《涉溱》,疑即《郑风·褰裳》,因为这首诗中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的句子。《涉溱》一诗的主题是表现男女之间情爱,其表达也非常直白,朱熹认为是女子对情人说的戏谑之言,清人毛奇龄更进一步,认为是女子对男子的激诱之词,说:“女子曰:子惠思我,子当褰裳来。嗜山不顾高,嗜桃不顾毛也。”(《毛诗写官记》)诗中且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之句,在方巾气浓重的儒家看来,这简直是目无礼法的淫行,所以诗小序就强解道:“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很明显,《诗论》对此诗的评价虽然没有像诗前小序一般歪曲原意,但起码也对这种放荡的行为深致不满。而相反地,在同一章中说到《大田》、《蓼莪》、《鹿鸣》诸篇时,就从正面给予了肯定:

《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

《蓼莪》有孝志。……《鹿鸣》以乐始(李作“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

《大田》是祭祖诗,《蓼莪》是哀悼父母的诗,《鹿鸣》是宴会诗,它们分别与尊祖返本之礼、孝敬之礼、朋友之礼相应,是《诗论》作者心目中的合乎“礼”的典范。由此可见,诗与礼的关系是《诗论》中一个主要的思想,这种关系又是通过对具体的诗的分析而得出的,这更凸显了《诗论》的诗教色彩。

3. 《诗》的鉴赏

《诗论》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以言简意赅的语言对《诗经》的某些篇章进行了点评,涉及到他对这些诗的鲜明的主观情感,相对于《论语》中孔子对《诗经》的整体性、概括性、客观性的批评而言,这些鉴赏中渗透的主观性使它成为极具价值的先秦文学鉴赏文本。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鸛鸣》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庙]》吾敬之,《烈文》吾悦[之],《昊天有成命》吾[口]之。《宛丘》曰:“洵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鸛鸣》曰:“其仪一”,是“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亡>竞维人”,“丕显维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

《诗论》的作者在此使用了“善”、“喜”、“信”、“美”、“敬”、“悦”等主观性极强的词来表明他对相应诗篇的态度。这样,通过考察他所评价的诗的内容,就可反映出作者的基本美学观点与兴趣所在。如他所肯定的这些诗篇,大都是出自《大雅》与《周颂》,出自《国风》的三篇(《宛丘》、《猗嗟》、《鸛鸣》)也多从正面着眼。举凡君子的仪态、威仪,王室的辉煌历史与隆重典礼,都是他所心仪的对象。这一段材料可以证明,尽管作者在前面数章多论《国风》但他的

感情天平是倾斜在以《雅》、《颂》为代表的“有成功”之作上的。《论语·子罕》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独独没有提“风”,可知其表述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大抵《诗论》的文学思想,是从社会政治伦理等外在角度来审视文学,对文学本身的特点注意不多。贯注于《诗论》中的指导思想,还是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与实用主义文学观,体现在注重诗的教化作用、多对诗的内容进行分析上面。但相对于后世以《诗序》(包括大序与小序)、《诗谱》等同样从儒家角度来分析《诗经》的著作来说,《诗论》又体现了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踏实、对诗的情感把握得比较真切的特点。

二、《诗论》与《诗序》的比较

《诗论》已公布的材料共 29 简,李学勤先生将之分为 12 章。其中,第 8、9、10、12 章为总论,包括对《诗》的作用与艺术特点、风雅颂各自的作用与特点的说明;第 1-7、11 章为分论作品,涉及到风雅颂的各个方面,达 56 篇之多。

《诗论》与《诗大序》总论对比见下表:

在诗的作用与特点上,《诗论》很明显强调的是《诗》的教化作用。它包含着政治、伦理、实用

《诗论》与《诗大序》总论对比表

内容		《诗论》	《诗大序》
诗	作用	诗其犹旁门与?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特点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风	作用	残民而怨之,其用心将何如?/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特点	其言文,其声善。	(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雅	作用	民之有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大雅,盛德也,……多言难而怨怒者也。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特点	(小雅)衰矣!小矣!	雅者,正也。
颂	作用	有成功者何如?/旁德也。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特点	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寻,其思深而远。至矣!	/

知识诸方面,这点与《诗大序》并无大异,这也是与孔子思想中的文学教化说思想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倒是相对于《论语》和《诗大序》,《诗论》给予了“风雅颂”的艺术特点以更多的关注。这涉及到“风雅颂”的旨趣、形式、风格、语言等诸方面的特点,为前后二者所不载。如《诗论》说颂的音乐稳重而迟缓,其韵律悠长伸展,其意旨深邃窈远,并将之誉为“至矣”,这为我们了解孔子心目中音乐和诗的最高标准给出了一个相当可信的答案,所以他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韶乐的特点,根据《诗论》对颂诗的赞叹可知,正是那种“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寻,其思深而远”的音乐。

更重要的是《诗论》对大小雅的分辨。上节已经引了《荀子·儒效》篇与《礼记·乐记》的例子。其中,《乐记》所说是从接受者角度而言,没有直接说明作用;《荀子》所言风、大小雅、颂的作用分别是“节”、“文”、“光”、“通”,大小雅的“文”是文饰,“光”是发扬之意,都是从肯定的角度立论,也没有对大小雅的内容进行区别。事实上,大雅固然多是歌颂周王的功德的诗篇,但小雅除了有如陆德明所说的“正小雅”的“文武之小雅”外,还有诸多如《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中的讥刺怨尤的篇章。

《诗经》实际在内容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诗大序》中有这样的说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这里区别了大小雅,但它只是以“政有大小”来解释大小雅的内容。《诗大序》还提到了“变雅”: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但是,《诗大序》在提出“变雅”之后,下面又着力说“变风”,而对“变雅”则不置一词了。接下来提出“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的观点,虽然加了它们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的前提,使人联想到言下之意是说大雅言“王政之兴”而小雅言“王政之废”,但毕竟语意晦涩不明,不能说是解决了这个矛盾。到了郑玄的《诗谱序》,才从历史角度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变风”、“变雅”的内容: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譖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邴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这段话体现出的思想,一是变风变雅是孔子有意识地编辑进《诗经》的;二是说明了“雅”具有两种内容,相对于变雅而言的正雅是“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这大概即是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变雅则是说明“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的,这大致相当于小雅中的那些怨刺之篇。

考察了汉人对大小雅的区别以及对小雅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与风格的论断,再回头看看《诗论》,可以发现《诗论》是最早对上面的问题作出清楚论断的著作。

《诗论》第八章说:“大夏(雅),盛德也,多言……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小矣!”在说大雅言盛德之后,又说多写苦难而传达出怨恨愤怒之情的,是衰世之音,是小雅(据文意补足)。这里恰好与《诗大序》对小雅的定义相冲突。小雅是《诗》的一部分,孔子一方面肯定怨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是一般的正,而是小正,并以大雅作大正的标准与小雅对立。这种安排是煞费苦心的,它体现了孔子一面对诗的审美标准有着正面的要求,以此来规范人们尤其是贵族的行为,同时又想保留诗中描写和控诉这种标准与秩序被破坏的

篇章以作警诫。说到底，这都是为了教化的目的服务的。而我们从这种安排中也可以看到后世所谓“变风变雅”说的由来——将对立的时代、对立的风格、对立的情绪统一在比较一致的“正”的标准之下，就不得不采用这种说法。在这方面，《诗大序》与郑玄《诗谱序》又是与《诗论》一脉相承的。至于它们的说法在面貌上为什么和《诗论》有所不同，可能的原因一为经秦火后传承的缺失，二为汉人重经学，以己意对之进行了改造。

《诗论》具体论诗的部分涉及到对多达 56 篇《诗经》中的作品的评价与理解，占现在留存下来的《诗经》总篇数的几乎五分之一。具体评价中，因为《诗论》的评价多为片言只字，往往只是很简略地揭示出本篇诗的情绪与内容，所以较难确定其本事是否与《诗小序》相同。总体看来，基本情感的判定上可以相通，但本事多未必如《毛诗序》所说，后者与《诗论》相比，更多了许多附益的色彩。

总的来说，《诗论》的评价与诗歌本身所表达的内容与情感是基本相同的。如第一章中的《绿衣》，诗前小序说这是卫国夫人庄姜自伤之诗，因为妾夺占了君王的欢心，正妻失位而作，可这篇诗明明是男子怀念从前的妻子的语气！《诗论》的评价正是“《绿衣》之忧，思古人也”，古人即故人。这正是符合诗歌原意的。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但很多情况下，在《诗论》的判定与原诗感情基本一致的同时，《诗论》也表现出了“断章取义”的色彩。不过，它并不是如汉人一样将诗的文本历史化，而是根据它所想宣扬的教化原则的需要来提取诗意中有利于说明这种原则的因素。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汉广》。《汉广》是写汉水边一个青年男子求偶不得，意绪惆怅的诗，《诗论》则将这种求而不得的意绪提炼成一个“知”字，说：“（《汉广》）不求不可能，不亦知恒乎？”意思是《汉广》诗意是不强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难道不是知道常道吗？后面又说：“《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意思是《汉广》的智慧，在于知道不强求不可得的东西。而《诗小序》说：“德之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

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这就将诗与文王拉在一起，从而将诗历史化了。又如《木瓜》一诗，诗前小序说：“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施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但《木瓜》毫无疑问是男女互赠诗，诗中含有情意，《诗论》说得很平实：“隐志必有以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干也。”意思是隐藏着的志意与情绪必定要有所凭借才可以抒发，他们的言辞要有一定的物质承载才能用来正常地交往。这就将男女交往互赠之节延伸到人际交往的领域，成为说明“宾赠之礼”的文本了。

可以说，直至战国时代中期，《诗经》都还未被附会上更多的历史教化色彩。这种附会，更多的是汉人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教化说并不是对诗进行附会来进行教化，而是在注意到诗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注意到了它的文学功能本身。如《诗论》评价《柏舟》“闷”，《谷风》“悲”，就充分注意到了这两首弃妇诗的不同情绪与特点。在孔子的“兴观群怨”及“兴于诗”的说法中，“兴”都还是根据诗歌所传达的形象与感情对读者情绪上的感染而兴起的，并非满纸的微言大义，而是很自然地作品出发来进行人生的教育。这是一种很朴实但又相当正确的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诗论》正秉承了这种方法，《诗论》对五十余首诗的阐释便是明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诗论》补足了由先秦儒家的文学教化思想到两汉经学儒家文学思想中的过渡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它的意义不在于让我们能够重写学术史，因为它的最终结论是已经有了定论的，而在于它能让我们对以前所不知道的过程进行增补，使这一环节显豁出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文学教化说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看清后人在对它的改造中保留了什么，舍弃了什么。

就这个作用而言，上博楚简《诗论》体现出的几点重要文学思想，无不具有开创的意义，这几种重要的文学思想是：一、文学教化说的系统阐述；二、大小雅的划分及其对变风变雅说的影响；三、注重教化的同时重视对原作的客观阐释。其中，一、二点为汉代的经师所继承，并将之建造成精致

试析汉语四字格成语的类型及其释义方式

陶原珂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博士,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 本文对《现汉》四字格固定词语及其释义方式进行类型分析, 根据其词义构成的特征, 先把非成语与成语区别开来, 从寓意成语实例归纳表义类型, 证明表义二层性只是部分寓意成语的特点, 进而分析介于非成语和寓意成语之间的固定词语——类成语的非直义性特点, 指出它们共同归属的语言系统——古代汉语, 与寓意成语有着大体相同的语言结构, 从而归纳出对汉语成语的若干新认识。

[关键词] 四字格 成语 类型 释义

[中图分类号] H13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130-08

在语言中, 成语也是作为独立的表义单位来使用的, 因而, 在现代的普通语文词典中, 成语也和普通词一样作为独立的词目来处理。然而, 学术界对成语的界定至今仍无共识, 这使得一些成语词典的收录范围博杂无边。有的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成语, 认为“它体现着汉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传统和博大深邃的睿智哲理, 在现代汉语中保持着

历久弥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往往包含典故史事或古代语义”;^①有的则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成语, 认为它是语言文化的精华、“活化石”和“全息块”;^②等等。而真正能从成语的语言属性特征来认识成语的, 则以《现代汉语词典》^③(以下简称《现汉》)和刘叔新先生的研究^④较有代表性。

《现汉》给“成语”所下的定义是: “人们长

字·重”: “厚也, 从壬东声。”“壬”、“东”会意成入世间万物运动、滋生, 有厚实、充裕意。其同源字有纒、禛时代, 作为联接词使用时, 其所联接的前后成分之间或为正接、或为反接、或为先后、或为因果, 但绝无果前因后的用法(参见王力《汉语史稿》第335页)。廖释“善、贵”正是以“皆贤于其初者”作为“重”的原因, 方可讲通, 但这在句法上难以成立。所以, 周凤五释作“重复”于义为长, 它与“皆贤于其初者”构成两个动词性并列成分, “而”字在其中表示顺接关系, 则文意完满自足。故此处从周说释为“重复”之“重”。

⑤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 第75-76页, 中华书局, 1991年; 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 《武汉大学学报》, 1956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呼 韩

①见《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2卷, 第2期, 2002年1月。又参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一文附录“《诗论》分章释文”, 《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58-60页。

②见《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 第152-172页。

③另外, 《周礼·春官·大师》: “教六诗, 曰风, 曰赋, 曰比, 曰兴, 曰雅, 曰颂。”这里也出现了“风雅颂”的提法。但学者对于《周礼》的成书时间与学派性质均有争论, 此不多论。

④“重”字, 李学勤隶作“童”, 无释。廖名春赞同周凤五说, 认为应作“重”, 但廖又认为周释作“重复”则非, 应为“善、贵”义(《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263页。)按廖说迂曲。“重”为东部定母字, 《说文解

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它从习用、精简与定型以及出处(或典故来源——以下简称“典源”)几个方面来界定成语的特点和性质。然而,《现汉》在4815个立目的四字词语^⑧中,给出词语出处的不过275条,大部分成语的释义并不给出处。因此,在操作上,读者显然不能够只根据有无典源来判断大部分固定词语的性质,而单靠“词组或短句”的“习用、精简与定型”的特点往往又不能够把四字的术语、普通词语等固定词语与成语完全区别开来。

从释义方面看,《现汉》对这四条成语的释义各不相同:前两条无出典,“小题大做”条释比喻义(比喻把小事当做大事来办,有不值得这样做的意思),“后来居上”条直接解义(后起的超过先前的);后两条引典源,“朝三暮四”条释原典的比喻义和后来的比喻义(反复无常),“杯弓蛇影”条则只释原典的比喻义(比喻疑神疑鬼,妄自惊慌)。而这些释义方式与成语的表义类型(直义、喻义、转义等)大体上相适应,但与《现汉》的成语分类并不对应。可见,从释义类型上看来,成语的表义类型与成语的区别性特征的关系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刘叔新先生曾经指出(1993年):“成语的重要特征,凭之基本上能同所有其他固定语区别开来的特征,是表意的双层性:字面的意义具有形象比喻作用或使人联想的作用,透过它曲折地表现仿佛处于内层的真实意义。”因此,他认为,应以是否直接表意作为区分一般词语与成语的语义标准。这个分类原则与西方语言学对成语(idiom)的解释相一致,^⑨但它只适用于上述一、三、四例成语。“后来居上”条并无寓意,所以《现汉》直接解义:以“后起的”释“后来”,以“超过先前的”释“居上”,把精简的成语切分为两段,按词义对应的方式扩展开来,成为两段扩展的释义语。《中国成语大辞典》(缩印本)^⑩也有意识地按“从严标准”收录成语,但“移风易俗”(转移风气,改变习俗)这种非寓意性的成语,也出现在例言中用作典型的成语

例。看来,在实际分析和应用中,“直指”与“寓意”不一定能够用作判断是不是成语的标准。对成语的寓意和表义类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和发展。本文正试图通过对《现汉》所收固定词语的实际分析来得出新的认识。

《现汉》对成语词目并无标示。虽然汉语成语以四字格占绝大多数,但是,在《现汉》里立目的四字格固定词语却未必是成语,其中还有术语、普通习用语以及介乎于典型的成语(或说寓意成语——它们的成语属性无争议)与普通习用语之间的词语形式。而对汉语固定词语的这种中间形式(姑且先称为“类成语”)的确定,对于进一步认识成语的性质、类别及其区别性特征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对今后在词典中进一步标明词语的性质也有参考价值。本文在分析比较《现汉》里的全部四字词语的基础上,试图以类成语为中介来探讨成语的表义类型,先排除非成语的部分,然后对成语及“类成语”的语义特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同时讨论它们在释义上的区别和特点。

一、汉语的习语、术语和成语的区别

“习用、精简与定型”以及“寓意性”等特点,虽然不可以直接简单地用来限定汉语成语的范围,使之与其它固定词语完全区别开来,但是,汉语成语在这些方面的确与一般词语及术语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不妨以它们作为分析项来切入分析和比较习语、术语和成语的区别性。

(一) 术语的特征

术语是“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现汉》),通常用于一定的学科范围。它们是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往往也经由个人率先使用到学科普遍接受与规范化的过程。然而,术语有着单一性——即术语与概念之间一对一的关系——的内在要求,这是术语规范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在规范化的过程中,不同个人或理论中使用的术语逐步得到统一和定型,或者继续代表着不同个人或理论中的概念,如syntax(句法)与sentence grammar(句子语法——也可以译作“句法”),前者主要用于乔姆斯基的理论及其影响下产生的研究领域。术语的单一性还表现为术语在一定学科范围内的单义性,^⑪使它能够与双概念并列结构的成语或一

般词语区别开来。例如：“巴山蜀水、白山黑水”等，虽然所指的地理位置比较具体，却与术语的单一性相左，因而不是地理学科的术语。

成语一般都有固定的词语形式，然而，在长期的实际运用中，有不少变异形式并存，因而，寓意成语的定型性，与其说表现在词语形式与语义一对一的关系上，不如说它表现为其寓意的所指很稳定。比如“黔驴技穷”与“黔驴之技”、“黔驴”、“黔之驴”，“殃及池鱼”与“池鱼之殃”或“池鱼之祸”等等，根据上下文(context)的需要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由于出典的喻体确定而表示相同的寓意。

另外，与习语相比，学科性是术语与一般用语(或日常用语)的一种明显分界线。比如：“肘”——“胳膊肘子”、“腕”——“胳膊腕子”、“中耳炎”——“耳朵底子”等，日常用语的构词性语义结构显然不够精简和准确。然而，对术语构成成分的精简更多地表现在术语的使用之中，例如：“文学评论”→“文评”、“物理治疗”→“理疗”、“高等教育”→“高教”等。这种应用中的精简表现出个别约定性，所以，人们往往不作结构上的类推，如：“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在应用中就不作类似的精简，又如：“基本词汇、基本单位、基本建设、基本粒子、基本矛盾”等术语，在使用中只有“基本建设”精简为“基建”。

术语的词语表义性是直义的，不是寓意的，因此，术语的释义一般是直接解释术语的所指，或通过概念的种属关系来下定义。当术语被赋予了寓意时，如“不二法门、先天不足”等等，便会变生出成语义项，其使用范围亦随之超出了原来所属的学科，而原来的术语义项仍保持着直义的表义性。虽然在语文词典中它们的术语义项不一定单独列出，但实际上是术语义项和成语义项并存，如上两例均如此。

(二) 普通词语的特征

所谓普通词语，是相对于术语和成语而言的，普通词语的非学科性使它区别于术语。然而，寓意成语的寓意性与某些普通词语的表义性有类似的地方。普通词语既有单纯词也含有复合词，而“复合词”的词义往往并非语素义的简单相加……如汉语的

‘锅盔、锅伙、滚肥、滚刀肉、具文、据点……’等等，它们的词汇义并不能简单地按语素义相加来理解，而是一个个词的词义整体。”^⑨其中，有一些(比如前四个)复合词是在词素义的基础上以隐喻方式构成词义的。另外，有些复合词，比如“果实”、“肘腋”等，虽然本义是词素义的合成，但可以通过比喻的方式发展出新的义项，即：A义项→B义项=A义项+B义项(如“果实”，两义项并存)，或：A义项+B义项=B义项(如“肘腋”，只保留比喻义项)。“肘腋”是词，而非词组，然而，四字格的“胜利果实”一般不被看作成语，而“变生肘腋”或“肘腋之患”等，则被看作含有寓意的成语，这些成语的寓意性其实都来自于其中某个词的比喻义项，即寓意存在于词的义项层面。可见，普通词语的词义表现与成语的寓意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普通词语的习用性与成语的习用性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口语中普通词语甚至会更常用一些。普通词语的定型性表现是词形稳定，通常不容嵌入或改变其语素的次序。这与寓意成语的定型性主要表现为喻体典源的稳定而词语形式可适当改变的情况不同。个别“偏正结构”的普通词语可以加“的”而语意不变，如“胜利果实”→“胜利的果实”，反映了该固定词语尚未完全固定的发展状况。因为，一般来说，普通词语通常是不可嵌入其它成分的，比如“赤脚医生”、“积极分子”、“过路财神”等，不可嵌入“的”字；或如“紧急状态”、“安民告示”、“案头工作”、“一般见识”等等，如果嵌入“的”字，构成短语的语义会稍有改变。

从语言系统性的观点来看问题，普通词语和成语之间还存在着语言系统的差异。如《现汉》指出的，成语是“长期以来习用”的，其词与词之间的结合体现着古代汉语单音节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而普通词语则属于现代汉语本身的，其结构、用词都表现着现代汉语复合词的构成规律。这种差异性，既是客观存在，也是我们用来给普通词语、成语及类成语加以归类的一个重要依据。

根据普通词语的上述特征，现代汉语的四字格普通词语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1) 单纯词，例如“译音词”“罗曼蒂克、歇斯底

里”等。因为成语是固定“词组”或“短语”，所以，单纯词不属于成语。在四字格固定词语中，还有不少并列叠音词，也属于单纯词，例如：“吹吹打打、风风火火、缝缝连连、沟沟坎坎、半半拉拉、方方面面、纷纷扬扬、急急巴巴、期期艾艾”等，虽然后者在《现汉》里是以典源释义的。象声词也属于单纯词之列，如：“丁零当啷、嘀哩嘟噜”等。

(2) 只有单个含义语素而其余为衬音语素的词，其中的衬音语素虽然强化或调整含义语素的语义(一般是形容词性质的)，却主要起衬音作用。例如：

“白不吡咧、滑不唧溜、黑不溜秋、黑咕隆咚、花不楞登、花里胡哨”等，整个四字格的词义接近于其中含义语素的语义，因而在语感上相当于一个词。有的双音节形容词加上起强调作用的叠音词素，如“可怜巴巴”，其语义构成与此相当，也属于普通词语。但是，双音节非形容词加上叠音词素，则是另一种语义结构，比如“天网恢恢”、“文质彬彬”、“信誓旦旦”、“衣冠楚楚”等等，是主谓结构，其中的“彬彬”和“楚楚”等叠音词还可以作为词素与别的词语结合。又如：“逃之夭夭”、“想入非非”或“庸中佼佼”等等固定词组，是动补结构或偏正结构，它们的语义结构类型也与上述的形容词强调形式不同。双音节叠音词素在前的四字词语，如：“心心相印”(主谓性结构)、“洋洋大观”、“芸芸众生”(名词性偏正结构)、“跃跃欲试”、“息息相关”、“惺惺作态”、“振振有词”、“蒸蒸日上”(动词性偏正结构)等等，也不同于上述的形容词强调形式的词义结构类型。可见，纯粹从构词形式上看，词组性和短语性也是区别部分普通词语和成语(及类成语)的重要指标。

(3) 一般事物或观念的名称或通俗说法，例如：“卡拉OK、黄毛丫头、一般见识、炒买炒卖、苛捐杂税”等等。它们也表现出非学科性和非寓意性的特点。其中有的(如后两个)带有某种情感色彩，与术语有别。作为某种事物或观念的名称，它们的所指应是某一个或一类事物或观念，因此，它们大多数为偏正结构。如：“炒买炒卖”指整个买卖过程，“苛捐杂税”指苛杂的捐税，都是直指某类事

物的。而在结构上，除第一例属于译音词外，其它都符合现代汉语复合词的构词词序。

(4) 行业词语也按社会职能分门别类，但较接近于社会生活，不像术语那样讲究结构规整和有系统性，比如：“成龙配套”、“插科打诨”、“买空卖空”、“后台老板”等，它们的习用性与一般词语有较多的共同点，而它们的行业性与成语的广泛应用性相异，因此，在讨论成语和类成语的时候，我们把它们归并到普通词语里来。当行业语被广泛使用之后，便有可能转变为成语，如“买空卖空”和“插科打诨”。某些语体功能较突出的词语，如“敬谢不敏、言归正传、例行公事”等等，其表义本身具有特定的行为功能，亦明显有异于成语的广泛应用性，笔者也把它们归并到普通词语的范围里来。

(5) 熟语，“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如‘慢条斯理、无精打采、不尴不尬、乱七八糟、八九不离十’等”(《现汉》)。其结构固定而不可按构词成分来分析，整体表义而无寓意。又如：“一天到晚、不成比例、胡说八道、老着脸皮、不差什么(方)”等等。其中，“不差什么”的标准语义项是可分析的，不在此例。熟语的不可分析性，也是区别于类成语的分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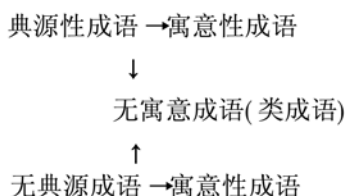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些数(尤其是概数)的表达式，例如：“百分之百、百儿八十、千儿八百、万儿八千、成千成万”等，也是现代汉语日常口语的固定词语，它们与“一五一十”、“九九归一”、“独一无二”等以数字表达某种寓意的寓意成语有着表义上的根本差异，也属于普通词语之列。

二、成语类型研究

《现汉》把成语大别为在理解上需要典源的和无典源的两类，这种分类并不涉及成语的寓意性。而事实上，在《现汉》中给出典源的成语并不一定有特别的寓意性，例如：“兵贵神速”(用兵以行动特别迅速最为重要)、“得道多助”(坚持正义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不可思议”(不可想像，不能理解)、“悖入悖出”(胡乱弄来的钱又胡乱花掉)等等，都没有特别的寓意，所以，《现汉》相应地都按逐字扩展直义的方式来解释。由于这类成语的表义方式是直义式的，附以典源固然有助于了解出

处和成义语境,但其中短语句式比较完整的(如前三例),即使不附典源,只要稍微掌握字面的意思,也就不难理解它们的基本含义。在汉语里,类似这样的大量固定词语因长期使用而定型,虽然没有特别的寓意,也已被广泛地收入到各种成语词典之中。只是为了与寓意成语相区别和称名的方便,我们才把它们称之为“类成语”。

在类型划分中,我们只考虑词语形式与表义之间的关系,并不考虑典源的因素。因为,典源在一些成语的释义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不能把历史上的许多词语与成语区别开来,而且不同于成语表义构成方式这种描述共时系统性的词汇特征,如把它作为划分成语细类的一个指标,会使寓意性这个区别特征变得模糊不清,引起交叉分类的混乱(如下图所示)。



因此,在进一步从固定词语的结构和表义方式方面分析成语和类成语的细类时,我们只是把它纳入到共时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来应用,而不把它看作成语基本类型的分析项。

(一) 寓意成语的寓意类型及其释义方式

A. 喻体。它们可以是某种事物、人物、状态、过程或者境界等。例如:“百花齐放、晴天霹雳、杯水车薪、背道而驰、吹灰之力、阳春白雪、冰清玉洁”等,都是现成的喻体,虽然成语里没有比喻语,喻体与寓意的关系却大体上是确定的,比如,“晴天霹雳”喻意外事件,“杯水车薪”喻无济于事,“背道而驰”喻选择的努力方向相反,等等。在使用中,比喻语(“如”、“犹如”等)需要根据上下文来补足或阙省,相应地构成明喻或隐喻。

B. 明喻。成语本身含有比喻语,喻体和本体或形容词语在成语中表义自足。例如:“骨瘦如柴、表里如一、福如东海、洞若观火、恩同再造、巧夺天工”等等,成语前部指明在哪方面如喻体,它在成语里与比喻词及喻体共同构成完整的明喻格式。这类成语在使用中不需要另加比喻语。另一种明喻

在成语里无本体,只有比喻语和喻体,例如:“如鸟兽散、如数家珍、如蚁附膻、如鱼得水、若无其事”等。其中的比喻语和喻体部分共同构成动宾关系,在使用中,需要补足其相应的本体做成语的主语。

C. 隐喻,无比喻语,喻体和本体在成语中通过某种语法关系来表达比喻义。例如:“风烛残年、毛举细故、覆盆之冤,笔走龙蛇,唇枪舌剑”等。在语法结构上,前三条是偏正结构,中间一条是主谓结构,后一条是拆分的主谓结构。其中,主谓结构的主项也正是该比喻的本体和成语的寓意范围。在使用中,这种主谓结构的成语本身可以成为独立的分句。偏正结构的隐喻成语,功能相当于名词,但是,在具体的使用中,一般还需要指明某个相应的主体作为该隐喻更明确的主项。

D. 局部构成喻体。例如:“饱经沧桑、饱经风霜,宝刀不老、滚瓜烂熟、滚瓜溜圆”等等。其中半截给出喻体,另外半截暗示或点明其喻义点,比如“所经历的”、“所经受的”或“圆、熟、不老”等等。但是,比喻的本体或主项并没有出现在成语之中,需要在具体的运用中,根据上下文给出相应的主项。其中表示喻体的词语,有的是在该成语中才含该比喻意的,例如“宝刀”和“滚瓜”;有的则是该词较为固定的比喻义项,例如“沧桑”和“风霜”。可见,成语的寓意性既可以在成语层面构成,也可以在词素层面构成。而从义项的固定性来考虑,由词素层面构成寓意的寓意成语,它们与直义性的成语(或说类成语)的区别性,也就不在成语层面了。

E. 指代。例如:“酒肉朋友、告枕头状、不足挂齿”等,其中,“挂齿”代指言说、提及,“枕头”代指丈夫,“酒肉”代指吃、喝、玩、乐,等等。这类成语的寓意,是基于成语中某个词语的代指性的。而这些含代指义的词语,有的只是在该成语中含有代指义,如前两条;有的则是已凝固为词的比喻义项了,如后一条。在释义中,对含指代义的词语加以适当说明,全条的含义便会显豁。

F. 表义夸张。例如:“欢天喜地、惊天动地、撼天动地、老八辈子、火冒三丈,花天酒地,火海刀山,九牛一毛”等。夸张不是直义,所以,表义

夸张可以看作一种语意夸大的寓意方式。汉语成语夸张的构成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通过对举“天”、“地”或博大的事物来表达,一是以夸大的数来实现。从表义结构来看,前五条含有夸张的基本语义点,“欢喜”、“惊动”、“撼动”、“老”、“火”等等,第六条的“花”和“酒”用作动词,也构成夸张的基本语义点。最后两条都没有词充当夸张的基本语义点,而是以整条构成一个夸张的喻体,与前述A类相似。

G. 典源寓意。大凡需要了解典源才可以理解的成语,往往是因为一些有出典的成语结构过简,或者其中含有历史人名、事件、地名或涉及前人的语篇等。例如:“筚路蓝缕、白衣苍狗、杯弓蛇影,班门弄斧、逼上梁山、暗度陈仓”等。前三例均为并列结构,表义结构不完整,未构成寓意结构关系;后三例的表义结构较完整,但含有历史事件、地名或人名,需要相应的知识准备才可理解。因此,这些成语的释义都需要提供相应的历史语境或语篇,才便于了解它们的寓意。而在使用中,这些成语一般仍按中心词的语法功能行事,但名词性并列结构的典源寓意成语多作独立语。

在以上七类寓意成语中,A、B、C、D四类和一部分的F类都是以比喻的方式来构成表义结构的,除A类在应用时需要补足比喻词和被喻者之外,其余几类的寓意性都是自足的,喻义点都可以从成语中找到字面义,可以说它们的字面义与其寓意相一致,在释义时不需要分开字面义和寓意这样两个层面来解释,只要直接解释清楚成语的比喻义即可(因比喻义就是其字面义)。

(二) 类成语的非直义性及其释义方式

我们这里谈论的汉语类成语,虽然没有字面义之外的特别寓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存在非直义性的一面。不过,类成语的非直义性,是从语言的系统性方面来说的。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现代汉语的性质;一是结构的紧缩性,或非扩展性。这两个方面的差异,都是与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词汇为主的构词方式及其扩展性言语的表义方式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

A. 含古代虚词和代词的义项及其结构。虚词和代词在古今汉语中几乎是“大换班”,因而,它们

在类成语中的存在颇能够反映出古今汉语词汇系统的差异。例如:“反求诸己、诸如此类、得其所哉、久而久之、长此以往、多此一举、曾几何时、答非所问、不知所云”等等。其中,介词“诸”、语气词“哉”和句末助词“之”^⑥在现代汉语里已不用,“此”的指代用法,“何”受“几”的修饰,以及在否定词之后接的“所”结构,等等,也是典型的古汉语结构,虽然“所”字结构(往往带“的”)至今仍在使用。这些词素本身以及它们与其它词结合结构上的古代性,使这些类成语具有历史感。

B. 含古代实词义项及其结构。例如:“匪夷所思、安步当车、不经之谈、博闻强识、长歌当哭、不即不离、别无二致、不为已甚”等,其中,“匪”、“夷”、“安”、“经”、“识”、“歌”、“即”、“致”和“已甚”等词的义项,都不是现代汉语的义项,它们只保留在成语之中。又如:“既往不咎、后来居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别具一格、不拘一格”等,其中的“咎”、“居”、“承”、“具”和“拘”等单音节词在现代已发展出相应的双音节词,它们正反映了古今词形的区别。

C. 含古代否定结构。例如:“概莫能外、人莫予毒、居心叵测、大而无当、时不我待、得不偿失、出其不意、悔不当初、猝不及防”等。它们的否定词均与现代汉语的用法不合,其中,在语义上“莫”与现代汉语的“不”或“不能”相当(第二条还使其动宾结构颠倒);“叵”与“不能”相当;“无”在现代汉语中相当于“没有”(所以应当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而“不”在现代汉语里不接词性变用的词语,而且“不”后是“动一宾”结构而不是“宾一动”结构,“不及”后不接动词。这些否定词的非现代用法,均表明这些词语结构的古代性。

D. 含词性变用结构。例如:“祸国殃民、不期而遇、骇入听闻”等,前两例名词用作动词,后一例动词用作名词;“敬而远之、厚此薄彼、厚古薄今”等,形容词用作动词;“除暴安良、除旧布新、锄强扶弱”等,形容词用作名词;“安邦定国、大快人心”等,则可看作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按古代汉语的使用习惯,词性多变用,它反映了单音节词词性较灵活的古汉语特点,这也是类成语结构可以像寓意成语那样精简的一个原因。

E. 用引申义项构成形象的语意。例如:“改换门庭、别具匠心、后起之秀、趋炎附势、鸿篇巨制、忍辱负重、穷途末路”等。其中,从语素的义项来看,“门庭、匠心、秀、炎、鸿、负重、路途”等,用的都不是本义,而是由本义比喻而成的引申义,因而这些类成语的表义有一定的形象性。这与寓意成语颇为相似。从释义的角度来看,由于义项的提取来自语言的实际应用,而这些语素的比喻义项又往往直接从类成语中提取,词典提供的释例也是现成的类成语,这就使得成语的寓意和义项表达两者难以分清。

F. 书面语义项。例如:“毁家纾难、朋比为奸、动辄得咎、戮力同心、穷兵黩武、面面俱到、两败俱伤、饕餮不继、聊以卒岁、揆情度理”等。其中书面语义项“纾、比、辄、黩、俱、卒、戮力、饕餮”等,它们不像古代义项及其结构那样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而是至今保留在书面语之中,只是口语一般不用或少用。尽管成语不限于书面语,但成语的长期习用性,大都体现在留传下来的文献之中,这也是书面语的特色之一。而书面语义项在类成语的保留,也正反映了类成语的长期习用性和古旧时代的色彩。

G. 含古旧事物或传统意识。例如:“残篇断简、披发左衽、披麻戴孝”,反映了古旧的事物,在现代社会已不复使用,而它们只有在提起这些古旧事物(或类似的事物)的时候才使用。又如:“安贫乐道、刚柔相济、识文断字”等,反映了古时尊道、辩证以及对语文知识的看法。这些古旧事物和传统意识,从文化方面反映着类成语的历史文化积淀,及其相应所属的语言时代。

从古汉语的角度看来,类成语的以上七个语言特征方面,都是在词组或短语的句法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是构词上的特征。它们反映出类成语属于非现代汉语系统的性质,因而,类成语在现代汉语的词典语境中,需要用现代汉语来译解——大都可以作扩展性的对译。正是由于存在古今语言系统的差异,类成语也给人非直义的语感。

(三) 共同的四字定型结构

类成语主要属于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古代汉语系统,这一点与寓意成语是一致的。纯粹从结构类型的角度来看,类成语除了没有明喻和隐喻的结构之外,其形式结构类型与其它寓意成语的结构类型基本相同。其中,除了含虚词、代词或否定词的类成语结构不对称之外,其余的基本结构一般都是对称平分为前后两节各两个音节,可分为以下几类进行对比。

A. 两节顺接。其词语构成的语义结构与短语的句法结构相同,前后两节的结构关系可以按纯句法关系来解释。如寓意成语例:“八仙过海(主谓)、点铁成金(连动)、程门立雪(偏正)、入木三分(动补)”等,类成语例:“后会有期(主谓)、积非成是(主谓)、弄巧成拙(连动)、发人深省(连动)、枵腹从公(偏正)、后起之秀(偏正)、从容不迫(形补)”等。

B. 两节并列。这种语义结构,因两节的所指近义或同类相关而成为并列关系。如寓意成语例:“梦幻泡影、叠床架屋、鹅行鸭步”等,类成语例:“探赜索隐、好善乐施、度德量力”等。

C. 两节对比。这是句法上并列而语义上对比的词组结构。如寓意成语例:“方枘圆凿、高山流水、声东击西、寸短尺长、寸草春晖”等,类成语例:“居高临下、博古通今、此起彼伏、顾此失彼”等。

D. 两节拆分。其句法结构也属于并列,语义上是对比或对照,其特点在于其中两节的某对语素在现代汉语中可以结合成词,而在成语中被拆分派入两节。如寓意成语例:“吐故纳新、沉鱼落雁;火眼金睛、开天辟地”;类成语例:“归根结底、盘根问底、惊世骇俗、离乡背井、情投意合、闲情逸致、移风易俗”等。

E. 同词嵌入。其两节的同一位置上含有相同的语素,如寓意成语例:“不郎不秀、见仁见智、吠形吠声、出尔反尔、难兄难弟”等;类成语例:“不偏不倚、入情入理、全始全终、假情假义、相反相成、以讹传讹、自卖自夸”等。

F. 半截叠音。两节中的一节由叠音词素构成,叠音部分通常修饰或说明非叠音部分。如寓意成语

例：“陈陈相因、空空如也、天网恢恢”等；类成语例：“夸夸其谈、循循善诱、摇摇欲坠”等。

尽管汉语词汇的发展已从单音节词发展出许多双音节词，但是，类成语的定型性使它们具有可以为相应的双音节词所解释而不可以被它们替代的性质，比如：“惊世骇俗”不是“惊骇”+“世俗”，“背井离乡”不等于“背离”+“乡井”；“盘根问底”不是“盘问”根底”而是“盘问(事情的)根由底细”，“归根结底”也不是“归结”“根底”而是“归结到根本上”。因此，在词典的释义中，往往并不是简单地把类成语中的单音节词换成现代汉语里相应的双音节词，然而，逐词扩展的释义方式仍然是可见可感和行之有效的。《现汉》对类成语的解释，基本上就是采用逐词扩展的释义方式。

从以上的类型分析可以看到，并非所有的寓意成语都可以划分出字面义与寓意的，只要喻义与喻义结构共同存于成语之中，其字面义与喻义就是同一层面上的语义。成语具有表意双重性的说法，只是覆盖了寓意成语中的A、E、G类与部分的F类。如果把汉语的寓意成语与类成语综合起来看，古汉语系统性是它们更为突出的共同特征，而且在语义上也都因此而表现出非直义性的特征，成语的历史性和紧缩性亦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比较而言，寓意成语的寓意性特征更为显著，对现代新成语的形成似乎更有影响力，例如：“唱独角戏、唱对台戏、点头哈腰”等，都是寓意性的。其中，前两条含三音节词，第三条用双音节的现代词汇，它们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和用词的特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类成语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距离，看到类成语在汉语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性。

其实，按《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⑩成语(idiom)这个术语是有多个义项的，除了指含字面义与寓意的固定词组和短语之外，它起码还指语言中

个人、群体和民族习用的固定形式。这后一个义项，正可以用来解释具有古代定形性的类成语。因此，从汉语成语类型的实际出发，汉语成语可以描述为(古代)定形、长期习用的固定词组或短语，大部分具有寓意性，而以古汉语系统性为突出的语言特征，一般为四字格。

根据以上的类型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关于《现汉》4815条立目的四字格词语的统计数字：术语1191条，普通词语295条，提供典源释义的成语275条，寓意成语2463条，类成语866条。

①《八用成语词典·殷序》，齐鲁出版社，1991年。

②莫彭龄：《汉语成语新论》，《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③《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版)。

④刘叔新：《固定词组及其类别》，《刘叔新自选集》1993年。

⑤在本文的统计中，“儿”化字不作为有效的别义音节来计算。

⑥参看王宗炎主编《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R. R. K. 哈特曼和F. C. 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⑦《中国成语大辞典》(缩印本)，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2年。

⑧另外，多义项的术语在不同的领域里表示不同的概念，比如“场”在电磁领域和在语义学里就表示截然不同的概念。这与术语在具体某个领域里的单义性不相左。

⑨陶原珂：《双重系统中的词位与释义关系类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6月，第99页。

⑩何金松：《虚词历时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4页。

⑪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Clarenddon Press, Oxford 1995.

责任编辑：童 轩

雷州方言与雷州文化

詹伯慧¹ 甘于恩²

- (1.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632)
2.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 要] 雷州地区的方言与雷州文化一样蕴含着极丰富的人文价值。本文讨论雷州方言在雷州文化中的地位、价值以及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关键词] 雷州方言 文化 来源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2) 09- 0138- 05

一、雷州方言的分类与来源

广义的雷州方言是一个以行政区划为限定语的概念,指的是在雷州半岛通行的汉语方言。从行政上说,雷州半岛包括湛江市及其所辖的徐闻、海康(现雷州市)、遂溪、廉江、吴川五县市,不过,从语言特点和历史渊源看,属茂名市的电白县与上述县市关系密切,也应包括在内。狭义的雷州方言则指雷州话(或“雷话”),属闽语。本文采用广义的概念,狭义的雷州方言则以“雷州话”或“雷话”称之。

(一)雷州方言的分类

雷州方言十分复杂,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雷州话。雷州话是闽南方言的次方言,旧称“东语”、“客语”,跟雷州话是由外来移民带入有关,但现已不用,老百姓多简称“雷话”,海康一带又叫“黎语”。雷州话是雷州半岛通行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约300万人)的方言,以原海康县城雷城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雷州市境内21个区镇,徐闻境内18个区镇,遂溪境内23个区镇,湛江市的7个市辖郊区和赤坎、霞山市区的部分,廉江境内5个区,吴川境内3个区,电白城关及5个区。

(2)白话,即粤语。主要通行于湛江市区和市郊坡头区,廉江县的廉城镇等6区、吉水、新民、营仔3区的部分,以及吴川县,此外,雷州市、徐闻、遂溪三地境内,还有一些零星的居民点。使用人口近200万人。湛江市、吴川县一带的居民,习惯上把雷州半岛的白话分为以湛江话为代表的“白话”和主要通行于吴川境内的“吴川土白

话”。

电白白话主要分布在羊角、七迳、博贺、那霍、沙院、小良等镇的部分乡村,使用人口超过12万人。其中羊角、七迳的白话与茂名、高州白话相近,那霍白话近于阳春话,博贺白话则与吴川白话关系较密切(博贺白话的使用者主要为渔民,又称“置家白”)。此外,大衙镇的龙记、棉花地等村的白话叫做“麻兰话”,与四邑话接近。

(3)涯话。又作“厓话”、“涯话”、“哎话”,即客家方言。主要分布于廉江县西部和北部的塘蓬、石角等5区,河唇、石岭、青平、高桥4区的大部,河堤、营仔2区的部分;电白县北部大衙等7区,霞洞区的部分乡村,其他各县也有一些乡村使用客家话,如雷州市英利区的小部,遂溪县城西区的搬迁队。使用人口不足70万人。

(4)海话。主要通行于廉江、电白两县的沿海地区。海话有两种:廉江沿海的海话旧方志称为“海僚话”,是粤语的一种土语;电白沿海的海话则属闽语,跟福建漳州一带的闽南话相近。廉江海话的使用人口约为5万人,电白海话的使用人口则近50万人。虽然这两种方言都叫做“海话”,但从语言特点看,应分属不同的大方言区(粤、闽)。

如把海话分归粤、闽语,雷州半岛实际上通行三大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此外,电白电城等地还零星分布着称为“旧时正话”的官话方言,使用人口约3万人,也有人认为这种方言与广西平话较接近。^①

(二) 雷州方言的来源

雷州方言的分布格局,与雷州半岛历代的移民关系密切。

1. 雷州话的来源

湛江等一市六县在汉代属合浦郡地,古时为“岭南之南”,十分荒僻。《电白县志》说“唐宋以前,僮僯杂处,语多难辨”。唐宋以降,早期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南部旧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以及粤东旧潮州府地区,多经海路进入雷州半岛,聚居在徐闻、海康、遂溪等旧雷州府三县,以及其他县的沿海地带。雷州话内部有差异,恐怕跟移民来自福建不同地方有关,如廉江横山有边擦音[ɬ],可能来自旧兴化府(现莆田、仙游两地);而海康、徐闻等处的雷州话,与闽南话关系较密切。

关于雷州话的定型期,《中国移民史》有段话值得注意:“现代闽语区的雷州片,包括今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中山(中山闽语归入雷州片,尚待商榷——引注)、阳江、电白、吴川诸县市,其中的大部分地区宋代都已具有相当数量的福建移民。文献载:绍圣年间(1094-1098年)南恩州(辖今阳江、阳春、恩平等县)‘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特别是州治所在的阳江县,‘邑大豪多莆(田)、福(州)族’。化州(治今县)也不例外,‘化州(城)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州治所在县如此,下属县也同样。清代吴川县的巨族吴、林、陈、李各姓,祖先都是在宋代由福建沿海迁入的。由于福建籍人民已是雷州半岛汉族人民的主要部分,当地人民‘平日相与言’均是闽语,闽语区雷州片已基本形成。”^②可见,雷州话成形于唐(后期),定型于宋。

2. 客家话的来源

客家人大量移居雷州半岛,当始于19世纪中叶四邑地区土客械斗后,原定居该地区的客家人被迫迁往高州和雷州,以信宜、徐闻两县最多,雷州半岛北部的电白、吴川、廉江三县的北部山区也有不少客家人。李如龙也认为,这次移民“是历史上客家人入迁粤西以来人数最为众多,时间最为集中的一次移民运动,它对粤西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③

当然,清初甚至明代也可能有少量客家移民进

入雷州半岛,如《吴川县志》卷十《纪述·杂录》曰:“迨明中叶来自新会者,多住西山……他邑迁移,间一二耳。”但其“来自新会者”,主要还是粤语区的居民。^④所以,真正成规模的客家移民,当属同治年间因土客械斗导致的强制性的官方迁移。

3. 粤方言的来源

前引《吴川县志》说明,雷州半岛与广州地区的频繁交往始于明代中叶。雷州半岛古属合浦郡,是俚、僚等古代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此前与汉人的交往多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后来闽、客移民逐渐进入,促进了这一带的经济发展,也开始了这一带汉化的进程。粤语居民来得较晚,多从事商贸,集中在雷州半岛北部的城镇商埠,甚至把早期居民排挤出去。今廉江的廉城镇、安铺镇,吴川的梅菪镇都是有数万居民的商贸中心,镇内几乎清一色地通行白话,就是在这种移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湛江近郊一带仍通行雷州话,而在市区白话占绝对优势,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雷州方言的文化内涵

(一) 地名中的文化内涵

据《岭南古史》引《宋书》的记载,“历代王朝苦于南裔各民族的暴乱,若考其暴乱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地方官吏的欺凌,一是其风俗习惯遭到严重的干预,”^⑤统治者对付民乱的办法,无非是强力镇压和减缓剥削以安抚民心,因而地名上亦流露出统治阶级力求安定南方的意愿。如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海康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以雷州改置海康郡,西面又设海康所,“海康”应含“海域安康”的寓意,类似的地名还有湛江的“民安”、“太平”,徐闻的“海安”、“广安”,雷州的“太平”、“平定”,廉江的“永安”、“新安”等处。

雷州市现有不少闽语地名,这些地名是闽人在当地长期生活留下的历史见证。突出的例子是有许多小地名皆称以“-仔”,这在粤语地区较少见,例如:井仔、网门仔、下寮仔、六洲仔、坑仔、下六仔、东塘仔、英龙仔、坛头仔、坡仔、新坡仔、调错仔、贤洋仔、塘仔、培家仔、油河仔、东村仔、新村仔、迈创仔,等等。邻近的遂溪县也有类似的地名,如“钗仔、石塘仔、打铁仔、坑仔、铺仔、分界铺仔、牛圩仔、湾仔、田头仔、坡仔、后

坡仔、黄川仔、石滩仔、那梭仔、石坑仔、急水仔、岭尾仔、迈典仔、河图仔、苏村仔、陈村仔、崖村仔、黎角仔、平重仔；廉江有：营仔、下长福仔、高塘仔、高坡仔、高田仔、元岭仔、铺仔、墩仔、新塘仔、莲塘仔、新围仔、尖仔，等等。粤语地名不太用“仔”字做词尾（粤语“仔”读[tsei]，多用于指称人，是“儿子”或“男性青年”的意思，也可以指物），而雷州半岛的“仔”音[kia]（本字为“团”），在闽语中既指“儿子”，也可以作为小称，在地名中使用，往往指很小的村落（或地貌，如“坑仔”指“小坑”），有时还与另一旧地名相对而言，如“迈创仔”与“迈创”、“新村仔”与“新村”（雷州）；“后溪仔”与“后溪”、“陈村仔”与“陈村”、迈典仔与“迈典山”（遂溪）；“下尾仔”与“下尾”、“博爱仔”与“博爱”（徐闻），这些带“仔”的地名可能是从原地名（如“迈创”等）衍生而来的。此外，有些地名只有用闽语来解释才豁然通顺，如“山狗空”，“空”闽语指洞穴，“山狗空”在雷州西部靠海处，当是早期荒凉冷清，野狗出没之地。

电白县今行政上从属于茂名市，与高州、两阳接近。电白有“那霍区”，小地名则有：那庄、那贞、那楼、那银、那尾、那笈、那菴、那关坡等。“那”是壮瑶语的成分，意为“田”，雷州以北的四邑、两阳地区非常多见，如恩平的那吉、那龙，台山的那扶、那金，鹤山的那白、那水，新会的那伏，还有化州的那务镇，高州的那射山。雷州市所辖的各县市，也有不少以“那”为开头的地名，例如雷州的那南、那尾、那金、那毛、那澳、那利、那宛、那平，遂溪的那杰、那梭尾，徐闻的那利、那黄下、那骆坑、那汤、那潭、那郎、那屋、那山、那练、那种、那七，廉江的那榕、那毛角、那亭、那牌、那交、那特、那彭、那腮、那贺圩、那梭圩、上那顶、下那福等，说明古南粤民族的壮、瑶这一支系的行踪，一直来到雷州半岛一带（有些地名甚至可能直接反映这一点，如廉江的“瑶仔”）。

雷州半岛还有不少地名，汉语的语义未明，笔者揣测应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如各地都有以“迈”开首的地名（迈典、迈创、迈陈、迈奴、迈塘），以“菴”结尾的地名（梅菴、那菴），值得好好探究。

（二）方言词语中的文化内涵

雷州诸方言使用的一般词语（包括俗语谚语），体现出不同次方言文化圈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反映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实况，是雷州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财产。

1. 雷州方言中的海洋文化

雷州半岛面对大海，渔业发达，一般词汇中即有丰富的鱼类名称，显示海康话中浓厚的海洋气息。例如：鲛鲙（真鲷）、鲮鱼（弹涂鱼）、蛇（海蜇）、魮鱼、（海鲳鱼）、笠鱼（乌鱼）、大头鱼（鱮鱼）、水乞食（水虱）、白痣鲨（星鲨）、角螺（海螺），等等，举不胜举。即使在口语语汇中，也有许多熟语与海、与水相关，如“红膏赤蜃”（红光满面）、“无孔讨鲮”（无事生非）、“乜竿都背来海”（滥竽充数）、“合水蜆口化瘦”（像水马儿那样瘦）、“日头落水”（太阳下山，雷州半岛东西两面临海都映射出雷州半岛独特的地理特点）。

2. 雷州方言中的山地文化

雷州一带的客家人多依山而居，山地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相对于雷话，俚话的渔业词汇稍微贫乏，但由于农业、畜牧业较为发达，客家方言产生了丰富的相关词语，出现了一批特有词。例如廉江石角客话“米酒汁”专称为“酒娘”（不少客家话亦如此），把“已婚女子”称为“槟榔婆”（显示种植业在家庭生活的重要地位）；电白沙琅客话“人死后埋葬”谓之“上山”（或“壅”），“扫墓”则谓之“铲山”，家畜雌性分“嫫”（已成年）和“处”（未成年），如“牛嫫”（母牛）、“牛处”（小母牛）。而口语词中的俗语、谚语则较多与农事、动物相关，以下举电白沙琅客话的一些例子：

花头鸭（比喻专做坏事、出了名的人）

早禾鸭（比喻短命的人）

瘦猪嫫屙硬屎（死要面子）

鸡笼盖花被——外头好睇，底背空（华而不实）

迟鸭无肉，迟禾无谷

3. 雷州方言中的传统文化

在雷州诸方言中，不时可见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1）雷话等方言保留较丰富的古汉语单音节词。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而现代汉语普通

话已发展成双音节词甚至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但是,在雷话等南方方言中,单音节词依然十分常见,例如雷话:厝(房子)、喙(嘴巴)、骹(脚)、涂(泥巴);电白哎话有:索(绳子)、禾(稻子)、朝(早晨)、颈(脖子);吴阳和电白白话也有:屋(房子)、索(绳子)等,不一而足。

(2)雷话等方言保留许多古汉语的词义和用法。雷州诸方言中有不少词语和语义仍与古汉语一脉相传,如上述的“索”、“禾”、“颈”等,常见的还有雷州雷话的“拍”(打)、“市”([赶]集)、“箸”(筷子)、“共”(和)、“晏”(晚);电白雷话的“行”(走)、“囤”(藏)、“沃”(浇灌);电白哎话的“爽”(畅快)、“着”(穿)、“箸”(筷子)、“镬”(锅子)、“木”(树);电白白话的“饮”(米汤),等等。

(3)雷话等方言的词语反映传统的民俗、民风。雷话把日常的三餐“饭”都叫做“糜”,早饭叫“早糜”,午饭叫“日昼糜”,晚饭叫“冥昏糜”,反映了早期雷州半岛生产力低下、老百姓温饱不能解决只好三餐食“糜”(古汉语“糜”的本义为“稀粥”)的状况;雷话称“桌子”为“床”,也是源自上古的汉民族习俗。

三、雷州方言与周边语言(方言)的关系

(一)雷话与母方言割舍不断的关系

雷话来自闽地,不仅有历史、地理方面的证据,而且有语言本身的证据,显示其与母方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皆可得到证实。

1. 语音上保留许多古音特点,如轻唇读如重唇、舌上读同舌头、部分匣母读同见母,这些闽语的重要特征在雷话中都能见到,例如:

	肥奉	茶澄	迟澄	张知
雷州 _{雷城}	pu ¹¹	tɕ ¹¹	ti ¹¹	tiɔ ³⁴
徐闻 _{徐城}	ʔbui ¹¹	ʔde ¹¹	ti ¹¹	ʔdiɔ ³³
湛江 _{东海}	pu ¹¹	tɕ ¹¹	ti ¹¹	tiɔ ³⁴
廉江 _{横山}	pu ¹¹	tɕ ¹¹	ti ¹¹	tiɔ ³⁴
电白 _{电城}	pu ¹¹	tia ¹¹	ti ¹¹	tiet ³³

匣母读同见母以电白_{霞湖}雷话的读法为例:咸 ki^{am22}、行 kia²²、厚 kau⁴³、滑稽 ku⁷。

2. 文白对应整齐。汉语不少方言都有文白异读

现象,反映不同的语音层次,但像闽语那样有异常丰富、成系统的文白异读,其他方言尚未见到。雷话也有严整的文白对应,与福建闽语基本相同。如雷州_{雷城}话的文读和白读:

	饭奉	夫非	蜂敷	妇泰	三添	山算	生
文	baŋ ⁵⁵	hu ²⁴	hoŋ ²⁴	hu ³³	hu ¹¹	sam ²⁴	t ¹ iam ²⁴
	saŋ ²⁴	suaŋ ²¹	saŋ ²⁴				
白	pu ¹¹	peu ²⁴	p ¹ ar ²⁴	pu ³³	peu ¹¹	sa ²⁴	t ¹ i ²⁴ sua ²⁴
	sui ²¹	se ²⁴					

3. 电白东话、廉江黎话有许多古代的心、邪、生、书、禅、船、崇母字读边擦音ɬ,而周边闽语则无此声母。电白、廉江这类闽语之所以有ɬ这一独特的声母,与移民的成分有关,水东、廉江一带的早期移民,不少是从福建莆田迁来的,跟其他闽语区的移民来源有所不同,因此,有学者推论“粤西闽语中的ɬ的形成,其原因之一就是福建莆田话中带来的”。^⑥

4. 雷州话也有很多词语直接来自闽语,体现出词汇上的闽语特性。例如:厝(房子)、巷团(胡同)、乞食(乞丐)、团(儿子)、摆骹(瘸子)、胡蝇(苍蝇)、[物]配(菜肴)、[k¹io](拣、收拾)、跋(摔倒)、八(认识、懂得)、洩(稠)、偁(瘦),等等。

5. 在语法上雷话亦体现出闽语的特色,如有小称词尾“团”、有正偏式的结构(如“母鸡”称为“鸡母”、“公猪”称为“猪哥”)、第三人称代词为“伊”、被动式标志用“乞”[K¹i]等。

(二)雷州诸方言的外来借音、借词

尽管雷州话是闽方言的分支,但是由于它来到雷州半岛的时间较长,难免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变异;而雷州半岛的客家、粤方言,也产生相互的借用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格局。

1. 雷话受外来因素影响的语言证据

雷话有不少非闽语的成分。如:雷话非组及疑母(白读)多读浊塞音b,这大概是黎语的影响使然(海南闽语也有b);徐闻_{徐城}雷话则有两个带喉塞的声母ʔb、ʔd,而带喉塞的声母ʔ-在黎语诸方言中普遍存在;电白海话(属闽语)知组字往往有文白异读,其白读是闽语的层次,而文读却是粤语的层次,如“展”白读为[tiet³¹],文读为[tsiet³¹],“耻”白读为[tɕ³¹],文读为[tsi³¹];雷话有两个名词

词头[bɿ³¹](人名背称)和[nɿ³¹](亲属称谓)恐怕也是非汉语的成分;雷话“小孩”叫[^onoŋ],跟壮侗语的[noŋ](弟弟)很相似;雷话中还有一些其他汉语方言的词语或用法,如海康雷话的“碱”(或“番鬼碱”,肥皂)、“倾偈”(谈天)、电白雷语的“托手踭”(暗中捣乱)、“车大炮”(吹牛),皆明显来自粤语;电白雷话表给予义的“分”(分两万钱我)显然来自客家话,表动物雌性的词尾“婆”(鸡婆、狗婆)也可能来自客家方言。

2. 客家话受外来因素影响的语言证据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指出:“粤西客话词汇和粤东粤北不同的条目中,许多明显是受粤方言影响的结果。粤西地区粤、闽、客三种方言杂处,在数百年的交往中,接触一定很频繁。”该书拿粤西客话350条特色词语与粤语比较,发现竟有200多条跟粤语相同,占57%,作者认为“这就足以说明粤方言对粤西客方言的影响,也说明这正是粤西客方言词汇的特点。”^①例如:淋(雨)、禾秆(稻草)、矮瓜(茄子)、飞鼠(蝙蝠)、hie(女阴)、饭、nuŋ(锅巴)、一涿屎(一泡屎)、马骝(猴子)等。此外,粤西客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也有些是粤语作用的结果,如廉江石角“抽厘”叫做“柜桶”,“乱讲”谓之“乱ŋap”,电白沙琅“点头”叫“ŋep头”,皆与粤语相同。

《电白方言志》也指出:“哎话受粤语的影响很大,借用了不少方言的常用词。”^②作者认为以下词语皆属借词:睇、靚、啱、咁、遮(伞)、咧、割、乜嘢,当然还需斟酌,不过也反映出粤语对电白客家话有深刻影响的事实。

但是,雷州客话似乎并非仅受粤语的影响,有的客家话里也有闽语词,如电白哎话“米汤”说“饮”,显然来自雷话的“饮”[am³¹]。

3. 白话受外来因素影响的语言证据

虽然白话是广东的强势方言,但在雷州半岛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接受异方言的影响亦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资料较缺乏,这里主要举电白白话为例。

电白^{羊角}白话的日母读为ɲ,日母在典型粤语中应读j-,而客家话日母则多为鼻音声母ɲ或ŋ,反映了较古老的语音层次,综观电白^{羊角}白话周边的客家话,日母正是读鼻音ɲ或ŋ,因此,电白^{羊角}白话

的ɲ属非粤语的成分。在韵母方面,电白^{羊角}白话没有撮口韵y-,相应于广州话的撮口韵y-,白话皆读为齐齿的i-韵,这跟周围的闽、客方言没有撮口韵y-有直接的关联。在词汇方面,电白^{羊角}白话有不少与广州话不同的词语,这些词语大多可以在邻近的雷话、哎话找到同样的说法,可视为外来影响,例如“玉米、手套、米汤”说成“包粟、手笠、饮”,与雷话相同;“树、橄榄、妹妹”说成“木、黄榄、老妹”,与哎话相同;“萝卜、雨衣、抽厘、钢笔”说成“菜头、水衣、拖桶、水笔”,与雷话、哎话相同。

①⑧戴由武等《电白方言志》说,旧时正话“似乎与桂林等地的‘平话’较接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②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85页。

③李如龙等《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④《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380页指出:“从清代后期土客械斗的资料来看,新会虽受迁海的影响,却未有客家迁入。也算是一个基本没有移民的县份。”

⑤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58页。

⑥何科根、李健:《谈粤西闽语中声母X的问题》,《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⑦李如龙等《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91页。

主要参考文献(已见于注释者从略)

张振兴《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方言》,1986年第3期。

张振兴《广东海康方言记略》,《方言》,1987年第4期。

张振兴、蔡叶青《雷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蔡叶青《雷州话方言词典》,海康县文联,1989年。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林伦伦《雷州(海康)话语法特点述略》,《第二届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林伦伦《广东闽方言研究述评》,《第三届中国国际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1月香港。

林伦伦《粤东粤西闽方言词汇的同与异》,《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责任编辑:陶原珂

“教坊丁大使”考释

赵晓涛¹ 刘尊明²

1.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上海 200433
(2.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刘克庄评柳永词“有教坊丁大使意态”。“丁大使”即北宋中后期教坊大使丁仙现, 主要活跃在神宗熙宁至徽宗崇宁数十年间, 本为市井艺人, 后入教坊, 至迟在熙宁二、三年间提为教坊使。丁氏擅长乐舞俳优, 秉承了古代优孟讽刺精神; 而柳永词本与教坊乐曲联系密切, 丁仙现亦熟稔柳词, 故后人用“丁大使意态”移来评价柳永词。

[关键词] 丁大使 丁仙现 教坊 柳永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9-0143-04

关于柳永词的品评, 历来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南宋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后村题跋》卷2)云:“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态。”此语与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 虽极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之语如出一辙。

“雷大使”已有人考释, 而“丁大使”则迄今未见揭示, 且其意态究竟如何亦不得而知。而这些无疑是理解刘克庄评柳词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 笔者试对此问题作一考释。

一、“丁大使”乃教坊大使丁仙现

有关“丁大使”的姓名、职官和事迹, 见诸宋代多种典籍的记载, 尽管文字上略有出入, 但可以确定, “丁大使”指的是北宋中后期教坊大使丁仙现。

据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记载:“熙宁初, 王丞相介甫既当轴处中, 而神庙方赫然, 一切委听, 号令骤出, 但于人情适有所离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 且多被黜降, 后来者乃寝结其舌矣。当是时, 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 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 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 必因燕设, 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谑, 肆其诮难, 辄有为人笑传。介甫不堪, 然无如之何也, 因遂发怒, 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 取丁仙现匿诸王邸。二王者, 神庙之

两爱弟也。故一时谚语, 有‘台官不如伶官’。”以上所记为丁仙现嘲谑王安石的故事, 这是有关“丁大使”丁仙现称谓和事迹的较早记载。其中明确指称丁仙现为“教坊使”, 而时俗呼之“丁使”。所谓“丁使”, 也就是“丁教坊使”的简称。至于“丁大使”之称, 则应该是对“丁教坊使”的尊称。教坊是唐代开始设置的一种掌管宫廷音乐的官署, 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百戏的教习和演出等事务。唐高祖时始置内教坊于禁中, 其官隶属太常; 玄宗开元二年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 洛阳、长安亦各设左右教坊二所, 以中官为教坊使, 从此不再隶属太常。宋元两代亦有教坊, 其制度皆沿袭唐制, 设教坊使为长官, 时俗尊称为“大使”, 故有“雷大使”、“丁大使”之称。

在其他宋代典籍中, 丁仙现又作“丁先现”、“丁线见”, 除了称其为“教坊使”、“教坊大使”之外, 还有称之为“教坊长”、“优”或“伶人”的。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条记载云:“街南桑家瓦子, 近北则中瓦, 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 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 可容数千。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 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这里所记载的“丁先现”应该就是“丁仙现”, 是一个混迹于瓦舍勾栏之中的市井艺

人,姓名前未冠以“教坊使”、“丁大使”一类的称谓,反映的当是“丁仙现”早年的生活和事迹。孟元老为北宋后期人,南渡后著《东京梦华录》一书,追记北宋京都风物和市民生活,大多真实可信。又如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2云:“元丰中,神宗仿汉原庙之制,增筑景灵宫。先于寺观迎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备法驾,羽卫前导赴宫,观者夹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先现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挥泪者,都人父老皆泣下。”邵伯温生于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早年逢王安石变法,中年历经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变”,卒于南宋之初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享年78岁。《邵氏闻见录》乃邵伯温晚年所作。此外,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1、吴自牧《梦粱录》卷20等,皆记“丁仙现”为“教坊大使”,朱彧《萍洲可谈》卷3又记作“伶人丁先现”,而范公偁《过庭录》则云“元祐间伶人丁线见教坊长,以谐俳称”。范公偁仕履不详,为范纯仁曾孙,所著《过庭录》多述祖德,记事时间下限到绍兴十七年(1147年),成书当稍晚于此,大致亦在南宋初期。可见丁氏本为“伶人”,以擅长乐舞戏谑表演而被任命为教坊使。所谓“教坊长”即指“教坊使”,至于“丁线见”、“丁先现”,实与“丁仙现”同为一人。

从以上记载来看,以《铁围山丛谈》最为详细。蔡絛为蔡京的季子,官至徽猷阁待制。北宋末年,蔡絛助父专权乱政,导致“靖康之变”的发生,被钦宗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白州境内有铁围山,《铁围山丛谈》一书,即为其南渡之后于贬地所作。一方面,蔡絛早年主要生活于北宋后期,距神宗朝较近;另一方面,其父蔡京历仕神宗、哲宗、徽宗诸朝,且官至显要,熟悉历代朝廷掌故和轶事琐闻。因此《铁围山丛谈》所记“教坊使丁仙现”的事迹,当颇为可信。又按,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年)被拔擢为参政知事,一年以后正式拜相。可知丁仙现为教坊使至迟在熙宁二、三年间,而入教坊自更在此前。

二、“丁大使”擅长俳优之“意态”

丁仙现从一个市井艺人跻身于宫廷教坊并最终荣升为教坊大使,一方面固然凭借的是其擅长于乐

舞和俳优的精湛技艺,另一方面也与他秉承的优孟传统及其所展现的个性风采有关,所谓“丁大使意态”即表现于此。

据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熙宁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献香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伶人丁仙现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视之,乃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曰:“近人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乃有此语。这是丁氏所演杂剧硕果仅存者,故虽吉光片羽,然弥足珍贵。此出戏中丁氏发奇思异想,设想侯叔献死后在地狱仍不忘邀功图赏,以“奈何水浅”为由,献图欲新开河道,重操生前旧业,此处看似荒诞至极,实则蕴涵着辛辣的讽刺。可见丁氏所演滑稽戏,以动作、对白为手段,内容以讽刺世事、滑稽逗乐为主,继承优孟衣冠,“务在滑稽”、“隐于谏诤”(吴自牧《梦粱录》卷20“伎乐”条),其讥刺如绵里藏针,不露声色,有下情上达,反映民意之效。张师正为北宋中后期人,据张师正之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5记载,熙宁丁巳(熙宁十年,1077年),张师正为鼎州帅,时年“已六十二”矣。大致张师正于哲宗朝尚在世,享年应在70岁以上。成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的《玉壶清话》,于卷5中已记载张师正“著《括异志》数万言,《倦游录》8卷”,《倦游录》应即《倦游杂录》,则此书之编撰又当稍早于《玉壶清话》。据此,则张师正大致与丁仙现为同时代的人,其所记丁仙现演出的杂剧当甚为可信。

又据李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记载:东坡先生近令门人辈作《人不易物赋》(物为一人重轻也),或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名帽曰“子瞻样”)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者)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

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逗得皇帝为之开怀而笑，并盯着东坡的帽子看个不停。这里丁氏语义双关，将笑料包裹抖开来，借士大夫效颦于东坡的生活小事，对那种附庸名流而徒具面目、仅袭皮毛的士风进行嘲讽。李廌(1059—1109年)亦为北宋中后期人，元丰年间，曾到黄州拜谒苏轼求教，元祐年间，与苏轼及苏门士子秦观、张耒等人亦多有交游，因杂记师友言论及当朝轶事，成琐闻笔记一卷。其所记丁仙现俳谐之语，既妙趣横生，亦真实可信。

又据范公偁《过庭录》记载，北宋时每逢新拜宰相，教坊使及副使照例要去当庭参拜，并“即事打一俳戏之语”以表恭贺，可得赐绢五匹。元祐三年(1089年)，吕汲公忠宣(吕大防)新拜相，每天以任重为忧，眉头紧锁，未尝少解。丁线见(仙现)携副使丁石一道参谢吕汲公，他装腔作态嚷嚷：“饿杀乐人也，相公！”丁石一头雾水，不解地问：“今时和岁丰，朝野欢乐，尔何饿为？”丁线见话锋一转，故意指着吕汲公道：“是他。着这几个好打哄趁浪，我辈衣食何患！”逗得吕汲公一脸惨淡愁云消散了许多。同书又记载，元祐六年(1092年)，刘莘老(刘摯)拜相，丁线见与丁石同贺莘老。刘莘老因与丁石是同里故旧(两人同是乡贡举人，刘莘老第一名，丁石第四名，丁石亦是才子，后失途在教坊中)，不欲当廷羞辱他，乃引见于书室中，再三慰劳丁石。丁石曰：“某忆昔与相公同贡，今贵贱相去如此，本无面见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废，诚负惭汗。”丁线见为打破难堪的局面，因启相公曰：“(丁)石被相公南巷口头掷下，至今赶逐不上。”刘莘老乐得大笑。以上两条纯为个人的谑浪调笑，丁仙现皆能以轻松的打趣将沉积在不同个人心头的话题或情绪一一化解。从中还可见出教坊人员中不乏功名蹭蹬、仕途失意的有才之士，丁石的遭遇即令人酸鼻。

又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记载：“绍圣初，修天津桥，以右司员外郎贾种民董役。种民时以朝服坐道旁，持挝(引者注：一种鼓槌)，亲指挥工役，见者多非笑。一日，桥成，尚未通行，仙现适至，素识种民，即呵止曰：‘吾桥成，未有敢过者。能打一善诨，当使先众人。’仙现应声云：

‘好桥，好桥。’即上马，急趋过。种民以为非诨，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讥己也。”明《广滑稽》卷29引此则故事时批曰：“意(丁氏)以‘乔才’戏之。”今人任二北先生《优语集》则考释云：“桥”、“瞧”同音，丁氏讥种民朝服持挝，桥边督工，好瞧也。可见丁氏乃借“桥”与“瞧”谐音双关来指桑骂槐，挖苦揶揄贾种民，以表达修桥民众的怨愤之情。又《避暑录话》卷1记载：“崇宁初，大乐阙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言：‘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世人笑。’蔡鲁公(京)亦不喜。蹇授之尝语余云：‘见元长，屡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声终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召众工，按试尚书省庭，使仙现在旁听之。乐阙，有得色，问仙现如何。仙现徐前，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坐客不觉大笑。”此则故事中，丁仙现通过使用有着近乎悖论语言的舛互修辞手法，先扬后抑，先褒后贬，以扬显抑，以褒显贬，一倍其贬抑，巧妙地讽刺了蔡京那种颀顽无知、好大喜功的长官作风。从中亦可见丁仙现不苟合取容，曲意逢迎。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8论此事云：“词(按：指晁端礼《黄河清慢》)中‘六乐初调(角徵)’句，正以谏京。其时朝臣，无不从风而靡。仙现一乐工耳，独矫矫不阿如此。”对丁氏的独立人格赞赏有加。又按蔡京首次罢相在崇宁五年(1106年)，此则丁氏轶事当在蔡京首次罢相以前，为丁氏在文献中的最后出场。

从以上各条有关丁氏的记载来看，丁氏主要活跃在神宗熙宁至徽宗崇宁这数十年间。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个性鲜明。以上见诸宋人杂史记载的有关他的事迹，虽多属俳优戏谑之类，却颇能反映他人格精神的风采。对此，宋人也不无体认和揭示。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云：“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则容貌俨然如士大夫。”又如朱彧《萍洲可谈》卷3亦云：“伶人丁先现者，在教坊数十年，每对御作俳，颇议正时事。”可见丁仙现虽出身卑

微，却嫉恶如仇，勇于批判，嬉笑怒骂，显恶扬善，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伶的讽刺精神和优良传统。

三、柳永俗词与“丁大使意态”

自刘克庄之后，承其声口以论柳词者不乏其人。清代邓廷桢《双砚斋词话》云：“柳耆卿以词名景祐皇祐间。《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猥蝶，取誉筝琶。如当时人所讥，有教坊丁大使意。”然则何以刘、邓二人会将后来者的丁仙现移来评创作活动年代明显早些的柳永的词作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方面从柳永来看，北宋时教坊设置在市井间，柳永“游东都南北二巷”（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1引《后山诗话》），与个中人物交往过从甚密，“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3），多有联袂合作之事，则其词自然与教坊乐曲在相当程度上本是一家亲，难分彼此。诚如清王闿运《湘绮楼评词》评柳永《望海潮》所云“此则宜于红氍毹上扮演，非文人声口”，而冯金伯所谓柳词“令市伶按拍称好”（《词苑萃编》卷2），更是对其文艺意趣的精辟揭示。另一方面从丁仙现来看，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条记载，丁仙现早年曾混迹瓦舍勾栏卖艺，且是同侪中之翘楚。这种伴随宋代都市商品经济大潮而出现的市民文艺新景象，纷繁如雨后春笋，对封建传统思想及生活方式不能不产生巨大冲击。作为弄潮儿的丁氏后来进入教坊，且做到教坊使，则意味着上层的高雅文化对于下层通俗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和吸纳。他以其挡不住的艺术风情征服了统治者，赢得了御前表演资格，为市民文艺的大舞台开疆拓土，促进了

雅、俗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另外宋代杂剧比之唐代参军戏，更加自然地引入燕乐曲调（比之太常雅乐，教坊乐显得轻松、欢快、随和），从而成为有机统一体，其演员在表演时往往和歌舞伎同场。作为教坊乐工头领兼杂剧名角的丁仙现“捷才知音”（吴自牧《梦粱录》卷20“妓乐”条，又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熟稔“骯髒从俗，天下咏之”（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1引《后山诗话》）的柳词，自然也不在话下，趣味相投，接受其影响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柳永词“有丁大使意态”，而且丁大使亦学柳永作词且有词作传世。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据《草堂诗余》后集卷上及《岁时广记》卷10，收录丁仙现《绛都春》上元词一首。此词为仄体，首见于丁氏。现录此词如下：

融和又报，乍瑞霭霁色，皇州春早。翠幃竞飞，玉勒争驰都门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绡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

缥缈。风传帝乐，庆三殿共赏，群仙同到。迢迢御香，飘满人间闻嬉笑。须臾一点星球小。渐隐隐，鸣鞘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这是一首节序时令词，此类词“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枯之声耳”（张炎《词源》卷下“节序”条）。柳永在节序词的创作方面开风气之先，这类词在他之后就走上了“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典实富艳”之路（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丁氏此词亦不出此种风调，有追摹柳词的痕迹。正因为如此，丁仙现的这首唯一的传世之作，还曾经一度被曹元忠误收于《补乐章集》中。

责任编辑：王法敏

《文艺学多棱镜丛书》述评

刘晓春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 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学学科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学术实力的学术群体。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曾经出版了一套《文艺美学丛书》, 初步显示了学科点的整体实力。近几年来, 人文学科越来越处于边缘状态, 不再有往昔的热闹。位于地理边缘的湛江, 却更能够使人沉潜于学术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艺学多棱镜丛书》, 则体现了这个群体近年来的思考与探索。这套丛书中, 有三本著作可以说是作者一系列成果的深入与延续。《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是继《天汉雄风》之后, 作者对中国秦汉时期的审美观与思想史、文化史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 《文学文本理论》拓展了作者关于文本理论的思考, 全面考察了西方以文学文本为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派别, 也是作者继《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后的深入探索; 《道·圣·文论》则是在《中国艺术意境论》的基础上, 以现代文艺学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论体系。另外三本著作则体现了这些作者对于新问题的敏锐关注, 或者运用新视野对于传统问题的重新思考。初次阅读这套丛书, 可以看出这些作者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以问题切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从而使这些著作有了一定的学术关怀与学术深度。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各种理论竞相登场, 众声喧哗, 在这种热闹的场景中, 无论是西方的、中国古典的甚至苏联的文艺学理论, 学者又究竟产生了多少深入的思考和积累? 《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的作者李瑛平希望通过批判性还原, 即用理性眼光平静地将对象放回到特定体系进行观察、分离, 进而把这些思考的亮点作为重建文学理论的根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 作者将秦汉“致用”文艺观放在华夏民

族门客文化和畿服制中央宇宙观、伦理亲源纽带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秦汉文人的文艺观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致用”因素, 总是试图将文艺(甚至生命)当作有效工具, 热切期望效用于封建王朝。这种经世致用的文艺观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艺, 也渗透到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并使隋、唐以后的知识分子滋生了浓重的依附性。本书作者正是试图寻找产生这些因素的文化基因, 并梳理其线索。作者发现, “致用”因素潜藏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包括刺客、客卿、客将、纵横客等)文化中。作者将春秋战国时代门客的心理动机、行为方式等作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其生成、变化过程及其发展轨迹, 从中过滤、筛选某些特定的文化沉积物, 勾勒这些沉积物与春秋战国“士文化”以及春秋早期乃至更早的“畿服制文化”背景之间的隐秘联系。作者的目的在于, 超越一般的古代文艺理论研究, 试图将一般文艺学的问题与思想史、文化史之间建立起逻辑的勾连, 将文艺观的研究还原于观念产生的时代及其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笔者看来, 这种研究方式可能是对文艺理论界目前倡导的“文化诗学”的一种回应吧。

林衡勋的《道·圣·文论》全面反思了中国古典文论现代研究观念, 认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不是现代狭义文学模式, 而是始终囊括有哲学、历史等因素、以道为本体的大文学, 与此相适应, 探讨古典文论现代研究方法有必要把眼光放大到与古典文论同源共生的历史文化哲学领域。作者认为,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运用西方知性思维为基础的狭义文学批评观念对中国文论民族独创性与深层意义的遮蔽。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文论体系的现代构想: “本乎道”(中国文论之道本体论), 这一理论在传递过程中尽管存在着儒家正统派有意

无意的遗忘与转向,但经过回归、还原与发展,总体上仍然呈现出道、儒互补的特点;“作者曰圣”(中国文论之作家论与创作论),圣指得道者——只有得道的圣人才具有作者资格,即道是圣的内容,而“圣”是“作”的主体保证;“道之文”(中国文论之作品论、构成论与文体论),道显现为文,便是五经,文学再“禀经以制式”,从《诗》而来,由于“道”要经由为“圣”的作者用“文”来体现,故中国文学以意境之呈现为最高境界;“观文者”与“闻道”、“知音”(中国文论之读者接受鉴赏论),观文是手段,闻道是目的,能闻道者,则为知音,与西方文论相比,闻道、知音体现出中国独有的作家中心观和民族特色。以文学道本体论的论述为例,作者在梳理文学道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与复杂状况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学道本体论是以中国哲学本体论为基础并与之相对应的,进而论述了与文学道本体论相关的几个重要范畴,如德、性情、意等。在他看来,道与德既是哲学命题,也是伦理学命题,并都与文学本体论有关。他从哲学本体论的本末关系出发,将孔子的名句“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理解为:得道而品质高尚的人,应该有言(言论文章);有言(言论文章)的人则不一定为得道之人。得道的人的言是以道为本体的言,是道之言、道之文;没有得道的人,其言是没有道本体,是非道言,非道文。作者指出,学界对这句话一般得出重道轻文看法,这显然仅仅是从伦理学本体论出发,不全面并有违孔子的原意。全书处处体现出作者在全面、深入思考基础上的辩难、见解。全书读来逻辑清晰,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探索,颇见功力。

一般认为,文本理论仅指解构主义及其相关理论。但是,赵志军的《文学文本理论》却独辟蹊径,将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学派、塔尔图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学派等对文学文本的论述都归纳到文学文本的论述之中,将文本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考察。作者认为,这些学派都将文学研究的中心和对象从作者移向了文学文本,使之摆脱了作者的垄断和束缚。此书将“文学文本”和“语言意识”作为

关注焦点。第一章概述了诗人和小说家为克服语言表征危机而产生的两种语言意识,一种主要发生在诗歌领域中的语言乌托邦意识和策略,另一种则主要发生在小说领域中的现实主义杂语意识和策略。作者认为,这两种语言意识推动了人类对语言性的可能性的探索,语言乌托邦意识在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这种对惟一而绝对的语言的追寻意味着专制和极权。第二章重点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巴赫金的作者理论关于文学作品作者地位的思考,在这些流派中,作者被赶到了文学理论的边缘,而文学作品进入了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文本表明了诗和小说的产品已从作者的专横控制中摆脱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作品的概念是保守的,而作者的概念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放,有必要用文本概念取代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理论通过主体移心,将文本意义的控制权从作者手中抢夺回来,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成了文学文本理论的中心任务。接着,作者运用大量的文本分析,考察了诗歌文本中的语言乌托邦和小说文本中的语言现实主义。作者比较全面地把握了西方文本理论,对文本理论的梳理、评述显示了作者的理论思辨能力,而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则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致的文本分析能力。

在国内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领域中,究竟哪位作家是第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王钦峰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在对不同观点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博尔赫斯及其作品的典型的后现代特征的显现,要早于贝克特、罗伯-格里耶和乔伊斯们,他更有理由作为第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作者的出发点在于,他把后现代主义小说看作是一种悖谬的、矛盾的现象,无论在出现的年代还是在其内涵、可辨认的形态上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复杂性,而不应该将后现代主义小说当成与现代主义或传统规则完全对立的一种事物来思考。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绝非“二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而是伴随着整个现代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并最终取得主流地位的一种文化文学现象。畅广元认为,这种能成

一家之言的视界、研究态度和治学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将历史叙述和逻辑分析结合起来，既考察了后现代主义小说萌生、发展、变化的曲折轨迹，也研究了其模式、特征、性质。作者将后现代主义小说模式、特征归纳为无穷后退、迷宫手法、空洞化、非真实的安全世界等，都不失为独到的认识。

李新灿的《女性主义视野观照下的他者世界》的最大特点，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从魏晋文言小说到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作者重点探讨了婚姻制度、情感历程、贞洁问题、嫉妒问题等，由此深入女性的情感世界，考察其所遭受的压迫与苦难、抗争与追求，以揭示妇女问题的社会根源。由于作者把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放置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语境中予以思考，使此书在系统性、专题性地梳理传统材料、探讨古老话题的过程中，渗透着强烈的现代性。作者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既全面、充分地评述论题，又能够做到条分缕析、层次井然。如第四章论述风尘女子部分，作者首先论述女性沦落风尘的原因，随即论述风尘女子的苦难，最后论述风尘女子的人生结局。本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作者掌握了大量丰富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在他看来，考察历史与文化话语中建构的女性形象，可以了解形形色色的女性问题，有助于使人类社会趋于理想的生活模式和生存状态。

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阐释焦虑，却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多元的主义与问题，在现实社会问题面前，显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分化。杨颢《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与其是考察90年代的中国文论，毋宁是从文论转型的视角考察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较早成果。正是这种学术

视野，使本书的眼界开阔，能够在比较宏大的背景下考察一个特定时段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本书重点考察了90年代的文论转型，对90年代的后形而上学知识观、新写实主义、新表现主义、90年代的文论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讨论与“新启蒙”、“新理想”主张、以及9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个人化与多元化追求等诸多现象进行了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困境与转型”的思考与探讨。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确认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依据，在他看来，认同白话文传统、追求工具(科学)理性与历史理性共同支配下的科学化知识形态和具有较强逻辑性与体系性的论述模式、提倡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有鲜明的学科独立性追求等，是从五四至80年代中国文论家们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目标，90年代文论的兴起正是通过反思和修正上述文论现代性追求而形成的。90年代中国文论现代性目标之所以受到反思和修正，主要是由于这一追求在当下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状况中暴露了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危机与困境，进而推动了重构与转型，这些危机和困境包括文论自性危机、文论知识合法性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启蒙主义文学理想危机、主体性的危机和效用危机等。整本书体现了作者对当下问题的敏锐把握，尽管讨论的是当下问题，但作者在很多问题的讨论中还是能够与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使自己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意识。

总之，这套丛书的作者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相信有兴趣的读者在与作者的对话中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责任编辑：呼 韩

试论华文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王功平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讲师,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素质教育研究已遍及我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乃至幼儿教育, 但对于华文教育的素质教育研究尚不太多。本文着重论述了华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系统性和实践性。

[关键词] 华文教育 素质教育 必要性 系统性 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9- 0150- 04

一、必要性

1. 知识经济社会的要求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智力)资源为第一生产要素、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 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其关键是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必须是创新型人才。他们必须能够面对竞争多变的未来社会, 善于抓住机遇, 追踪占领科技发展的前沿, 并能够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条件, 以迅速适应变化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 及时做出正确决策, 求得自身的发展。他们除了要有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较强的运用知识的能力外, 更要有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良好道德品质、广阔的国际视野。华文教育只有实施素质教育才能将华侨华人培养成符合此种要求的国际型、开放型人才。

2. 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信息时代的到来, 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信息产业继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后, 成为各国国民经济中的第四大产业。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集成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我们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等正因此而发生重大变革。第四届世界华商大会以“电子通讯与资讯新技术对环球市场的影响”为主题, 以“华粹展北美, 商网结全球”为口号。^①这表明海外华侨华人要想在 21 世纪有更大的作为, 就必

须具备熟练运用计算机和其它多媒体技术, 有效地获取、评估、组织、保持、诠释和交流信息的本领。这一任务也只有靠素质教育才可完成。

3. 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教育国际化是指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当今, 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以确保自己的教育在国际上的中心地位。面向世界的教育, 不仅有自身的教育生存发展问题, 还关涉到我国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表一可知, 我国每年的出国留学生人数在持续上升, 其中 1999 年的人数是 10 年前(1989 年)的 7 倍, 是 20 年前(1978 年)的 27. 6 倍。如果按人均 25 万元人民币计算, 则仅 1999 年我国就有约 40 亿元的资金流向国外教育。当然, 表一也显示我国接受来华留学生人数在逐年增加。但如果我们不抓住办学的生命线——提升教育质量, 入世后, 随着我国教育市场的开放, 该优势将会被别的国家“抢摊”。所以, 我国的教育, 必须根据本国国情, 走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之路。其中的一个特色是进一步拓展华文教育, 并实施素质教育, 以提升教育质量, 打造我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品牌, 以华侨华人作为桥梁, 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华留学。

表一, 1978——1999 年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和来华留学生人数统计。

年份	出国留学生(人)	来华留学生(人)
1978	860	
1979		590

1980	2124	1439
1985	4888	6061
1986	4676	6174
1987	4703	2044
1988	3786	1854
1989	3329	1393
1990	2950	6291
1991	2900	9828
1992	6540	14000
1993	10742	18000
1994	19071	22000
1995	20381	32758
1996	20905	41211
1997	22410	43712
1998	17622	43084
1999	23749	
合计	171636	250439

(资料来源: 叶礼奇、陈悟朝: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年。)

二、系统性

这里的系统性, 指在华文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时, 妥善处理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西方现代文化教育、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教育的个性化与教育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

1.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科学一直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力量, 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源。然而科学教育被过分强调, 而人文教育受到冷落, 其结果是: 人性坠落、道德恶化、物欲横流、暴力横行、生态失衡。而实际上, “科学只是给人以力量, 有助于我们去掌握方法”, 而“人文学科在所有的方面都高于科学, 而且, 这已是被西方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⑧因此, 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人文教育复兴的热潮。如博伊竭力呼吁: “教学内容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学科范围本身, 还要在课堂上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⑨其实, 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如同鸟的双翼, 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为防止重蹈历史的复辙, 一种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人文主义”教育应运而生。^⑩这也正是华文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南。当代人文主义教育观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观有所不同, 它重点提倡如下伦理价值: 理解与和平、人的尊严、自由与责任、敬重自

然等。两者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相加,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问题, 而是一种相互渗透, 相互彰显, 相互促进的过程。

2.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西方现代文化教育

中西方文化各自有其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一般来说, 西方文化崇尚“民主”与“科学”, 重视个人的价值而忽视群体的价值, 重视发挥人的独立性、批判性、开拓性和创造性, 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它在创造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同时, 也造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的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轻个性、轻科学、轻质疑等缺陷。但其重视群体的价值, 重视人伦和秩序, 讲求中庸和谐, 天人合一, 特别是堪称其中精髓的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 对于 21 世纪完善人的性格、情操、行为和心态, 净化心灵, 净化社会, 以及对于促进现代科学技术中局部与总体、客体与主体、精神与物质、人与宇宙自然相沟通相统一的新的发展模式有重大意义。1988 年 1 月, 全世界 75 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 “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头 2500 年, 去吸取孔子的智慧。”^⑪所以, 华文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内容, 既要包含西方现代文化, 更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3. 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

心理学家艾里蒂在对创造性进行综合性研究后认为, 创造性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综合物——一个无意识思维的、原始的、无理性的方面与有意识思维逻辑的、有理性认知方面的综合体”。^⑫后者包括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思维力等智力因素: 前者包括灵感、直觉、意志、情感、动机、兴趣、欲望、本能等非智力(主要是“情商”)因素。以往的教育大多是指以传授理性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即逻辑认识能力和逻辑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唯理性教育。而戈尔曼等人认为, 人的成功要素中, 智力因素(智商)只占 20%, 而 80% 则受其他因素(主要是情感因素——“情商”)的影响。^⑬显然, 为培养在未来社会成功的华侨华人, 华文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必须发展学生的“情商”, 注意实施非理性教育,

将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4. 教育的个性化与社会化

教育个性化,指教育过程中重视个性,发展个性,承认差异,崇尚自由,使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够有所发展,使每一个学生在其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获得成功的体验和自信。教育个性化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基础——发展学生创造性的关键。

但是,自由与自律、个性化与社会化等,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个性化不等于放纵、无秩序、不负责任。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第四次咨询报告中曾写道:“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地生存于世界的,每个人都应当自觉意识到所肩负的建设国家和社会的重任。为此,必须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包括培养全心全意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精神、尊重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精神,以及对他人他物和异质性、多样性的宽容之心。”^⑧

华文教育的素质教育在确定价值取向时,应该融合教育目的“个性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的精髓,达到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鼓励学生天才、能力和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而不助长个人主义,从而培养出既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性,又有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的新人。

三、实践性

1. 转变华文教育观念

华文教育观念的转变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指转变教育价值观——当代华文教育不但要传承过去,接纳现实,更要设计未来。新人必须能够迎接21世纪“三个世界——技术的世界、无边界的世界和两极分化的世界”的挑战。^⑨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微观上就必须实施以个性发展为基础、以创造力的培养为核心的素质教育。

2.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革新的关键,要提高学生素质,必先提高教师素质。华文教师素质包括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每位教师的个体素质两大方面。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包括:年龄结构(老、中、青)适当,职称结构(高、中、初)合理,地域结构(亚、美、欧、澳、非)协调,背景知识结构(文、理、工、农、医)兼顾。华文教师个体的素质主要包

括: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既热爱祖国,又仁爱全人类;具有渊博的知识——既能文(人文),又能武(科技):既通中(中国文化),又通西(西方文化)。具备很强的各种能力——既有高智商,又有高情商;既会教书,又会育人;既会合理传承,又会大胆创新。具有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体魄强健、精神振奋、心胸豁达、意志坚强。

3. 丰富华文素质教育教学内容

经过广大学者的多年努力,华文教学的内容得到了不断的改进。由原来的读汉文、写汉字,到现在注重学生汉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还有些学者提出要突出汉文化的主导地位。但现在的华文教育,特别是海外华文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汉语言文字教学,大多数华侨华人学生只是能运用汉语进行交际,对中华文化至多也是一些表面的、常识性的了解,还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心性的体验,更很难以指导自己人格的提升和人生的发展以及人类问题的解决。为此,必须加大中华文化教育的力度。一方面,要加重中华文化精华的比例,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文化要素,真正做到文化教学寓于语言教学之中。如词汇教学,尤其是成语教学,不但要求华裔学生会读、会写、会用,而且要领会其中的深刻文化内涵。阅读教学,不但要求华裔学生会做题目,会划分文章层次,会抓文章的中心,而且要能够辨证地提取文中的中华文化要义作为自己立身和处世的理念。

4. 优化华文素质教育方法

实施华文素质教育首先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将其与以往的所谓“应试教育”相对立。因为“新的教育形式是既存的教育形式的增加,而不是取代原有的教育形式”。^⑩因此,华文素质教育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借梯上楼。二是自从提出素质教育改革以来,涌现出了许多新方法,像愉快教育法、成功教育法、情景教育法、希望教育法、个性教育法、创造教育法、疏导教育法、对比教育法、典型教育法、个别教育法、感染教育法、预防教育法、冲突缓解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于华文素质教育。但在引用时,一定要考虑到华侨华人学生的年龄、性别、个性、兴趣、爱好、动机、所在国籍以及文

化背景等诸多因素, 适人、适时、适地地采用。

其次要采取自我教育法。素质的根本特征是内在性, 即表现为人的品质的深层底蕴。因而决定素质的形成必然是个内化的过程, 也就是把外部的东西转化为内部的东西, 客体的东西转化为主体的东西。这一过程的实现, 关键在于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自律性, 即自我教育。人的内心都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 从“自省”、“自知”、“自胜”, 直到“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素质教育的效果终究取决于个人的持之以恒的自我教育。

另外, 要大力施行隐性教育法。即重视教师的人格, 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活动、学校的校训、学风等因素对个体潜移默化的隐性作用。尤其是要开展访名胜(如故宫)、探古迹(如长城)、“寻根之旅”、“相约新世纪”等各种实践活动。

5. 完善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

在评价华文素质教育的成效时, 不能单看华侨华人学生掌握了多少汉语词汇, 能否用汉语进行交际, 关键还要看他们是否真正领会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铸就了健全的人格。评价时, 应将知识评价、能力评价和素质评价相结合, 学校评价、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 短期评价(一个月或一个学期)、中期评价(入校至离校)和长期评价(工作多年

以后)相结合。

①林振淦:《海外华人经济与世界华商》,《世界经济文化年鉴》,1998—1999年,世界经济文化年鉴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②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9页。

③博伊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国家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2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47、277页。

④UNESCO 报告《学会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75—88、422—423、39页。

⑤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⑥邵瑞珍:《教育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

⑦戈尔曼(美):《情感智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⑧临时教育审议会(日)《关于教育改革的第四次咨询报告》,瞿葆奎主编、钟启泉选编《教育学文集·日本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⑨Victor Ordonez, What Type of World? IR, Fifth UNESCO—AECI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99.

⑩Wilson, H. C. On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J]. In Kinball, S. T., Burnett, J. H(eds.), Learning and Culture, Proceedings of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211—241.

责任编辑:陶原珂

On the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ang Gongpi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at the main position for cultivating Chinese overseas in the new century. Meanwhile it is a breach for Chinese education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test after China enter WTO. The research of quality education has extended all over basic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vocation education and children education at pres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quality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considerably littl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ses the necessity, system and practice of quality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quality education; necessity; systematicness; practicality

广东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形式

冯增俊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本文以“基本形式”为题, 探讨广东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实现的基本策略和途径等。

[关键词] 高教大众化 基本形式 广东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9-0154-04

中国高等教育自1998年后开始扩招, 从当年招生108万人, 到1999年招160万人, 2000年扩招达220万人, 2001年又招生250万人, 预计近年内将达到年招生300万人的相对稳定规模。如此大规模扩招, 使中国的高教发展局面呈现出空前活跃态势, 引起中外广泛关注。

按国际公认的高教发展界定, 高教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以上, 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预示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将进入重大发展时期的可喜征兆, 也表明新发展阶段到来过程中将给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 需要做出重大转型以适应之。

一、广东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高教大众化不是在入学人数的简单增长, 而是教育发展的一种阶段性发展, 是新模式代替旧模式的教育革命。20世纪百年的发展证明, 各国之所以发展高教, 实施高教大众化,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工业化运动的推进; 第二, 民主化运动, 民众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其中, 经济发展的推动是最主要的, 最根本的。20世纪高教大众化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现代化模式, 其中与高教相关的有三种: 一是经济与高教互动发展模式, 如一些主要发达国家, 马丁·特罗讨论的主要是这种模式。二是经济带动高教发展模式, 即经济发展了高教就随之发展, 反之亦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教发展基本上受制于经济。三是

高教带动经济发展, 即通过发展某种形式的高教, 推动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如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当今的印度等。从后发展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经验看, 一是只有采用第三种模式的国家, 经济才会有较稳定的发展后劲; 二是发展高教的同时要改革高教, 大力推动高教的时代转型, 推行科技教育为主的发展模式, 改造文科。印度正是在70年代后实现了高教模式的根本转变, 从而取得了今日的发展成就。广东乃至中国推行高教大众化, 也应关注当代高教的现代发展, 使高教大众化健康发展。广东自鸦片战争以来, 进行了许多惊天动地的革命, 但是, 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 广东往往较多具有的是先锋作用而缺乏榜样意义。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二、广东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形势

广东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发展规模过小, 与广东高速的经济增长严重不相适应。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需要大量的新型高级人才, 一方面是原有人才要提高并实现功能转型以适应经济水平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是人才总量需求在大幅度提升, 而且在信息化的推动下, 人才需求开始从需求中专毕业生到大专以上毕业生过度。据广州南方人才交流中心资料显示, 广东1999年10个热门行业的高级职位人才几乎无人应聘或无法招聘到合适人选;^①广东自1995年后, 高级人才需求量高居全国榜首。2001年仅广州市对应届高校毕业生总的需求

又跃历史新高,市属单位上报需求量已达15703人,而广州生源只有9269人,^②其中需求本科以上的职位占90%,但广州生源只能满足其中的43%。又如高中教师,广东1996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的需求随之大增,但高中教师的培养尚不受重视,主要由华南师范大学等数家高校承担,生源与实际需求是1:10以上,许多用人单位只好到全国招聘。此外,广东教育资源开发不够,对经济需求也带来影响。高校扩招,无疑给广东发展带来福音,受到广东各方面的普遍欢迎。

在高校扩招推动下,广东兴起大办高等教育热潮。一是扩大高校办学规模,广州几所老校都急剧扩大招生数额,尤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为甚。二是兴办新校区,其中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珠海校区,华南师范大学的增城学院和南海学院、广东商学院的三水校区等为典型,新校区的创办,有力地缓解校园狭窄的困难,为扩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各地政府大力支持创办新校园区,如珠海市创办的大学园区,已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落户;深圳大学城已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并有意延伸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东莞市和广州市也提出创办以高科技为主体的高科技大学园区的设想,东莞市已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四是创办新校,如各地大力兴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发展私立高校,其中尤以顺德市职业技术学院出手迅猛,发展形势令人侧目。1999年广东省审批的私立专修学院已达50多所。这些都反映出广东高教大众化发展已进入异常活跃的新时期。

三、广东实施高教大众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大跨越式推进高教大众化的进程中,广东高教将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1. 高等教育发展观的时代挑战

广东高教大众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与挑战是高等教育的观念更新。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仍然保持较活跃态势。尽管广东高教有重大发展,但对经济支持并不明显,至少尚未见到影响全局性的重大动作,其关键是高教办学观念创新太少。从纵向看,广东高教至少有过

两次重要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是80年代中后期,当时完全可以凭借广东独特的经济优势,引进人才发展关键性新学科,从而构架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世纪框架,从根本上改革广东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态势。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为广东高教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广东高教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和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条件,一是独立高考命题,改革广东高校招生制度,实现从统一高考向相应的社会性考试与高校自行招生相结合的新高考制度转型,促进广东基础教育改革,为广东高教提供优质生源、创造最佳发展空间;二是把高教引进市场,推进高教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建构以综合性大学为总龙头,专业院校为分龙头的新高教体系,促进高教多样化、国际化,并进入初步大众化,走在全国前列;三是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新学科,推进大学与企业联姻,在大学与企业互动发展的基础上营造起广东的高新技术群,使广东形成新时代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广东与这些机遇擦肩而过的原因之一是观念问题。这在被认为观念最开放的广东显得更为突出,也表明新世纪广东高教在走向大众化、把握第三次发展机遇的过程中,更新观念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首先,广东高教必须走出那种过分学术化的传统教育观念,把高教发展与经济结合起来。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学术发展与社会需求是不矛盾的,没有学术深度的实际研究是不会产生出骄人的成果的,而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也必定行之不远。然而,在当今的广东,使学术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是观念的转变,是领导对发展教育的认识。第二,广东高教应当建立一套符合大众化发展要求的价值观,例如,走出高教投资依赖政府的思路,推行更加灵活的投入方式;走出大学生就业由政府包分配的观念,走出关门办大学的观念,把学生食宿让给社区,高校主要抓教学科研。此外还应转变以往对教学秩序的看法,把教育质量与学生的能力发展、创业精神联系起来。

一句话,广东高教大众化,首先应具有大众化高教的观念,大众化的教育思想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发展观,营造高教大众化的民众心理基础。

2. 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历史转变

广东高教大众化必然带来高教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00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等地的入学率已达到或超过15%。^③广东高教要在短时间内达到15%以上的目标,如按传统办学方式实施必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严重困难:如政府投入要大量增加,这势必影响政府的预算总盘;高教的基本建设,包括师资、设备、教室都一时难以跟上,甚至会造成某种对教育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而这种传统办教方式的症结是以计划为主的政府办教模式。推动这种机制的转变,实现市场竞争机制的高教运营,这不仅可以实现高教资源的最大优化,促使高教投入多渠道发展,而且能促使高教按发展规律办学,真正实现高教的多样化和国际化。

3. 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创新

广东高教在短时间内要实现较大飞跃,必须推动高教体制的重大创新。广东高教未能较好地适应广东的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与全国教育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自动力所造成。教育体制过于单调,无法与广泛的社会需求相适应,使高教缺乏必要的活力而丧失服务社会的基本兴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大跨步地从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迈进,但是高教仍然墨守成规,新办的高校则一律称其为职业技术学院,甚至至今仍无人能给这种学院的办学模式严格定位,这种办学体制严重挫伤了高教发展的内动力,既无法吸收社会资源办学,也使经济与教育的互动联系受到阻碍。在广东高教走向大众化进程中,高教体制创新,无疑是舒缓目前各种紧张因素的重要一环。

广东高教只有着力于改革,解决这些问题,才有望高质量地尽快实现大众化的目标。

四、广东高教走向大众化的基本形式

从广东实际出发,广东高教大众化的进程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意义的发展和变革的过程,就现在的认识看来,大致有以下形式特征。

1. 逐步的阶段性发展

广东高教大众化有可能加快,实现跳跃式发展。但是从历史看来,教育的这种跳跃式发展似乎在广东或中国还困难重重。广东的经济发展似乎很开放,但教育却受到各方面制约,显得过于拘谨保守。这使广东高教大众化缺乏一定的观念基础和精

神准备。在目前情况下,广东高教大众化最可能的形态是,在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的压力下,呈现出逐步推进的阶段性发展:入学率2005年将达到16%,2010年达到20%,以后很可能是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至2020年达到30%以上,基本达到较成熟的大众化发展阶段。美国和日本等高教大众化的阶段都非常明显,美国60年代的10年间使高教进入大众化,达到在校生1150万人,入学率超过了35%,以后稳定发展,直到1995年才达到50%以上;日本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使高教入学率从10%达到35%以上,以后稳步发展。阶段性发展较符合广东的实际,广东今后10年是高教大众化的关键阶段。

2. 遵循世界高教大众化发展规律,推行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运行机制

广东高教大众化是一项大工程,应大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决不是由政府包干教育,而是有目的地引导高教进入市场,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高教。政府除全力支持需要重点支持的重点大学项目外,各大学的发展都应由市场加以调节,而政府重点建设部分也同样需要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优化,避免为了大众化而大众化。

3. 实行分类指导,多样化发展

广东虽为一个省,但情况复杂,发展水平差别很大,高教大众化进程中还应分类指导,倡导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一是沿海地区应建立更加密集的高教体系,注重对广东未来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高科技学科,重点扶持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而两翼及山区则重点发展职业型技术性学科;前者重在基础技术研究,重于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后者重在技术开发应用研究,重于专科和本科教育。从广东的省情看,基础技术研究的学科与技术应用开发研究应为3:7或4:6。

在分类指导之下,广东高教应大力倡导多样化办学。现行的以国家办学为主的政策应当重新定义。国家办学为主,并不是国家办学最多,而是以办重要学校为主,以国家教育政策为方针。同时,应大力倡导发展私立、民办等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充实和完善广东高等教育体系。新成立的私立院校除了职业技术学院外,还可办其他类型或其他

性质的高校。特别是，还应支持与境外著名大学合作办学。在深圳等沿海投资的重大项目，都应当倡导企业办学、办高校，如大亚湾中海石化项目上马，应倡导引进项目的同时，也必须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引进培训体系的方式，兴办有专业性质的科技人才培训机构。省政府应颁布有关政策支持各地兴办各种大学园区或大学城，并努力使之完善，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4. 高教整体规模扩张

广东高教大众化的另一重要实施形式是，前期办学规模迅速扩张。这种规模扩张对公办高校而言是创办高级别的巨型大学，而对新办的私立院校则主要是数量增长。对研究型大学而言，高教规模扩大主要是新学科、高质量水准学科的增加，而对于其他高校而言，则主要是普通学科的数量增长。对于正规高等学校而言，是扩大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社会成人生源的招生数量，而对于企业办学而言，则主要是招收某一行业人员的生源，扩大行业从业者受教育的总量。从广东目前投资教育的力度看，到2010年私立和民办高校必须达到公办的2倍以上，才可能为高教发展建构一个较为合理的发展空间。

5、建构龙头大学和龙头型高教体系

广东高教大众化不是平均化发展，而应当采取有重点发展和有计划普及的互动模式。即在创办龙头大学的同时，建构一个以专业系列为构架的龙头体系，如在发展以中山大学为综合性大学的主体龙头大学时，发展华南理工大学为理工类院校龙头，华南师范大学为师范教育类龙头、华南农业大学为农林教育系列龙头等。各系列龙头对省内该系列下游院校的发展起指导、扶持作用。综合性大学除发展自身特色的龙头专业外，应有目的地发展一批基础性研究学科，而系列龙头院校应根据专业实际和下游院校特点建构起有相应分工的、多样化、层次合理的专业结构体系，满足产业不同层次对人才的需求。^④

①参见《羊城晚报》1999年7月。

②参见《扬子晚报》2001年2月24日。

③参见《北京青年报》2001年2月23日。

④冯增俊：《广东高教现代化在现阶段的基本策略》，《高教探索》1998年第4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经济强省

——广东社科界“建设经济强省”座谈会纪要

6月18日和6月26日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联合召开专家座谈会，分别就建设经济强省和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进行了研讨。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现将会议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与会代表认为，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目前广东充其量也只能称作经济大省而非经济强省。广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556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1/10强。与此同时广东的个人储蓄存款也超过了1万亿元，广东的进出口也占了全国的35%。但经济总量大并不等于强，与会代表认为，经济强省体现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国际竞争力的强化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而目前我省的竞争力还不够强，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竞争力不够强主要体现在缺乏强有力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1998年以来以30%的速度高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虽然超3400亿元并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其产业中许多产品的核心技术和自有知识产权的比例并不高，尤其是IT行业，规模大，产值高，但其技术的原创能力却非常低。代表们认为，广东今后面临的竞争将是产品核心技术的竞争，在科技创造未来，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大而不强将无法取得竞争优势，也将无法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谈到如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再创新优势，有部分专家认为，体制的创新非常重要，要实现向经济强省的跨越就必须紧紧抓住改革这个关键。他们认为，相对于全国来说体制优势是广东最大的优势。广东经济发展20多年的成功实践，就是靠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两个轮子驱动的，广东要再创新优势同样离不开这两个轮子。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体现在珠三角与粤东、西两翼以及粤北山区的经济差距上。目前，广东现有50多个山区县，土地面积占

全省66%，人口占全省40%，但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7.5%。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7%，外贸出口占2.9%，珠三角人口与面积分别仅占广东总量的30%和23.4%，经济总量却占了全省的70%，居民储蓄存款的76.6%，经济增量的80%和财政增量的90%，两翼、山区农民与珠三角地区农民的收入相差达6倍。而且这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全省的差距还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珠三角与16个贫困县GDP差距1990年为10.4倍；1995年为21.4倍；1999年为27.6倍。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在分析广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时，有学者认为是因为欠发达地区不具备在经济上同珠三角的“市场联动机制”，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珠三角的繁荣与落后地区显得不相干，二者之间的二元结构非常明显，既看不到前者对后者渗透效应中的跟进效应。长此以往，粤西、粤东、粤北山区在广东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有可能被逐渐“边缘化”。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由于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区域发展出现先后快慢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落后地区还有可能继续成为各种资源净流出的地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不平衡的原因关键在观念的落后和人才的稀缺，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之所以能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就在于广东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落后地区现在是“凤凰落地变成鸡”留不住人；出去的人也不愿回去，这样就形成和加剧了经济的恶性循环。地区经济发展愈发不平衡。

如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学者认为，政府要善于驾驭市场经济规律与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让珠三角这类具备条件的地方，充分利用先发

优势,加快发展,更好地积蓄辐射和带动欠发达地区的能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龙头带头作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运用政治优势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调节的盲点,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促进欠发达地区跟进发展,这将有利于发达地区培育经济腹地,提升产业结构,拓展市场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他们认为,实现区域发展的相对协调,是不同地区的相互促进和资源互动,是不同地区之间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另有学者认为,要有效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关键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市场联动机制”,在强调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时,决不能以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为代价,要破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坚定不移地加快珠三角城市化的进程,最大限度发挥珠三角的辐射作用。对于具体如何缩小差距,实现平衡发展,与会专家提出了几条具体建议:(1)为欠发达地区作好科学规划,欠发达地区也应以市场为导向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辐射,并根据市场的需要挖掘潜力,进而有效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2)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构建全区域信息系统,从总体上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素质,实现新的路通、财通。从而加快地区平衡的进程;(3)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切不可将扶贫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要将扶贫措施制度化、效益化;(4)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落后地区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用好人才。(5)认清比较优势,确定东西两翼和山区的支柱产业。

专家们普遍认为,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掌握协调发展的力度有一个时机问题。从广东的实际来看,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就目前来说,我们还应该统观全局,把眼界拓宽些,将协调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国际范围来考虑,要把南中国海沿岸地区、华南、华中、西南、香港地区列入通盘考虑的协调范围内。

与会代表认为,要建立经济强省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协调是重中之重,在这方面主要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1.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2.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3.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4.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伴随着城市化出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外省民工对本地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冲击问题等等);5.科技创新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6.经济结构调整中跨越式发展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系;7.中心城市带动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8.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在实现向经济强省的跨越过程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政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与会代表认为,我省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切不可头脑发热,一轰而上搞新的大跃进。(广东经济学会:雷比璐)

2002 年“生态圈与人类文明” 国际论坛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9-0160-01

2002年6月3-4日,由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联合主办;肇庆市旅游发展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肇庆旅游研究所承办的“生态圈与人类文明”国际论坛在中国肇庆举行。

在“生态圈与人类文明”的主题下,专家们运用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生态文明发展阶段作出较为科学的判断;结合肇庆特色,对自然、健康、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生态旅游与休闲经济及其文化等问题展开互动式交流。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们论辩思路开阔,讨论的问题深入、集中。现将本次论坛研讨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注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圈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研究员认为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圈。工业革命以来,地球被大规模的破坏,而人类现在的文明已经出现了危机,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是传统的以物质财富周转为中心,以个人创造的文明观,根源于自发的发展方式,因此,人类摆脱发展的困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人类的文明观念。改变人类的文明观念主要有四个方面。(1)调整 and 改变我们的发展价值观。(2)调整 and 改变我们的人类观,也就是人类对自己的看法的改变。(3)调整 and 改变我们的自由观。(4)调整 and 改变我们的伦理观。二是改变人类发展的方式。改变人类的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和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方式。过去我们的发展方式是单向的。在人类获得利益的同时损坏了自然,需要建立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与自然界交换的方式,即是互动共用型的。同时人类也改变自

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多地注重于物质,而忘记了有人类本身更本质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我们应当是适当地发展物质财富,在合理的物质财富基础上,支撑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二、发展生态旅游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傅崇兰研究员认为区域生态的健全是城市生态健全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生态环境中的一环,它是区域生态环境的一个细胞,应当把城市的生态与区域的生态联系在一起研究,从保护环境区域观来理解,它是一种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复合性概念。一个城市须与整个区域的发展结合起来。(1)积极的、辩证的科学地对待生态保护和环境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把发展经济可能带来的破坏或对环境的影响与保护环境统一起来。(2)应该加快科技进步,科技是建设生态的主导之一,种植业、水产业尽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为生态产业创造条件。(3)加快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4)加强群众参与意识的培养。(5)坚持开发项目与保护环境评价,特别是生态环境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研究员谈及生态圈与人类文明时认为旅游正好是这两个概念的接交点,生态环境是赖以发展旅游的基础,而旅游的发展只会促进人类文明。(1)生态旅游不是大众旅游,或者说大众旅游不是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则以提高旅游素质、保护环境为主要特色。(2)不是所有的自然旅游都是生态旅游。生态旅游主要的目的在于旅游过程中达到保护的目的。(3)生态旅游不仅仅是在自然环境里,在特定的文化领域、特定的民族区域里,生态旅游只是一种产品,

信用立市 品牌兴市 实业强市

——第二届汕头特区论坛综述

陈汉初 黄育新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 汕头 515000)

由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名优企业协会和市商标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汕头特区论坛于6月27日在汕头举行。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特级教授王珏, 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经济学家曾牧野专程莅汕作学术报告, 汕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荣汉同志代表汕头市委、市政府讲话。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45篇, 来自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社科院、汕头大学、汕头市委党校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工作者, 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打造汕头名牌, 建设信用城市”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面向新世纪, 汕头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的部署, 审时度势, 及时提出了“信用立市、品牌兴市、实业强市”的经济发展理念, 启动城市信用体系建设, 大力推进品牌兴市发展战略, 完全符合汕头实际。与会学者的论文,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实施品牌战略是迎接入世挑战的重要手段。二是实施品牌兴市战略, 是增强汕头经济特区综合实力的需要。三是实施品牌兴市战略, 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四是实施名牌战略, 有利于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东西两翼齐飞。

在论坛上, 与会者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是名牌——品牌——信用的关系问题。几乎超过一半的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自己见解。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品牌是信用的最佳载体, 创名牌就是树信誉。有学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WTO的经济架构中, 信用的载体和标识符号对企业而言就是名牌, 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品牌, 品牌的特殊效应说到底是其知名度在起作用, 是信用在起作用。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品牌效应, 在整个经济活动中, 可以代替多种传统经济手段, 起到很多传统经济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 创名牌的过程, 实际也就是把经济建设和信用建设紧密结合的过程。张平增认为, 名牌包括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和名牌商标三个方面的内容, 品牌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一种身份、一种时尚和观念, 企业要以争创名牌作为追求目标。

2. 打造强势企业, 精心构建名牌主体。汕头市委党校的学者认为, 在名牌商标、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三者相互渗透产生名牌效应的过程中, 企业作为创业主体起着主导作用。事实证明, 企业经济、

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 可持续旅游发展才是所有旅游的原则。当今世界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有两种, 一是欠发达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 这类国家现在是通过观赏、游览野生动物等旅游形式, 形成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二是发达国家有经济实力, 通过旅游保护环境, 人们的责任感很强。

三、自然、文化与旅游之间的关系

美国夏威夷大学生态与健康系教授 Dr. Bruce Wilcox 以夏威夷作为案例阐述自然、文化及旅游三

者间的关系。夏威夷是美国唯一一个太平洋岛屿省份, 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 自然、文化和经济是完全独立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夏威夷的经济依赖于旅游业, 其成功经验值得肇庆在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加以借鉴。最后, 提出了生态健康的概念, 认为该概念提供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结构。(执笔: 庄伟光等)

责任编辑: 郑红军

学术研究

地域经济、行业经济、民族经济的振兴与腾飞离不开一批享誉海内外的龙头企业。实施名牌战略，理所当然必须致力于构建名牌的主体，即在打造名牌企业上下功夫。大印象集团总裁郑定平等来自企业界代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企业改革是打造名牌企业的基础，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是打造名牌企业的关键，诚实守信是打造名牌企业的根本。讲信用，重信誉，是企业特别是名牌企业的立身之本，兴业之路，成功之道。

3. 创立名牌产品，推进品牌工程。与会者认为，名牌企业的产生，需要以名牌产品为依托。名牌的创立、保持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的信赖和好评。实施品牌工程，应以创立名牌产品为重点和突破口。汕头企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必须学会实施全方位品牌管理，建立有效的品牌管理机制，加速品牌形象的建立，对品牌给予适当定位，把品牌维持作为品牌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创名牌难，保名牌更难。因此，与会不少专家呼吁，企业不仅要争创名牌，更要懂得维护名牌，要视名牌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还要强化商标法律意识，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法律武器打好品牌保卫战。

4. 建设企业文化，注重“社会良心”。新华社高级记者王炜中认为，品牌兴市势必涉及企业文化，名牌、品牌，“品”字在先，这个“品”字可理解为企业文化。事实证明，高尚的企业文化能够造就出优质的品牌，企业的品牌渗透着企业文化的“基因”。企业品牌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大力弘扬诚信的企业道德。总之，没有道德“含量”的品牌一文不值，只有切实加强文化建设，优、特品牌才能货真价实，长盛不衰。汕头大学商学院王关义教授认为，信誉和良心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重要软件，任何企业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赢得竞争优势，保持良好的成长性、稳定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必须牢固树立信用意识，讲求“社会良心”。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1世纪企业管理的基本趋势和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建设企业文化、创立企业品牌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政府如何加强自身信用建设，为实施名牌兴市战略创造良好环境，成为这次研讨会的又一中心话题。来自汕头大学的专家指出，政府示范，推动社会，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政府应该正视自身信用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定位。政府的价值在于为公众谋福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更应如此。政府应该按照为民服务的价值定位来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也有专家认为政府必须为企业创名牌创造和提供条件。要制定名牌产品的总体发展规划，帮助企业选好创名牌突破口；要构筑有利于创名牌的良好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加大名牌企业产品宣传力度，消除各种不利于创名牌的因素。

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品牌产生和培育的社会信用环境呢？刘锦庭认为，要始终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和宏大而又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来抓，把汕头建成全国信用最好的城市之一。加快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和个人信用档案，全面推进信用道德、信用网络、信用法制、信用市场这四个重点，走“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逐步推进”之路，并审慎处理好征信数据公开与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关系。李科裕认为，目前我市信用建设势头良好，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如立法方面相对滞后，信用信息的采集、评价与披露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和统一规范。孙良胜针对这一问题认为，应致力构筑信用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加强征信制度的立法、资信评估制度的立法、信用基础工作的立法、政府监管方面的立法，同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立法与执法等方面关系。汕头大学的学者认为，要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加强信用的法律建设，使诚实信用原则化、具体化、义务化。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打击信用犯罪，这是完善信用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曾开荣等认为，汕头要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必须弘扬优良文化传统，克服潮汕文化的弱质；克服小市民思想，大力弘扬大都市风范；克服关系情结，营造依法办事的氛围；克服“官本位”思想，确立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就是责任。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MD) 总体介绍

CDMD 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与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办与全国近 300 家博士培养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CDMD 具有覆盖学科广、文献量大、收录质量高、全文收录、每日更新、使用方式灵活等特点,是我国最具权威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 简介

CDMD 覆盖理工、农林、医卫、社会科学各学科,精选收录全国近 300 家博士授予单位,2000—2001 年的论文全文近 30000 册,其中“211 工程”高校的收录率达 80%。CDMD 按学科划分为 9 大专辑出版,今后,每年增加论文全文 20000 册。

2. 专辑清单

代码	专辑名称	专辑光盘	学科范围
M- A	理工辑 A(数理科学)	半年刊	数学 力学 物理 生物 天文 地理、测绘、资源 气象 水文 海洋 地质 地球物理学
M- B	理工辑 B(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	半年刊	化学 化工 矿冶 石油 天然气 金属及金属工艺 煤炭 轻工 劳动保护 环境 材料
M- C	理工辑 C(工业技术)	半年刊	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 机械 仪表 航空 航天 交通 运输 水利工程 农业工程 建筑 动力 原子能技术 电工技术
M- D	农业辑	半年刊	农业基础科学 农艺学 植保 农作物 园艺 林业 畜牧 动物医学 狩猎、蚕蜂 水产 渔业
M- E	医药卫生辑	半年刊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中医、中药 药 学 生物医学工程
M- F	文史哲辑	半年刊	文学 艺术 旅游 历史 哲学 宗教 体育 人物传记
M- G	经济政治与法律辑	半年刊	经济学 商贸 金融 保险 政论 党建 外交 军事 法律
M- H	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辑	半年刊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学 民族学 人口学 人才学 各级各类教育
J- I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辑	半年刊	无线电 计算机 自动化 新闻与传媒 图书情报 档案

3. 出版背景

学位论文与期刊、图书、报纸等文献资料一样,是记载人类创造的知识信息的一种重要文献类型。世界各国的文献信息机构都很重视对它的收藏与开发利用。我国在博硕士论文的收集、整理、开发方面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远不能满足国家信息化建设的要求。CDMD 的建设是在国家信息化建设战略方针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实行全面规划、统一标准、规模建库、资源共享。

4. 用途

- 1) 发展高等教育 特别是研究生教育事业,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
- 2) 推进科技工作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
- 3) 建设国家基础知识设施和国家创新体系。

5. 检索系统

- 1) 提供 CNKI 知识仓库分类导航与学科专业导航两套导航检索系统;
- 2) 提供关键词、中文题名、副题名、中文摘要、作者姓名、导师、全文、引文等基本检索功能;
- 3) 提供初级检索与高级检索两套检索界面,支持二次检索、多种逻辑组合检索等专业检索功能;
- 4) 提供中文简体、中文繁体 and 英文检索三种检索界面,支持中英文对照和中文简繁对照检索;
- 5) 提供论文全文的在线浏览、全文下载、保存、打印等功能,提供摘录功能。

6. 使用方式

- 1) 网上包库服务(WEB 方式):读者直接登录 CNKI 数据库交换服务中心网站(全国共有 10 个)进行检索;
- 2) 镜像站点方式:将 CDMD 数据库系统安装到用户单位的内部网络服务器上,读者在内部网上进行检索;
- 3) 全文光盘方式:将 CDMD 全文光盘(DVD 格式)安装在本单位的计算机或局域网上使用。

7. 更新周期

CNKI 数据库交换服务中心网站数据每日更新,镜像站点通过互联网或卫星每日更新,光盘每半年出版一期。

8. 软件环境

用户端: Window 95/98/ME/2000/NT/XP 服务器端: Window 2000/NT/XP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8008100946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大厦 1300 室 通信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 84-48 信箱 邮编: 100084

联系人: 张莉 联系电话: 010-62791829/30/31 E-mail: qklw@cnki.net

详情请访问: CNKI 电信全国中心 <http://www.cnki.net/> CNKI 教育全国中心 <http://www.edu.cnki.net/>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 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学术研究

月刊 2002 年第 9 期 (总第 214 期)

出版日期: 9 月 20 日

社长: 梁谓雄

主编: 刘斯翰

常务副主编: 郑英隆

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叶金宝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 510050

电话: 020- 83846163

排印: 广州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刊号: ISSN 1000- 7326
CN 44- 1070

网址: www.xsyj.com

电子邮箱: xsyj@xsyj.com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 64

国外代号: M 268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4.00 元